



白

·Blind
Flow·

二
市
场

马特 著

盲目

流动

BLIND FLOW

马特著

作者介绍

马特

自由撰稿人、历史遗迹探访者、前杂志编辑、独立音乐人经纪

2019 年 12 月发布第一本书《铁锈与孤岛》

网站：铁锈与孤岛 www.tiexiuyugudao.com

播客：北方废墟（网易云音乐电台、Apple 播客、喜马拉雅电台、荔枝电台同步）



致谢

感谢我的家人们，他们为我提供了宽松而美好的童年成长，也为我承担了很多压力，让我有足够的空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感谢所有在我的旅行探访过程中提供帮助的朋友们。

感谢钱赓、林嘉熙、Turbo、王鹤为本书提供视觉设计。

目录

书名的由来

前言

宁山哀与我的第一篇对话

马来半岛之旅

马六甲：东方从此开始没有秘密

吉隆坡：多族群社区共有

怡保：见证纷争

太平：平息之地

槟城：南洋小哈尔滨

伊斯坦布尔之旅

世界首都的中心

东方与更东方

多族群的精神空间

神圣的哀伤

奥斯曼帝国的世俗荣光

伊朗西部之旅

德黑兰：堆满灰尘

伊斯法罕：祖上有半个天下

亚兹德：琐罗亚斯德

霍拉姆沙赫尔、阿巴丹：战争与革命之火

舒什、舒什塔尔：古典时代的遗迹

大不里士：北方的革命者

乌鲁米耶、马拉盖、苏丹尼耶：湖边的蒙古人与基督

焦勒法、马库：山中的亚美尼亚人

加兹温：鹰巢下的故都

哈马丹：西部腹地

乌兹别克斯坦之旅

塔什干：苏联社会主义的样板

撒马尔罕：帖木儿大帝的尴尬遗产

铁尔梅兹：佛教遗址

布哈拉：经学院里的旅游市场

希瓦：沙漠中的强悍古城

浩罕：费尔干纳的富饶与牺牲

安集延：巴布尔凝视的悲伤

宁山哀与我的最后一篇对话

在瘟疫中完成书稿

关于本书的声明

本书为**非卖品**，读者可以免费获取阅读。本书**非公开传播**，唯一下载平台是我的个人网站 www.tiexiuyugudao.com，希望读者仅用于个人学习参考和小范围交流。如需公开传播或用于商业用途，请与本人联系。

我现已开通赞助捐赠，由于我的历史文化探访写作是非商业项目，只在公共媒体上提供免费阅读，所以欢迎赞助本人写作事业，非常感谢你。

另：如需获取本人第一本书《铁锈与孤岛》，请在我的个人网站下载获取，也可联系本人邮箱：846812993@qq.com，在我的个人网站中可以找到我的微信号。





盲目流动

一个无业游民自我流放的旅途

Matt X Turbo

《盲目流动》书名的由来

在我小时候，家长们经常教育孩子，“你要是不好好学习，长大就当盲流子”，盲流子的意思就是没有正式工作单位在社会上盲目流动的闲散人员，那时候正好赶上东北工人大规模失业，而且大学生开始毕业不再包分配，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闲人。后来经济状况好一点了，对这些社会闲散人员中一部分经常有活儿干的人有了一个相对体面的称呼，就是自由职业者。

直到今天在我的家乡，上点岁数的人们提到自由职业者还是会想到盲流子，因为我们的社会对“自由”这个词实在是太陌生了，如果没有稳定的工作单位，没有编制，甚至没有正式名头和社保，那就只能是盲流子。

这样算起来，我成为一个盲流子已经有四年了。在这四年里，我去了一些地方，寻找历史建筑遗迹，探访少数族裔和移民社区，并把这些整理记录成文章。

在很多人看来，我的探访写作就是一种盲目流动，渐渐我自己也接受了这个说法，我开始发现这其实是个褒义词，在这个时代里，能够有机会摆脱束缚盲目流动，是一件多么难得甚至奢侈的事情。人们相信瞎子算命更准，因为他们失去双目却开了天眼，在我的旅途中，我希望自己像个瞎子一样，能够摒弃目力所及之处的感官印象，在陌生土地上追溯自己过往的记忆。

我们总是生活在他人制定的秩序中，努力在并不利于自己的规则下获取更好的生活，这让我们从一出生就开始垂死挣扎，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度过勉强强平安的一生，这已经是很多人认为的福气了。我希望自己能够保持流动的状态，哪怕生活在鱼缸里，也不要到死都不知道鱼缸有多大。

我并非一个流浪者，也不适合流浪的生活，但我的探访旅行却是盲目流动

的，虽然每次旅行都有明确的主题和目的地，但我并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探索和思考出什么有价值的内容，也不确定这些是否能被记录和传播。这些年我开始接受，也许我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重要，也许我的作品并没有那么高的记录和传播价值。但那却是我能创造的指向我自己人格的东西，是我在这世上存在过的痕迹，我想把自己流淌过的水痕在完全干涸消失之前保存下来，也就是写这本书的目的。

这本书的副标题叫“一个无业游民自我流放的旅途”，算是对盲目流动的解释，与其说流浪不如说自我流放。在这本书里提到的四个地方，马来半岛、伊斯坦布尔、伊朗西部和乌兹别克斯坦，我把自己流放到那里，在陌生的地域和人群中回过头审视自身的困境，这些困境一部分是外界强加给我的压迫，一部分是我面对压迫的应激反应。

在北京以外乡人的身份生活让我更加关注自己与故乡的关联，我也在自我流放或者流亡当中才有机会更深入地审视自己所在的国家和土地，有了对比就让人怀疑那些曾经的理所当然是不是足够坚定，这是一个打破之后重塑的过程，如同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流放中找寻俄罗斯灵魂一样。

无数个我在这具躯体里倾轧争斗，一部分我被另一部分我流放到各地，我试图在途中重新聚拢自己的灵魂。

前言

我时常感觉自己的灵在漂流中，虽然并没有真的去过很多地方，却有很多地方的记忆荡漾在我的脑海中，如同已经去过很多次一样。真实的记忆和虚构的记忆叠加在一起，仿佛一具躯体内有多个不同时空的灵魂。

在北京生活，对于人与空间的体验是错位的。我深夜散步，走在如广场般宽阔的马路上，这些马路并没有缓解城市堵车的压力，却足以隔绝两旁，鸟都无法飞过对面。在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时候却会觉得城市太大人太少，人们被分隔成过度孤立的个体，彼此之间有互斥的磁场，偶尔相遇滑过互不融合。

傍晚地铁晚高峰，人们带着金属疲劳拥挤，发出叮叮当当的碰撞声然后四散，这时又会觉得城市太小而人太多，人群就像贪吃蛇，密集地绕成一圈圈轨迹，居民区、商圈、办公楼，最后凝固成一片，彻底锈死在这座城市里。

我是一个并不享受旅行的人，大概是不擅于社交，旅行总是伴随着一堆需要与人沟通的麻烦。但我好奇于人与空间的错位，我常常很难把周围的观察与体验和“生命”联系在一起，很多人似乎已经放弃甚至并不具备生物本能，克制压抑自己的进食、打斗、交配、繁衍，他们更像是高级的玩偶，有智能但是没有生命，被设计出来的社会功能性取代了生物本能，我不确定这是人类的进化还是退化。

我们身处一段暂时平静的时光里，就像吃了睡睡了吃的仓鼠，我好奇大自然里没有滚轮，仓鼠会如何跑动，如何觅食，如何交配繁衍，如何保护自己？我想去了解那些动荡中的人们，那些虚幻的平静被戳破后，人们显露出了真正属于生物的一面，拔下了插在脑后的那根管子。

2017年和2018年，我做了四次历史文化探访旅行，分别是中东铁路、新

疆北部、西康省和南满铁路。那些迁徙而来短暂定居又离开的移民，那些随着政治风向产生又消失的社区，那些遗留下逐渐废弃的建筑，背后都是人们的平静被打破，人们开始逃跑、战斗、挣扎、听天由命，这些也都在指向我们今天对过往历史的重新理解。

在 2018 年下半年，我计划把这四次旅行记录整理成书出版，取名《铁锈与孤岛》，打算行使一下公民的出版权利，留下我自己视角中这个时代存续的遗迹记录。然而在一年半当中，31 家出版机构拒绝了我，最后在 2019 年年底，我把这本书做成电子版免费发布。

在准备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我继续进行探访写作，又走了四条路线，分别是马来半岛、伊斯坦布尔、伊朗西部和乌兹别克斯坦。在我选择目的地的时候，一开始只是遵循本能沿着有灯塔指引的方向寻觅，直到走完这些路线，才发现其中的关联线索，殖民与移民、民族主义与共产革命、伊斯兰近现代变革、20 世纪的普遍残酷、地区乃至半个世界中心的没落等等。

悲观的人总是充满远见，他们能看到糖吹成的宫殿在融化，如果能够把时间看得足够远，任何故事都是以悲剧收场，或许还要加上惨剧。任何时刻都适合回忆和总结过去，因为黑夜从中午过后就开始了，在不可阻挡地走向衰败前的狂欢中，我希望可以记录和整理更多的个人文献，用于以后我们的子孙躲在地下庇护所里如鼯鼠一样生活的时候，可以翻出我的书，了解一些他们的祖辈去过的地方。

这本书是我这四次自我流放的旅途记录，有我沿途的见闻思考、探访的建筑遗迹描述，相关的历史背景笔记，希望可以分享给像我一样正在或即将自我流放的囚徒们。

在这本书中，有很多涉及宗教、民族、历史、社会的记录和观点，在这个时代，这些话题难免会引起争议，但我不打算避开这些话题，也不打算加上很

多遮遮掩掩拐弯抹角的废话，这对于写作来说会显得很真诚。如果有读者被书中的某些观点冒犯到，那只能说很遗憾，这就是社会，肯定有你喜欢的观点和你不喜欢的观点。我对待自己不喜欢的观点，方式就是写进自己的书里进行驳斥。对于不喜欢我书中某些观点的朋友，如果我的内容能成为你创作的反面素材，那我也是很高兴的。

在本书的整理过程中，有一个叫宁山哀的人提前看了书稿，提出了一些评论和意见，我们还就书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我觉得其中一部分评论和对话很有意思，也会对读者有所启发，我就把宁山哀的评论和我们的一些对话放进了书中。



宁山哀与我的第一段对话

宁山哀：感谢马特把我的评论发表出来，我重新校对了一遍，感觉自己说的一些话可能刻薄了点，但你的写作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本身就会遇到很多挫败，我这点刻薄也就不算什么了。当然你可以根据需要删减我的话，如果你不希望读者看到太多我对你作品的负面评价。

我：无所谓，反正也没几个读者，我觉得我们的一些对话，包括你的评论很有价值，对我的书表达否定意见也没关系。

宁山哀：你的书名解释和前言部分是最后写的，所以我刚看完，我稍微有点担心，你好像在试图合理化自己的偏执（当然对于作家和艺术家来说偏执也不算个缺点）。读完你的上一本书，我觉得你的价值观比很多年轻人都要更传统，你非常热爱世俗生活，赞美传统婚姻和稳定家庭，非常向往旧时代，抵触新鲜事物。

但是，你的行为和你的表达是相反的，你抗拒稳定的工作，无法主动建立亲密关系，长期从事理想主义事业，而且你虽然抵触新鲜事物但嗅觉却很灵敏，我惊讶你是如何自洽的。你在书名中提到的自我流放，是你有意识地让自己一直处于“外人”的身份和视角，你在保持一个很有趣的磁悬浮状态，非常靠近地面但就是不真正接触。

我：有很多朋友认为我所向往的那种传统生活是空想的，他们建议我不要追求稳定的工作与生活，干脆就去做真正的旅行写作，也不要追求婚姻和繁衍，他们建议我更自由地去丰富多样化的人生经历。

一些人的创作动力和素材来自个人体验，他们需要更自由地行走，更丰富的情感生活和性生活，更多样的人生阅历。但我并不需要这样，相反我认为人应该摆脱体验的束缚，不能让你的体验定义了你，“我是一个去过很多地方的人”

“我是一个情感经历丰富的人”等等，人的存在是先于体验的，是你的人格定

义了你的体验，而不是反过来。所以无论是旅行还是写作，我都不是为了获得更多体验，这些行为和我所追求的传统生活方式其实是一致的。有点像打猎，你看到的是我在山野中狩猎像个活在大自然里的人，但其实我一直居住在山下的村子里，狩猎只是我每天为家人获取食物的方式而已。

宁山哀： 你所说的“无需体验”是你在事后给出的解释，而不是你在事前就遵照的价值观。我前面说你在合理化自己的偏执，因为你是得在得不到之后说自己并不需要，但你不是真的不需要，也不是真的得不到，我相信无论是旅行写作还是情感生活性生活，对你来说并不是很难，你就是不愿意去做。我觉得你在趋向于不断重新解释自己的困境和矛盾，而不是试图改变。

我： 你认为我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向往和我现在做的一些事情，这两者是必然矛盾的。但我觉得这是咱俩对我所做的事情理解不同，在你看来这些事情代表了某种特定的新的生活方式，但在我看来这些事情并没有超过传统生活方式的范畴。我觉得这恰恰是人的开放性，我可以在创作上只接受我个人的认同，但在生活上遵循传统的方式。精神与肉体不一定要密不透风地贴合在一起，相反这两者存在间隔距离，精神追求不代表肉体实际要去过的日子。

宁山哀： 我并不是说你一定该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有着生活上的自由，也承受着创作上的限制，但你却在坚持创作的同时在生活上给自己设限。坚持创作值得鼓励，但你的生活可以和创作一样自由打破限制，这才是自洽的。我赞同精神与肉体可以不完全贴合，但要在一个方向上，不然早晚会彻底分离无法重新合并在一起。

我： 灵肉分离，人们一直期盼的就是精神能够摆脱躯壳的束缚而独立存在，如果人的心灵与现实生活可以截然区分，那也是实现了一部分的出窍神游，因此不朽。



马来半岛之旅

亚航凌晨两点的航班上，为了推销收费的毛毯把冷气开得很低，作为一个燥热体质的人，我原本是很享受冷气的，此时却裹紧了衣服睡不着。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出国旅行，谁能想到前往一个热带国家竟然要先经过一夜严寒，真是冰火两重天。

在飞机上，我回想起童年的时候出国旅行还是很罕见的事情，当时刚刚兴起“新马泰”旅行，最多也就是去韩国和日本，俄罗斯和朝鲜虽然离我们那里很近，旅游却并不便利，多是做生意的人去，欧洲和美国还是不可想象的。即便是“新马泰”，也只有条件很好的家庭才能前往，我的亲戚和伙伴中没有谁去过。

说起来小时候也并没有羡慕出国旅行，只当不属于自己的生活范围，现在来到马来西亚倒是实现了二十多年前的一件事情。想想那些二十来岁就去过十几个国家旅行的朋友，有一种由衷的遗憾和失落。这个世界上精彩的一切，我的一生已经度过了 30 年，却未能窥见一二。

我至今印象很深的是五六岁的时候，我舅舅去香港出差，带回来一个芒果，当时东北的南方水果还不多见，全家人都觉得很新奇，一人一小口分了。南方在一个几岁孩子的印象里是一片模糊的存在，我那时候以为过了黄河就都算南方，广东和马来西亚也没有多大区别，都和我们不一样，听不懂的语言，奇奇怪怪的食物，炎热的天气等等。我那时候想不到自己大学会去广东，更想不到之后会去更南方的马来西亚。

媒体上都说今年是经济状况很不好的一年，这可能同样意味着今年也是我余生里最好的一年。在我童年，故乡大量工人失业，那时大街上有很多修自行车的摊子，其实没有那么多自行车需要修理，只是失业的工人们没有其他能做

的事情，只好都去修自行车。在东北寒冷的冬天里，路边修自行车的几个大叔蹲在地上裹紧衣服，在一个柴油桶里用废木头和纸壳箱生火取暖，这是我记忆里总也挥之不去的一幕。

我那时候在想，热带地区的人会不会生活更容易一些，他们不用抗拒严寒，不用花更多钱买厚衣服，到处都是水果。后来看一些书里面说热带地区的生活是一种诅咒，因为获得食物很轻松，而且没有冬季，所以人们生产与积累财富的动力不强，社会发展水平就比较低。但反过来说，社会发展是否意味着人们生活一定幸福呢？社会发展带来的分配矛盾造成的苦难比社会不发展带来的苦难还要多，人们追逐物质欲望而互相整治的手段总比大自然的手段更加残酷。

我来到马来西亚之后，有时在热不透风的空气中会想起故乡的严寒。这里的人有一种与我的乡亲们不同的懒散，在东北的乡下有猫冬的习惯，类似动物冬眠，农作物一年只能收获一次，人们在秋天收获之后无论收成好坏都只能躲在屋里过冬。这种猫冬与其说是休息放松，不如说是小心翼翼无能为力的等待。热带人的懒散却是彻底的欢快，汗淋淋的肉体蒸发出情欲的气味，这里的人看上去确实比我故乡的人更加快乐一些。

我希望深入到这个热带国家里，了解他们快乐的原因，以及可能不快乐的一面。

马来半岛是一个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混居的移民地区，融合了三种不同的文明，还有不同宗教下的精神世界。同时，这里是亚洲东部殖民史的开端，欧洲人越过马来半岛就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东方，过往的相互交流与对峙变成了西方对东方压倒性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马来半岛又是一个前沿。

宁山哀：我读你上一本书《铁锈与孤岛》的时候，发现你每去一个地方总喜欢

对比自己的故乡，这很奇怪，你之前说大学离开故乡之后每年就回家一次，那么你这些年其实对故乡并没有太多了解和研究，为什么你总要提到故乡呢？

我：这是我感受当地的方式，我不喜欢全然陌生的东西，而喜欢从熟悉的角度切入，不同地区之间相似与差异的对照会刺激我思考。而且贯穿我旅行的主线也是不同地区之间文化上和历史上的连接，这些连接最后指向的就是我的故乡。

宁山哀：但这种思路会让你有意去关注目的地与你故乡的联系，而忽视了当地的独特性，可能有些联系是因为你的立场而牵强附会的。

我：故乡不一定是地理上我出生的那座城市那片街区，故乡包含了精神层面和群体意识。比如今天被称为中华民族传统的很多文化现象在我的故乡并不存在，我从小根本没见过，但这并不妨碍我在异域发现相似的文化现象时引起注意，比如马来西亚以闽粤移民为主的华人，他们和马来人一样跟我故乡差异很大，但我依然会有天然的特别关注。所以这种寻求联系的思路并不会忽视当地的独特性，而是让我有一个更广泛的视角去看待当地的独特性。

宁山哀：所以你不觉得应该超越自己的标签身份之外去写作，或者说，你不愿意跳出自己的地域、民族、国家身份之外进行表达？

我：我觉得不可能且没必要，身份不只是标签，身份是一个人的过往，你的经历、成长环境、受教育、家庭传统等等，只是表现成了标签而已。我不认为一个人可以摆脱这些，也不需要摆脱，一个人的视角来自他全部过往的积累，绝对中立客观的视角就是没有视角。身份标签是一定存在的，我想挖掘的就是我身上所有的身份标签塑造出来的我自己的视角。

马六甲：东方从此开始没有秘密

马六甲不是我在马来半岛旅行的第一站，却是我要讲述的故事的起点。15世纪中期之后，东西方的实力对比在果阿甚至霍尔木兹就已经决定清楚了，奥斯曼帝国无疑是基督教欧洲在东方唯一的对手，葡萄牙只需要几艘军舰和很少的船员就可以从伊比利亚半岛一路打穿非洲沿海和印度洋西部，马六甲也成为东西方已然分出胜负之后，下一步试探的地区。

当葡萄牙人从果阿殖民地来到马六甲的时候，西方人从此超越了亚历山大大帝保持了一千多年的东征极限，把东方拖进了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时代。在马六甲之后紧接着是澳门和长崎，葡萄牙人的探索最终和西班牙人控制的马尼拉连在一起，东方被西方人打通的航线贯穿，从此开始没有秘密了。对马六甲乃至马来半岛，这又是走进希腊-罗马世界的起点。

作为来自北方大陆的人，热带半岛在我眼中有着新奇的观感。虽然雨季已经过去，但空气依然湿热，那些与我故乡迥异的植被景观、深色皮肤陌生语言的居民，都让我想起大学所在的广东，事实上这里的部分华裔居民祖先确实来自广东。

驰来北马多娇气，歌到南风尽死声，在走出机舱感受到第一股热风时，我突然想到这句诗。吴旻在他的那本格斗教科书《手臂录》里写下了这句诗，感慨南方汉人不敌北方满洲人。如今我从满洲来到比吴旻的故乡江苏要向南更多的马来半岛，不知在南风中会听到什么声。

作为一座游乐场式的旅游城市，马六甲给我的第一印象既不是过往的殖民痕迹，也不是马来本地文化，而是移动互联网崛起带来的中国海外输出。司机把我送到城中心游客最密集的地标——荷兰红屋广场，这里是本地观光三轮车的集散地，人力三轮车上装饰着大量卡通玩偶来吸引顾客。我注意到每一辆车

都在播放音乐，而且全是抖音 APP 上面的热门流行曲。

我询问了一位车夫，他说中国游客很喜欢这些音乐，熟悉的音乐会吸引他们来坐车，而且抖音国际版 Tik-Tok 在马来西亚市场很大，本地年轻人玩的很多。我打开软件看了一会儿，不少中国几个月前流行的音乐或者情景段子，刚刚传到马来西亚不久，很多人在模仿拍摄。

旅游区三轮车这种面向流动游客的商业通常是最紧跟流行文化的，这样才能在高度同质化竞争中胜出，马六甲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曾经老殖民帝国建设的旧城中心，在曾经欧洲人到东方的征服象征——基督教堂与总督府面前，中国借助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先发，开始向外输出文化。

对于中国原子化趋向的社会，政府的言论禁锢和快速更迭的低幼娱乐让移动互联网传播几乎没有阻碍，互联网形成的新型社会关系开始取代已经瓦解的传统社会关系。中国的大型科技企业往往与政府当局绑定在一起，肩负着向海外输出新秩序的任务，这其中绝大多数是基础设施建设，石油、铁路、通信这些行业里的中国东印度公司在海外开辟新一轮势力范围。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先发为中国对世界施加影响开拓了可能性，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与精神错乱般的价值理念在政治高压管制中可以并行不悖，这实在是太阳底下难得的新鲜事。

宁山哀：这些快速更迭的低幼娱乐内容并不是中国独有或者原创，中国反而是创意输入地区。你这种担心是没必要的，那些网络自由的国家信息来源多元化，何况快速低幼是流行文化正常的发展方向。

我：这种自由在技术面前很可疑，比如你身边大部分人都使用微信，你可能明知微信和中国政府密切合作监控用户言论，但为了和其他人交流便利还是不

得不使用，你就要放弃自己的自由。在技术笼罩之下，人们会老老实实把自己的自由交出来，甚至你可能都意识不到自己把自由交了出来。中国在移动互联网和通讯硬件方面抢占了先机，当这种先机优势转化为大量用户之后，就会让中国政府获得更有利的条件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也会伴随着更符合中国政府利益的用户协议。

宁山袁：所以你不认为技术本身是中立的。

我：纯粹的科学理论研究可能是中立的，但技术大多不是中立的，因为技术有功能方向。过去可能存在个人研究者闭门造车做点小发明，也许一开始确实想不到这项发明之后会被用于什么。但今天大规模专业团队进行科研项目，特别是有政府或军方背景支持的，研究者肯定知道自己的研究成果将要用于什么，不可能是中立的。也许研究者本人未必认同某项具体的应用目的，但他对团队所属的国家当局至少是支持或者积极服从的态度。

说到中国对马来半岛的文化输出，要追溯到明朝郑和的航海行动。在葡萄牙人从果阿来到马六甲之前，马六甲处于中华文明的影响之下，虽然更早到来的是印度人，但是过于古老而且留下的痕迹不多。郑和对马六甲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他的到来导致了马六甲王国的诞生，也带来了在马来半岛第一批正式的华人移民。

当我到马六甲的时候，老城区大街上随处可见“郑和下西洋 613 年纪念”的宣传旗帜，是当地华人商会安排的。在荷兰红屋博物馆中，郑和下西洋也是一个重要的展出单元。跟随寻找郑和的足迹，我在马六甲首先前往的地方是三保山（Bukit Cina），三保山上大概有一万两千五百多座坟墓，除了大部分是华人的坟墓之外，也有少数马来人的墓，包括 1641 年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亚齐武士比迪之墓。

据说郑和下西洋来到马六甲，他的舰队就驻扎在这里，三保山得名于郑和的头衔“三保太监”，这个头衔有不同解释，一种说法是来自他的原名“马三保”，因为他是回族，“三保”来自阿拉伯语名字“沙班”。

关于郑和究竟是穆斯林还是佛教徒有所争议，一些人认为郑和是元朝云南长官赛典赤·赡思丁的后代，但也有人认为郑和的家谱墓志皆为后来攀附，他的祖上并无详细记载，大概就是某个普通的色目人后裔。但这至少意味着对郑和而言，从明朝向西并非是陌生的世界，他可能通过来自西亚的商旅知道了很多关于南海和印度洋航行的情况。

我来到三保山脚下，首先看到的是一座“马六甲华人抗日义士纪念碑”，这是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反抗日军侵略而殉难的华人。1947年，马六甲华人社团树立了这座纪念碑，并请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题词“忠贞足式”，意思是忠诚与坚贞足以成为榜样。

在纪念碑旁边有一处文物，让我感觉马来人眼中明朝与马六甲的关系也许与华人理解的不太一样。这处文物叫汉丽宝井（Jin Puteri Hang Li Poh），周围有石头围墙围住，井口直径大概两米，用铁丝网遮住。

这口井有一个中国人不太熟悉但马来人很熟悉的故事。在马来的历史书《马来纪年》中记载，马六甲第六位苏丹满速沙（Sultan Mansur Shah）统治时期，马六甲王国达到全盛，明朝皇帝在1459年将一位名叫汉丽宝的公主嫁给满速沙。这座三保山是苏丹送给新娘和500名随从的礼物，让随从们定居在这里，并且挖掘了这口井，这就是马六甲第一批华人移民。

葡萄牙人征服马六甲之后，这口井成为殖民地城区重要的水源地，后来荷兰人修建了围墙保护这口井，英国人来的时候被逐渐废弃了。

在马来历史中把这件事情当成马六甲与中国重要的交流标志，但是在中国

的历史中并没有这段记载，也没有汉丽宝公主这个人，明朝皇帝并不姓汉，汉丽宝的“汉”可能不是姓，而是指代华人身份。马来西亚当地华人觉得这是马来人杜撰的故事，因为汉丽宝公主嫁过去的时间距离郑和最后一次航海已经过去几十年，明朝没有大规模航海也不把东南亚当成重点，根本不会嫁公主过去。

在中国的记载中，马六甲与中国在隋唐时期就有通商贸易，明朝时期马六甲被称为“满刺加”，一位苏门答腊巨港的王子拜里米苏拉（Parameswara）从满者伯夷的统治下逃到淡马锡自立，后来落脚到马六甲，臣服于暹罗。马六甲建国的時候，也正是明朝强盛的时候，马六甲希望借助明朝的力量摆脱暹罗的控制。永乐皇帝登基的那一年（1403年），明朝使者来到马六甲，拜里米苏拉派人跟随前往明朝进贡。

明成祖朱棣封拜里米苏拉为满刺加国王，马六甲成为明朝的藩属，不再服从于暹罗，马六甲王朝从此开始。1412年，拜里米苏拉跟随郑和的返程船队前往明朝觐见皇帝。1414年，马六甲王国第二位君主登基，称伊斯甘达沙（Iskandar Shah），伊斯甘达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意思，沙是波斯君主的称呼，也是伊斯兰政权统治者名号。

在荷兰红屋博物馆里专门介绍了马六甲与中国之间的交往，我注意到其中几幅画，描绘的是马六甲与明朝之间的关系。

其中第一幅内容是明朝公主来到马六甲，向马六甲苏丹下跪，旁边站着明朝使臣，苏丹的大臣们在两边坐着。第二幅是苏丹前往明朝觐见皇帝，皇宫非常小，而且画作特意选择了马六甲苏丹刚刚走进皇宫的角度，并没有表达觐见的时候是站立还是跪拜。第三、四幅是明朝使臣来到马六甲，从画面构图上看使臣和苏丹都是站立的，使臣地位与苏丹的大臣们平等。

在这几幅明朝和马六甲关系的绘画之后，是表现阿拉伯商人与马六甲关系

的绘画，以及伊斯兰教传入马六甲。从绘画中人物站位看出，在马六甲的阿拉伯人与中国人地位基本等同，可能阿拉伯人的地位还要更近一点，因为有阿拉伯教士与马六甲苏丹对坐着探讨宗教的绘画，但是涉及明朝的绘画，没有双方坐着的，都是公事公办的站立。

在马来西亚，各个君主州到处悬挂的苏丹照片和展示苏丹生活的博物馆，让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君主传承的国家。相对于今天中国人更熟悉的领袖崇拜，君主崇拜不是来自实在的权力，而是更深层的法统。

对于这种崇拜的理解，我要去探访一个传奇故事，这个故事未必全部都是真实的，但故事里的人却是存在过的，他们的陵墓就在马六甲市区。

汉都亚（Hang Tuah）与汉惹伯（Hang Jebat）的故事或许可以让我了解马来社会的一部分精神世界。我在马六甲老城区的小巷子里寻找汉惹伯的陵墓，在满街的旅游商店中，一扇白色小铁门很容易被错过。他的陵墓由白色石料建成，低矮的墓葬上有小小的白色石头亭子，墓葬非常简单，没有过多装饰。汉都亚和汉惹伯是马来历史中著名的悲情英雄，他们之间有一个关于忠诚和正义的思辨故事。

汉都亚和汉惹伯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年轻的时候击败了海盗，得到了马六甲苏丹的赏识，汉都亚成为海军司令。后来汉都亚被指控与公主私奔而被判处死刑，但是并没有执行，一位大臣藏匿了他。可是汉惹伯并不知道此事，以为苏丹处决了自己的朋友，就造反刺杀苏丹，没人能够阻挡他。这时候大臣们告诉苏丹，汉都亚并没有死，只有他能挡住汉惹伯。苏丹把汉都亚找了回来，汉都亚杀死了想为自己报仇的好友汉惹伯。

这个故事在马来历史中很著名，汉都亚与汉惹伯兄弟相残历来都是一个关于忠诚与正义的讨论。汉都亚代表了马来上层社会的价值观，对于统治者的忠诚高于一切。在今天看来，明明是汉都亚背叛了汉惹伯，何况汉惹伯是为了给

他报仇，汉都亚是毫无义气的愚忠。但在马来传统价值观的解读中，汉都亚杀死汉惹伯是因为汉惹伯不服从苏丹，反叛君主是对社会秩序根基的破坏，会带来更多的无辜杀戮。

汉惹伯有一句著名的口号：王贤则尊，君暴则抗。在上世纪 60 年代之后，正面描写汉惹伯的文学影视作品增加，他成为一个反抗暴政的起义者形象。

引申到马来人与华人的关系，最早来到马来半岛的华人效忠的是更上位的明朝皇帝，而非被皇帝册封的本地国王。对后来移民的华人来说，乡绅治理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移民群体江湖气息浓郁，更加强调对义气的尊重，对本地苏丹不会有太多的忠诚。在马来人看来，对于君主的忠诚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华人与母国的关联以及内心对本地法统与文化的抗拒，让马来人认为华人冒犯了本地君主，这种“不忠诚”就是“不正义”的。

不过关于这两位传奇人物，在当地有一种说法，他们可能并不是马来人，而是来自中国闽南地区的华人雇佣兵。因为 Hang 这个姓氏可能是闽南的“洪”姓移民，“Tuch”在闽南语中就是大的意思，汉都亚就是洪老大。他们一起从小玩的几个伙伴还有汉卡斯都里（Hang Kasturi）、汉叻基（Hang Iekir）、汉叻古（Hang Iekiu），更像是一个同乡兄弟会。也有人认为“汉”不是姓，而是他们的华人身份，后面的名字是他们原本的汉名马来语音译后的叫法。我在马六甲苏丹博物馆的华人解说员那里得到了对于这些说法的非正式认同，当地人告诉我马来政府在 90 年代之后的教科书中删除了这两个人的内容。

汉都亚与汉惹伯的故事是一个很典型的“忠”与“义”的思辨，“忠”代表着对秩序的维护，认为秩序是幸福的前提，维护秩序有了天然的合法性，即“糟糕的秩序也比秩序瓦解要好”，这也是大部分专制或威权统治所宣扬的，他们会极力鼓吹秩序的重要性，夸大秩序被破坏的严重后果，让人们不敢轻易动摇和打破一个糟糕的秩序，哪怕这个秩序显而易见对民众不利。

“义”则是把秩序分布到个体身上，个体之间的连接契约也是秩序的一部分，而且是更基础的秩序。如果维护社会集体的秩序一定要打破个体之间的秩序，那么错的不是个体，而是集体秩序本身有问题，这个“义”是符合道德的，而“忠”则是强迫人违背道德。人们应该优先尊重个体之间的秩序，然后是家庭、家族、社会，最后也是最弱的才是国家的统治秩序。

宁山哀：我觉得这里有一个不太恰当的延伸，把忠于君主和遵守社会秩序放在一起。我认为遵守社会秩序是没有问题的，社会秩序应该高于义气，所以包庇就是一种犯罪嘛。

我：忠与义并非对立，而是关于秩序的两个层面。集体并不仅仅是个体的集合，而是本身拥有巨大权力的秩序系统，只有人们对个体之间秩序的认同高于对社会集体秩序的认同，个体才不会被集体碾压，强调义气是为了不破坏个体之间的秩序。包庇并不天然就是犯罪，古代有“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亲人之间互相藏匿是不会受制裁的，法律不能突破人伦，非血亲之间为了义气而包庇，虽然要受到制裁，但却获得了道德上的肯定。

宁山哀：但是这种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破坏会侵犯无辜的人，你不能因为社会秩序系统拥有权力，就认为这种权力一定对个体不利。很多时候人们需要被社会秩序保护，比如一个杀人犯因为被朋友包庇而逃脱追捕，对于受害者来说就是伤害，正义就没有得到实现。

我：我们今天为什么禁止刑讯逼供？因为虽然破案是为了实现正义，但“禁止刑讯逼供”被认为是正义的一部分，所以即使为了破案也不能这么做。同样人与人的亲密关联（包括血缘、婚姻、义气）也应该是正义的一部分，不能为了实现别的正义而破坏了这部分的正义。



离开汉都亚与汉惹伯的陵墓，我漫步在马六甲老城，虽然汉丽宝公主的故事不太可信，但郑和确实带来了马六甲最早的华人移民，这些移民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娘惹峇峇（Nyonya-Baba）。娘惹是女性，峇峇是男性，他们通常被当成华人，但准确地说是华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叫土生华人，也叫海峡华人。在马六甲有一座 19 世纪的宅子，现在是娘惹峇峇文化博物馆，可以了解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历史。

郑和的航海行动中曾经多次在马六甲停留，后来把马六甲作为舰队休整的营地。舰队的一些随从和水手长期驻扎在这里，和当地人通婚，开始定居繁衍，他们的后代就是娘惹峇峇。明朝中后期逐渐衰弱，不再进行大规模航海活动，进而关闭了航路。这些滞留在马来半岛的娘惹峇峇群体由于交通不便、政府闭关海禁政策等因素，开始与明朝母国关系疏远，逐渐失去了来往。

在与马来本土文化接触越来越密切之后，娘惹峇峇逐渐形成独立的族群，他们的母语也由最初的华人方言慢慢开始夹杂马来语，但依然保留了华人的风

俗仪式。在 1960 年之前，娘惹峇峇被视为马来土著民族身份，后来新的身份识别中被归为华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国被迫接受英国的要求，允许本国人出国务工。由于当时英国人开发马来半岛需要大量的劳工，很多华人前往马来半岛从事矿工和种植工，马来半岛开始出现了第二批华人群体，也是今天马来西亚华人的主体。

在英国殖民时期，由于这些娘惹峇峇已经在马来半岛定居很久，通晓马来语和马来习俗，又能联系华人群体，同时受教育程度较高，所以很多人在英国殖民政府中担任公务员，周旋于英国人、马来人和华人之间。这些娘惹峇峇中一些人逐渐融入英国社会习惯，皈依了基督教，他们也是马来西亚对英国殖民统治最认同的群体。

在融合中，娘惹峇峇接受了一部分马来习俗，一些娘惹餐馆是清真的，这在纯正的华人餐馆中很少见。娘惹菜非常擅长将马来人与华人的烹饪方式相结合，大量使用马来本地香料，尤其擅长烹饪鸡肉与海鲜。

我在马六甲的一家娘惹餐馆品尝了当地的鸡粒饭团子和一种臭豆子调味的鱿鱼，饭团子有种海南鸡饭的味道，臭豆子是本地特有的调味食材，从没吃过这样的味道，有点怪怪的好吃。这家店好像比较出名，墙壁上贴满了当地报纸采访他们的新闻报道。

我住的旅馆前台服务员推荐给我这家餐馆，她是个华人和印度人的混血，中文讲的不错，她为我在城市地图上标出了旅馆附近好吃的。我住的酒店周边看似有些空旷，却是传统华人住的街区，晚上有好几片华人的大排档，远一些的地方还有道光、咸丰、光绪三朝的华人墓地和殖民者修建的圣约翰炮台。

宁山哀：正宗的娘惹菜比你吃的这些要丰富很多，比如叻沙、椰浆饭、乌达烤

鱼，还有一些甜点比如娘惹糕和煎蕊。你要吃娘惹菜最好去檳城，吉隆坡也有不错的偏现代一些的。

在娘惹峇峇与母国逐渐失去联系的明朝中后期，葡萄牙人到了马六甲，把马六甲带进了一个新的世界里。为了找寻葡萄牙人留下的殖民痕迹，我来到福摩萨堡，这里是马六甲游客最多的地方之一。福摩萨（Formosa）这个名字中国人非常熟悉，台湾就曾被称为福摩萨，这个词在拉丁语中是美丽的意思，葡萄牙人把航海中发现的很多地方都称为福摩萨。

福摩萨堡是葡萄牙统治时期尚存的遗迹，也是马六甲的标志性历史建筑。如今福摩萨堡剩余的只有正门部分，红砖墙体，正面的草地上有几门老式铜炮，城堡正门和后门上方都有浮雕，雕刻着帆船、火枪、传教士和士兵，很有殖民建筑特色。

1511 年葡萄牙舰队击败了马六甲王国末代苏丹马末沙（Sultan Mahmud Syah），占领了马六甲城，苏丹逃亡。为了防范苏丹反攻，葡萄牙人在圣保罗山下面修建了这座堡垒，还有城楼和炮台。到了 1526 年，一支葡萄牙舰队远道而来摧毁了马六甲苏丹最后的基地，马六甲王国被彻底占领了。

马六甲被占领后，彭亨苏丹阿都加米儿（Sultan Abdul Jamil）由于亲缘关系支持马六甲复国，马末沙苏丹继续抵抗，并派遣使者向明朝求援。然而明朝此时无力支援，马末沙苏丹独自发动了多次复国战争，均以失败告终。

1528 年马末沙苏丹最后一次复国战争失败，两年后去世，王子阿拉乌丁·利雅沙二世（Alauddin Riayat Shah II）在南方的柔佛继承王位，但对复国已经不抱希望。1536 年，阿拉乌丁·利雅沙二世与葡萄牙人议和，结束了 25 年的复国战争，马六甲王朝彻底结束，柔佛王朝开始。马末沙苏丹原本的王储，吉兰丹公主所生的目扎法沙（Muzaffar Shah）则前往北方的霹雳，成为第一位霹雳苏丹，王位一直延续到今天。

柔佛王朝建立之后，马六甲海峡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状态，分别是柔佛王国、葡萄牙殖民地和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亚齐王国。三方互相结盟对峙，亚齐王国还把奥斯曼帝国也拉了进来。在这期间，欧陆局势也在发生变化，16 世纪后期，葡萄牙在海外殖民地面对英国和荷兰的围堵，在欧陆沦为西班牙的附庸，已经江河日下。

1641 年，荷兰人得到柔佛苏丹的帮助攻占马六甲，严重毁坏了这座坚守 130 年的福摩萨堡，之后在 1670 年，荷兰人对城堡进行了重建，把 VOC 刻在了城门上，我在城堡大门的上方还看到了当时留下的 ANNO 和 1670 的字样。

宁山哀：VOC 是什么意思？

我：VOC 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由 14 家公司联合组成，正式名字叫联合东印度公司，荷兰文是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 VOC。

荷兰人在马六甲的统治一直持续到 1824 年，拿破仑在欧洲大杀四方，荷兰国王威廉五世逃往英国，把海外殖民地交给英国托管。英国人担心福摩萨堡之后归还给荷兰会被用于对付英国，所以开始拆除堡垒。新加坡的斯坦福·来福士爵士干涉此事，希望保留马六甲堡垒作为进攻爪哇的基地，英国政府放弃了拆除计划，可惜只剩下一道城门，就是今天看到的圣地亚哥城门。

我穿过圣地亚哥城门向背后的圣保罗山上走去，一位演奏手风琴的街头艺人在上坡拐角处摆摊，兜售一些旅游纪念品。山上的教堂对于天主教来说是一处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遗迹，游客很多，教堂外表由红色石砖混合着白色石膏，墙面已经大面积脱落，教堂屋顶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四周的墙壁，窗框还在但是没有玻璃。

葡萄牙人来到马六甲之后，1521 年修建了一座小教堂，1548 年果阿教区主教把这座小教堂交给耶稣会，取名为圣母堂。这座教堂由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

圣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主持，沙勿略一生最传奇的事迹就是前往东方传教，马六甲是他重要的一站。

沙勿略在 1542 年到达果阿，1545 年前往马六甲传教，结识了漂泊在这里的日本萨摩藩浪人弥次郎（Anjiro），在马六甲圣彼得教堂门前还有沙勿略与弥次郎的雕像。1549 年，沙勿略跟随弥次郎前往鹿儿岛传教，他是第一个到达日本的天主教传教士。1552 年沙勿略试图进入中国，但病逝在广东江门上川岛，他的遗体被送回马六甲圣母堂中短暂停留，然后运到果阿安葬。

我在圣母堂内看到了当年停放沙勿略遗体的墓穴，四周用围栏围着，有人往里面仍硬币。天主教有崇拜圣徒的习惯，圣徒的遗物、遗骸、墓穴都是被崇拜的对象。

沙勿略的死没有阻挡耶稣会传教士前往中国传教，就在沙勿略去世的这一年，利玛窦（Matteo Ricci）出生了，他将成功完成沙勿略未竟的使命。

沙勿略去世 30 年后的 1583 年，作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利玛窦到达广东，在中国南方辗转传教，又过了 18 年，利玛窦终于在 1601 年被允许进入北京。利玛窦利用他的数学和天文知识，以及对中国经典的尊重和研究，结交了很多中国官员和学者，这种上层路线也被后来许多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采用。

1644 年满洲人入关政权更迭，清朝政府在统治初期对外国人很有兴趣。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重用西方传教士，因为他们有出色的天文学知识，很多耶稣会传教士在清朝政府中任职，他们将汉文经典翻译成拉丁文，又将欧洲天文学著作翻译成满文和汉文。到了 17 世纪后期，耶稣会传教士是西方世界中对中国研究最专业的人士。

我曾专门去过北京市委党校寻找三位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的墓，三

人墓旁边另有一小片传教士的墓，门口最先看到的就是著名的宫廷画师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在北京五塔寺后院的石刻博物馆里还有其他一些耶稣会传教士的墓碑，比如乾隆皇帝的园艺师汤执中（Pierre Nicolas d’Incarville）、修建圆明园水法的蒋友仁（P.Benoist Michel）以及康熙皇帝的御医安泰（Etienne Rousset）。

19 世纪中期，随着通商口岸的出现，传教士们有更多机会进入中国传教。1847 年 11 月 21 日，意大利传教士罗伯济主教(Bishop Lodovico Maria)在靠近黄浦江的董家渡主持了天主教江南代牧区主教座堂的奠基礼，就是今天的董家渡教堂。为了纪念沙勿略的东方传教梦想，耶稣会把这座在中国建成的第一座主教座堂命名为圣方济各沙勿略堂。在去世 300 年后，沙勿略的名字终于树立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马六甲圣母堂的墙壁上摆放着大量的墓碑，上面大多绘制着帆船、大炮、船舵、海兽、人鱼等等与航海相关的图案。1924 年在教堂周围发现了葡萄牙墓地，开始进行考古研究，散落的墓碑被整理起来存放在教堂内展示。

我走出教堂遗址，在门口看到一座纯白色的沙勿略雕像，雕像的右臂是损坏的。1952 年，在这座雕像祝圣完成的第二天，雕像右臂被一棵树砸坏了，巧的是，真正的沙勿略遗体也是右臂与身体分离，被列为圣物分别安葬。

在一些旅游手册上这座教堂被称为圣保罗教堂，这是荷兰人改的名字。荷兰击败葡萄牙占领马六甲之后接管了圣母堂，由荷兰归正会所有，命名为圣保罗堂。1753 年新的基督教堂建成后，圣保罗堂作为军事设施使用，教堂内成为墓地，顶部被拆除便于架设大炮。

荷兰人虽然在马六甲统治较为长久，但秉持重商主义，并不热衷于传教（也是由于这一点，他们得以在日本取代了葡萄牙人的通商资格），也不鼓励与当地通婚，因此没有留下很深的文化影响，反而是之前来的葡萄牙人热衷于

通婚，还有族群后裔遗留。荷兰占领马六甲之后，把投降的葡萄牙人遣送到印度殖民地，只留下和当地人通婚的混血后裔，在马六甲有一个村子里居住的就是这些葡萄牙后裔。

我从圣保罗山走下来，沿着散落的坟墓石棺走进旁边的一片绿地，这片绿地叫作独立公园，里面有火车车厢和战斗机展示，也有城堡曾经的地基和排水道。公园里有一块四面方尖碑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用英文写着：为了纪念那些在双溪乌绒骚乱中主动服役献出生命的同伴们，时间是 1875.6。

双溪乌绒就是现在的马来西亚芙蓉市，这座碑上的内容说的是，1874 年，当时的雪兰莪苏丹继承者拿督克拉纳与拿督班达发生内战，班达有华人矿工帮派支持，于是克拉纳与英国总督克拉克签订了一份协议，得到英国的军事援助。英国任命了一位参政司管理此地，把殖民统治深入到马来半岛内地。这引起了一些本地居民的不满，引发了骚乱，最后在军事行动和柔佛苏丹的劝说下和解。

在马来半岛的殖民历史中，利用土著酋长或各个王国之间的矛盾，提供武器或直接派遣军队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顺势安插自己的治理官员，这是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常用的手段。英国人用协调平息内战派驻参政司的方式，先后涉足了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等地。

从独立公园出来拐个弯，我路过巨大帆船造型的航海博物馆，跟随一群小孩子上去参观了一圈，就回到了荷兰红屋广场附近。马六甲基督教堂在荷兰红屋博物馆旁边，是马六甲最古老的还在开放的教堂，属于圣公会西马教区。1753 年，荷兰人为了纪念夺取马六甲一百周年，修建完成这座新的基督教堂取代之之前使用的葡萄牙圣母堂建筑。

1824 年英荷条约签订，英国将苏门答腊岛明古连地区交给荷兰，荷兰把马六甲交给英国，组成英国海峡殖民地，这座基督教堂改为圣公会所有。英荷协

议也确定了今天东南亚的格局，英国控制地区成为之后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荷兰控制地区成为之后的印度尼西亚。另外，荷兰控制东印度群岛期间，帝汶岛东部保留为葡萄牙殖民地，1975 年葡萄牙人撤走后印尼占领东帝汶，直到 2002 年成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



今天基督教堂周围都是一片红色建筑，但这并不是最初的样子，教堂最初是白色的，1911 年和总督府一起改为红色。教堂外部墙面上写着“CHRIST CHURCH MELAKA 1753”字样，最上方有一个钟楼，我在教堂地板上发现铺着很多墓碑，墓碑上是葡萄牙文和亚美尼亚文。

红屋广场周围游客聚集，尤其是中国老年游客最多，我躲开人群，去寻找马六甲有两座很有特色的清真寺：甘榜乌鲁清真寺（Masjid Kampung Hulu）和甘榜吉宁清真寺（Masjid Kampung Kling）。这两座清真寺外观容易被混淆，区别是颜色不一样，前者是红色屋顶，后者是绿色屋顶。

甘榜乌鲁清真寺整体上是一栋爪哇建筑，有一个多层的红色屋顶，而不是清真寺常见的圆顶穹顶，在这座清真寺建成的时候，穹顶尚未在马来地区流行。清真寺门口有一个小小的鼓楼，起到宣礼塔的作用，这种鼓楼是印度教的影响。

甘榜吉宁清真寺旁边是印度教的马里安曼神庙和华人的青云亭，这座清真寺建于 1748 年，最初是木质的，1872 年改建为砖石建筑。甘榜吉宁清真寺建筑是混合风格，两层绿色三角形屋顶是苏门答腊和爪哇地区传来的建筑风格，白身绿顶的宣礼塔和拱门很有中式建筑的感觉，里面的喷水池是欧式设计。

葡萄牙人殖民统治热衷于传播天主教，对一切非天主教建筑都不太友好，荷兰人比较注重实用，避免与当地发生宗教文化上的冲突。在荷兰统治时期，对一些传统建筑进行重建，并向当地人分享了欧洲的建筑技法，所以清真寺内部有荷兰样式的瓷砖装饰。马来西亚的一些清真寺，宣礼塔不在清真寺内部，而是在外面单独一座建筑，与欧洲常见的市镇中心钟楼一样，这是殖民者带来的设计。

马六甲是马来半岛最早接受伊斯兰教的地区，13 世纪有大量来自印度西海岸的穆斯林商人到苏门答腊岛北部，这里也是东南亚最早接触伊斯兰教的地区，包括巴塞、亚齐、巴禄头等地。马六甲第二位君主伊斯甘达沙迎娶了巴塞公主，从此皈依伊斯兰教，马六甲进入伊斯兰时代。到了第五位君主目扎法沙时期，正式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君主也从此称为苏丹。

在马来西亚有不少亚齐风格的清真寺，亚齐是东南亚主要的穆斯林地区，亚齐苏丹国曾经是和马六甲王国竞争南洋穆斯林领导者的对手，也为马来半岛带来了大量穆斯林移民。马六甲的一些清真寺融合了印度教的设计，可能来自苏门答腊和爪哇的印度教文化。很多清真寺的圆形穹顶设计是 19 世纪之后才开始发展的，加入了欧洲的工艺和审美，比如英国人带来的印度伊斯兰建筑风格。

宁山哀：我见过的中国清真寺好像有两种，一种是阿拉伯建筑那种带穹顶的，另一种是中式建筑，和佛教的庙很像。

我：并没有阿拉伯建筑，而是演变过的罗马或拜占庭建筑，而且佛教场所不叫庙，只能叫寺。寺最初是国家机关的意思，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自称印度国师，所以他们的场所被称为寺，佛寺不只是宗教职能，还包括教育、翻译、驿站、外交，后续的外来宗教比如伊斯兰教场所都称为寺。庙是祭祀用的，一般中国本土的祭祀场所称为庙，龙王庙、关公庙、城隍庙这种。

宁山哀：那中国两种不同风格建筑的清真寺区别是什么？

我：没有本质区别，中式建筑清真寺年代一般更老一些，早期汉人地区的清真寺往往采用中式建筑，比如广州怀圣寺、扬州仙鹤寺、杭州真教寺、泉州清净寺等等，只在方向布局上有所区分。

所谓阿拉伯建筑的清真寺是比较近代的，一方面是阿拉伯地区宗教复兴运动带来的传教热潮，部分新建清真寺采用了阿拉伯地区流行的样式，另一方面这种建筑造价更低，修建更便利，传统中式建筑成本和维护都是大问题。

除了这两种清真寺建筑之外，也有少数融合了其他建筑风格，比如哈尔滨的鞑靼清真寺就有更多拜占庭建筑风格，上海的小桃园清真寺则有一些民国时期西洋融合建筑特点。

宁山哀：方向布局有什么区分？

我：传统中式建筑包括佛寺，大多是坐北朝南，但中国的清真寺是坐东朝西，因为要面向麦加的方向礼拜。

宁山哀：所以近些年新建的都是阿拉伯建筑清真寺吗？

我：不一定，近些年随着中国对国家民族主义的支持，以及对境内穆斯林受阿拉伯国家影响的抵触，部分地区开始拆除所谓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主要针对穹顶结构，重新改建成中式建筑，或者去除建筑风格，也是为了在意识上

强行塑造统一文化的国家。再就是出于成本和建筑空间的限制，有一些清真寺建在现代楼房内，就无所谓建筑风格了。



傍晚，我在老城一家印度街头餐馆解决了晚餐，这家餐馆好像很有名，还没到饭点就有很多食客守着等候，看长相都是印度人，这是一家餐馆味道好的预兆。印度人的脸很美，他们有一种特别的自信，也许有些油滑浮夸，但确实显得很友善而有魅力，一个试图向你施展自己魅力（哪怕炫耀优越感）的人往往更无害，而一个过于内敛而看起来城府很深的人总会让人更谨慎警惕。

晚饭之后一场大雨让这座城市变得清爽，我在餐馆里一边喝着冻拉茶，一边看着走过的行人。马六甲是一个交汇口，不同族裔的人们来到这里，带来了他们各自的神，热带大雨中摇曳的树影，仿佛有神灵在枝杈间窥视着人们。

走访了华人和欧洲殖民者的遗迹之后，我在马六甲的最后一站要去拜访一处属于穆斯林的圣地，是清真寺里的人告诉我的。那个地方是马六甲附近的勿

沙岛 (Pulau Besar)，从马六甲市区到 Anjung Batu 码头，大概坐 20 分钟的渡轮就到了勿沙岛。这座岛是早期来马六甲的商船补充淡水的地方，岛上有很多淡水井，有的井离海边只有几米远也能打出淡水，岛民认为这是安拉的赐予。

我早上六点半起床来到勿沙岛，连续走了 4 个小时寻找修行者的洞窟。勿沙岛上曾有一位伊斯兰苏菲修行大师，叫伊斯梅尔 (Sultan Al Ariffin Syeikh Ismail)。伊斯梅尔出生在巴格达，是穆圣的后裔，五百多年前在麦地那听到安拉的指示来到马来半岛传教。

伊斯梅尔在岛上修行的时候，很多人来这里向他学习，把他的思想传到马来各处。在勿沙岛码头附近的海上有一块大石头，形状如同人脸一般，人们说那块石头就是修行者伊斯梅尔的脸。

勿沙岛上有伊斯梅尔修行时待的山洞，随着旅游开发山洞已经公开，但极难到达。我找了一个岛民带我前往山洞，我们走了半个小时，又过草地又爬礁石堆，最后到达了那个面朝大海的岩洞。

向导告诉我这座岛上最早的居民是印度人，不仅穆斯林会来修行者的山洞，印度教徒同样把山洞视为崇拜地点，还有很多华人也会来到岛上寻找山洞。经过艰难的攀爬，我进入了山洞，洞里有拜访者们留下的礼拜毯、香灰和各种彩色的颜料，人们把自己的愿望写在石头上，认为可以借助修行者的祈祷力量实现。



勿沙岛原本要开发成别墅区和高尔夫球场，铲平了很多山丘，但因此打扰了修行者的坟墓，所以出了一些意外事故。我在岛上漫步，看到高尔夫球场果岭和别墅区基本建成，但是废弃无人，倒是个适合拍恐怖探险电影的好地方。很长一段时间这座岛是马六甲苏丹训练武士的地方，一些伊斯兰修行者本身也是武术教师，他们把身体和心灵的训练结合起来，现在岛上还有一座武术场。

岛上绝大多数居民是热情友好的，但也有个别居民不太欢迎外来人，因为外来人（主要是欧美游客）带来酒精和性狂欢，亵渎了修行之地的神圣，一度引发激烈的矛盾。而且这个岛有一些宗教争议，瓦哈比主义者认为崇拜坟墓是不可接受的，一度想把修行者的坟墓铲掉。后来政府协调，在岛上建了清真寺，宣传不要崇拜坟墓，同时又把修行者的坟墓保护起来，现在算是关系相对缓和了。

我在伊斯梅尔的墓前遇到了一个人，他是个来自新加坡的穆斯林，看起来像孟加拉或者印度南部的人。他在墓前坐着，我走过去时他向我问好，问我是

不是穆斯林，然后给我讲伊斯梅尔的历史和苏菲教团的修行。不过我几乎不懂英语，所以听起来很费劲，勉强从他口音浓重的英语和夹杂的阿拉伯语经文词汇中，大致判断他说的内容。临别时我请他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岛上有一些饭摊和店铺，售卖的是本地最常见的印度快餐，米饭配上咖喱煮的鸡肉和鱼。

那个人每天就在这座岛上，祈祷、晒太阳、聊天，我不知道他的生计如何，但至少他表现出来的，是令我向往的从心而生的安逸。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待漏五更寒，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

岛民们告诉我岛上现在依然有修行者，那些隐遁的修行者们去了岛的更深处，有一些只有从水下与外界连通的洞穴，岛上常来一些人，在岛上消失十几天之后重新出现离开小岛。



宁山哀：你相信那些隐遁的修行者的故事吗？

我：很难说，那些遗迹是真实存在的，也不排除岛民们讹传了一些消息，毕竟

在他们眼里我是个游客，他们乐于夸大其词。

宁山哀：你觉得为什么修行一定要远离人群，人们也更愿意相信那些隐遁的人有更高的修行造诣，仅仅是因为神秘感吗？

我：神秘感是一方面，看修行与社会的关联，修行并不是完全隐居，秘密只有在被少数人知道一小部分的时候才是价值最大的时候，所以修行者并不需要也可能不愿意完全隐藏起来。如果加入了有关权力的因素，修行者和掌权者之间的关系是一场成功骗取信任的把戏，需要一个信息不透明传递的环境。这就和那些所谓的气功大师一样，为什么那么多官员、商人、明星会信这些骗子，因为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他们必须扮演受骗者的角色，这种关系不是两个人之间的，而是要展示给其他人的。

宁山哀：所以你觉得修行者的修行只是个幌子，相反他们通过修行的方式来获取社会地位和权力？

我：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修行可以看作是反抗社会的控制。中国古代修仙的人不食五谷长生不死，因为谷物是农业社会中权力的象征，死亡则是进入信仰秩序中成为祖先被祭祀。不食五谷摆脱了世俗权力的控制，长生不死摆脱了信仰秩序的控制，所以修行本身就带着无政府主义倾向。

宁山哀：这么听起来和你也有点像，摆脱世俗权力和信仰秩序，无政府主义倾向，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和写作也是一种修行吗？

我：我可以说点“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场修行”这种屁话，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是被动地挣扎，挣扎甚至都不需要心理感知到痛苦，只是一种生物条件反射的肉体本能，就像你能看到鱼挣扎的无比惨烈，但鱼并没有像人一样的痛觉。修行是一种内心的反应，在精神世界与外界之间建立复杂的联系，我的生活与写作就像没有痛觉的生物挣扎一样，离修行还很远。

宁山哀：有意思的观点，但我觉得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人的行为可以上升到精神层面，包括进食、斗殴、交配、繁衍这些看起来动物性的行为，在人身上也投射着复杂的心理活动，你当下的愤怒也许来自很久之前的记忆，你的性爱表现可能受到与父母关系的影响，你的决策中有你的成长挫败，这些都是可以追溯到心灵的。

我：我恰恰希望人的行为可以回归到动物性上，而不要把太多事情上升到精神层面，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智力水平无法进行这样的思考，只会给自己增加烦恼，或者被人误导。人们该学会享受自己动物性的本能，也许修行就是为了摒弃那些无用的心理活动和嘈杂的精神世界。

我在马六甲买了几件T恤送给我的朋友们，这个系列是一个独立设计师品牌，主题是保护猩猩。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变成一只猩猩，随便干点啥人事，大家就很惊讶这只猩猩怎么这么聪明，如果只有一个游客，我就突然说句人话吓唬他一下，想想也挺有意思的。

我看过一部关于婆罗洲猩猩的纪录片，这种猩猩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生活，一只猩在丛林里觅食、睡觉、唱歌，自己和自己玩，我想猩猩会不会也觉得漫漫长夜孤枕难眠。与人相处的动物都有深刻的精神世界，狗知道你的电脑密码，甚至知道如何抹去操作痕迹。但猩猩不一样，它们不需要与人相处却能拥有人的心灵，错误的观点认为猩猩就像人类的小孩子，实际上他们更像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有着复杂但模糊的思维，所以它们常常很沉默，表情总是充满困惑，试图挽回破碎的意识。

在马六甲汽车站，我遇到了一对德国的拉拉情侣，她们各自背着一个巨大的背包，我好奇自己能不能背得动，就去试了试。她们对着一张地图专注地研究路线，听起来好像有一些分歧，但是都在很温柔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后以

达成共识接吻结束。两个人共同努力制定计划、解决问题，这是我觉得伴侣在旅途中很美妙的事情。

马六甲最早的殖民者葡萄牙人靠武力打穿了从非洲到东南亚的航路，在一系列的登陆战中凭着个人悍勇与宗教狂热夺下东方一座又一座城，被他们攻克的东方城市人口不止葡萄牙人的几十倍，却总是无力反抗很快溃败，但葡萄牙人（也包括西班牙人）自身母国的政治制度让他们无法在殖民地建立多族群共存的社会。

英国人比葡萄牙人聪明的地方是带来了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可以把不同族裔稳定在共存的社会体系内，让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彼此有了在同一条船上的想象，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统治。

一艘船上，不同船舱之间的等级矛盾一定存在，但统治的艺术就是要让所有人都想象自己在这条船上别无出路，只能努力维护这条船的安全与秩序。当这种想象被戳破，人们发现国家只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人们有很多艘船可以选择，甚至可以造一艘属于自己的船，统治的权威就被打破了。

在中国，民族革命完成了这一步，“中华民族”的概念被创造出来深入人心，人们在对外战争中完成了统一民族共同想象的过程（当然也意味着不愿意这样想象的人会遭到排斥和镇压）。但是在马来西亚，英国人留下的族裔联合非常脆弱，马来西亚的领导者很难建立统一的马来西亚民族想象。对这一点的了解，引领我前往下座城市吉隆坡。

宁山哀：读完了你的马六甲旅行，作为新书的第一章，和你上一本书的风格很相似，特别是和上一本书中对哈尔滨和伊宁的描述很像，你都试图去表达这些城市历史中的多元化，你是很醉心于这种多元化，然后有意识地去挖掘吗？

我：我的确醉心于此，但并非刻意挖掘，在上一本书中我前往的东北、新疆、川西等地是传统汉人地区的外延，这种边区的混合拼接是天然形成的。我觉得与其说是多元，不如说是复杂更合适，多元总是让人们倾向于区分出各种不同类别，但城市的复杂不是由分类造成的，而是由历史影响造成的，没有复杂历史的多元就像一家无聊的酒店，即便每个房间都住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客人，如果没有故事和关联，那也谈不上多么有趣。马六甲包括我上一本书中写到的那些城市，其实也算不上特别多元，但它们的历史非常复杂。

宁山哀：你说的这种复杂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地方在历史中发生的事件影响足够重大吗？

我：复杂意味着自身发生变化和影响其他地区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有些地方自身能够孕育和孵化出诸多变化的机会，可能是一个发源地，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中间节点，这些地方在历史中往往负责输出秩序，或者成为秩序的重要扩散地点，但另一些地方只能被动接受输出。

复杂虽然会带来持续的动荡不安，但这正是这个地方重要性的体现，好比你控制某一个城市中的某几座建筑可能比控制一多半的国土更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这几座建筑是秩序输出的源头，而一多半的国土只能接受输出。

吉隆坡：多族群社区共有

在马六甲，我了解到马来半岛最早期的华人——娘惹峇峇，但如果仅有娘惹峇峇，华人尚不能成为对本地有影响力的族群，真正对马来近代史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鸦片战争之后来到马来西亚的第二批华人移民。

这批到来的华人移民数量远远超过早期的娘惹峇峇，被早期定居的人称为“新客”。新旧移民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新客们的侨居思乡意识浓厚，男女比例失调，与马来人文化差异太大，这批华人一开始大多不打算在马来半岛定居，而是希望赚够钱回到老家。这种意识让他们很难也不想融入马来社会，更愿意结成社团自给自足，这也是之后马来人与华人分歧的一个隐患。

这批新的华人移民中大部分是锡矿矿工，矿工们组成的乡党帮派常常发生激烈的械斗冲突，但在冲突中也磨合出了华人社团自治的定居方式。这引领我来到吉隆坡，这座由华人矿工开辟的城市。

我在吉隆坡有一些朋友，大部分是在这边留学或者工作的中国穆斯林。马来西亚吸引了很多中国穆斯林前来，在吉隆坡找寻有关中国穆斯林的生活痕迹也是我此次探访的内容之一。

在吉隆坡，我住在这座城市的诞生起点——嘉美克清真寺（Masjid Jamek）旁边一家印度人开的小旅馆里，距离地铁站和几个主要街区都很近，周围是印度人聚居街区，街道两边有点像闽粤地区的骑楼。

嘉美克清真寺在Klang河和Gombak河的交汇处，1857年，87名探寻锡矿的华人矿工在河流交汇处登陆，把这里命名为吉隆坡，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泥泞的河口”。夜晚的时候，我来到清真寺旁边两条河交汇的地方，这里有很多乘凉的人，白天湿热的气候让我这个北方人颇为不适，晚上河边略有凉风愉悦了

很多，河面上会起雾，雾气朦胧中望向嘉美克清真寺，仿佛回到了建城初始。



嘉美克清真寺是吉隆坡现存最老的清真寺，1908 年修建，英国建筑师 Hubback 以 19 世纪折中主义建筑为基础融合了印度伊斯兰建筑样式，他的作品几乎是马来西亚各个城市的地标建筑，除了嘉美克清真寺之外还有吉隆坡老火车站、吉隆坡铁路局、怡保火车站、纺织博物馆、吉隆坡市政厅、怡保市政厅等等。

我住的旅馆旁边是印度街区，我来的时候临近印度教的屠妖节，这片街区特别热闹。人们采购节日用品，焚烧的香料、酥油和布料等等，还有各种油炸食品。印度人特别喜欢吃油炸食品，有一些条形的有点像回族做的撒子，还有一种油炸小团子。我在印度商店里买了一个铜制的摇铃，几个泥捏的供酥油的小碗和一些香料，那种香料有一种非常醒脑的香气，我还给钱赓带了一个象头神雕像。

宁山哀：钱赓是不是给你上一本书设计封面的朋友，你送他象头神雕像有什么寓意吗？还是随便选的。

我：象头神伽内什是湿婆的儿子，印度教中的智慧神，他只有一根象牙，因为《摩柯婆罗多》的作者广博仙人曾经找到伽内什，他自己口述由伽内什书写，但中途笔坏了，为了不打断广博仙人，伽内什掰下了自己的一根象牙继续写。在我看来，钱赓的书法作品是他用自己的身体去书写的，所以这个神像很适合他。

我从嘉美克清真寺旁边的印度街区往南走，走到茨厂街周围的华人街区。今天的茨厂街是一条专门面向游客的旅游市场街，并没有可看之处。但是旁边的仙四师爷宫（Sin Sze Si Ya Temple）是吉隆坡最老的华人庙宇，也是华人在马来半岛奋斗定居的缩影，可以说是吉隆坡乃至马来西亚华人精神世界的中心。我来到这座庙，寻访吉隆坡华人的起点。



据庙里的主理人介绍，仙四师爷宫是吉隆坡的华人开拓者叶亚来为了纪念他的两位将军盛公和钟公而修建的，当地人称他们为仙师爷和四师爷。庙分成上下两栋，上栋大殿中龕供奉着仙师爷和四师爷的神像。下栋正中为庙门，有一副光绪二十四年的对联，右边是义勇祠，供奉太岁、白虎爷、财神爷，左边是观音堂，奉祀观音菩萨、金花夫人、花粉夫人。庙内还有文昌君、关帝、大伯公、财帛星君。

我参观的时候，看到一个老人家带着一个女孩在这里拜文昌君，老人把每科考试的时间和科目逐渐念一遍，祈求保佑女孩考试通过。

庙中左侧是叶亚来的塑像，身边两侧是华光大帝和谭公仙师。叶亚来是吉隆坡华人历史最重要的人物，他是第三任华人甲必丹，甲必丹这个词是荷兰语Kapitan的音译，意思就是首领。之前我在马六甲去了青云亭，青云亭是荷兰人任命的华人甲必丹的办公场所。

在庙门口有一座民国二十一年立的四公纪念碑，四公指的是叶德来（就是叶亚来，他在担任甲必丹期间叫叶德来）、叶致英、叶观盛和陈秀莲，这四个人都是华人领袖。

纪念碑上写道：四公均於前清咸、同、光中叶先后莅止是邦，距今约八十年前。时各州土酋，相争沙乱靡有定，吾侨居此，难获安处。叶工德来，率众奋起为公理尽义务。事既息，从此致力开辟事业。叶致英、叶观盛二公，亦同为本邦领袖人物，地方建设，胥赖其力焉，当地政府知人善任，故次第畀三公以司甲政，陈秀莲公虽属后起，但当日翊赞地方公益，功亦甚伟！论者谓其时设甲必丹之制度仍在，则陈公断不仅以市县议会议员为止境云。溯自建立本庙之意，原以当日尚未有所谓社团之组织，除寻常会馆外，而欲成立一无界限之公共集会场所，则庙堂尚矣，此前人最苦心之擎划也。

在这块纪念碑上面大体可以看出吉隆坡华人的历史，这些华人领袖平定了

当地的动乱，保护了民众的安全，这也是马来西亚华人基本的共识，华人对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政治稳定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宁山哀：你看到马来西亚的华人会觉得亲切吗？

我：亲切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界限，是渐进的程度变化。马来西亚华人以闽粤移民为主，和我的故乡差异很大，但他们使用的文字又是我能识别的，这种熟悉是整个中华文化圈都存在的，包括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北部，在马来西亚不只看到华人文化我会有亲切感，看到日韩文化我也会觉得亲切，因为日韩离我的故乡东北在地理上比闽粤更近。不过马来西亚不是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因为本地马来人大部分是穆斯林，对穆斯林我是很熟悉的，对伊斯兰礼仪的了解超过对闽粤地区华人礼仪的了解，很难说这两者哪一方让我更亲切，可能由于文字的关系更倾向于华人，毕竟我对文字很敏感。

1857 年吉隆坡建城后很快发展为锡矿区贸易中心，第二年英国殖民当局指派了第一位华人甲必丹负责管理华工事务。当时的矿区由两个华人帮会控制，分别是客家人为主的海山会和福建人为主的义兴会，叶亚来是惠州的客家人，属于海山会。

吉隆坡华人矿工帮派内斗严重，1866 年蔓延成雪兰莪州内战，叶亚来在 1868 年成为甲必丹平息战乱。到了 1873 年内战结束，他成为华人领袖，开始重新振兴锡矿业。1879 年，英国顾问来到吉隆坡，第二年把州府从巴生迁往吉隆坡，今天的巴生河以东三分之一的土地曾经都是叶亚来的，他修建了很多道路连接矿区和城市，其中就包括茨厂街。

在叶亚来平息雪兰莪州内战的过程中，这座庙里供奉的仙师爷和四师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仙师爷盛公叫盛明利，原本也是一位华人甲必丹，相传他在内战中阵亡，死的时候脖颈溅出白色的血。当时叶亚来是他的部下，安葬了他。盛明利死后显灵过两次，托梦给叶亚来说当地酋长要叛乱，并帮助叶亚来平叛。四师爷钟公叫钟炳来，是叶亚来手下的一个将军，统领三军运筹帷幄，

是叶亚来全部战役的主将。

茨厂街虽然是唐人街，但白天的时候商铺却大多是印度人在打理，可能是华人老板雇佣印度人看店。晚上这条街有人妖娼妓出没，看长相很多也是印度人，他们在摊位后面招揽生意。我晚上在茨厂街散步的时候，发现一家兰州牛肉面馆，好奇地看招牌上的菜单和价格，正好看到路边一个人妖娼妓在整理紧身短裤里的男性器官，我前面的几个中国女游客看见之后吓得尖叫跑开了。

宁山哀：不要称呼人妖娼妓，是跨性别性工作者。

从仙四师爷宫出来路过关帝庙，我到了建于 1873 年的斯里马哈马里安曼印度神庙 (Sri Maha Mariamman Temple)。这座神庙最值得看的就是正门高大的塔楼，一共有 5 层，上面雕刻着印度教中的各位神祇。这座庙是吉隆坡最早的印度教神庙，早在吉隆坡附近发现锡矿的时候，马来酋长们就招募了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来做矿工，他们也带来了自己的宗教。



马哈马里安曼是印度南部的神，她是湿婆的妻子雪山女神帕尔瓦蒂的一个化身，被视为离开故乡者的保护神，在海外的印度人尤其是泰米尔人崇拜她。女神的神殿在神庙后面，这座神庙也像人的身体，神殿朝向西方是头部，塔楼朝向东方是脚。进神庙之前要在门口脱鞋光脚，人们经过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门槛，进入神庙到达神灵头部。我去的时候临近屠妖节，庙里面在进行一些翻新装修工作，也有很多人在里面参加宗教仪式。

我在神庙门口看到一个印度人在画画，用染色的稻谷和面粉在一个圆盘上绘制出各种几何图案，这是屠妖节的习俗。虽然印度人在马来西亚人口中占比例并不高，也并不热衷参与政治，但他们在商业上的贡献和社区凝聚力却对社会有比较强的影响，很多商场里都会绘制屠妖节的彩色绘画。

神庙里的一个华人老奶奶发现我一直在看画画，就来和我搭讪，老奶奶的祖父来自广东，20岁就来到马来西亚了，但老奶奶自己不会讲中文。她告诉我，这种绘画是一种神圣的艺术，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艺术，但艺术背后的神圣每个人都能获得，所以不要只看到绘画，而是要看到绘画背后的神圣。

我在马来西亚每到一座城市都喜欢去印度街区逛逛，像我小时候90年代大市场的感觉，喧嚣而富有旺盛的生命力。印度人跟华人、马来人都不一样，有一种很特别的热闹，印度人的市场里总是充满音乐，弥漫着香料的味道和烟气，色彩也非常浓郁，他们好像蛮重视家庭，街上都是拖家带口吵吵闹闹，我看着觉得人家挺幸福的。

我很喜欢在印度人的路边摊吃饭，他们的大排档会经营到很晚，和我的口味比较接近。煎饼和咖喱肉食是我的最爱，而且一定要配冻拉茶，有一些专门的素食餐厅味道也很好，甜点主要以油炸为主，他们喜欢在油炸的面外壳里面添加馅料，有点像硬壳的油炸糕。一些传统的摊位，食物被盛放在叶子上，印度顾客用手进食，店主会给外国人递上勺子，但微笑着鼓励我用手试一试。

试不了，吃烤鸡还行，但用手抓米饭有点费劲，而且不是比较粘稠的东北大米，没法捏成饭团蘸咖喱酱料吃，那种很散的印度大米我只能用勺子进食。

中国政府喜欢把一切都规划清楚，用统一的招牌、设置好路线的商业街和强制的空间规范进行管理，这样看起来有一种更文明的错觉，可能是落后久了总想先进，城市的管理者非常享受像乐高玩具一样的城市规划来满足他们幼稚的控制欲。城市不是被规划建造的，而是像森林一样自然生长的，每一座城市在建立初期都想不到之后会有远远超过想象的人口，人类寄生在城市当中吸取营养，也对城市产生作用。

完全硬性规划的街区是没有真实生命的，就像农场里一行行小麦（我的同胞们更愿意称自己为韭菜），在并没有自然生命的耕地上，被人为种植只为了功能性地收割，这不是真正的生命，只是一种有生命功能的塑料模型，逛吉隆坡的印度街区就像是离开农场走进森林里。

宁山哀：城市不会自然生长，城市是规划出来的结果，完全自然生长的城市就是成片贫民窟，你现在也能看到城市里老的小区都有很多居民圈地盖的违建房，这就是自然生长的结果。

我：肆意圈地违建是缺少自发秩序的结果，而不是自然生长本身带来的。城市的公共服务秩序不等于禁止自然生长，那些街道也有现代城市的警察、清洁工、路灯和排水管道，但不会影响街道的生命力。反而我觉得，之所以出现肆意圈地违建，恰恰是因为没有自发秩序的土壤和习惯，人们在被动的外部秩序中只会为自己抢夺利益，而不是主动建立和维护一个多方受益的平衡状态。

我居住的嘉美克清真寺附近这片印度街区到了晚上，会有流浪汉在路边游荡，朝走过的人要零钱。当地人似乎很习惯这种现象，便利店店员会拿给他们当天剩下的食物，也会帮助顾客驱赶他们。这片街区的 KFC 快餐店，我中午在

里面吃饭的时候，一个流浪汉进来四处寻找别人吃剩的食物，店员习以为常并不阻拦。在一些旅行日志中会有安全提示，但我这一路上都习惯独自夜游老城街区，从来没遇到过危险。

寄生于一片繁荣街区的固定游民是无害的，虽然他们偶尔会显得粗鲁或者骚扰一下游客，多数时候只是想要点零钱或食物，存在固定的游民说明这片街区有着比较强的供养能力，本地居民相对富足有善心，而且治安状况相对良好（真正危险充满吸毒者和帮派火拼的街区不会有慵懒安逸的固定游民）。

宁山哀：你觉得安全因为你是男性，你这形象剃光头留胡子让人感觉不好惹，如果一个女性在异国单独旅行，住在游民比较多的街区恐怕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即使没有实质危险也容易被骚扰。



本地人告诉我这些流浪汉不全是印度人，也有巴基斯坦人或者孟加拉人。这些流浪汉很多拿着长期劳工签证来到马来西亚，但他们不会工作太久，辞职之后就黑在这里，除非有人报警，警察一般不会查护照，也不会驱赶流浪汉。

在马来西亚的印度人也分成不同群体，大部分是印度南部泰米尔人，有印度教徒也有穆斯林，少数是印度北方人和锡克教徒，这些锡克教徒中不少是当时派驻到英国海峡殖民地的军人和警察的后代。

我询问当地印度人对母国的看法，与华人不同的是，这里的印度人好像对印度母国并没有特别的情感，他们更多的是强调印度人这个族群社区的影响与魅力。站在马来西亚本国来讲，可能印度人的心态更受欢迎，而那些看起来总与中国勾勾搭搭的华人群体显然不能让政府和主体民族马来人放心，虽然当地华人不一定真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有多少好感。

一个四十多岁的印度司机和我聊天，他父母那代人从印度来到马来西亚，他只回过印度几次，并不喜欢印度。他觉得马来西亚更干净，这里的印度人更亲切平和，做菜也好吃。他同时也坦言印度人不如华人勤劳，这也是印度社区看起来比较混乱，流浪汉比较多的原因。

屠妖节临近，吉隆坡的小印度社区也开始热闹起来，我观看了一场户外演出，感觉像社区音乐节，我是现场唯一一个华人面孔的观众。之前看印度电影中经常看到莫名其妙插入的歌舞表演，在印度社区发现他们确实有这样的传统，除了印度民族歌舞之外，流行音乐和 Hip-Hop 也是观众非常喜欢的。

印度人来到马来半岛其实很早，一般认为要早到公元前 3 世纪，目前留下的遗迹主要在吉打布秧河谷地带，印度的政治和宗教对马来传统的塑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代马来西亚印度人的活动与英国殖民和二战有关系，英国殖民时期无法有效控制华人和印尼人，本地马来人难以胜任辛苦粗活，欧洲雇员成本又太高，英国人开始雇佣大量印度劳工来到马来半岛。

在当时的海峡殖民地，海峡华人群体常常被英国殖民者重用，而印度人一开始没有社群意识，在政治上参与感也很低。二战爆发之后，随着英国人在东

南亚的败退，日本扶持在新加坡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东南亚的印度人开始有了民族觉醒意识。

一些学者认为印度人缺少历史的传承，这是很片面的观点，历史的传承只有在更高层次的信仰缺失的时候才显得过度重要，没有神灵为镜只好以史为镜，而当人们有远超过现世的精神追求时，历史就显得过于短暂和单薄，是无所谓被记录 and 研究的。神话可以代替历史，但历史代替不了神话，历史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模仿神话的叙事。

我喜欢印度文化中浓郁的英雄情结和精神追求，项羽是中国最后一个英雄君主，从春秋战国开启的英雄时代，在项羽死后走入了衰败，到三国时期就是最后的光辉。之后庙堂有枭雄，江湖有好汉，但不再有英雄，枭雄可以建立帝国，好汉可以占山为王，但他们的世界观中已经去除了英雄的存在，人们只能在零星的个体身上找到曾经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英雄主义。

宁山哀：我读你上一本书时就发现，你迷恋使命感和牺牲情绪，我不太能有这种感受。使命感和牺牲情绪会引导人走向狂热，尤其男性更容易陷入对自我意识的崇拜，侵犯或者藐视他人，社会还会赞许他们是为了追求更崇高的理想。那些男性的革命者、政治家、艺术家、作家特别容易这样，你可别变成这种自大的蠢货。

我：恰恰相反，我觉得这个时代人们不够自信，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可能男性的自尊心相对还要更脆弱一些，因为社会宣扬男性强大的假象，但大部分人都是平庸而弱小的，他们会因为自己无法到达社会标准而迷茫和偏执，也会把这种偏执变成对女性的攻击。使命感可以让人更加自信，尽量排除社会对人不利的影响，也就尽量减少影响的负面结果。

宁山哀：但很多人的使命感并不来自内心，而是来自社会影响。无论是赚很多

的钱，还是照顾家人，还是为国家做贡献，都是社会教育的结果，大多数人都是把社会的要求当成自己的使命，所以强烈的使命感并不会让人自信，只会让人跌入社会教育的陷阱中更加偏执。

我住的旅馆周围有两所学校，一所是马来人为主的公立学校，一所是印度人和华人为主的教会学校，大部分都是女生。我观察出一个很主观的印象，华人女孩一看就特别聪明，印度女孩有一种看起来容易被欺负愚弄的样子。但华人女孩的聪明感觉就是挂在脸上的这些，印度女孩的脸有一种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类似灵性的东西。引用我一个朋友的话，“你只是对其他种族比较陌生，而太了解同胞们的所谓聪明都是何种钻营世故了”

在中央车站附近的印度街区漫步，我发现了一座有意思的建筑，是一所修行学校，建筑为白色两层，墙面有黄色装饰。这座建筑叫 Vivekananda Ashrama，是 1904 年为了纪念斯瓦米·维韦卡南达造访马来亚而修建，建筑前有一座他的塑像。

维韦卡南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行大师，他将瑜伽带到了西方。如今这座建筑依然在发挥学校的作用，为当地年轻人提供精神指导，曾经面临拆迁开发的状况，但被当地人努力保留了下来。这里的警卫懂一点中文，但是懂得不多，里面也没有中文讲师或材料。我去的时候建筑外面有一个搭建的大棚子，里面在讲学。

离开 Vivekananda Ashrama，我走过几条街，这附近有几座斯里兰卡移民的宗教场所。其中有一座教堂 Evang Lutheran Zion Church 属于路德教会，是斯里兰卡泰米尔移民在 1924 年建的，最初路德会就是在马来半岛种植园的泰米尔劳工当中传教。教堂院子里有一口铜钟，上面讲述了教堂的历史，很可惜我去的时候教堂没有活动没开门。

同一条街上还有一座斯里兰卡僧伽罗人的佛寺 Buddhist Maha Vihara，这座佛寺是 1895 年建成的，由当时英属锡兰的僧侣们来主持宗教活动。在上世纪 20 年代之后，华人佛教徒开始为这座佛寺捐赠，目前佛寺属于僧伽罗人与华人共有，我去的时候有一些华人学生在寺里举行活动，应该是课外拓展学习。

这座寺是马来西亚最主要的佛教寺庙之一，每年的佛诞日会在这里举行音乐节。在教堂和佛寺中间是一座属于斯里兰卡移民的印度教寺庙，正门后面是一座象头神，然后是两侧向上的楼梯，TripAdvisor 上面一个日本游客说像织田信长的安土城。

在斯里兰卡本土，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长期内战，这其中还有印度政府的涉足，但在吉隆坡，这两个民族和印度人一起混居在中央车站附近最繁华的地区。



我在吉隆坡的最后一站是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比较遗憾的是没有中文翻译

机，实际上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去看的博物馆，里面有大量伊斯兰文明不同地区和时代的展品。在博物馆内有半个展厅是关于中国（华人）穆斯林的艺术品，这也是我能唯一不借助讲解能看懂的部分，大部分展品是正德瓷器。

除了瓷器之外，还有中国穆斯林的阿拉伯文书法作品，阿拉伯文书法是伊斯兰艺术很重要的部分，也分出了各个不同的流派，中国穆斯林将阿拉伯文书法与传统汉文书法结合，将阿拉伯文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进行组合，用书法描绘出宝剑、寿桃、花瓶等图案。

这座博物馆中的中国穆斯林展品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在马来西亚华人穆斯林群体是很少数的，这些人当中一部分是马来西亚本地华人皈依伊斯兰教，比如因为通婚而皈依；另一部分是中国穆斯林，其中主要是回族，包括移民、长期经商务工人士和留学生。

在吉隆坡的回族大多集中居住在国际伊斯兰大学周边，一部分是留学生及家属，还有一部分是在吉隆坡经商务工的，为了方便聚居在一起。这些回族来自青海、甘肃居多，每到冬天就会有这两个地区的回族来马来西亚过冬，吸引他们的原因包括方便的清真饮食和宗教场所、便宜的物价、有通行中文的空间、简单快捷的签证以及适宜的气候。

我试图去了解这些回族在马来西亚本地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态度。我的朋友韩小姐是在马来西亚的中国籍务工人士，之前在马来西亚读艺术类专业，后来回国一段时间，在北京我们相识，现在她又回到马来西亚在吉隆坡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在她的日常接触中，马来人并不会按民族区分中国人，“中国回族”这个概念对马来人没太大意义。不过“穆斯林”是一个有可能获得区别对待的身份，可能对方会稍微热情一些，但也仅限于此。

在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时代，推出了一个口号叫“Satu Malaysia”（一个马来西亚），试图强调族群之间的融合，以统一的马来西亚人的概念弥合不同族

群的差异和分歧。无论回族在宗教上更倾向马来人，还是在族裔身份上更倾向华人，终究都是外国人，并不在马来西亚本国的身份体系内。

我们聊到这些回族在马来西亚的生活态度，大体上一部分人会觉得比在中国过得好，因为中国国内部分地区清真饮食不太方便，宗教活动也会受到政府的管制和监控。在中国一些穆斯林较少的地区，人们对于包头巾的穆斯林女性依然会有一些不恰当的好奇心，再加上近些年大中华民族主义的自大倾向，有时候会给境内的少数民族带来困扰。

另一种情况则截然相反，对于一些来自相对保守地区的穆斯林年轻人来说，马来西亚更加开放自由，他们可以规避家庭的限制和过于严格的宗教要求。

我认识的另一位在马中国籍穆斯林马小姐，她是来自青海的撒拉族，之前在北京读大学，后来在马来西亚工作。她告诉我吉隆坡的回族没有明确的聚居社区倾向，主要是留学生和经商为主，基本没有政治地位诉求，也没有形成社区自治的传统。在中国城市中的回族习惯围绕清真寺居住，但在吉隆坡的回族没有固定聚集的清真寺，而是根据居住和工作地分散在不同的清真寺进行宗教活动，也没有如其他国家移民那样形成自己专门的聚居社区，这些回族依然是松散的外国人，而不是一个稳定的定居移民社群。

马来西亚有华人清真寺，这源于马来西亚政府早期试图对华人传教，但收效甚微。近些年新建的华人清真寺主要是与回族商人团体的合作，对于在马来西亚的普通回族侨民并没有太大意义，我认识的在马回族朋友都没去过或者只是旅行路过。

我之前去云南旅行的时候，在巍山东莲花村听闻当地回族马帮的故事，这些马帮常年往返于川滇和中南半岛之间经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一部分人去了缅甸和泰国。我试图在马来西亚找寻当年那批回族马帮的后裔，或

者更早时期下南洋的闽粤回族后裔，但没有相关线索。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马来西亚的华人由于更坚持自身的文化传统，和马来人有一定对立感，这也是华人穆斯林难以立足的原因。一些因为婚姻皈依伊斯兰教的华人逐渐就只和马来亲属来往，被华人社区疏远。

当地政府的一些政策也制造了误解与隔阂，比如华人与马来人通婚皈依伊斯兰教，通常认为要有一个新的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名字，这是伊斯兰教的传统，很多中国回族都有这样的阿拉伯语“经名”，与汉语名字并不冲突。但在马来西亚一些执行官员的误导下被当作是强制改名，这对于重视姓氏的华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宁山哀：我很好奇一些少数民族的国家与民族认同，你觉得他们会更认同哪个？如果是这个民族有自己独立国家的呢，比如朝鲜族或者哈萨克族这种？

我：民族与国家原本该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但民族国家或者国家民族主义把这两者混合在一起，形成主体民族的强势和对少数民族的压制和裹挟，包括也会有泛民族主义或者“中华民族”这种文化观念试图达成融合，这是民族国家这个形态本身的问题。在我的观念里，一个国家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而是属于这个国家的全体公民，国家不该具有民族意识，一个民族也不需要给自己国家层面的限定。

宁山哀：但现实不是这样，可能只有极少数移民国家像你说的这样。

我：不只是现代移民国家，古代帝国同样是这样，民族国家是相对新的近代概念，古典帝国更强调遵从祭祀传统、尊重君主的法统等等。欧洲以前很多君主甚至不是本国人，而是和上一任君主有血缘关系的外国人，同样奥斯曼、蒙古、中华这些东方帝国中也有大量的外国人成为官员，和族裔无关，只因为他们效忠君主。

宁山哀：所以你还没有回答，你觉得少数民族会更认同哪边？

我：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没有制度层面的民族歧视），如果没有历史中的分离传统（比如苏格兰），也没有很大的经济差距（比如过去南朝鲜与中国），也没有刚独立民族国家的强烈号召（比如以色列或者哈萨克斯坦），少数民族会更倾向于国家一边。

因为他们的乡土连接在这个国家境内，他们的日常生活围绕着这个国家的社会秩序和运作方式。民族是一种传统的集合，这种传统包含着乡土和社群，土地从不属于某一个族群，而是不同族群属于同一片土地，民族国家那一套叙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在吉隆坡的最后一天，白天我去了 Amcorp Mall 里面的跳蚤市场，只有周末才开，有大量的黑胶唱片和旧 CD，我买了一堆明信片，很多是二战期间的。傍晚的吉隆坡下起了暴雨，有点像我大学所在的珠三角，热带地区下雨就像天漏了一样，但雨后又会格外凉快。

晚上我散步到一片老街区，这里有一座东方俱乐部，不过招牌的霓虹灯坏了，东方变成了东厂。这周围都是老房子，很多流浪狗聚集在这里，到了晚上非常热闹，一大片棚子搭起了夜市和舞台，是华人的夜宵场所，舞台上的女歌手在唱着港台老歌，这里在凌晨之后是一片低档红灯区，闷热夜晚靡靡之音的夜宵摊子，像我大学所在的唐家湾。

回到我住的印度街区，一家街边的快餐店坐满了人，我在那里点了炸鱼、烤鸡和南印度煎饼，那种煎饼是薄薄的长筒型，非常脆，上面有一层糖晶，蘸着咖喱酱料吃。在北京比较少见这种街边露天大食堂一样的餐馆，在我故乡东北多一些，在广东就非常多了，这些地方不仅仅是餐馆，就像非洲大草原的池塘一样，是城市自然生态的一部分，餐馆是半开放的，与街道没有很明确的分界线，人们聚集在这样的餐馆中用餐、聊天，可以从中午待到半夜。

在吉隆坡我了解到华人矿工帮派对这座城市的作用，以及留在华人精神世界中的影响，我接下来要去的地方霹雳州，华人矿工帮派的影响更加深刻。

我在吉隆坡见了几个朋友，他们在吉隆坡生活很舒适，建议我也考虑留在大马，或者长住一阵子写作。但或许是我自己乡土感很深，我总不愿意离开故乡太远，无论是之前去西北还是西南，亦或是在上海旅居一年，虽然我不得不承认有很多美妙的存在，却无法让我产生真正的亲近感，我留恋北京也并非真的喜欢这座城市，只是因为离我的家乡足够近。

宁山哀：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回到故乡呢？

我：我理想的居住地是在故乡之外但又不太远的地方，就像从外部勾勒一个物体的轮廓才能知道它的形状，我只有以外乡人的身份生活在其他地方，才能反过来感受我与故乡的联系，以及故乡对我的影响。

从吉隆坡到怡保，我决定尝试马来亚铁路，火车快速穿越热带林区的快乐是坐大巴体验不到的。我喜欢乘坐火车，除了享受那种速度之外，确定路径且

路途封闭的铁路会给我带来安全感，这或许来源于我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从一个点到明确的另一个点。不同于我的那些热衷于尝试很多生活方式的朋友，那些生活的体验者们，我更愿意旁观不同的生活方式，然后选择自己明确的一条路。

马来半岛最有名的丛林铁路其实是从哥打巴鲁到新山的一段，我在之后的环岛旅途中享受了这段火车旅途。傍晚的哥打巴鲁，白天的闷热逐渐散去，我在站台上边喝着冻拉茶，一边感受难得的雨后凉爽微风，意识到我要前往整个欧亚大陆最南端的城市，离我的北方故乡更遥远了。

和马来半岛西部经过吉隆坡的火车比起来，东部丛林铁路的火车要陈旧很多，大概就是中国的绿皮车，也没有多少乘客。慢悠悠的老旧火车穿越丛林，车厢晃来晃去，我仿佛穿越进了十九世纪殖民文学里，一种茂盛而神秘的热带对北方人的吸引力。

火车从哥打巴鲁到新山开了一整夜，很难睡着，因为火车上实在太冷了。夜里穿过北部林区之后，更多的人上了火车，看他们的服装好像是学校的足球队，给冰冷的车厢里带来了一些热闹。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带队的女老师披上了一件方便礼拜毯在车厢末尾进行晨礼，列车员开始准备早餐，有炒面、汉堡和牛奶，吃过早饭之后感觉舒服了一些。

如果说这趟冻死人也困死人的火车之旅有什么惊喜，那就是我早上醒来的时候，在远处的丛林间瞥见了马来半岛的日出，一开始是大片暗紫色，猛然迸射出一线亮红色，天际的形态渐变过渡，在火车窗外勾勒出树梢越来越清晰的轮廓，真的好美。

怡保：见证纷争

怡保是霹雳州首府，霹雳这个名字看起来像汉语，其实是音译，Perak 在马来语中是银的意思，指的是锡矿的银色。霹雳州苏丹历史传承很久，我上文在马六甲的时候提到，葡萄牙入侵后，马六甲苏丹的两个儿子分别逃往柔佛和霹雳成为苏丹，再后来柔佛宰相篡位，霹雳苏丹的法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按照马六甲苏丹被明成祖册封的传承来看，霹雳苏丹就是中华帝国承认的藩属国延续至今的君主。

17 世纪，荷兰人试图垄断霹雳的锡矿贸易，但没有成功，紧接着英国人开始关注这里。华人矿工帮派与本地酋长勾结争夺矿区的控制权，再加上当时霹雳苏丹的两位继承人拉惹·伊斯迈和拉惹·阿卜杜拉之间内斗，矛盾非常激烈。在槟城的英国海峡殖民地总督克拉克担心冲突蔓延到槟城，召集各方在邦咯岛开会协商，会议决定支持阿卜杜拉继位霹雳苏丹，要求苏丹必须接受一位英国驻扎官员，除了马来习俗和宗教之外的其他事务都要征求驻扎官员意见。一年之后，苏丹被迫同意由英国驻扎官员代理管理国家。

在怡保我住在新区，每天要过桥去河对岸的旧城区探访。怡保最有名的地方叫旧街场，就是旧城区，1892 年旧城区大火之后开始修建新区。过去的殖民建筑大多在旧城区，现代商圈和华人美食街在新区。我住的旅馆是一栋老房子改造的，老式电梯一次只能容纳两个人，前台服务生是一个很腼腆的华人男孩，会讲一些简单的普通话，帮我解决了一些旅行路线问题。

我在旅馆放下行李就去老城区转转，在小雨中来到一排美食摊子前，一抬头发现这里就是怡保的地标建筑——伯奇纪念钟楼。这座钟楼 1909 年建成，钟楼整体建筑是白色，有黑色边框纹饰。这座钟楼为了纪念被刺杀的英国殖民官员詹姆斯·伯奇（James W.W. Birch），他是霹雳州第一位英国驻扎官，在锡兰有治理殖民地的经验，但是孤傲固执非常不尊重当地习俗，强行推广一些他认

为的文明世界的规则。

1875 年,伯奇被当地马来酋长如卡·易卜拉欣·马哈拉惹里拉 (Dota Maharaja Iela) 刺杀,刺客成了当地的英雄,被当作马来民族反抗殖民者的象征,钟楼旁边的街道就是以刺客的名字命名的。这座钟楼中间四面画着壁画,描绘的是各个文明的代表人物,我注意到有一个人被挖掉了,就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因为按照伊斯兰教要求,穆圣的形象不允许被随意绘制。



伯奇被刺杀后，英国发动了一场战争，把霹雳苏丹和几位大臣流放到塞舌尔，政府迁移到了太平，派来了第二任驻扎官员休·劳（Hugh Low）。休·劳在婆罗洲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更尊重马来习俗，与当地酋长关系很好。他也是一名植物学家，引进了橡胶、咖啡等经济作物，在霹雳州种植了马来西亚的第一棵橡胶树，今天橡胶已经成为马来西亚支柱产业之一。在休·劳 12 年的治理中，废除了马来传统的债奴制度，修建了马来半岛第一条铁路，他成为马来半岛参政司制度的楷模。

伯奇纪念钟楼旁边就是著名的旧街场咖啡馆，我来尝试了一下，感觉像个港式茶餐厅，味道蛮适合中国人口味。不过这里的咖啡太甜了，在马来西亚吃饭，我最常说的就是“Sugar free、No sugar、Without sugar、Unsweetened”。这家咖啡馆里有很多南洋口味的小吃非常棒，比如炸春卷之类的，在中国清真的闽粤小吃不多见。

糖曾经是财富的象征，酷爱甜食也许和商路贸易有关，因为我后来去的一些旧商路上的国家，人们都普遍热爱甜食，会在茶和咖啡里加各种口味的糖，在我看来实在是过甜了。也许这些地方历史上太富饶了，人们有拼命吃糖炫耀财力的传统，而东亚普通民众的生活过于贫瘠，更喜欢清苦的东西自虐，学会品味唾液的返甘聊以自慰。

这就稍微有了一点度假的感觉，我外出旅行很少特意寻找美食小吃，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漫步街道探访老建筑上，到了饭点就近看看什么可吃的。很多旅行者把旅行视为拓展生命的宽度，这也是基于浪漫主义观点认为人应该尽力增加体验以丰富自己精神世界的素材，这样才能更好地表达对自我和世界的看法。

作为一个阅历匮乏的人，我并不喜欢去刻意体验太多东西，体验会带来愉悦、刺激以及更多的可能性，但也让人们沉浸在对体验的追求中无力自拔，人

们会渴望更多的食物味道，更多的旅行目的地，更多的性伴侣，但这些体验是平行的外部世界，并不是人们对自我的挖掘升华，人们把思考素材的数量积累当成了思考本身。

旧街场咖啡馆蛮不错的，但如果不是恰好路过，我也不会特意来试一下，我对给自己的愉悦是如此吝啬。



宁山哀：旧街场咖啡就是偏甜的，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又不愿意尝试新事物增加体验，那旅行的意义岂不是不完整，和很多老年旅行团不愿品尝当地食物带一堆泡面出门有什么区别？

我：我不觉得这种不完整有什么问题，对“完整”的追求是一种虚妄，你不可能穷尽当地所有的体验，我更愿意选择在一部分体验上追求深度，比如历史文化老建筑这方面，而对广度上另一部分体验无所谓，比如吃喝玩乐。

宁山哀：但你无法预判哪些体验是你需要的，你只有体验之后才能做出判断，体验让我们的感知丰富，就像你不加糖就会一直认为糖只是甜的，但我告诉你不同种类的糖以及不同的甜度会让咖啡有不同的味道和口感，这就不只是甜这个单调的概念，而是非常丰富的，但你不去尝试无法感知到这种丰富性。

我：你忽视了人可以有意识控制自己的体验，就像我选择来马来半岛而不是另一个地方，这就是我在控制自己的体验，我放弃了去另一个地方的可能性。同样，咖啡不加糖会让我失去一些关于甜的体验，但这不是放弃体验，而是让体验可控，我是在体验中加入自己的选择，哪怕面对完全陌生的东西，也总有一些变量是我可以自己决定的。

宁山哀：我要说的是你的选择会造成感知素材的狭窄，你自己人生前 30 年的经验做出了判断，认为对于甜的体验是不重要的，但很可能你之前全部的经验非常局限，你可能并没有吃过真正的糖，没有感知过真正的甜味（举个例子而已，但确实很多人一辈子不知道某种食物真正的味道，因为他们一直吃的是工业制成品或者廉价替代品）。我的意思是说你的现有经验不一定能支撑你的判断，所以才要更开放地去增加体验。

在旧街场附近的建筑墙壁上，我发现很多壁画涂鸦，尤其是有一些政治意味的涂鸦，包括著名的纳吉小丑。这个形象是讽刺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涂鸦中有马来文写的“Kita Semua Penghasut”（我们都是煽动者）和“A.C.A.B”（All Coppers Are Bastards 所有的警察都是混蛋），还有无政府主义的符号（圆圈里面有个大写字母 A）。

这件事情源于一个马来西亚导演，叫法米·惹札（Fahmi Reza），他也是社会运动活跃分子。2016 年，法米·惹札在他的 Facebook 上放了一张抨击总理纳吉的图片，图片上把纳吉画成了小丑的样子，还有“Kita Semua Penghasut”这个句子。他还曾把纳吉小丑的图片印在 T 恤上拿到书展贩卖，因

此被警方逮捕。2018 年 10 月 11 日，总检察署撤销提控，我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法米·惹札刚刚获释。

如果是一个中国人画了个维尼熊小丑，恐怕没这么容易算了吧。

总理纳吉执政时期急于推行统一的马来西亚民族观念，在我离开马来西亚之后不久，90 多岁的前总理马哈蒂尔再次执政。这样一个多族群且关系复杂紧张的国家，任何激进的改革政策都会导致危险的后果，统治者必须是各方认可的忠厚长者，依靠丰富的经验和社会威望谨小慎微地平衡关系。

马来西亚的街头艺术很繁荣，可能比较被大众熟知的是立陶宛艺术家 Ernest Zacharevic 在槟城的一系列街头艺术创作，实际上马来西亚很多城市都有类似的街头艺术。在吉隆坡和哥打巴鲁等地有政府主导的城市景观项目，槟城也有世界文化遗产搭配的艺术项目。

在怡保可以看到 Ernest Zacharevic 早期在这里创作的少量绘画作品，更多见的是本地城市文化项目的作品，一部分是城市和民族文化，反映怡保的旧时商业场景，比如牛奶摊子、收垃圾车、人力车、冰室点心档等等，还有一部分内容就是表达政治抗议。

怡保老城区的中心是一座运动场，我傍晚在那看了一会足球和板球训练，运动场对面有一栋霹雳中华总商会，我留意到上面的牌子，题字者是黎元洪，时间是中华民国六年。

从运动场往北走，我在雨中来到火车站附近的老建筑群。这一片基本都是白色建筑，火车站对面是 1914 年建成的市政厅，一楼悬挂着霹雳苏丹和苏丹后的照片，我登上二楼阳台，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瞭望点，可以看到火车站的全貌，一座摩尔式和维多利亚风格结合的建筑。

我从火车站买票出来，在火车站前广场上看到一座战争纪念碑，灰色石料立方体，其中有一面刻着二战阵亡士兵的名字，用玻璃保护了起来。在怡保和太平都有战争纪念建筑，太平有二战军人公墓，怡保火车站前面这座纪念碑更值得关注。我阅读一下上面的内容，包括一战、二战、马来西亚独立战争（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印马对抗（INDONESIAN CONFRONTATION 1962-1965）和马来西亚紧急状态时期（THE RE-INSURGENCY PERIOD 1972-1990）。



后面两个可能中国人不大了解，印马对抗是马来西亚独立初期，印度尼西亚为了阻止马来西亚成立而发生的武装冲突，印尼总统苏加诺认为马来西亚会继承欧洲殖民者在婆罗洲的利益，这会损害印尼在婆罗洲的地位。这场对抗双方并未宣战，多数战斗发生在印尼与东马的边界，所以也称为婆罗洲对抗，直到苏哈托上台之后，印尼才与马来西亚和解。

马来亚紧急状态则是了解马来西亚华人困境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因为这其中涉及了一个马来人和华人，包括中国人都不太愿意再去提及的历史问题：马

来亚共产党。

完整的马来亚紧急状态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指 1948 年马来亚共产党展开武装斗争之后，英国殖民政府宣布全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一直持续到 1960 年才解除，期间马来亚人民解放军与英联邦军队进行了长达 12 年的游击战。“马来亚紧急状态”一词是殖民政府的称呼，马来亚人民解放军称之为“反英民族解放战争”，但是在这块纪念碑中，这段时期算在马来西亚独立战争中。

另一部分指的是马共在 1960 年落败后，退回到北部泰马边境地区，在 1967 年，马共领袖陈平发起第二次马共武装斗争，斗争断断续续持续到 1989 年以失败告终。

马共问题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也是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族裔冲突来源之一。华人是马共的重要支持者，人民解放军游击队的成员多是华人，少部分成员是马来人、印尼人和印度人。游击队的营地在热带丛林当中，基础设施很差，山区的华人农民在丛林边缘建起房屋，游击队通过这些渠道可以补给物资和征募士兵。华人尤其是华人农民支持马共的主要原因是华人没有与马来人平等的公民权利，农民也没有土地权。

在 1961 年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大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游击队的支持，并在 1967 年设立“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进行宣传战。1972 年马共修改党章，开始执行农村战略，扩大人员招募，所以怡保火车站前的战争纪念碑上的紧急状态从 1972 年算起。

1974 年，马来西亚与中华民国政府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中国开始逐渐减少对马共的援助，1980 年中国正式停止了一切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支持。

宁山哀：中国政府停止援助马共之后，马共怎么样了？

我：缅共、马共、泰共失去中国援助之后，在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先后向所在国政府投降。1989 年 12 月 2 日，马共在泰国政府的见证下与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马共宣布解散，结束了长达 41 年的武装斗争。马共解散后，部分成员回到马来西亚故乡，另一部分则选择留在泰国境内。泰国政府安置了那些愿意留在泰南勿洞乡根据地的前马共成员，建立了 4 个和平村，现在是旅游地区。

国际主义曾经与共产运动密不可分，在钢铁慈父赶走先知，决定在一国建立社会主义之后，名义上的理想并没有破灭，国际共运依然以社会主义国家输出革命的方式延续着，虽然这种输出带有国家利益的成分。在这点上，中国比苏联显得更加纯粹一些，即使中国共产党获取政权并非完全秉持共产主义，而是与本国民族主义革命结合在一起，但至少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以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压迫者代表的身份支持着东南亚的革命活动。

无论是为了获取西方国家的友好，还是国际共运低潮之后必然走向国家民族主义路线，中国都已经背离了原本的国际主义精神，即便是对外援助也基于现实利益或者领导人的虚荣心，不再基于意识形态支持革命组织，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背叛。



我采访了一位怡保本地华人大叔，他的祖父那代人来到马来西亚，他本人年轻的时候搬到怡保。这位大叔告诉我怡保和其他城市不太一样，这里的华人主要是广东人，其他城市的华人主要是福建人。这位大叔从来没有回过中国祖地，在他年轻的时候华文教育受到限制，他虽然可以讲汉语，但是不认识汉字也不会写。对于故乡的地址，他只能让父亲口述，由妻子把地址记录下来，留着孩子读大学之后去中国祖地，在那边还有一些远亲。

这位华人大叔说很向往槟城，因为怡保老年人太多了，年轻人大多离开去了大城市或者国外，来到怡保的都是游客，不会留下来定居。槟城年轻人多一些，尤其是华人比较多，而且是华人地位相对比较高的城市。

说到华人的地位问题，这位大叔很生气，他认为华人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尤其是在有苏丹统治的君主州，马来人占据着政治权力，华人根本无法有效参政。一些华人企业家被政府强迫雇佣并不怎么干活的马来人，甚至有一些被迫逐渐搬到国外，他们留在国内的产业就被政府接收了。大叔提到一件让他非常气愤的事情，他说一些华人渔民的船被印尼海盗劫持，政府让家属去送赎金，结果在经手赎金的时候还要在中间加钱。

在怡保的最后一天，我去了城区北面的一座日本花园，怡保和日本福冈是友好城市，所以在这里有一座福冈政府支持修建的花园。在这个东南亚城市中发现一座东北亚地区的花园，我觉得亲切了许多，这是个有意思的感受，虽然这座城市中遍布华人，但让我有了故土感觉的却是一座日本花园。

夜晚我喜欢外出散步，九点之后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只有华人街区依然灯火通明，人们在这里吃宵夜，街上的招牌都是我在大学的时候还算熟悉的广东食物。在怡保的几天里，每天都在下雨，和珠三角很像，也是在珠三角我养成了下雨不打伞的习惯，我喜欢下雨天去海边坐着，那时候一般没什么人，积雨云让天际线变得模糊，分不清大海和天空的交界。

下雨的夜晚，我在老旧的街区里游荡，像个夜游神一样，这座城市白天很热闹，晚上却格外寂静。雨后凉爽的空气让我恍惚间忘记这是热带的异国，甚至有了一点回到北方的错觉。有的人努力在熟悉的城市里找寻陌生的新鲜感，一家新开的店铺甚至是一块更换的广告板都会让他们兴奋。但也有的人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试图找到熟悉的东西，甚至和故乡空气相似的味道都会刺激他们敏感的嗅觉。

城市就是深渊，对一些人来说是堆满礼物的深渊，人们从各地到来，登上
一座高台，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鲜血倒进去，虔诚地献祭自己的时间与生命，
高台上的祭司们心安理得地以神之名享用祭品。对另一些人来说，城市是堆满
垃圾的深渊，人的肮脏、卑劣和无耻像尘土一样沉积在路旁，随着雨水被冲刷
进阴沟里。一部分人喜欢下雨，另一部分人不喜欢，喜欢下雨的人看到路面上
的污垢被冲刷干净，不喜欢的人看到污垢冲进了自己住的阴沟里。

有时候人们试图从阴沟中探出头，欣赏一下星光，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
在熟悉的城市中找寻新鲜感，这是他们对抗虚无与悲哀的方式。我更愿意找寻
自身记忆中的故乡痕迹，在一次次与回忆的贴合中故乡被不断美化重塑，变成
了一种精神层面的向往。一个无比美好又不会回去的故乡，逐渐变成了心灵中
期望的样子，成为了我精神的投射。



太平：平息之地

我上面提到在第一任英国驻扎官员伯奇被刺杀之后，政府从怡保搬到了太平，我跟随这个事件前往太平。

太平是马来西亚第一座以中文命名的城市，源于华人矿工帮派海山帮与义兴帮混战，同时苏丹的继承人纠纷，英国人担心威胁到檳城，1874年在邦咯岛举行会议调停，签订《邦咯协定》。这个协定确定了这座城市由霹靂州苏丹统治，华人各个帮派共有，但海山帮获得很大的优势，同时英国派驻参政司维持秩序，将拉律山脚下的这座矿区城市用中文重新命名为太平。

人们提到太平，总会想到旅游手册上说的太平有 33 项马来西亚第一。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是钵努沙弥（D. M. Ponnusamy），他曾在医院工作，退休之后就在太平走访老建筑进行田野历史研究。1999 年写了《TAIPING' S MANYFIRSTS》，里面列举了 56 项太平位居马来西亚排名第一的事物，大部分与英国与有关，少数和印度有关，基本没有华人的部分（只有广东会馆一处）。

这里面说的马来西亚指的是马来半岛土邦，不包括东马的沙撈越和沙巴，也不包括前海峡殖民地的马六甲和檳城。今天旅游官方的太平 33 项第一，是 2006 年由退休测绘师安华伊萨（Anuar Isa）提交市议会通过的。

在这 33 项第一中最重要的一项，是 1885 年霹靂州修建了从太平到文德港（Port Weld）的铁路，为了从锡矿区向港口运输矿石，这是马来西亚最早的铁路。

文德港现在叫瓜拉十八丁（Kuala Sepetang），我到太平之后，乘 77 路公交车 40 分钟坐到终点站，就到了瓜拉十八丁港口。我试图寻找当年那条铁路的终点站，如今铁路早已不在了，火车在上世纪 60 年代停运，1980 年铁路线被

拆除，站台也没有了。

在瓜拉十八丁村子里，我找到一块当年保留下来的火车站站牌，上面记录了这里最早的名字“钵威”（PORT WELD），下面的红砖上写着“KTM 1885”，“KTM”是“Keretapi Tanah Melayu”，马来亚铁道的意思，这块站牌就是马来西亚第一条铁路仅存的部分。

在瓜拉十八丁西边靠近海峡有一个小岛叫老港，是本地华人移民早期登陆的地方，岛上还有本地最早的华文学校和天主教堂。我去的时候赶上下雨，询问了一些当地的渔民，告诉我当天已经没有顺路渔船了，单独乘坐游船又太贵了，我就没有登岛。

回到太平市区，我继续寻找当年马来亚铁路的遗迹。最早的太平火车站已经拆掉了，第二座 1893 年修建的火车站现在改建成了博物馆。在这个院子里有一小段铁轨，上面还有一节绿色老式火车车厢，对面的墙壁上绘制了当年的火车站站台，还有一块站台牌，上面写着 TAIPING, PDG RENGAS（巴当宁仔）- PDK TANJUNG（丹绒加弄）。

在墙壁上还有两块牌子，分别是 LARUT 1840 和 TAIPING 1874，LARUT 就是拉律，是本地之前的名字，1840 年在这里发现了锡矿，从此被开发，1874 指的是 1874 年邦咯岛会议签订条约。我留意到门口的黑色路灯，这是 1903 年从英国进口的，之后就一直留在这里，下面有标志铭牌。

我在隔壁发现一栋废弃的老房子，被藤条植物包裹着，小心翼翼走进去，内部有一些残存的卡通墙绘，看起来曾经是一座幼儿园。房子外墙壁上满是涂鸦，画着很多有政治意味的人物，包括穆罕默德·阿里、圣雄甘地、马哈蒂尔，还有戴着 V 字仇杀队面具的切·格瓦拉，外墙上用马来文写着“如果你抽大麻，你就会被邀请了”，内部墙壁上面用马来文写着“致所有人，记住这些话，如果你觉得不安全，就写一份遗嘱”，感觉像一个嬉皮士聚集点。

在太平有很多早期殖民建筑，包括 1894 年建成的政府旅馆，现在是被围起来待修缮的危房，感觉已经废弃了，从外面能看到墙壁上的名字 REST HOUSE。这是太平第一家旅馆，太平成为霹雳州首府之后，从海峡殖民地来的旅客就住在这里。从政府旅馆继续向西走，经过 1897 年修建的拉律马登县属（Larut Matang & Selama Land & District Office），一栋维多利亚时代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门口的大红心是标志。

在这附近更有名的建筑是爱德华七世学校，是一栋白色墙壁棕色屋顶的二层建筑，从外表看起来倒像是一栋豪华的饭店或者俱乐部，外墙上写着“S. K. KING EDWARD VII”。这是马来西亚第一所英文学校，最早建立是给那些在太平铺设铁路的欧洲工程师的孩子上学的。1878 年命名为甘文丁英文学校，1883 年在太平镇镇中心建起中央学校，到了 1905 年为了纪念四年前登基的英王爱德华七世，命名为爱德华七世学校。

在太平的 33 项第一中，还包括最早的英国圣公会教堂——诸圣堂（GEREJA ALL SAINTS），这栋教堂离市中心有点远，但值得去看一下。我从市区朝东面的高地走去，经过一栋白色的建筑，对着街道的是棱角分明的三层塔楼，这是 1906 年修建的英国军官办公室。

在这栋白色建筑对面就是诸圣堂，教堂建立于 1883 年，有很大一片庭院，教堂建筑白色墙壁灰色屋顶，木制外观，最引人注意的部分是 1911 年安装的彩色玻璃，这些玻璃在二战中很难得地保存了下来。教堂旁边是一小片墓地，埋葬着早期的英国殖民者，多数人死于热带疾病，还有一些因为没有退休金无法回国，老死在这里。

我走回到太平市区，在一个十字路口发现了一座醒目的钟楼，这是太平大钟楼。这座钟楼建于 1881 年，是为了纪念拉律战争平息而修建的。钟楼白色尖顶楼体，有白色拱门、屋檐柱子和窗户浮雕，尖顶上有一个公鸡型的风向标。

钟楼最初是木料建成，后来在 1890 年用石砖改建。这栋建筑曾经作为太平市区警察局，后来又成为消防局，也是马来半岛第一座消防局，现在是旅游资讯站，在钟楼旁边还有当年的消防栓和一个红色的英式电话亭。



离开钟楼，我前往太平客运站准备离开，路过一片热闹的商业区，这里有一座百年大市场，当地人称为老巴刹，是马来西亚第一个市场（这一点我有些存疑，第一个市场怎么会年代这么近，但旅游手册上就是这么写的，我估计是第一个现代建筑室内市场）。市场是两栋长条形建筑，建于 1885 年，外表是木

材建成，褪色的红漆屋顶，屋檐木料是棕色，墙壁是褪色的白漆。市场旁边还有一座钟楼，上面写着 PASAR LAMA 1885，钟楼是黄色圆柱体，二三层都有彩色方形玻璃，上面是小灯泡组成的电子钟表。

当地一位商贩告诉我，他们在这座老巴刹里做生意已经延续了几代人，建筑在老化，有一些危险，他们希望政府可以维修，但政府似乎想让他们迁出去，把这里改造成艺术区。我在市场里闲逛，这里有不少小吃摊子，无论是商贩还是顾客，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比较多一些，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地面水平线的关系，这栋建筑好像有一点倾斜，恐怕真的是需要修缮了。

这座大市场还和当地一项很有名的民间活动有关系。太平被称为雨城，当地人有赌雨的传统，这座市场曾经就是人们赌雨的据点，人们聚在这里打赌雨滴何时落到市场屋顶上。赌博在马来西亚是非法的，但赌雨没有赌具不会被警察逮捕，根据《星洲日报》的报道，赌雨在上世纪 70 年代很流行，现在已经没有几乎这种活动了。

在怡保和太平历史中有一条重要的线索，就是英国殖民干涉。英国人涉足马来内陆是担心华人矿工帮派的内战威胁到檳城殖民地，那么檳城殖民地当时是怎样的状况呢？这座曾经由英国人治理的城市，今天被认为是华人地位相对最高的地区，又有怎样的族群历史？我的下一站就是檳城。

大巴车在路上穿过一片片丛林山区，作为平原地区长大的人，我对大山有一种特别的好感。所谓的文明世界曾经是一个个点，海港、要塞、宫殿、庙宇、殖民点，后来连成线，扫荡成平面，最后变成立体的现代国家。在国家的概念只是一片大概范围内的若干个点的時候，点与点之间充满着自由的空间，相对不适合种植粮食的山区和山谷中的小块土地，不被国家管理也不需要国家提供服务。

劳动力密集的水稻种植把人禁锢在土地上，形成一个个密集的定居点，这

些定居点并不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却能让财富和人口更容易被国家管理征收。于是农业定居的生活方式被统治者鼓励或者强行鼓励，国家在管理征收财富和人口之后，也会帮助人们扩大生产规模，进行开荒和修建水利工程，包括组织对山区自由地带一遍遍的讨伐、扫荡和驱逐。

大巴车途经的这片山区和我去过的云贵地区很像，从云贵川西，或许还要加上湘西和桂西，向南延伸到马来半岛北部，有一大片无国家空间，在平原的水稻农民统治者管辖之外，人们建立起类似无政府主义社区一样的村寨和部落。在古代，这些无国家空间依靠地形的优势尚能存活下来，然后缓慢地迁徙到更深处山区，直到后来被现代国家彻底摧毁。

今天现实世界中已经几乎没有无国家空间可以供一部分人拒绝认同任何国家当局，只愿意独自或者自由结成社群生活。制度与科技把人牢固地变成社会的一部分，为多数人带来便利与安定的同时，也让少数人更加难以逃脱，野人无处遁形。人们到底有没有脱离社会，或者不受任何国家管制的自由？恐怕我们只有放弃肉体，把自己电子化，才能在互联网当中实现无政府主义社区。

穿过山区丛林，我来到槟城。其他一些城市是本地统治者在本地建立的点，槟城则是外来统治者建立的点，之后这个点将和其他几座城市连成线，最终组成英国的东印度殖民地带。

槟城：南洋小哈尔滨

槟城与哈尔滨很像，都是在本地原住民不多的地方由外来人新建起一座城市。哈尔滨是俄国人建立的城市，槟城是英国人建立的城市，俄国人到来是基于铁路，英国人到来是基于航海，俄国人把沿铁路线作为中东铁路附属区，英国人则把槟城、马六甲、新加坡合并成海峡殖民地，这两地都和中国人有关，又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移民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社区。

与马六甲比起来，槟城的历史并不长，早期的中国航海家把这里称为槟榔屿（Pulau Pinang），但无人定居。槟城原本是吉打苏丹的领地，1771 年吉打苏丹同英国东印度公司签订协议，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权，换取对抗暹罗的军事援助。15 年后，弗朗西斯·莱特代表东印度公司接管槟城，命名为威尔士王子岛，他本人也就成为了这里的第一任总督。

槟城老城区是世界文化遗产，有很多民宿和免费的 CAT 观光大巴，居住很方便。我在民宿安顿下来，去了一家豪华别墅一样的 KFC 餐厅简单吃了午饭，开始城区徒步。

我在吉隆坡也提到了 KFC 餐厅，这边的 KFC 炸鸡比中国的好吃，分量也更足一些。我们的世界在变得越来越相似，那些跨国企业利用人们对熟悉感的需求，你有任何一家麦当劳都知道大概会有什么，你有任何一家沃尔玛都知道该如何买东西，这让我们的世界变得便利快捷，对于不想尝试新鲜事物的旅客总能找到不会太差劲的食物。

但这并不是一件好事，相反其实挺糟糕的，我们的社会在高度便利当中也失去了广泛的可能性，如同流水线上生产出样式五花八门实际没什么区别的塑料花。我在后续的某一个城市旅行中，我询问当地人附近有什么好吃的，他给我推荐了一家本土的 KFC 餐厅，意思就是全部食物和 KFC 餐厅一样，但食物名

字是当地语言。

宁山哀：你知道挺糟糕的那你还吃，檳城是马来西亚最著名的美食城市，你竟然吃 KFC。

我：我真没觉得檳城有什么好吃的，可能我的口味不适合那里，而且檳城是华人城市，我都去国外了为啥还吃华人的食物。

宁山哀：北马不识南风，你都去国外了还吃 KFC。

我在檳城先要去拜访的是一座基督徒墓园，在红毛路。这条街原本是早期殖民地高级官员和富商们居住的地方，当地人俗称叫百万富翁街。这座墓园被称为红毛旧冢，红毛是过去对西洋人的称呼，原本主要指的是荷兰人，但埋葬在这里的大部分是英国人。在我家乡过去把俄国土匪称为“红胡子”，看来对西方人统一的视觉感知就是体毛红色。



这座墓园中埋葬的大多是英国殖民时代的士兵、水手和官员，包括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墓园里有 345 个有名字的墓碑，还有 150 个无名墓碑，有一些墓葬毁于二战。这片墓园最早在 1787 年开始埋葬死者，一直用到 1892 年。墓园中早期埋葬的人大多死于热带地区的疟疾，因为城区开发大范围砍伐树木，导致热带疾病在城市中蔓延。

我走进墓园里，有一些石柱型的墓碑，还有圣杯样式的，也有带有明显罗马式风格亭子的大型墓葬，但已经有些破损。第一任总督弗朗西斯·莱特（Francis Light）安葬在这里，他在 1794 年死于疟疾，他的墓葬上用英文写着“这墓碑下躺着的是弗朗西斯·莱特，是开拓此岛的英国殖民者”。

在这座墓园中还有一小片华人基督徒的墓，墓碑上是中文，他们是为了躲避清末太平天国战乱而逃到槟城的，大部分是光绪十四年 1888 年去世的，最早有 1860 年的。我无法考证他们是逃避战乱的平民还是战败流亡的太平军成员，因为墓碑上并没有明显的标志。

按照历史记载，太平军战败后，一部分军官逃到了香港，其中洪秀全的侄子洪全福还策划了光绪二十八年年底的“大明顺天国”广州起义，更多人到了美国，之后又去了秘鲁和智利，还参与了当地的战争。但流亡东南亚的太平军没有很多记载。

我在墓园里面走了半天，还找到一个人：托马斯·里奥诺文斯（Thomas Leonowens）。托马斯本身不出名，他在印度殖民地担任书记员，结婚后来到槟城在一家酒店里当经理，死于中风。托马斯的妻子很出名，他的妻子叫安娜·哈莉雅特·爱德华兹（Anna Harriette Edwards），在托马斯死后去了泰国，成为了泰王拉玛四世的家庭教师。她写了一本回忆录《暹罗宫廷里的英国女教师》（The English Governess at the Siamese Court），后来被玛格丽特·兰登写成了著名小说《安娜与国王》。

宁山哀：那本书里的故事很多是杜撰的，安娜在丈夫去世后先去了新加坡再去的泰国，而且并没有书中她和国王之间那么多故事，她可能就见过国王几次，也不是一个影响很大的老师，她写那本书可能只是为了赚钱，添油加醋编成一个西方女人进入东方宫廷的夺人眼球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墓地中还安葬着一些亚美尼亚人，他们大多故乡在波斯和印度，18 世纪跟随英国人来到槟城。他们在槟城原本有自己的教堂和墓地，但是在 1906 年拆除了，墓地也迁移到了现在的这座红毛路墓园。我之后去伊朗的时候，寻觅到亚美尼亚人的移民迁徙历史，其中就涉及到了槟城。

在离城区稍远的地方还有一片更大的基督徒墓地，里面有更多华人基督徒的墓。我冒着热带地区下午两点的太阳走了很久，还差点走错岔路，这片墓园中有很多老旧的天使墓碑，我发现了一座墓，墓上面有一条狗的雕像，这座墓的照片在网上经常出现。据说是主人去世之后，这条狗格外难过趴在墓上面哀悼，不久也死了，人们就在墓上放了这座狗的雕像。

在这片墓地里还有一座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墓，上面有黑色的海军船锚和十字架，墓碑上用英文和俄文写着“致 ZHEMCHUC 巡洋舰的俄罗斯海军官兵，祖国感谢他们”。这座墓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槟城发生的唯一一场战斗，有 88 名俄国水兵牺牲在这里，其中埋葬在这座墓中的有 10 个人，还有 2 个人埋在木蔻山。战斗之后有两百多人被当地渔民营救逃生，俄罗斯使馆每年都要举行活动纪念阵亡士兵，同时感谢营救官兵的槟城渔民。

1914 年，从青岛港来的德国巡洋舰埃姆登号袭击了停靠在槟城港口的俄国巡洋舰，被击沉的这艘俄国军舰参加过日俄战争对马海战，之后停在槟城，一战中加入了协约国军队。袭击俄国海军的德国巡洋舰埃姆登号经历也非常传奇，一战爆发后，日军准备进攻青岛，埃姆登号巡洋舰在日军到来前离开港口，一直徘徊在印度洋和东南亚海域，共击沉和捕获 30 艘协约国军舰和商船。为了骚扰协约国海军，1914 年 10 月埃姆登号巡洋舰突袭槟城港口，击沉俄

国、法国军舰各一艘。



走访了这两座基督徒墓园之后，我来到槟城的犹太墓园。犹太墓园不大，很容易被忽略掉，里面埋葬的犹太人大多是当年来到槟城殖民地的犹太裔军人和家属，最早的墓是 1835 年的，但看起来比较新，应该是修缮过，最晚的一座是 2011 年的。守墓人是一个印度老人，他说槟城已经没有当年的犹太人后裔了，但偶尔会有在以色列或者欧洲的家属后代来看望祖先。

墓园中一部分墓是三角体，有希伯来文和英文的墓碑，还有大卫六角形，也有少量正方体的，有几座墓碑已经破碎了。守墓人专门带我去了一座犹太军官的墓，墓碑顶部有一个王冠标志和罗马数字 IX，下面是英文 9TH JAT REGIMENT，再下面写着 2ND LIEUTENANT L. V. COHEN。死者是一个隶属于英属印度陆军步兵团第九团的少尉，死于 1941 年 10 月 9 日的，年仅 22 岁。

离开犹太墓地之后，我又去了槟城的日本墓地，在马来西亚著名歌手和电影人比·南利的故居旁边。铁栅栏门上用汉字写着“日本人会 共同墓地”，里面共有 56 座坟墓，但是由于墓地没有开放，我没有看到深处的慰灵塔，只从门口看到里面一座座矮小的立方体墓碑。门口有一座陆军军曹的墓，属于二战时期的日军，其他的都是明治时期移民的墓，很多墓碑上刻着汉字“南无妙法莲华经”和“阿弥陀佛”。

巧合的是，比·南利拿过的第一个奖项——马来亚广播电视北马区歌唱大赛季军，正是在日本投降的 1945 年。

每到一座城市我都喜欢去当地的墓地看看，墓碑上往往记录了重要的历史，墓地又相对容易逃过城市规划和意识形态造成的建筑破坏。但在很多现代城市，公墓总是被不断翻新和填埋，在中国只有一些宗族地区和宗教社区的传统墓地还能部分完好保存着。

死去的人失去了阐释自己的权利，他们最后留下一座墓碑，也许只有名字和出生死亡年份，即便如此已经是非常幸运，很多人的墓碑早已不见，甚至根本没有墓碑。在青少年的时候，我常常想人死之后会去哪里，会不会如一些老人所说依然看着我们这个世界，死去的人可以做除了复活之外的所有事情。

我喜欢在墓地散步，里面充满了一种欢喜的氛围，煎熬的一生终于结束，他们离开了这具受了一辈子苦难与屈辱的肉体，从此再也没有饥饿、寒冷与痛苦。他们留下的躯壳慢慢腐烂化为灰烬，墓地里除了泥土与骸骨其实什么都不

会有，他们的灵早已飘浮到我们的世界之外，墓地里偶尔毫无来由地吹过微风，是一个刚刚亡故的人放下了他全部的眷恋。



传统上汉人不太能接受基督教，儒家思想相信人性本善，不能理解为什么人生下来就有原罪。在一些轮回论者眼中，人是有来世的，我猜想皈依基督教会不会是为了避免进入轮回，若是投胎为牲畜，意识迷茫混沌中挨过一刀，倒还算是痛快，若是投胎为虾蟹虫鱼，根本没有心智，那就也没有痛苦的感知，

就怕投胎为人，又要再受一辈子罪。

离开这些墓地，我从岛内走向海边，经过了一座天主教堂，教堂旁边是槟城天主教区博物馆。博物馆里面有一座圣母子的雕像，圣母带着欧洲王冠，穿着一件蓝色长袍，那件长袍很有满洲风格，站在她膝盖上的圣子则是白衣红袍。工作人员说这个圣母像看起来很像中国人，是一个教徒捐赠的，问我认不认识，是不是来自我的故乡。我把照片拿给一位研究服装的老师，他说看起来圣母的衣服像一件清朝宫廷女性的衬衣，这种衬衣可以内穿也可以单独外穿。

我之前看过一幅中国古典画，画中的圣母子是送子观音的样子，是传教士把圣母子像带到中国之后，中国画家仿画的，所以有可能这件圣母子雕塑也是中国教徒模仿圣母子的样式用中国服饰风格做的。

槟城教区的天主教徒很多是葡萄牙后裔，他们的祖先从亚洲的葡萄牙殖民地来到槟城。根据教区的记载，当弗朗西斯·莱特船长来到槟城的时候，发现已经有超过三千名中国人居住在这里，以开矿和手工业为生，很多华人是基督徒，逐渐形成中国教区。

这些华人基督徒一部分是太平天国时期逃难到这里的，其中有平民也有太平军成员，还有一部分后来是躲避义和团运动的中国基督徒。在吉隆坡有一座1903年修建的天主教玫瑰堂，墙面上有中文的题字：天道无私祸淫福善，主恩丕顯崇正黜邪。



离开天主教区博物馆，我继续向海边走，港口区周围是槟城的老建筑区，有一座康华利斯堡值得去看看。康华利斯堡是 1786 年修建的一座星状城堡，以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查尔斯·康华利斯的名字命名，最初是木质的，1808 年进行重建改为石头城堡，但这座堡垒从来没有投入过实战。

这里也是莱特船长最早在槟榔屿登陆的地方，城堡内还有莱特船长的雕像，在一棵槟榔树下面，据说没有人知道莱特船长真实的模样，这座雕像是根

据他儿子的外貌做的。

在堡垒里面有很多当年的大炮，其中有一门叫 Seri Ramdai 大炮。这门大炮很传奇，最早是荷兰人送给柔佛苏丹的礼物，想寻求苏丹帮助攻打马六甲，所以大炮上有一个 VOC 的标志。后来这门炮被海盗夺走，再后来大炮沉入海底，英国人想打捞这门炮，一个马来人潜水把大炮捞了上来，他要求在大炮上刻上古兰经经文。当地有一个说法，这门炮可以求子，以前有女人来给这门大炮献花烧香。

宁山哀：很多地方都有女性求子的奇怪把戏，这就能看出女性的生育压力有多大，很少看到男性求子的习俗，大概是男性不愿意承认生不出孩子是自己的原因。

我：确实这种生育的压力更多在女性一方，但不等于社会不承认男性的问题，古人很清楚生育和男性有关，但由于认知局限将生殖能力和性能力混为一谈，我觉得男性对于壮阳的迷恋有一部分就来自生育焦虑，各种动物的生殖器和模样像生殖器的植物就是男性的求子大炮，他们用狂热吃下这些稀奇古怪食物的方式献祭生育之神。

宁山哀：这种性焦虑与其说是对于生育，不如说是对于征服女人，男人把性视为对女人的权力和暴力，当他们的性能力无法有效征服女人的时候，就会陷入焦虑。

我：也是因为大部分男性无法获得社会层面的权力，在两性关系中的征服是他们唯一可以展示男性权力的机会，他们就会更看重这方面。而且男性对生育的焦虑也来自姓氏和财产继承、社会评价、绿帽子风险等等，这种焦虑都是社会权力地位层面的，而不是单纯的自然繁衍。

在堡垒旁边的海滨公园里也有一座战争纪念碑，除了和怡保的一样有一战、二战、马来西亚独立、印马对抗和紧急状态时期之外，还有一个“SIAM-BURMA DEATH RAILWAY 1942-1945”。这个指的是二战期间，日本为了修建泰国-缅甸铁路，征用 30 万东南亚的战俘和劳工，造成 9 万劳工和 1 万 6 千名战俘死亡，称之为死亡铁路。



海滨公园到老城区民宿之间是一大片商业区，我在这里找到了一家以做鱼闻名的餐馆，他们家的魔鬼鱼特别好吃，老板是华人，他自己调制的辣酱配上臭豆子，味道诡异而美味。我小时候原本是不喜欢吃鱼的，只有刀鱼能吃一点，长大之后发现了很多种好吃的鱼，才意识到我家里做鱼不太能去腥，小孩子对鱼腥味不会太喜欢，鱼类又没有其他虾贝类海鲜的甜鲜味，所以才会不喜欢。

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家餐馆的蛋花汤，不放紫菜，而是放大量的薄荷叶

和少许贝柱，味道非常惊艳。然而我却有些遗憾，这种瞬间的惊喜，身边没有人可以分享我的感受，就算以后有了伴侣，第一次喝到那碗蛋花汤的惊喜却无法重现。

前面提到的华人基督徒在本地华人中还是少数，多数传统华人社区中依然保留着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民间信仰，其中代表性的建筑就是宗祠。我前面提到第一批来到马来西亚的移民娘惹峇峇逐渐融入了马来社会，但是在 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第二批来到槟城务工和经商的华人，他们的融入意识并不强，更加内部抱团。

这一期间为了帮助新移民更好地定居下来，华人们成立了会馆，按照故乡建造了宗祠，当地人称为“Kongsi（公司）”，开始形成自治社团。在英国殖民政府和本地马来人看来，这些华人社团类似于帮派组织，经常发生宗族械斗，难以被管理。

这些宗祠会馆除了有“领事馆”的作用之外，还有更深层的社会使命，维系与协调不断扩大的宗族内部责任和外部社会责任。随着时间推移，许多宗祠会馆越来越富有，建筑也更加华丽，开始互相在装饰和数量上进行攀比，正是由于这样的攀比，槟城才成为中国海外宗祠建筑最集中的地方之一。

谢公司（Cheah Kongsi）是槟城最古老的华人宗亲会所在地，除了作为庙宇及聚集厅堂之外，这座建筑还是几个帮会的登记总部，每个帮会占据庙宇的一部分，这里成为 1867 年爆发的帮派骚乱的核心地带。

潮州会馆（Teochew Temple）也叫韩江会馆（Han Jiang Ancestral Temple），建于 1870 年，会馆旁边有一座韩江学校，韩江就是潮州的母亲河，会馆有几块匾额分别写着“九邑流芳”，“帝德同沾”，“派衍韩江”。潮州有八邑和九邑两个说法，八邑指的是海阳、揭阳、潮阳、澄海、普宁、惠来、饶平和丰顺八个县城，九邑就是加入大埔县，这个县今天属于梅州。

潮州会馆内里面有一块“槟榔屿潮州会馆纪略”碑，记载了这座会馆的历史。上面提到潮州人从乾隆五十一年（1768 年）就开始在槟榔屿移民开拓，到了道光十二年（1846 年）有了第一座家庙。咸丰五年（1865 年）在槟榔屿的潮州人以潮州公司名义开始祭拜祖先，同治九年（1870 年）完成了现在这座家庙的修建。在民国八年（1919 年），响应改革的浪潮，开始兴办教育，修建了韩江小学，之后家庙改成会馆，成立了马来亚潮州会馆联合会。

虽然是当地华人的会馆，但这些闽粤后裔离我的故乡过于遥远，让我感到熟悉的是会馆内的文字。汉字真的是中国作为统一民族国家伟大的发明，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获取政权之后马上进行全民扫盲，因为学习文字就是在塑造民族意识。

如果仅仅是身处同一个被限定边界的国家境内，并不足以让人们产生“自己人”的意识，因为国家的边界往往来自征服和政治交易，并非相似族群的自然分布界限，无法证明为什么某几个族群必须要被圈在同一个国家里，所以才会将国家称之为想象的共同体，这意味着要塑造一些共同的象征来维系这种想象。

现代人获取信息的最重要途径就是视觉，使用同一种文字意味着在同一个语言平台上交流，每天看着同样文字的新闻报纸，接受同一种文字的政府公告，孩子们接受同一种语言的教育，生活的公共环境只有一种文字，慢慢大家就会以为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国家在努力塑造人们的意识，让人们想象生活在这个纯粹政治划定范围内的都是一体的。

文字最重要的表达是被记录的历史，这些历史给人们塑造了关于过去的来源，提供了虚幻的合法性。这些被文字记录的历史决定如何判断谁是自己人，以此来区分族群，人们有了依据用假设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指导今天的行为。不得不说，被文字记录的历史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但这也把人束缚在过往中，

并且一部分当权者会利用这些历史，或者制造历史来影响人们对当下的判断。

我自己常常处于这样的矛盾中，一方面我喜欢历史，喜欢那些人类有过的癫狂、荒诞和残酷，另一方面我又不愿被束缚和蛊惑，历史给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做出了很多限定，不一定是真实的，因为国家会有选择地保留和鼓吹一部分历史，同时隐藏和销毁另一部分，编造对统治更有利的神话故事。那都是唬人的，“自己人”不该被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字、相似的长相和被修正过无数次的历史所限定。

讲到檳城的华人就不得不提及一个人——郑景贵，檳城有两条街以他的名字来命名。郑景贵年轻时跟随父亲在马来半岛经营生意，40 岁的时候已经成为有名的华人富商，他主要投资的就是锡矿业，郑景贵努力调和各个矿工帮派之间的矛盾，推动了矿业的发展。

到了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内地一些背景复杂的人流亡到马来半岛，对当地社会治安危害很大，侨民们对此深恶痛绝，英国殖民政府又毫无作为。郑景贵以自己在华侨中的影响，与当局协力整治，他从此声望更高，被英国殖民政府任命为甲必丹，华人事务都由他处理，郑景贵的儿子郑太平在 1921 年被任命为霹靂州最后一位甲必丹。

檳城侨生博物馆曾经就是郑景贵的家，一座很大的庭院宅子，融合娘惹峇峇住宅风格，在内院侧面有一个欧式天使雕像喷水池，但背后的墙壁却是中式的浮雕。博物馆内里面收藏了大量有关娘惹峇峇名门望族生活的古董和艺术品，包括各种金器首饰，金漆屏雕，也有结婚礼服、女士的梳妆柜、绣花鞋嫁妆礼盒等。



在博物馆里引起我注意的是郑景贵的照片和画像，他穿着清朝的官服官帽挂着朝珠，俨然一位清政府官员，他的妻子也是官员夫人的打扮。

1860 年大清国被迫解除海禁之后，开始重视海外侨民问题，一方面侨民带来的外汇可以缓解财政压力，还可以输出劳工减轻社会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海外有大批的反清流亡人士，有会道门分子和太平天国支持者，也有革命派、

改良派等一系列政治反对派，让清政府觉得有必要进行控制。

于是清政府开始派出官员慰问侨民，允许侨民领袖捐官，并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处理南洋侨民事务。郑景贵当时就买了一个“资政大夫”的官职，赏戴花翎候选守巡道加四级，官职是正二品，他的夫人是三品淑人。

对于海峡华人群体来说，他们的政治认同是很复杂的。这些人大部分接受英文教育，政治上认同英国统治，社会地位往往很高，成为英国人与华人之间的连接。我不知道英国殖民政府任命的甲必丹和大清国任命的资政大夫究竟哪个更吸引郑景贵，按照当地实权来说应该是前者，但博物馆中的照片和大幅画像似乎表明中华母国政府的册封才是至高的荣誉。

宁山哀：在你的北方故乡没有宗族祠堂这些东西，你也没怎么接触过闽粤文化，也不懂那边的语言，所以你在国外见到这些是什么感受呢？

我：北方只是不像南方保留的那么多，但陌生不等于一无所知，我们依然在同一套文化叙事系统中，虽然具体的宗祠祭祀活动我之前从没在现实中见过，但这些活动背后的含义我非常清楚。是文化叙事系统决定了我们的认知，而不是实际发生的所见所闻，文化叙事系统改变人只需要非常短的时间，你听过维吾尔语版的京剧红灯记吗？这就是想象共同体的所在，社会教育驯化了我们，让我们把自己身边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当成和自己有关。

宁山哀：所以问题在语言上，当你学一种语言的时候你就是在学和这种语言相关的文化，使用某一种语言的人，哪怕他身边没有任何和这种语言相关的文化内容，他也会产生假想的熟悉亲近感是吗？

我：因为语言不是一个词一个词对照的，就像我们学英语一样，哪怕是纯粹的应试教育，我们也会了解英语族群的思维习惯、措辞方式、文化传统，即使是

功利性地学习，我们也会看英语影视剧，尝试阅读英文新闻和小说，可能会去接触英语母语者，这些就会成为我们自我文化塑造的一部分。一个中国人去阿拉伯国家，他看到英文标识和美式快餐可能就会觉得亲切，哪怕他除了学过英语之外和美国没有任何关系，他也会成为假想的英语群体的一部分。

宁山哀：你觉得中国人在汉语环境中也是假想的吗？

我：是的，只不过我们一出生就在这个环境里，中国有一些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很多地区的方言也很难相通，但汉语普通话+简体中文的官方标准建立了这种假想，让大家把自己都放在统一的“中国人”的概念里。

宁山哀：嗯嗯，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你会对当地的宗族祠堂有亲近感，就是因为你前面说的文字的原因。

我：文字是表面原因，再深一层是权力的原因，是权力决定你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而并非文化传统。有的群体因为权力压迫而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文字，有的群体反而因为权力压迫而更加强调自己的语言文字。一个少数群体对主体权力采取抗拒的态度，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这就是让我亲近的，无论是在国外使用汉语，还是在中国使用少数民族语言。

在槟城还有一处中国游客感兴趣的景点，就是孙中山故居。在清朝末期，马来亚和新加坡是海外华人政治势力争夺的地区，百日维新失败后，维新派人士纷纷流亡海外，1900年康有为在新加坡组织保皇党分部，1906年孙中山在新加坡组建同盟会，1910年将革命大本营搬到了槟城，并创办《光华日报》。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策划地就在槟城，参加起义的72烈士中有将近三十位来自马新地区。

我来到这座故居，里面有一位老人向我介绍孙中山和革命成员们的早期照片，博物馆里展示着同盟会时期的报纸，还有关于孙中山在马来西亚革命故事的电影《夜·明》的宣传海报，这部电影全程在槟城拍摄。有意思的是，里面

展出了一份报纸，是关于娜迪亚·科马内奇的，引用了她的一句话：不求事事顺畅的人生，只求做个生命的勇者。很鸡汤的一句话，不知道是不是和传闻中她与小齐奥塞斯库的故事有关。

辛亥革命成功后，国民党开始在马新地区成立支部，拉拢南洋华人华侨回国投资，1925 年英国当局禁止国民党活动，理由是其中有共产分子涉嫌反英活动。当时共产主义思潮从中国和印尼传到马新地区，印尼共产党在 1926 年政变失败后陷入低潮，后期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在 1930 年成立独立的马来亚共产党。



尾声

在槟城的旅行结束了，也就意味着我的马来半岛之旅结束了。我从马六甲出发，途径吉隆坡、怡保、太平，最早到达槟城，探访这一路的历史遗迹。

之前在 2016 年，我当时居住在上海，和朋友王鹤进行了一次南方之旅，从上海出发到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我在第一本书《铁锈与孤岛》里提到过这趟旅行。作为一个北方人，对于南方有着一种复杂的向往，湿热的空气中弥漫着情欲的气味，远离帝国北方首都天高皇帝远的自由，后来我发现自己的想象可能过于古典了，忽视了“现代”的强大，“现代”意味着权力可以延伸到最基层，肆意控制摆布着哪怕最遥远的边疆或者最人烟稀少的村落。

这次到了马来半岛，我感觉才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南方”，或者说我期待的那种南方。虽然在表面的自然生长背后依旧带有一层层政治痕迹，在全世界的国家民族主义喧嚣势头中，马来西亚作为东南亚地区以及伊斯兰世界重要的国家，政治地位得到强化，但这对于民众来说未必是好事。越重要的国家越会鼓动一个大政府的形成，但政府一旦大起来，就很难再小下去，开始有更多的资源被集中起来以国家的名义运作，开始有更强烈的国家民族主义意识被鼓动，总会有人相信国家强大会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但国家往往不会集中力量办大事，反而更容易集中力量办坏事。

在马来西亚的最后一天，我去逛了逛吉隆坡的武吉免登商圈，马来半岛的旅行总体上是令人愉悦的，愉悦的感受在我的生活里并不常见，在我之后的旅行中也是少有的。

注：马来半岛之旅写于 2018 年 11 月。

宁山哀：我觉得你所讲的南方并非真正的南方，而是一个与北方对应的意向，你把你的不满情绪投射在地域上，包括对中央集权国家、强烈的主体民族意识、现代规划的城市、禁锢的文化环境等等，你把与这些对应的都称为南方，这是你想要去寻找的。

我：部分是这样，在我童年记忆中的东北故乡，某些方面也比现在的中国好很多，所以这个“北方”确实是带有意向的而不是纯方位，因为“比北方更北方”反而更让我满意。我第一次感受到地域和意向重叠的南方是读大学时在广东，那边的氛围确实更加宽松，当然也和我读大学的时间段有关系，那时候新君尚未登基。

宁山哀：嗯，就像国际社会“南北合作”，用北方代表发达国家，用南方代表发展中国家一样。但为什么选择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平静的地方，比如马来人与华人的矛盾等等，如果按照你向往的南方，你有更好的选择，柬埔寨或者老挝，泰国如果不考虑政治矛盾也可以，或者干脆去拉美或非洲。

我：就像我文章开头讲的，我想寻找的主线是关于历史文化的连接，我前些年关注中国的穆斯林族群，反向看我也会关注到伊斯兰国家的华人，马来西亚是个很好的例子，而且又是文化边缘交界地带。的确马来西亚的社会冲突比较强，但这种冲突中也能观察和思考出更多问题，柬埔寨和老挝在我看来略单一，拉美可能我之后会去。



伊斯坦布尔之旅

从马来半岛回到北京之后，一边整理稿子，一边继续为我的第一本书寻找出版社。这个过程是很不愉快的，我低估了这个庞大帝国在普罗大众言论方面的小心眼儿，他们对一本哪怕只有百十来人能看到的私人出版物也充满着警惕，这与他们日常呈现出来的傲慢自大很不相符。我为自己在这个国家生活了三十年却竟然保有如此的天真感到有些羞愧，如同记录下奇异见闻信札的那个波斯人一样。

就这样，因为我的书，我成了精神上的外乡人。西周的时候，居住在城郭里有一定参政能力的叫国人，居住在乡野基本没有权利仅能谋生的叫野人，我就是个生活在城市里却没有权利的国中野人。

在马六甲我和当地华人闲聊，他们一致的观点是华人很勤劳，马来人太懒了，印度人稍好一些。我作为从北京这个低收入中产阶级劳改营来的人，听到这样的观点毫不觉得奇怪，人们把辛苦当成勤奋，把劳动等同于创造，这两者其实是不同的，劳动本身从来不是光荣的，劳动往往是被强迫和压榨的，创造价值才是光荣的。勤奋是一种主动的创造力，是人们努力想要改造自己的生活，但辛苦往往来自制度性的剥削和分配不公，而非个人主动创造价值的意愿。

中国人包括华人的勤劳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对创造价值的主动渴望，可能连一小部分都没有，绝大部分勤劳是因为人们被生产关系束缚住，这些制度让人们只能靠不断挤压自己的生活时间拼命劳动才能勉强满足生存需要，人们生活在不安全感当中，对闲暇休息感到惶恐不安。

一些人把勤劳视为华人在很多国家生存的能力，确实这种勤劳让华人群体变得富有，就像是一个老兵到了 BB 弹游乐场里，他会所向披靡，但一个正常的

社会不该是战场，应该是游乐场。人们的生活质量并不完全来自财富，而来自可支配自由时间和财富之间的平衡，东亚长期以来的生活方式是将人们的可支配自由时间压缩到最少，然后换取仅仅够维持生存的财富，目的就是让人一生耗尽精力干活儿勉强够活命，这是统治的策略。于是中国人到了可支配自由时间很多的地区，将本该用于闲暇休息的时间用于工作，打破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也就获得了更多的财富。

这恐怕就是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低生活质量优势，也是世界其他地区华人受到当地不友好对待的原因之一。

晨鸡初叫，昏鸦争噪，哪个不去红尘闹，路迢迢，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

到了12月，因为出版的事情还没有着落，我开始准备下一次探访旅行。在马来半岛时了解的历史中隐约有奥斯曼帝国的影子，不过是以旧人被新人碾过的形象出现。

由于陆地商路受到奥斯曼帝国的阻挡，葡萄牙与西班牙开始开辟东方航线，1509年的第乌海战葡萄牙海军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轻松击败了奥斯曼海军（其中一个原因是奥斯曼海军主力方向在地中海）。1538年的第乌围城战后，葡萄牙人在印度南部海岸站稳了脚，这为他们之后征服马六甲奠定了基础。

葡萄牙人到达马来群岛之前，南洋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中，在伊斯兰世界东进和中华帝国南下中双重受益的马六甲王国，由于葡萄牙人的介入开始瓦解。这时，在马六甲海峡对面苏门答腊岛的亚齐王国崛起，试图击退葡萄牙人取代马六甲成为南洋伊斯兰世界的领袖。但亚齐实力不足，他们需要一个外援，1565年亚齐请求奥斯曼苏丹即伊斯兰世界哈里发出兵。虽然奥斯曼帝国的少量兵力并没有挽回局面，但为亚齐提供了欧洲先进的军事技术，让葡萄牙人无法速战速决，一直拖到葡萄牙人的欧陆对手荷兰人到来。

这条线索让我在马来半岛之旅结束后开始关注奥斯曼帝国，也引领我前往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不属于土耳其，它是全世界的首都（或者说除了中国之外的全世界的首都），这个说法也意味着奥斯曼帝国不是属于“以安纳托利亚为故乡的土耳其穆斯林”的帝国，而是世界帝国（至少在青年土耳其党主政之前）。

2019年1月，我前往伊斯坦布尔旅行了一个月，带着一系列的疑问来到这座城市，想知道被欧洲视为东方的奥斯曼帝国，如何看待中国这片“真正的东方”？作为东方向西方扩张的极限前沿，奥斯曼帝国又如何以世界帝国的概念融合不同文明与族群？

在近代历史中，奥斯曼与大清被视为衰弱的东方旧帝国典型，然而两者是不同的，奥斯曼帝国一直试图用军事对抗挽回败局，并且在局部战场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最终毁于内部矛盾，阿拉伯地区与亚美尼亚人的反叛，国内政治动荡。大清国则正相反，把全部精力放在内部维稳，这样即使在对外战场上败涂地，却依然可以煽动民众恫吓列强，让列强不敢轻易亲自下场动手替换政权，只能支持清政府作为稳固的代理人。

从这一点讲，大清国能够将全盛时期的领土基本保留到最后，并且以相对和平的方式结束统治，恰恰是因为比奥斯曼帝国更加保守落后，才能有效控制民众，奥斯曼帝国毁于试图先进上。

两个帝国灭亡一个世纪了，各自建立了共和国，北京依然是中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却不再是土耳其的首都，这或许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依然在某些层面上继承了大清国的法统，而土耳其却已经和奥斯曼帝国划清界限。1908年康有为前往伊斯坦布尔，试图探索大清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联系，为大清国的救亡图存找到出路，111年后我来到这座城市，同样试图找寻这座城市与中国的联系，去思考在那些在中国困扰我的问题。

世界首都的中心

北京整个冬天都没有下雪，伊斯坦布尔却用一场雪迎接了我的到来，虽然只是一点小雪花，很快转成冬雨，却足以让我振奋了一下。我从小就觉得雪带着上天的启示，如果一个冬天都没有见到雪是不祥的征兆，预示着上天在抛弃这片土地。

我预订的旅馆在苏丹艾哈迈德区（Sultanahmet），那里是伊斯坦布尔老城的历史中心。我在巴库转机，带着红眼航班的疲惫来到伊斯坦布尔，从阿塔图尔克机场坐地铁到达老城区，在这一块小小的区域里，可以了解从拜占庭帝国开端一直到奥斯曼帝国终结的历史。

我出生的城市沈阳虽然记载的历史很远，但作为真正的现代城市要到南满铁路修建之后，也就一百年的时间，我工作的北京虽然是一座古城，但是已经被翻新和拆除的俨然一新，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古代遗留。到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现代与古典混合在一起，那些消逝在尘埃中的灵魂依然栖息于古老的砖石中。太现代的城市会让人怀疑历史的真实性，从这一点上讲，我不由得恶意揣测一下中国的统治者有意抹除城市自身的历史记忆。

老城区的旅馆都很小，我住的地方周围是一些废弃和准备整修的房屋，狭窄的巷子如同黑帮电影里一样。由于地势高低起伏，倒是可以眺望到很远的海平面。老旧砖石的围墙上，腐朽的木头嵌在其中，不知道曾经是小门还是窗子，现在已经封死了，一只老猫慵懒地趴在地上，好像在看守这扇门。我走近抚摸着那些石头，几步之外一只海鸥叫了一声，歪着头注视着我，我抽回手，这样的地方你说没有秘密是不可能的，这座城市的秘密要多少有多少。

旅馆里准备早餐的姑娘长得就像《羊脂球》里面的女主角，有种古典油画中人物的丰腴，我一看到她就想到老家冰箱里总有一块牛油，迷人的油脂香

味。虽然旅馆很小，但早餐还是很温馨的，除了夹三明治的各种奶酪香肠之外，沙拉和炒蛋也是很好吃的，为了看她我每天早餐会吃得很多，连午餐都省了。



从我的房间窗子望出去，是连接黑海和马尔马拉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伊斯坦布尔的历史也正是从这条海峡开始。在希腊麦加拉的王子拜扎斯（Byzas）出海之前得到了德尔斐的神谕，告诉他要到“盲人城市的对面”。当他们的船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时候，在东方亚洲部分已经有一座城市叫伽克顿（Chalcedon，现在伊斯坦布尔卡德柯伊区），拜扎斯发现由于海峡的阻挡，这些人看不到对面的高地才更适合建造城市，于是拜扎斯就在这里下船开辟了一座城镇，取名拜占庭。

这座城建立在七座山丘之上，七丘之城原本是对罗马城的称呼，君士坦丁大帝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想建立一座新的罗马城，选择拜占庭旧址上七座山丘的地区建立了新罗马，后来在狄奥多西二世时期，这座城开始被称为君士坦

丁堡。

宁山哀：然后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之后，君士坦丁堡改名叫伊斯坦布尔是吧。

我：并没有从君士坦丁堡改成伊斯坦布尔这件事，在这座城市被称为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同时就有别的称呼，突厥人和阿拉伯人把这座城叫做伊斯坦布尔，这个词是希腊语。到了奥斯曼帝国时期同时存在两个名字，一个是民间继续称呼伊斯坦布尔，一个是正式文件中称为“科斯坦丁尼耶”，这个词是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语译名，可以说奥斯曼帝国时期这座城市官方依然叫君士坦丁堡。1923年之后新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迁都安卡拉，这座城市官方就不再称为科斯坦丁尼耶，只剩下伊斯坦布尔的名字，1930年，凯末尔下令这座城市的正式名字就是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城市地势起伏很大，城内旅行首选是公共交通工具，出机场的时候我买了一张交通卡，惊喜的是竟然有中文购买页面，地铁、城轨和缆车组成了发达的轨道体系，自行车是难以想象的。当地人的车技都非常神奇，近乎于直上直下的斜坡和走路都费劲的小巷子，当地人可以飞速驾驶摩托车甚至汽车。这座城市很适合徒步探访，虽然起伏的丘陵让步行非常疲惫，但由于历史遗迹过于丰富，徒步才不会错过。

我离开旅馆，沿着蜿蜒的小路向北走，巷子口出来是一家叫长城饭店的中国餐馆，墙上挂着红灯笼打扮成中国模样。沿着这条街向东，就到了伊斯坦布尔最具历史气息的竞技场遗址。竞技场的西南边是马尔马拉大学博物馆，西北边是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广场上最显眼的是两根高大的石柱。

竞技场是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公共生活象征，在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大帝决定把首都从罗马迁往拜占庭，开始大规模进行城市建设，让这座城市配得上罗马的荣光。其中一项重要的工程，就是修复扩建这座竞技场作为城市公共中心，这里主要的活动是罗马流行的马拉战车比赛。

为了打造帝国新的中心，君士坦丁大帝将来自各地的艺术品运到君士坦丁堡，最重要的部分来自希腊。在竞技场的中央，是来自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中的普拉提亚祭坛，这座祭坛建于公元前5世纪，为了纪念希腊在希波战争普拉提亚战役中击败波斯军队而修建，祭坛顶端是由三个蛇头支持的金碗，由战利品打造，用来供奉阿波罗神。

这座祭坛代表着所谓文明的西方战胜野蛮的东方，君士坦丁大帝希望用这座象征文明世界胜利的标志物来提升新首都的荣耀，他下令将祭坛从德尔斐移到君士坦丁堡竞技场中间，希腊文明为罗马的迁都增加了荣誉感的背书，从此与天主教拉丁世界并行的是东正教希腊世界。

一些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绘画中可以看到，在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几十年之后，三个蛇头仍然在祭坛上，但上方的金碗已经不见了。我来到这座祭坛前，看到这里只有一根青铜色的柱子，立在低于地面几米的地上，上方原本的三个蛇头都不见了，现在被称为蛇柱。仅存的一个蛇头存放在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内，我在博物馆内找到了它，但并不是完整的，只有上颌部分。

到了狄奥多西大帝统治时期，拜占庭国力强盛，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决定给竞技场增添更加华丽瞩目的装饰品来超越君士坦丁大帝。罗马帝国喜欢竖立石柱和拱形大门来凸显阳刚审美，有人说这来自性器官崇拜，石柱和拱门就是阴茎和阴道，用强烈的性的表达，来弥补南欧地区男性矮小的身材。

宁山哀：我觉得国家和大地被当成女人，男人们建立自己的战绩，将刻着自己名字的巨大石头阳具竖立在大地上耀武扬威，代表着他们征服和改造大地的权力。

我：是的，征服欲往往被书写成气势磅礴的英雄传说，但如果你亲眼面见他人的征服欲，却只会觉得可笑和厌恶，人的自大与愚蠢让他们把贪婪当成雄心，

把视人命如草芥的漠然当成挥斥方遒的霸气，如果人们能够明白在几乎所有的英雄或者枭雄故事当中，自己只不过是随意践踏和牺牲的无名之辈，就会对所有的伟大英雄故事保有警惕了。

埃及方尖碑被罗马帝国视为征服伟大文明的战利品，今天在罗马城（含梵蒂冈）有 10 座方尖碑，比埃及本土还多 1 座，如果君士坦丁堡没有埃及方尖碑，就实在不足以体现新首都的强盛。



更加现实的原因是，公元 378 年哥特人在阿德里安堡击败东罗马军队，东罗马皇帝瓦伦斯被烧死，帝国的威严受到了挑战，宣传变得格外重要。继任的狄奥多西大帝面对外部潜在威胁，必须把权威牢牢掌握住，维护权力的秩序成为统治关键，竞技场的形态蕴含着对秩序的强调，中心便是狄奥多西大帝。

于是在公元 390 年，狄奥多西大帝从埃及购买了一块方尖碑，竖立在竞技场中间。这块方尖碑建造于大约公元前 1490 年，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在位期间，原本竖立在卢克索的卡纳克阿蒙神庙里，方尖碑的四个面雕刻着古埃及象形文字，大意是纪念图特摩斯三世在大约公元前 1455 年在幼发拉底河对米坦尼王国的胜利。图特摩斯三世是一位非常尚武的法老，这大概也是狄奥多西选择这块方尖碑的原因。

狄奥多西大帝将方尖碑切割成三块运回君士坦丁堡，感谢这位皇帝，我第一次看到埃及方尖碑竟然是在土耳其。



这块方尖碑由花岗岩制成，在方尖碑和基座的四个角之间有四个青铜立方体，用来支撑方尖碑。方尖碑的大理石基座四个面上都有浮雕，是运到君士坦丁堡竖立起来的时候雕刻的，上面描绘了狄奥多西大帝时期的竞技场场景，主角都是狄奥多西大帝，他站在人群中央，两旁是他的家人和贵族们。

其中一幅是狄奥多西大帝手持桂冠站在看台上，看起来是准备为比赛的胜利者颁奖，旁边是他的两个儿子，下方是手持乐器的乐师们。另一面可以看到皇帝周围的大臣与瓦兰吉卫兵们，卫兵携带着长矛和盾牌，下方是战车比赛的场景。第三幅下半部分是一群人向狄奥多西大帝单膝下跪致敬，大意是周围的蛮族臣服，在东北方的基座上工人们竖立起方尖碑的情景。

我留意到方尖碑基座上有明显的损坏痕迹，在基座东西两面下方有刻字，其中东面是拉丁文，铭文碑上有一道很深的裂缝，几乎让基座分成两半。上面写着“这是一次困难，暴君被战胜，我奉命服从宁静的主人并在他的掌握中。一切都服从于狄奥多西及其永恒的后代，这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我在三十天内被制服，最终在普洛卡勒斯长官的统治下指向天空”。

这段铭文是以方尖碑的第一人称讲述，记载的是方尖碑被竖立的过程，里面提到的暴君指的是马克西姆和维克多，他们妄图篡位，狄奥多西大帝击败了他们，普洛卡勒斯是当时君士坦丁堡的城市长官。

西边的基座上则是希腊文的刻字，上面写着“这根四面柱放在地上，只有狄奥多西皇帝敢于再次抬起它，普洛卡勒斯执行他的命令，这根伟大的柱子在32天内站起来了”。

狄奥多西大帝热衷于城市装饰，他曾经下令模仿罗马的图拉真广场设计了狄奥多西广场。今天狄奥多西广场只留有一些石柱的遗迹，随意地摆放在路边，我观察发现这些柱子和地下水宫的柱子相似，都有泪滴标记。

不得不说地下水宫是一个价值不太高的景点，正处在修复中，很大一部分空间都在施工，布景打光也很随意。地下水宫曾经是君士坦丁堡的蓄水池，里面的部分石柱构件是查士丁尼大帝从其他建筑上搬来的，也许水宫里泪滴样式的石柱和狄奥多西广场的石柱来自同样的建筑。水宫里有两座美杜莎的石像，一个侧放一个倒放，有人说这样可以使美杜莎失去法力，不会把人变成石头，但学者们认为这样放置只是正好适合支撑石柱。



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坦布尔的地下水宫有两座，另一座在苏丹艾哈迈德老街区中心，要小很多，很容易被忽视掉。小的这座地下水宫被改造成了一座现代风格的美术馆，打光和布展审美很不错，而且是免费参观。

今天被人们熟知的君士坦丁堡陷落指的是公元 1453 年奥斯曼帝国占领这座城市，然而在此 250 年前，君士坦丁堡经历了更大的浩劫，就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这次东征期间，十字军难以对穆斯林军队取得优势，转而进攻同样信仰基督教但教派不同的拜占庭帝国，掠夺战利品作为军费，拜占庭帝国短暂亡国，十字军建立了拉丁帝国。

在十字军入侵中，君士坦丁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拉丁帝国鲍德温二世出卖了大量的城中财物，最知名的就是他把耶稣的荆棘王冠卖给了威尼斯商人，后来又归法国国王所有。竞技场上的大部分珍贵文物都被掠夺走，在竞技场北端曾经有四座镀金的铜马雕像，被十字军运往威尼斯装在圣马可大教堂门口，其他沿赛道排列的马匹和战车的青铜雕像也都遗失，上文提到的蛇柱上的金碗也在这期间下落不明。

宁山哀：你没去过威尼斯吧，圣马可大教堂门口的铜马是复制品，正品在教堂的博物馆里面。

我：我确实没去过威尼斯，我是看伊斯坦布尔的资料上这么写的。

宁山哀：最早是放在圣马可教堂门口，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在教堂里面建了博物馆存放正品。

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受到破坏的还有君士坦丁堡皇宫。为了获得黄金，十字军几乎拆了皇宫，甚至把皇宫的瓦片揭下来卖掉。拜占庭复国后，因为修复成本太高，皇帝弃用了旧皇宫。等到 1453 年穆罕默德二世进城的时候，皇宫已经是荒废的遗址了，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大学就在曾经旧皇宫大会堂的位置。

在竞技场上，方尖碑西面的另一根石碑也见证了这段历史。公元 10 世纪，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在竞技场的西端竖立起了这根石碑，虽然也被称为方尖碑，然而这座石碑的材质却是石灰石方块，而不是埃及方尖碑使用的阿斯旺花岗岩。这座石碑外表原本装饰着镀金铜片，上面描绘了君士坦丁七世的祖父巴西尔一世的胜利，十字军剥走了镀金铜片，只留下一根斑驳的石柱。

到了奥斯曼帝国时期，苏丹并不热衷比赛活动，竞技场原来的用途逐渐被人遗忘，但是这片地区一直没有建造其他建筑物，而是被用于各种庆典活动。土耳其新军喜欢攀爬这座石碑，导致石碑的表面遭到进一步的损坏，但也让石碑幸存了下来，今天被称为墙柱。墙柱下方同样有带铭文的基座，上面写着：四方碑被君士坦丁皇帝抬起，他是罗曼努斯的儿子，王权的荣耀恢复得比过去的景观更好，巨像曾经是罗得岛的奇迹，现在这是一个黄铜的奇迹。



从两根石柱向东走，一路上都是游客，成群的鸽子与海鸥时而落在广场上，引来小孩子的追逐。我走到竞技场最东边，看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这是

所有到伊斯坦布尔的人都要去的地方。关于圣索菲亚大教堂，有一段非常暴力血腥的前传在这座竞技场上，就是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尼卡暴动。

对于罗马社会来说，竞技场是城市公共生活的中心，参与竞技的队伍由元老院内不同的政党资助。最初有四个党，后来形成蓝党和绿党两派，双方宗教派别和政治意见的分歧很大。当时的竞技比赛不仅仅是体育活动，还提供机会让皇帝和平民来到一起，在竞技场举行政治讨论和演讲。

公元 532 年年初的一场比赛中，绿党怒斥当时在场的查士丁尼大帝偏袒蓝党，两党在竞技场内爆发了激烈的斗殴。两天后，君士坦丁堡长官下令逮捕在竞技场闹事的人，并判了几个人死刑。其中两人在将被执行绞刑的时候，民众抢走了他们，两派联合起来暴动示威，齐声高呼“尼卡！”（希腊语“胜利”的意思）。

示威者包围了皇宫，皇宫被围困三天后，查士丁尼大帝决定去竞技场向民众发表演说，却被民众投掷石块，只好逃回皇宫。这时，贝利萨留将军带着从波斯返回的军队来到君士坦丁堡，对竞技场内的民众进行了屠杀，大约有 3.5 万人被杀死，尼卡暴动平息。这次暴动和后续的镇压改变了君士坦丁堡公民参与政治的传统。

在尼卡暴动中，示威者们四处放火，焚毁了多座标志性建筑，最著名的一座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这是君士坦丁堡的第二座圣索菲亚大教堂。第一座圣索菲亚大教堂修建于公元 360 年，在皇宫旁边，大概在公元 404 年毁于火灾，没有留下任何遗迹。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座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历史上的第三座。由于第二座教堂在尼卡暴动中被烧毁，查士丁尼大帝决心修建一座更加壮观完美的教堂，任命了两位建筑师安特米乌斯和伊尔多西，在公元 537 年，这座教堂历时 5 年完成。

在参观这座教堂之前，我想起一个关于查士丁尼大帝和中国的故事。曾经

罗马帝国没有人知道丝绸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但他们的贵族却为了这种精美的纺织品支付大量的财富。在查士丁尼大帝时期，两位印度僧侣找到皇帝，告诉皇帝他们去中国了解到丝绸的制作工艺。两位僧侣受皇帝的委托潜入中国，带回了蚕的幼虫和桑树，从此罗马开始有了自己的丝绸工业。

在罗马人掌握了丝绸的秘密之后，他们不再需要对波斯人开战获取东方商路，夹在两者之间的阿拉伯半岛也就失去了罗马和波斯的关注，再之后，就是在这片失去关注的土地上，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崛起了。

虽然圣索菲亚大教堂就在我的眼前，但我决定留到第二天早上再去参观，先解决晚餐。在伊斯坦布尔街头想选择一家美食餐馆非常简单，因为好吃的太多了，只需要留意避开那些专门面向外国游客的餐馆就好。我在老城区里跟随本地人走进一家餐馆，店里的伙计是库尔德人，老板为我推荐了他们的烤羊肉和烤鱼，味道非常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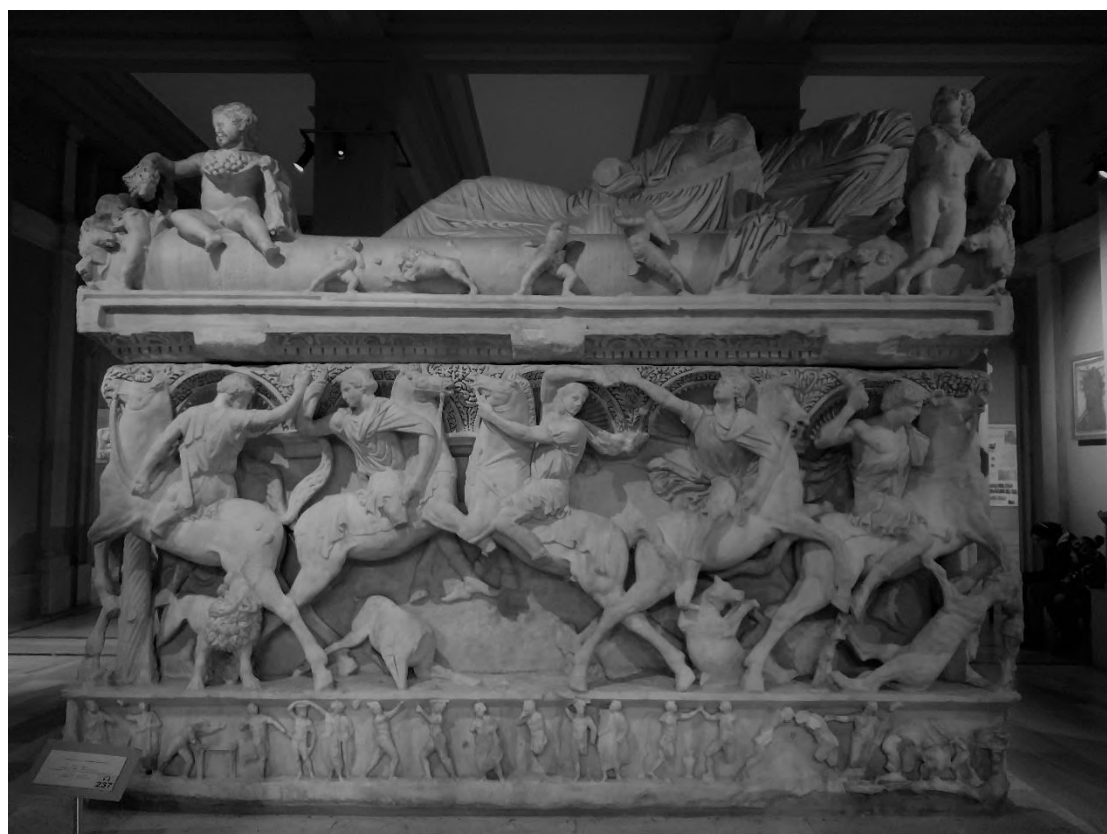
我很喜欢土耳其餐馆，除了肉食和奶食的搭配非常对我的口味，炙烤的香气使人兴奋，不同食物分开盛装干净利索，这是感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愉悦的感官刺激与分类的秩序让进食过程充满了人类的文明。

几年前我第一次出国是跟随当时的杂志团队去比利时和荷兰，那时候大家都很穷，只能吃得起最便宜的食物，就是土耳其烤肉卷饼。一份烤肉加上面包沙拉和薯条，我这样的饭量都吃不完，只需要 6 欧元。这是我对土耳其料理好感的来源，真正属于我们这种社会中下层劳动者的食物，和土豆烧牛肉是一类的。

土耳其红茶很浓，他们喜欢加糖饮用小杯的热茶，这与我的习惯不太一样，我更喜欢品味茶水本身的苦涩味道，似乎喜欢喝甜茶的地区，人们总会更快乐一些。

宁山哀：在怡保的时候你喝咖啡就不加糖，在伊斯坦布尔喝红茶也不加糖，你就是喜欢自虐。

我：我也没有权力虐待别人，虐待自己总可以吧。



圣索菲亚是“神圣智慧”的意思，这个说法来自使徒保罗对耶稣基督的描绘，他称基督是天主的德能和圣智。为了避开旅游团，我一大早来到圣索菲亚大教堂赶在第一批进入。走进教堂的院子，我看到一堆石雕，其中一部分来自历史上第二座圣索菲亚教堂的遗迹，主要是一些石柱和基座。在教堂墙基下方的地上有两块石条雕刻着十二只上帝的羔羊，这是第二座圣索菲亚大教堂正门的一部分。

走进教堂，正对着我的是帝王之门，我抬头向上看，大门上方是圣索菲亚大教堂最著名的马赛克镶嵌画之一，《万物的主宰耶稣》。耶稣坐在中央，拜占庭皇帝利奥六世跪在他的脚边，耶稣两旁的画像是圣母玛利亚和大天使加百利。耶稣手里拿着一本书，上面写着和平与你同在，我是世界的光，这幅画代

表基督将永恒的力量赐予拜占庭皇帝。

拜占庭的镶嵌画上，耶稣不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可怜人，而是君王的形象，头戴王冠坐在宝座上。君士坦丁大帝在迁到新国都之后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就是皇帝与神的关系。他召集基督教会的各个领袖人物开会，处理那些细枝末节的教义，在多神教被基督教取代之后，君士坦丁大帝要为帝国建立新的道德基础，宗教要成为政治的理念，君主是被上帝选出治理地上之国的代言人，君士坦丁大帝在新国都被他的大臣和将军们簇拥，就像耶稣基督被天使和圣徒们簇拥一样。

迈过帝王之门，我进入圣索菲亚大教堂，这座教堂长期在修缮中，直到现在内部还有巨大的脚手架，已经成为教堂景观的一部分。尽管之前已经看过很多图片，但这里的空气依然让我的心脏剧烈颤动了一下，15个世纪的尘埃堆积在这座建筑内，人们的呼吸、声音和气味都成为了建筑的一部分。

我绕过大理石镶嵌的拜占庭皇帝登基石，来到教堂的后殿。这里是被改造为清真寺的部分，有讲坛和礼拜龛，上方则是六翼天使和圣母与圣婴的镶嵌画，六翼天使并不是胜利女神模样的，而是显得有些诡异因此更加神圣。绘制六翼天使的扶壁部分是这座教堂最精妙的建筑技术所在，在教堂建成一千年后，被奥斯曼帝国天才的建筑师米马尔·希南破解，改进后建造了苏莱曼清真寺。

我沿着楼梯上到教堂二楼，二楼一部分区域被隔离修复中，所以著名的女皇佐伊镶嵌画和围栏上的维京人哈夫丹（Halfdan）涂鸦是看不到的。拜占庭皇帝希望拥有一支不会参与宫廷政治的外国雇佣军，当时维京人沿着第聂伯河到了黑海的北面，和君士坦丁堡隔海相望，拜占庭皇帝招募维京武士来到君士坦丁堡组建瓦兰吉卫队。

这些身材高大的北方人给君士坦丁堡的居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维京人

也被这座城市的壮观华丽所震撼，将这里的见闻带回故乡。其中最引人入胜的就是哈拉尔·哈德拉达（Harald Hardrada）过于传奇的经历，以及他与女皇佐伊的桃色故事。当然对大部分维京人来说，雇佣兵的生活并不那么精彩有趣，以至于在冗长繁琐的弥撒仪式中，百无聊赖地在栏杆上刻字涂鸦打发时间。

走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二楼，我感到地面是有斜度的，很多地砖都有明显的裂纹甚至凹陷，在新闻中提到这座教堂由于历史太久，上方拱顶的重量压迫下方的结构向中间挤压。

在二楼的一个角落里，我找到威尼斯公爵恩里科·丹多洛（Enrico Dandolo）的墓碑，他是个极端贪婪而精明的商人，正是他的阴谋让十字军不得不进攻君士坦丁堡，用战利品偿还威尼斯船队的费用。1204年恩里科·丹多洛带领十字军攻占并掠夺了这座城市，他本人死后埋在这里。当拜占庭从拉丁帝国手里夺回首都之后，人们把他的坟墓留在教堂地面上唾弃，后来奥斯曼军队占领教堂，他的遗骨被挖出来扔到了大街上。

在教堂二楼，最吸引我目光的是墙壁上的三圣像画，我在它面前停留许久。这是一幅残缺的镶嵌画，耶稣在中间，两旁是圣母玛利亚和施洗者约翰。镶嵌画下半部分损坏严重，施洗者约翰只有半个身子，圣母玛利亚只有头部和肩部，这是教堂内唯一能近距离看清楚镶嵌画。其实真要欣赏画的细节不如看高清图片，在复原图中，这幅画带着拜占庭时期圣像画特有的呆板，反而是残缺之后的样子意境更加深刻。



在这座查士丁尼大帝献给上帝的礼物中，打动我的并不是教堂本身的壮丽，而是这幅残缺的镶嵌画中施洗者约翰的表情。这座教堂的诞生开端是一场暴动和三万五千人被屠杀，教堂建成后又见证了无数次残酷的杀戮与政权更迭。在遇到耶稣基督之前，施洗者约翰在旷野中生活，穿着粗糙的衣服，吃蝗虫和野蜜，过着艰苦的生活，他不会用甜言蜜语笼络别人，最后希律王为了赏赐一个舞女，砍下了约翰的头颅。

和画中的耶稣基督相比，施洗者约翰表情痛苦而悲悯，他代表着这个噩梦般的世界里善的哀伤与愁容，他的悲悯随着画作变得残缺，历史的冲刷完成了艺术品创作的最后一步。

我这个中国来的人更能感受这种情绪，在中国，凡是伟大的功绩背后多是普罗大众的苦难，悲悯成为一种常态，人们就会对悲悯麻木，苦难并不会随着悲悯而得到解脱，如果没有现世改变的可能也没有对最后审判的期待，悲悯就只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挣扎。人们短促地依靠本能爆发，然后又继续漫长地沉沦

在泥潭中。

我从教堂的西南门离开，那里还有一幅镶嵌画，内容关于这座教堂和这个城市的连接。在这幅画中，圣母坐在中间抱着圣婴，君士坦丁大帝拿着君士坦丁堡的模型站在左边，查士丁尼大帝拿着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模型站在右边，圣母头部两侧各有文字缩写，意思是基督的母亲。

君士坦丁大帝希望把这座城市变成新的罗马，旧的罗马城建立在圣徒彼得的身躯上，是彼得的殉难让罗马有了基督教的神性，而君士坦丁堡这座新的罗马城，也找到了自己神性的来源，就是圣母。相比于彼得被倒钉在十字架上殉难的惨烈，圣母给这座城市带来更多的是哀愁的情绪。查士丁尼大帝延续了这一点，圣索菲亚大教堂虽然恢弘雄伟，却无不透着阴郁的气息，这是属于女人和母亲的气息，是神圣而苦难一生的气息。

施洗者约翰与圣母，是这座城市阴郁情绪的来源，他们代表的不是使徒时代的希望，而是光明之前最痛苦的一刻，未能得见地上之国的建立。如同我们今天，无法预知这个黑暗的时代是否会过去，也许现在就是从今往后剩下的日子里最美好的了。



圣索菲亚大教堂正门对面就是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通常被称为蓝色清真寺。土耳其有好几座以颜色称呼的清真寺，都是按照装饰瓷砖的颜色命名的。我在广场上的时候，清真寺里的唤拜声响起，整个旧城都能听到。人们听到唤拜进入清真寺，我匆匆吃完烤玉米和面包圈，也随着众人进入。清真寺内部正在维护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开放，但可以看到瓷砖长廊和部分穹顶。

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的修建带着很大争议，也是奥斯曼帝国扩张的拐点。在吉托瓦托洛克和约签订和对波斯的战争挫败之后，1609 年苏丹艾哈迈德一世决定建造一座清真寺献给真主。这引起了军队和宗教人士的不满，因为以往的

苏丹都是用战利品承担建筑费用，但艾哈迈德一世在位时并没有赢得战场胜利，不得不从国库调用资金建造，在军队看来这是无能的表现，无法让军人们获得财富，在宗教人士看来这是伊斯兰教反对的奢侈行为。

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是奥斯曼建筑古典时期的最后一个大型清真寺，受到建筑地点的限制，这座清真寺的布局不太规则，建筑物的正面面向竞技场，两个出入口一个朝向圣索菲亚教堂方向的苏丹艾哈迈德广场，另一个面向南边。这座清真寺有六座宣礼塔，这是不太符合礼仪的，被认为是傲慢的表现，因为麦加克尔白天房的清真寺也只有六座宣礼塔，用中国文化来说就是僭越，苏丹于是出资为麦加禁寺修建了第七座宣礼塔。

我从清真寺的庭院南面通道走出，在出入口的上方挂着一条人字形铁链。以前只有苏丹才可以骑马进入清真寺的院子，但有铁链阻挡，苏丹需要低头弯腰才能进入，这个象征性的动作代表了统治者在宗教面前的谦逊。但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中，统治者对于宗教更多的是功利的妥协，谈不上真正的谦逊，宗教人士对苏丹也会在过度宽容和过度严苛之间摇摆。

离开清真寺我走向旅馆，路过竞技场北面看到一座绿色屋顶的凉亭，和两根石碑的斑驳气质不太相同，这是德皇威廉二世喷泉，它的建造是为了纪念1898年德皇威廉二世访问伊斯坦布尔。

我从正面台阶走到入口小门，门锁着无法进入，喷泉底座上方有一个由八根墨绿色石柱支撑的圆顶，内部覆盖着金色马赛克，马赛克中有八个字母组合的图案，代表了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和德皇威廉二世的政治联盟。在圆顶内部中有四个图案，苏丹的纹章画在绿色背景上，在其他四个图案上，威廉二世的符号“W”写在蓝色背景上，“W”上有一个皇冠，下面写着“II”。

喷泉外墙有一块青铜牌子，上面是威廉二世的德语题词，大概意思是“德

国皇帝威廉二世赠予这座喷泉，以纪念他在 1898 年秋天拜访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这座建筑在德国修建，1900 年分解运输在竞技场上组装完成。



在威廉二世担任德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的时候，德国处于扩张期间，威廉二世热衷于出国访问，奥斯曼帝国当时面临欧洲国家的围堵和俄国的军事威胁，除了时而变卦的法国之外几乎没有朋友，于是德国和奥斯曼的关系开始变得密切。威廉二世在 1898 年前往伊斯坦布尔拜访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主要目的是协商建造从柏林连接波斯湾的巴格达铁路，并通过波斯进一步连接到英属印度。这条铁路可以提供从欧洲到亚洲的快速通道，便于德国贸易出口和军事活动，同时打破英国的势力范围封锁。

宁山哀：所以威廉二世和奥斯曼帝国的联合成功了吗？

我：算是部分成功了吧，在威廉二世出访的这一年，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俾斯麦去世了，原本保守稳健的外交政策开始变得冒进，最终把德国拖入了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与奥斯曼成为盟友，因为当时英法俄都对奥斯曼有领土要求，英国希望让美索不达米亚和汉志的阿拉伯人脱离奥斯曼，法国希望获得地中海沿岸的势力范围，俄国则一面试图从高加索南下，一面策动奥斯曼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分离，德国是对奥斯曼最友好的国家。

宁山哀：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和奥斯曼都是战败国吧。

我：是的，一开始由于德国的支持，奥斯曼帝国在加里波利和伊拉克取得了短暂的重大胜利，一度让英国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最终未能改变局势。

宁山哀：那这两位君主后来结局如何呢？

我：一战后，德意志第二帝国变成了魏玛共和国，威廉二世退位流亡荷兰，最终于 1941 年去世在那里，他活着见到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崛起，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早在一战前的 1909 年就被青年土耳其党废黜，1918 年去世，所幸没有见到奥斯曼帝国最后的瓦解。

从威廉二世喷泉经过一个向上的斜坡向西走，穿过上面提到的那座较小的地下水宫，我走到了主干道上。这条主干道再往北就是大巴扎，街边有一根高大耸立的君士坦丁纪念柱，是这一片地区的地标。君士坦丁纪念柱所在的小广场是大巴扎的入口，聚集了大量的游客，石柱周围撒满面包屑，引来大量鸽子供游客拍照。

这根纪念柱是公元 330 年君士坦丁大帝下令修建的，用来纪念拜占庭成为罗马帝国的新首都。今天的君士坦丁纪念柱早已不是最初的样子，我们只能在记载中得知，这座柱子原本顶部是君士坦丁大帝本人的雕像，采用阿波罗神的形象，手里拿着一个球，里面有真十字架碎片。



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这个曾经的酒馆女仆，之后成为拜占庭帝国最有权势的女人，她在公元 326 年去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带回来钉死耶稣的十

字架的碎片，是海伦娜亲自发现并监督挖掘的（感觉像老人家出门旅游总喜欢带回点纪念品）。在将圣物带回君士坦丁堡之后，君士坦丁大帝在挖掘原址建了一座教堂，就是耶路撒冷圣墓大教堂，在教堂里有一间海伦娜圣堂，里面有一把椅子，海伦娜曾经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监督挖掘圣物的。

君士坦丁纪念柱的底部是一个神龛，保存的圣物有：与耶稣一同被钉的两个强盗的十字架、发生饼和鱼奇迹的筐、制造诺亚方舟的斧子、抹大拉的玛利亚为耶稣洗脚的油膏罐，还有来自特洛伊的帕拉斯女神雕像，传说这个木雕是雅典娜神亲手制作的。

1106年的大风吹倒了纪念柱顶端的雕像，皇帝曼努埃尔一世在顶部安放了十字架取代雕像。1204年十字军同样抢劫了这座柱子，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土耳其人取下了十字架。石柱上面的环形金属箍是在16世纪加上的，作用是为了防御地震倒塌，然而1779年的地震和大火摧毁了君士坦丁纪念柱周围的街区，这根柱子被烧焦成了黑色。之后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一世进行了修复，增加了砖石基座，也就是现在的样子。我在石柱的顶端看到希腊文铭文：虔诚的统治者，恢复了上帝被时间摧毁的作品。

关于这根柱子上方的雕像是否真的是阿波罗神的样子，目前在历史学界还有争议。君士坦丁大帝选择了基督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罗马帝国原本的多神教信仰，他把自己的雕像设计成阿波罗神的样子，也许是在基督徒和原有的罗马多神教民众之间取得平衡或妥协。在君士坦丁大帝极具象征含义的对马克森提乌斯的胜利中，他自称在天空中看到了凯乐符号，这个符号是希腊文的XP，代表耶稣基督，还有一句话：你必将以此胜利。这或许只是君士坦丁大帝为自己的宗教政策赋予了一些具有戏剧色彩的合法性。

今天的伊斯坦布尔还遗留着几根其他罗马皇帝建造的纪念柱，阿卡狄乌斯石柱在大巴扎妇女市场附近，只剩下基座的部分，被包裹在建筑之间。马尔西安石柱基本完好地保存着，石柱上方的皇帝马尔西安的雕像已经不在，但老

鹰样式的柱头还在，下方还能看清楚一部分天使形象和桂冠的浮雕。马尔西安是狄奥多西王朝最后一位君主，在他统治时期东罗马相对和平，西罗马则持续战乱。

我从君士坦丁大帝搬来竞技场的三头蛇祭坛开始，到帝国鼎盛象征的狄奥多西方尖碑和圣索菲亚大教堂，到被十字军洗劫的墙柱，到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拐点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再到帝国最后挣扎时期的威廉二世喷泉，最后又回到了君士坦丁大帝树立的纪念柱。这片面积不大的街区浓缩了从君士坦丁大帝定新都到奥斯曼帝国黄昏，这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

回旅馆的路上，我经过一片街区公园，老树枯枝上落满了乌鸦，群鸦争噪，一意送斜阳。我走进公园里，成片的乌鸦骤然飞起。这座城市的乌鸦，一代代目睹了那些雄才大略的君主和他们建立的庞大帝国，从开始到结束，一层掩埋另一层。



夜晚

离开君士坦丁纪念柱已是傍晚，天逐渐暗下来，我回到苏丹艾哈迈德广场。广场上人不如白天那么多，雨夹雪的寒冷天气让游客们都回酒店了，两座建筑之间若干个喷水池周围只有寥寥无几的漫步者。几个街舞少年在清真寺面前的广场上拍短视频，卖面包圈、烤栗子和烤玉米的小贩在等待最后一批顾客，挎着冲锋枪的警察在巡逻，漫不经心地驱赶一些纠缠游客的乞讨小孩。

广场周围有一些流浪的孩子，一个穿得脏兮兮的小女孩在垃圾桶里翻东西，掏出一块别人丢弃的面包开始吃。我给了她一些硬币，她的表情麻木中带着恐惧，那是一张让我很难受的脸，我没多停留。本地朋友说他们是难民，有一些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能逃到伊斯坦布尔的人已经是很幸运的，更多的人在土耳其东南部的难民营里。

我一直以为自己生活的国家就是世界上最苦难的地方，但我还是会在异国被一个小女孩的脸刺痛，尽管她当时并没有遭受伤害，只是像任何城市都会有流浪儿童那样在路边翻垃圾桶。总有人说人类的悲伤不是共通的，但悲伤是可以联想的，这些叙利亚难民孩子尚能逃到土耳其活命，倘若中国发生战争，我们怕是无处可逃，东亚就是一片封闭的地狱，想到这里我就更难受了。

虽然在我出生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发生过哪怕小规模战争，但我依然对战争与大混乱充满恐慌。童年记忆中，暴风雪的傍晚，天空泛着血红，只是正常的自然现象，这一幕挥之不去的场景却如同末日启示一样刻在我的脑海中。我一直相信人不只有自己个人的记忆，也有过去祖先们的记忆，甚至有未来后代的记忆。如果未来发生难以想象的毁灭，时间被扭曲，人的意识被压缩顺着时间线倒流，重合在自己祖先的意识中，祖先就会感知到未来的场景，精神敏锐的人会有这样的预感，极少数人能够有意识地捕捉到来自未来的意识碎片，就有了谶纬预言。

君士坦丁大帝在天空中看到的凯乐标志是真实存在的，他看到的是一千多年后同样使用君士坦丁之名的拜占庭末代君主意识碎片。末代君主和城中的民众虔诚地乞求上帝的怜悯，期盼天使降临拯救君士坦丁堡，在城破前的最后一夜，一座城市的泪水凝结成流动的精神力量，穿越时间映照在这座城市的建立者——那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头顶的天空上，希望君士坦丁大帝的灵会回来保护这座冠以他名字的城。

土耳其人的脸对我来说很陌生，他们有非常迷人的微笑，但异族的面容让我不太容易捉摸他们的情绪，他们似乎热情洋溢，但又更加阴郁，猜不清楚他们在想什么。这样的面孔我之前在新疆旅行的时候也见过，动人而捉摸不透，口里人喜爱这样的面孔，因为看不到这样面孔下的哀伤、愤怒与恐惧，只能看到他们呈现在外表的美貌与热情。

深夜我穿梭在苏丹艾哈迈德区的小巷子里，一千多年的亡灵陪伴着我，在我耳边窃窃私语。我呼吸着深夜阴湿的空气，弥漫着尘土、鲜血、火药与呕吐物的气味。风吹动巷子里挂着的路灯，两旁楼房的影子一晃一晃，就像一条龙寄生在影子里扇动翅膀。这座城市里有无数的秘密，我喜欢秘密，当那些我们这个时代肮脏、卑劣、暴戾的阴谋永远被掩埋的时候，历史中的秘密反而成了最真诚的孩童呓语。

东方与更东方

按照我旅行的习惯，总是会试图建立起目的地与我故乡之间的联系，顺着这条线索去挖掘探寻，然而在伊斯坦布尔，我一开始却并没有找到相关的线索。在伊斯坦布尔的每一天，我都感觉这座城市的历史是关于东西方的矛盾与接纳，但又隔绝了我这个真正的东方人。

其实用东西方做划分有点蠢，这本身就是一种漫不经心的随意定义，并没有所谓的东方这个概念，东方只是代指“希腊-罗马世界”之外的全部范围，这个范围中并没有什么相似性，也没有一致传承的历史心理，类似于给所有能吃的食物之外找一个“非食物”的概念。

在北京已经看不出什么东方的样子了，也看不出什么亚洲的样子。国际大都市的虚荣皮囊下面是懦弱的肌肉和软骨头，还有空泛的灵魂。伊斯坦布尔与北京当然不属于同一个东方，伊斯坦布尔和乌鲁木齐大概算是同一个东方，这个东方最远只能到陕甘为止，再往里就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东方。

伊斯坦布尔的本地人确实很热情，我之前在马来半岛旅行还会遇到一些冷脸的情况，但在土耳其，即使由于语言问题互相不理解，对方也会很友善地微笑。我经常在路边的小茶摊喝茶，坐在这里的全是男性，夜晚大家坐在路边的小板凳上，挤成一堆。当地人一杯茶可以坐一晚上，我就习惯一杯接一杯灌茶水。他们对中国也谈不上有多大兴趣，因为离他们的生活太遥远了，不过政治、体育和女人总是男人们的共同话题。

宁山哀：你会和当地人聊政治、体育和女人？

我：不，是他们之间聊，我看着。

宁山哀：你能听懂土耳其语？

我：听不懂，大概猜一猜他们聊的是什么话题，如果大家都在抱怨那就是聊政

治，如果争执激烈那就是聊体育，如果一派欢乐那就是聊女人。

当地人看到东亚面孔很乐意搭讪聊天，除了问我来这做什么，去哪些地方玩之类的游客话题之外，还会和我讨论一些关于中国穆斯林的话题。土耳其人对新疆的人道主义危机比较关注，这种关注也包含了政府的渲染，他们通过欧美媒体了解新疆的信息，但对中国其他方面又不是很清楚。当地的电视台节目中除了土耳其国内新闻之外，主要是与美国的关系和中东（尤其叙利亚）局势，基本没有中国的内容。

伊斯坦布尔没有唐人街，但是有中国餐馆，尤其有不少新疆餐馆。在本地中国朋友说，这里的中国人很多是维吾尔族或者回族，维吾尔族多一些，因为饮食习惯和宗教文化与土耳其人更相近，更容易定居下来。我在伊斯坦布尔街头遇到打招呼的人，对方总是先用日语问好，当我说自己是中国人之后，对方才会用中文说你好。普通土耳其人对中国文化相对还是比较陌生，对日本和韩国的流行文化喜欢的人会更多一些，特别是韩剧和日漫，年轻人会比较喜欢。

历史上中国与奥斯曼之间没有直接来往，由于萨菲波斯的间隔，双方只是通过中间的各个汗国和商团间接来往，谈不上帝国之间的正面交流。我前面提到奥斯曼帝国在东南亚援助亚齐王国的时候，明朝已经海禁收缩战略范围，双方没有接触机会，不然有可能出现奥斯曼支持的亚齐和明朝支持的马六甲共同抵抗葡萄牙入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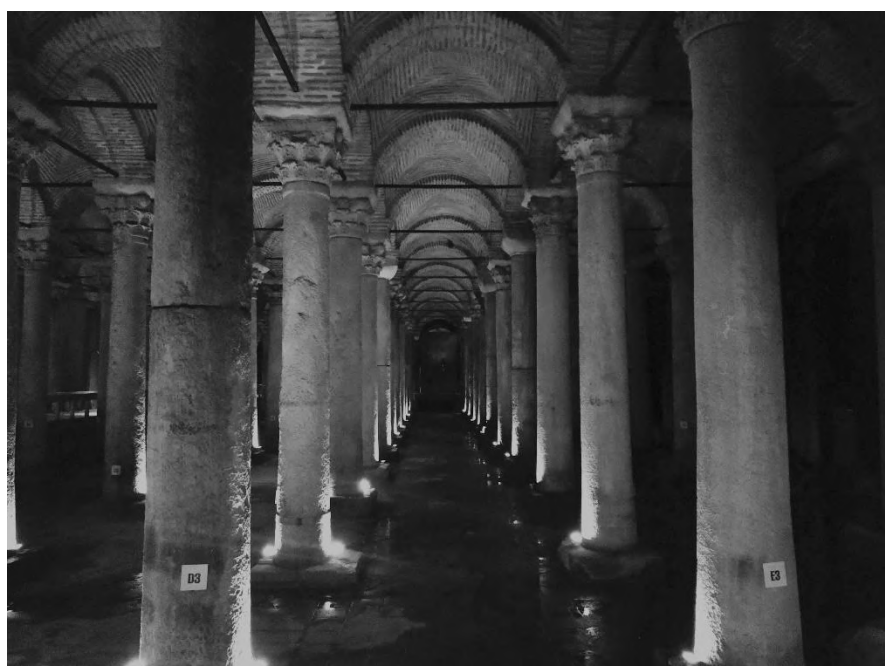
直到清朝时期，随着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对新疆地区的征服，同时由于俄国向东方扩张，大清国开始对奥斯曼帝国产生了兴趣。清政府此时统治新疆穆斯林地区，面对的很大问题就是文化陌生，新疆与满洲人相对熟悉的汉人地区和蒙藏佛教地区不太一样，而奥斯曼苏丹是伊斯兰世界哈里发，清政府希望了解奥斯曼帝国到底对新疆穆斯林地区有多大的影响力。

1732 年，大清国派遣使团前往俄国，确认俄国会在清军对准噶尔的军事行动中保持中立，借此机会大清国使团请求俄国帮忙联系奥斯曼帝国，希望前往奥斯曼帝国访问。但是俄国与奥斯曼帝国是敌对国家，当然不愿意帮助这个忙，清政府的决心也没那么大，这事就此算了。

在乾隆皇帝统治时期，蒙古土尔扈特部落曾经与奥斯曼帝国的保护国克里米亚汗国交战，在土尔扈特部落迁回大清国之后，乾隆皇帝询问过关于奥斯曼帝国的情况，但双方也没有实际交往。

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对中国产生关注要到 19 世纪 60 年代之后。由于欧洲强国的挤压，奥斯曼帝国不得不向中亚拓展生存空间，开始萌生泛突厥主义，包括延伸到新疆地区，这就是另一段故事了。

19 世纪末，青年土耳其党的活动引起了大清国一些政治活动人士的注意，他们发现了奥斯曼与大清国的相似处境，希望奥斯曼国内变革可以为大清国的救亡图存提供一些学习的素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康有为在 1908 年游历伊斯坦布尔之后写的《突厥游记》。在康有为的翻译中，他将奥斯曼帝国称为突厥，以此来建立土耳其和中国的历史关联。



在土耳其军事博物馆，有一个展馆展示了中土之间这种陌生而又不太愉快的来往，就是朝鲜战争。朝鲜战争与二战后和土耳其有关的几场局部战争（比如塞浦路斯冲突）放在同一个展馆里，没有太多展品表现土军与志愿军的直接战斗，侧重土军与朝鲜平民的友好相处上，很多照片都是土军士兵与朝鲜儿童的合影。

为了加入北约，土耳其在朝鲜战争中投入很大，相比于出工不出力的加拿大和干脆不怎么出工的法国，土耳其军队派出的人数在联合国军中除南朝鲜外排在美英加之后的第四位，而阵亡人数则排在了美英之后的第三位。

在军事博物馆朝鲜战争展馆中，提到了土耳其旅与志愿军的三次交战。第一次是军隅里战役，土耳其军队被派去掩护美军撤退，虽然在这次战斗中联合国军战败，但是土耳其旅的支援挽回了更大的损失，在展馆中提到麦克阿瑟对土耳其旅的评价：土耳其人的英勇战斗使联合国军有机会撤回安全地带。

第二次是著名的汉江战斗，在这次战斗中土耳其旅全线投入，也是志愿军面临的比较大的挑战。在中国的记载中确认了战斗的激烈与对手的实力，但没有格外突出土耳其旅。在土耳其的展馆中，这部分作为土耳其旅的重大胜利进行讲述：土耳其旅有 218 人阵亡，455 名士兵受伤，休整了 20 天之后，他们于 1951 年 1 月 6 日被重新送往前线。战后土耳其旅被美国国会授予“优秀联邦勋章”，并在战斗发生的山上建造了“土耳其胜利纪念碑”。

最后一场交火是 1951 年 5 月 13-19 日的汉城防御战，中国方面称为马踏里西山之战，展馆是这样描述的：北朝鲜军队于 4 月 22 日在中国军队支持下发动攻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到达了汉城。土耳其旅采取防御，在 5 月 18 日至 19 日的战斗中击退了 9 次攻击，这些阵地被称为土耳其堡垒。

我在这个展馆时，正好有一群伊斯坦布尔当地中学生集体参观，一位馆员

在做讲解。他看到我之后热情地打招呼，问我是不是韩国人，我说我是中国人，他尴尬地笑了笑。估计当着曾经“敌国人”的面讲述两国交战的历史，无论我是否能听懂土耳其语，大概都是令人尴尬的。

在土耳其海军博物馆中，我发现了几件日文的展品。包括日本海军军旗，几封汉字的书信和一张日本外务大臣签发的证件，书信和证件上面的人名叫山田寅次郎，日期是明治廿七年（1894 年），还有一幅书法作品，落款署名也是山田寅次郎，这几件展品是日本与奥斯曼的外交见证。

1871 年，日本政治家福地源一郎出访欧洲，顺路访问了奥斯曼帝国，这是日本与奥斯曼第一次正式接触。1890 年，奥斯曼帝国派出了 650 人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日本，在日本停留三个月后准备返航，结果在从东京驶往神户途中遭遇台风，船队在和歌山县附近触礁遇难，整个使节团只有 69 人幸存。

日本政府非常重视海难善后，救助伤者、打捞遇难者遗体遗物、整理船只残骸，派出两艘军舰护送遇难者遗体和幸存者回到伊斯坦布尔。在回去的船上有一位新闻特派员，叫野田正太郎，他在奥斯曼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第一个日本穆斯林。同时还有另一个日本穆斯林，就是山田寅次郎，他是一位日本企业家，在海难之后筹集了一笔捐款亲自送到伊斯坦布尔，奥斯曼苏丹接见了 他，在奥斯曼期间他主要负责沟通两国的通商事宜。

在 19 世纪到 20 世纪交界之际，各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人士都在探索本国的民族主义方向，一些鞑靼和土耳其学者提出了图兰主义的概念。图兰是波斯语中对中亚的称呼，图兰主义者把阿姆河以北的乌拉尔-阿尔泰民族称为图兰人，涵盖范围从匈牙利到日本，这是日本和土耳其在民族层面的一次连接尝试。



说起伊斯坦布尔对中国的影响，还有一个隐藏的彩蛋在马尔马拉海上的王子群岛。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在王子群岛建造了宫殿和修道院，群岛的名字源于很多贵族和宫廷女眷都被流放到这里，岛上的圣乔治修道院希腊教堂可以追溯到公元 6 世纪。

乘坐渡轮半个小时，我来到王子群岛中最大的比于卡达岛（Buyukada），90 年前的 1929 年 3 月 7 日，有一个人来到比于卡达岛上，他在一个月前与妻子和儿子被苏联政府驱逐，从敖德萨流亡到了伊斯坦布尔，他就是共产运动的先知：列昂·托洛茨基。

这就让这趟旅行有了一点朝圣的味道，虽然我并非完全认同托派思想，但不断革命的号召是如此动人。革命的魅力和作用就在于革命的过程而非结果，一旦革命成功，就难免开始陷入反噬。因为革命党的合法性和执政动力就来自不断折腾，而且只能由革命党自己主导折腾，这种反噬的失控是可怕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反噬的结果，如果不能把革命的方向指向外部，革命就

会在内部爆发，就像一个被扣在罐头下面的鞭炮。

所以革命唯一的出路就是不断进行下去，不断引向新的地区，才能把这种力量控制住。对于列宁式政党小而精干的先锋队模式，职业革命者的作用就是引导革命的方向，这个方向不只是思想上的，还包括地理上的，让已经完成革命的地区趋于平缓恢复建设，同时开辟新的革命地区。但如果革命的力量被困在某个地区内，会失去地理上的自由活跃而开始陷入内耗，就像越烧越干的水壶。

从这个角度上讲，革命没有真正的结果成功，革命的成功就是革命过程本身。在钢铁慈父驱逐了先知之后，甚至在德国革命失败之后，国家主义取代了国际主义，革命就变成了拉锯和消耗。



我上岛沿着住宅区往西走，经过几座废弃的大房子，走到一个岔路口发现一条向海岸延伸的小路，小路一直走到头可以看到一个被围住的院子，这里就

是国际共运领袖、革命先知托洛茨基的故居。现在这座楼已经是废弃半倒塌的危房，只能翻墙进入，里面满是杂草和灌木，房子已经破损得只剩下断壁残桓，地面还有很多凹陷，顶棚几乎完全没有了。

托洛茨基住在这栋房子里直到 1933 年 7 月离开，在他到这里的第一年，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刘仁静来到这座岛上拜访，从这里带回了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指示文件——《中国革命现状和中国反对派（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任务》。



我穿过这栋房子仅剩的墙壁残垣走到阳台上，脑海中想象 90 年前托洛茨基和刘仁静在这栋屋子里聊了什么，中俄这两个注定纠缠的国家因为国际共运在伊斯坦布尔这样被连在了一起。之后的故事，刘仁静回国后不久因为组织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之后投靠了国民党，共和国建立后忏悔，平静活到了 1987 年，托洛茨基则于 1940 年在墨西哥被刺杀。

我坐在托洛茨基已然变成废墟的故居中，思考一个关于何为祖国的问题。彼得大帝建起了圣彼得堡，俄国被有意识地引导成为一个欧洲国家，但是当俄国贵族们有机会前往欧洲旅行之后，他们反过来开始怀疑俄国是否真的该成为一个欧洲国家。

拿破仑战争爆发后，一直学习法国的俄国贵族们开始意识到，欧洲不是神圣的，俄罗斯才是神圣的。在战争中，沃尔孔斯基等贵族青年们与农奴一起为祖国战斗，他们逐渐发现，农奴身上有俄罗斯民族很宝贵的品质，那种根植于俄罗斯大地的、具有朴素人格的、虔诚信仰东正教的农民的品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把西伯利亚当成新的俄罗斯，他们认为在西伯利亚保留了最纯正的俄罗斯农民的品质。

在十二月党人被流放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批知识分子发现俄罗斯农民并不像他们期待的那样，这些知识分子理想中的俄罗斯神圣精神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这并不妨碍那些知识分子在他们的作品中试图塑造这样的神圣精神，并且将其视为俄罗斯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君主即国家变成了一个想象的民族文化共同体。

对于后来的布尔什维克们来说，共产党人是没有祖国的，全世界无产阶级不该受到国家民族的界限，不该给自己限定一个祖国的范围，反动派统治的国家不是祖国，是不值得热爱的。接下来，先知被放逐，苏联的建立既是革命转为低潮，自称没有祖国的共产党人建立了一个新的帝国和若干个附庸国，接下

来的半个多世纪只是在边缘小修小补，却始终没能突破传统俄罗斯帝国的界限。



宁山哀：站在你的角度，你如何权衡托洛茨基与斯大林？

我：斯大林是一个无比成功的君主，在他继任的时候苏联内外一片危机，欧洲革命已经几乎熄灭，新政权岌岌可危，而在党内他几乎没什么盟友。在他去世的时候，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一极，势力范围超过了帝俄时期。但斯大林不是一个能给世界带来希望的革命领袖，在他身上实现了旧式革命最巅峰的一面，就是暴力颠覆当新君登基征伐世界，他结束了共产运动，建立了一个新的帝国。

宁山哀：但有了苏联才有共产运动的延续，如果没有苏联，共产运动可能在三十年代，甚至二十年代就被扼杀了。而且你不能否认，即便是你所讲的帝国一样的苏联，也有巨大的感召力，比如六七十年代的各种左翼社会组织还有青年街头运动。

我：但这种感召究竟是来自共产运动理念，还是来自苏联这个国家的强大？如果没有共产运动的理念与目标，苏联和帝国主义有什么区别呢？那些革命组织也就成为了苏联国家战略延伸的代理人。在雅尔塔体系建立美苏瓜分世界之后，苏联就开始有选择性地支持这些革命组织，基于国家利益而非纯粹的意识形态。

宁山哀：世界革命只是一种假想，在二十年代初革命就已经被挫败了，先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并不是选择，而只有这一种存活机会。只有苏联在国内巩固政权才有后面半个世纪的延续，才有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我：苏联一国的强大让后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成了苏联的翻版，选择了斯大林确定的社会主义体制，失去了共产运动其他的可能性，最终导致这些国家都出现了和苏联相似的问题。世界革命并不会消散，因为革命会不断学习不断进化不断探索新的可能性，但如果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集权国家，这种可能性就会非常狭窄。

宁山哀：我的观点是苏联一国的建设强大让共产运动延续，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并存其他的可能性，但如果没有苏联，可能就不会有这些可能性了。我更关注的是青年街头运动，包括种族平权、女权、工人权益、LGBT 权利等等，虽然这些不是苏联支持的，但有了苏联这样一个另一面的可能性，这些相关的社会运动才会受到鼓舞。

我：真的会受到鼓舞吗？那么在苏联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如何对待本国的青年街头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呢？真正的革命不是重新圈地自立为王，真正的革命就在街头和田野，你可以理解为苏联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之后，苏联的革命就结束了，而其他国家的革命在延续，苏联此时已经在革命的反面了。

虽然托洛茨基曾经流亡到伊斯坦布尔，但这仅仅意味着伊斯坦布尔对流亡

人士的宽容，而不是对共产运动的宽容。早在 1920 年土耳其共产党就已经在巴库建立，但在土耳其国内一直处于非法状态，被禁止公开组织活动，人员也遭到凯末尔政府的抓捕。

在这样的背景下，土耳其左翼人士与中国一直保持着联系。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Nazim Hikmet）在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因为创办左派刊物被捕，1926 年流亡苏联，之后一直进行文学创作。纳齐姆有一首诗叫做《蒙娜丽莎与 Si-Ya-U》，这个 Si-Ya-U 指的是中国诗人萧三。两人在莫斯科相遇，1927 年上海工人起义被镇压，纳齐姆以为萧三牺牲，写下了这首诗。实际上萧三没有死，他们后来再次相逢，在 1951 年授予纳齐姆“国际和平奖”的典礼上，萧三还进行了发言。

离开托洛茨基故居，我在岛上散步，在两座山丘之间发现了一座巨大的木制废弃建筑，这座建筑是希腊东正教孤儿院，是欧洲最大、世界第二大木结构建筑，1898 年修建初始是一座豪华酒店和赌场，但苏丹没有批准执照，后来一位希腊慈善家买下来送给东正教普世牧首教会，1903 年作为孤儿院使用。1964 年塞浦路斯局势恶化，土耳其政府开始压制东正教会，关闭了这座孤儿院，80 年代一场大火毁坏了这里。2012 年土耳其政府把孤儿院还给希腊社区，但一直没有钱修复。

从山丘上下来的时候，我遇到一对郊游的情侣，我下山他们上山擦身而过，男人好像讲了个笑话，女人一边笑一边推他，那个女人包着头巾，睫毛特别长，她笑的时候一开始牙齿都露出来了，然后又不好意思地抿嘴，低头眼睛向上看着男人，那个表情太动人了，真的是凝固空气的爱意眼神。

我常常觉得自己在北京是一种精神上被流放的生活，我很难回到故乡，但也很难把自己当成真的北京人，北京是我的西伯利亚，也是我的王子群岛。我曾经认为在北京能够有很多和我心灵相通的人，就像十二月党人认为他们在西伯利亚可以挖掘到真正的俄罗斯灵魂一样。

但这是徒劳的，我的生活依然像一片荒原一样，我和我的朋友们从各自的故乡流放到北京，北京就是我们的劳改营，我们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间花在这座城市，用辛苦的劳动换取一些微不足道的薪水养活自己，这些劳动耗费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



在我回到伊斯坦布尔城区的时候，一连半个月的冬雨天难得出了太阳。塔克西姆广场上，一群老人来给革命纪念像献花，在这座象征着当年独立与世俗革命的广场旁边，一座高大的清真寺被建起，俯视着纪念像。

这对中国人来说是很熟悉的一幕，全世界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大家在集体右转，中国与土耳其都在相近的年代以民族主义的方式完成了帝国向共和国的转变。康有为在游记中将伊斯兰教与儒教对比，试图探讨两国的相似处境，如何在保留自身文化核心与信仰的前提下接纳现代化。

今天土耳其国内的宗教保守势力上扬，中国的新国学新儒家也在兴起，同样沸沸扬扬的是两国各自的国家民族主义情绪。在人民因为丧失信仰而迷茫的时候，政府需要新的政治理念去维护权力的合法性，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都可能成为他们的新选择。

有人说年轻人改变世界，后面还有半句，不久再被改回来。

中国与土耳其曾经都是帝国，帝国是没有边界的，而是基于对君主法统的认同和效忠。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不是汉人民族的国家，而是某姓皇帝的国家。被认为是外族统治的清朝，在定都北京之后，也不再是满洲人的国家，君主很快背叛了满洲人的传统贵族体制和本土乡亲们，继承了汉人原本的君主法统。

对于土耳其来说，在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之前，这个国家并不属于土耳其人，奥斯曼苏丹不是土耳其民族的君主，而是奥斯曼帝国全部效忠民族乃至全世界穆斯林的君主。在从帝国变成共和国的过程中，土耳其失去了原本的帝国宽容，变成了狭隘的民族国家。

我每到一座城市总喜欢打开短视频，看一下当地人喜欢拍什么看什么，这也是了解当地生活的一种现代方式。在中国人输出的TIKTOK上面，土耳其人很喜欢发表他们对祖国、国旗和国父凯末尔的热爱，这些视频总会点击很高，评论中人们纷纷称赞，和中国很像，在这个角度两个国家建立了新的关联。

在从王子群岛回到伊斯坦布尔城区的渡轮上，海鸥在寒风中追逐着我们的船，我想起一首诗《工人眼中的历史》：

底比斯七门何人建起
问青史 唯帝王之名
难道是帝王搬起了基石与墙砖
几番倾颓的巴比伦

又是谁将它重建
金碧辉煌的利马城
它的缔造者此刻栖居何处
万里长城完工之夜
工匠们又要去向何方
帝国罗马 笑尽凯旋
那是谁的心血
谁的战斗浇筑了凯撒的胜利
笙歌缭绕的拜占庭啊
宫殿岂是它全部的居所
即便是在那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
在那汪洋肆虐之夜
濒死的主人们仍在怒吼 为了他们的奴隶
亚历山大英姿勃发剑指印度
岂是千里单骑
凯撒挥师北征高卢
莫非凭借匹夫之力
当菲利普为沉没的无敌舰队哭泣
落泪的 又难道仅此一人
腓特烈大帝 伟大的七年战争
谁与他一同凯旋
翻过一页页光辉的胜利
谁为金杯斟满了庆功的美酒
人间十年一伟人
谁的白骨遍地 谁说莫问封侯
这样多的历史
这样多道不清的谜题。

夜晚

在太阳落山前，我前往博斯普鲁斯海峡最北面的一座小山丘上，我的面前是黑海。说来有趣，黑海的名字和海水颜色并没有关系，而是用黑色指代方位，中国也有这样的习惯，北方玄武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从这一点来讲，黑海在伊斯坦布尔的北方，玄即黑色，和中国文化是符合的，而伊斯坦布尔的南方是红海，也符合南方朱雀。

海的对面是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半岛，在海边有一座建于 18 世纪的火药城堡遗址，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城堡旁边法国人修建的如鲁梅利·费内里（Rumeli Feneri）灯塔用来给英法船只指路，同时提防俄国入侵。

城堡有两座高塔，东面的塔楼已经损坏，我努力攀登到西面塔楼的最高处走上城墙，看到城堡的全貌。城堡的拱门已经毁坏，只剩下一个石头半圈，如果忽略遍地的垃圾和涂鸦，这里是很美的一处海滨风光。

黑海的浪很冰冷，让我想起故乡的海也是如此冰冷，城堡下面是一片黑色的礁石，有点像大连的黑石礁。伊斯坦布尔是俄国想要却得不到的沙皇格勒，大连则是俄国得到又失去的达里尼。我坐在傍晚冰冷海滨的断壁残垣上，吸收着夜晚到来前最后一丝阳光的热量，恍然意识到这里离我的故乡只隔着一个国家。

诸多的移民来到伊斯坦布尔，带来了他们各自故乡的神，这些神夜晚在每条小巷子里发出低沉的呓语，他们的信仰子民也许已经离开这座城市，这些神成了孤独的流浪者。白天城市中的清真寺与教堂聚集了茂盛的生命力，旧神们无处显现，只有夜晚才能露出身影，从那些落单的人身上汲取养分。伊斯坦布尔每年要失踪很多人，他们成了旧神们的祭品。

我不知道有没有东方人带来东方的神，我每个夜晚穿梭在巷子中，试图召唤来自故乡的旧神，但是没有任何回应。也许东方的神从没来过，也许他们在异国吸收不到人的精神力量，早已凋零了。



多族群的精神空间

人们提到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常常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让民众对苏丹不满，然后推翻苏丹建立了共和国，但奥斯曼帝国战败和土耳其共和国建立，这是不同的两件事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民众把责任归咎为青年土耳其党三巨头恩维尔、杰马勒和塔拉特，而不是苏丹本人。真正让民众对苏丹不满的，是苏丹接受了屈辱的《色佛尔条约》，导致希腊入侵土耳其。之后，土耳其在凯末尔领导下反抗外国侵略军，迫使协约国签署对土耳其更有利的《洛桑条约》，获得民族独立。

我在伊斯坦布尔试图寻找曾经奥斯曼帝国多族群精神世界的遗留，在土耳其经过独立革命完成民族主义倾向之后，这种曾经的多元族群精神是不断退散的。

伊斯坦布尔的少数族群主要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再加上十月革命之后到来的俄国人，和近些年的阿拉伯（主要是叙利亚）难民，当然还有从东部来的库尔德人。在伊斯坦布尔，我没有找到更加东方的宗教场所，比如佛教或印度教等等，也许有小的移民社群自己的场所，但大概没有大型宗教建筑，所以我首先想去拜访的是希腊和亚美尼亚的教堂，去了解他们的精神场所。

作为一个短暂旅途中的外国人，想要了解土耳其的少数民族是很难的事情，一些提问本身就敏感而失礼，最多只能得到礼貌但敷衍的答复。土耳其国内的其他民族大多都与土耳其人有过一些不愉快的历史，除了东南部的库尔德人问题之外，希腊、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历史上都与土耳其有过冲突。然而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主要任用的官员和将军大多是基督徒归化的，其中希腊人和巴尔干人又占了大部分，这使得土耳其的少数族裔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

在伊斯坦布尔，我最先找寻的是亚美尼亚人。由于亚美尼亚大屠杀，土耳其人与亚美尼亚人有着复杂的纠葛。这个问题在土耳其官方有不同的解读，认为是亚美尼亚人首先背叛祖国，与俄国勾结分裂，才被驱逐强制迁移，期间的流血事件主要是与库尔德部落的冲突造成的。

想了解在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人的生活，最好的方式是在弥撒的日子拜访亚美尼亚教堂。伊斯坦布尔的几座亚美尼亚教堂主要集中在亚洲一侧于斯屈达尔区，从苏丹艾哈迈德区需要乘坐渡轮到达。



冬日的清晨，马尔马拉海的渡轮上，海鸥伴随着船只，这座城市美得如同世上冷傲的一切。我站在船尾，想到一句诗“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如果我就此在海上消失，会有谁常常念叨起我？

于斯屈达尔没有欧洲一侧那么多古老的建筑，更加市井生活化，除了鱼市

场之外，还有很多新潮店铺的小巷子，年轻人也更多一些，非常值得逛逛，这里也是曾经巴格达铁路的起点。我看过一个有趣的内容，有一首土耳其民歌叫《走在去于斯屈达尔的路上》，后来这首歌传到了新疆，又被采风的音乐家当成维吾尔民歌整理出来取名《娃哈哈》，就是那首“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

我在于斯屈达尔码头看见一对情侣，那种美貌简直就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天神一样圣洁。两个人穿的很普通，分食一个三明治和一杯茶，寒风中互相捂手取暖，非常开心甜蜜，一切就像电影里那么迷人。在中国不太有贫穷的浪漫，可能是经济发展太快了，人们对贫穷进行污名化，认为贫穷的原因是个人懒惰而非社会不公与剥削，家驴拉磨久了会觉得野驴撒欢简直是一种酷刑，无法面对别人不需要辛苦富有就可以很浪漫。我相信那对情侣婚礼的时候，天空会掉下银币的。

我去拜访的这座教堂叫施洗者约翰亚美尼亚教堂（Surp Garabed Ermeni Kilisesi），建造时间大概在 1555 年左右。最初这是一座木制教堂，1617 年重建在今天的位置上，后来经过 1727 年、1844 年、1888 年 3 次重要的重建和修复。在 1888 那次重建中，教堂改为石头结构，成了现在的样子。

施洗者约翰教堂门前有一个院子，我从外面街上看到教堂主楼为灰白色墙面，正面朝向街道，主楼有三层窗子，屋顶装饰有巴洛克式的雕塑，瓷砖覆盖的屋顶向两侧倾斜。主楼两旁是两座钟楼，在钟楼下方有通道通向两旁的庭院。

我经过一道不太起眼的小门走进庭院，教堂正面是带浮雕的黑色铁门，门檐上方有石雕，刻着亚美尼亚文，我只能通过数字判断讲的是这座教堂在 1888 年重建的纪念。我推开门走进教堂，里面是一个宽敞的长拱顶空间，大概隔成三部分，最前方高于地面，有一个圆形蓝顶拱形空间，是主持宗教仪式的地方，两侧都有圆形拱形壁龛。教堂中殿两旁是窗子和圣像画，屋顶悬挂着漂亮

的大型吊灯。

一位老人走过来接待我，示意我可以进入旁观，我到场的时候弥撒已经开始了，我在后排找了个座位坐下。教堂里弥漫着焚烧乳香和没药的烟雾，带着两种香料混合后特有的酸味。教堂里人并不多，大概只有二十多人，大部分是中老年人，三分之一是女性。

在教堂前方的台上，一位身着绿色长袍的神职人员在主持仪式，带领大家吟唱赞美，他的周围还有穿着白色长袍蓝色披肩的人员辅助，台上另有两个小男孩举着圣器。仪式结束后，人们排队到台前，亲吻神父手中的圣像画，然后神职人员们回到后台更衣，其他人逐渐离去。

弥撒之后，我在教堂的庭院里散步，院子里有一群小男孩在踢球，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邀请我和大家一起共进午餐。我们走进教堂旁边的一间屋子，里面大多是中老年男性，还有一个中年女人带着一个小女孩在为大家准备食物。他们吃的是一种类似面条的食物，口感却有点像米粉，在一个盛满了红油汤的碗里，里面还有鸡丝，配着面包食用。一位长者给我碗里加上辣椒和柠檬汁，这就有了酸辣粉的感觉。

那个小女孩坐在我对面，大概是对东亚面孔感到好奇，总盯着我看，非常萌，我心都化了。她妈妈和长者告诉我很少有中国人来到这座教堂，偶尔有一些欧美国家的游客来。日常来教堂参加活动的都是亚美尼亚人，他们彼此之间也都认识，每周弥撒来到这里更像是社区聚会。这些亚美尼亚人大多从没去过亚美尼亚，我问他们认为自己是土耳其人还是亚美尼亚人，他们给了我一个聪明而不失礼貌的回答：土耳其国籍亚美尼亚人，那一刻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像我的同胞。

亚美尼亚人（包括一部分希腊人）有一点中国回族的感觉，让我觉得有种莫名的熟悉，他们的一部分教堂（特别是小型的社区教堂）也有点像中国的一

些清真寺，只在宗教活动时才开放，平时都是锁上的，而且内部不允许拍照，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强力民族主义国家里少数族裔共通的敏感性。

他们与中国回族同样有另一个共同点，就是一旦双方开始交流，就会格外热情，处在一种渴望外界认同又谨慎面对外界的矛盾心理中。相反土耳其的清真寺大多非常开放，除了少数景点有人维持秩序外，通常随意进出拍照，但人们的态度相对比较平静客气，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热情，这倒是有点像中国的佛教。

在这座教堂不远处还有另一座亚美尼亚教堂，可惜没有开放，叫做圣十字教堂（Surp Hac Ermeni Kilisesi）。这座教堂最初是一位叫亚伯拉罕的神父在1676年建成，在教堂靠近街道的一扇小门上有名字和修建日期。这座教堂经过了多次翻修和重建，到了1892年，亚美尼亚教会搬到这里，教堂开始作为教会的办公场所使用。虽然圣十字教堂在2017年12月重建完成后重新开放，但我去的时候无人应答。

在两座亚美尼亚教堂附近有一座希腊东正教堂，叫做先知以利亚教堂（Profiti Ilya Kilisesi）。我从亚美尼亚教堂出来的时候想顺便拜访一下，走进面向街道的大门是一个很宽敞的院子，地面上铺着一些墓碑，被铁链围了起来，上面的文字很难辨认清楚。教堂由石头制成，覆盖着拱形圆顶，外部墙面是黄色的。教堂正面一层是突出的门厅，红色木制墙面，正面二层是淡黄色墙面带着红边装饰，院子左侧是钟楼，旁边有是废弃残破的红砖墙面。

我去教堂拜访的时候，弥撒刚刚结束，门厅里摆放着餐桌，看起来是人们参加弥撒后在这里吃午饭，有两三个人在打扫卫生。教堂的神父接待了我，告诉我常来的教徒大多是居住在这片街区的希腊居民，但遗憾弥撒结束了，不方便让我单独参观，而且教堂内部不能拍照。他让我记下弥撒时间，告诉我在伊斯坦布尔很多教堂都只有弥撒时间才开放。按照工作人员的介绍，这座教堂最初的建设日期并不清楚，在1804年被毁坏过一次，之后进行了重建。

值得一提的是，当对方跟我说 Greece 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词是希腊的意思，但我说出汉语的希腊时，对方听懂了，并且很高兴。我这时想到，Greece 是英语中的希腊，这个词来自罗马人对希腊地区的称呼，后来作为词源变成欧洲国家的通用叫法。而汉语中的希腊这个名字，反而更接近希腊人对自己国家的称呼 Hellas，所以我用汉语说出希腊这个词时，对方听懂了，并因为我作为外国人使用希腊人自己的称呼感到高兴。

宁山哀：那这个国名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我：Hellas 这个词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 Hellen，他是丢卡利翁和皮拉的儿子，丢卡利翁是普罗米修斯儿子，皮拉是厄庇墨透斯和潘多拉的女儿，这个称呼是希腊人对祖先神话的传承。

我去的这两座教堂相对比较冷清，周围街区人也很少，在伊斯坦布尔还有一座相对热闹的亚美尼亚教堂，这座教堂恰好在最繁华的鱼市场旁边，叫做圣王教堂（Surp Takavor Ermeni Kilisesi）。

我来到鱼市场，本以为需要找上一阵子，因为这座教堂在照片上的样子并不醒目。但到了现场发现其实非常好找，就在鱼市场旁最繁华的小广场街边，灰白色的主楼倒是不起眼，但是一座棕色木制哥特式钟楼非常显眼，是这座小广场的地标。门口有一个卖花的老奶奶，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伊斯坦布尔街头卖花的大多是罗姆人，也就是吉普赛人，他们的信仰非常可疑，会为了获得福利而皈依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

圣王教堂建于 1722 年，最初是一座很小的教堂，后来经过捐助扩建，在 1814 年开放供奉，现在这座建筑是 1858 年火灾后重建的，外观与亚美尼亚古典建筑不太一样，更加现代。

由于是非宗教活动时间，教堂是关门的，但可以进入院子。我推开院门进

去，院子里有几座石棺，上面刻着亚美尼亚文，逝者是教堂曾经的发起者，一座石棺四脚有精美的天使雕刻。教堂的钟楼结构有点特别，在教堂主楼大门正对面，一个玻璃空间笼罩着门厅同时连接着钟楼的下方，门厅内摆着圣像画和圣器，其中一角还有耶稣降生的模型布景。



在这座亚美尼亚教堂对面是一座希腊教堂，叫做 Ayia Efimia 希腊东正教堂，建于 1694 年，1830 年在俄罗斯的支持下扩建了教堂。教堂在一个封闭的庭院中，外部高墙环绕，面向广场的是一扇白色的小门，门檐上方是十字架，从墙外能看到灰色石头建造的钟楼。

提到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就要去法那尔希腊正教学院（Phanar Greek Orthodox College），这是伊斯坦布尔最负盛名的希腊正教会学校，成立于 1454 年，长期是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徒就读的学校。现在这座建筑建于 1883 年，是一座红色的城堡建筑，周围被高大的红墙围住，但我去的时候，整座建筑正在维修中，无法进入参观，好在旁边的另一座小教堂更加吸引我，就是蒙

古圣玛利亚教堂 (Church of Saint Mary of the Mongols)。

蒙古圣玛利亚教堂的正门不太好找，很容易被视为法那尔学院的一部分，我绕着学院的高墙走了一圈，才发现这道不起眼的小门和一块小小的牌子，上面写着圣母玛利亚希腊东正教堂。

这座教堂其实很小，但有一个很独特的红色塔楼，粗矮的造型很像一座水塔，上面是覆盖红色瓦片的锥形屋顶。由于 18 世纪之后的不断改建，这座教堂保留的拜占庭原建筑并不多，原本的教堂结构是十字型，后来向西部和南部进行了扩建，现在东部和北部的两个圆拱形是老样子。教堂圆顶在由四个半圆顶组成的十字上，四根柱子支撑起的钟楼是后期才修建的，有两座钟外露悬挂。

这座教堂平时不开门，需要按门铃叫人，一位看门老人接待了我。我走进教堂室内，看门人先带我看了教堂内保留的穆罕默德二世和巴耶济德二世的手谕法令，法令宣布这座教堂的所有权归属希腊社区。教堂内有大量的圣像画，相当一部分被银制表皮覆盖以保护圣像。

蒙古圣玛利亚教堂是伊斯坦布尔唯一未曾改为清真寺并且始终开放的拜占庭希腊正教会教堂。公元 7 世纪初，拜占庭皇帝莫里斯的女儿在君士坦丁堡的一座山坡上建起了修女院。十字军入侵后的拉丁帝国期间，修女院被摧毁，拜占庭夺回君士坦丁堡之后，米海尔八世的叔叔艾萨克重建了这座建筑供奉圣母。

1281 年，米海尔八世的女儿、伊尔汗国君主阿八哈的遗孀玛丽亚·帕列奥洛吉娜 (Mary Palaeologina) 回到了阔别 15 年的故乡君士坦丁堡。这位玛丽亚公主命运很坎坷，她是个私生女，在米海尔八世统治时期，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建立了伊尔汗国，米海尔八世希望和伊尔汗国保持友好关系，准备将玛丽亚嫁给旭烈兀，以换取蒙古人的友好，最好能获得更多基督徒。

然而玛利亚前往伊尔汗国途中，旭烈兀去世了，于是玛利亚嫁给了旭烈兀的儿子阿八哈。阿八哈去世后，玛利亚回到君士坦丁堡，她重建了修女院和教堂，在此隐居直到去世，此后这座教堂就得到了“蒙古人”称号。

1453 年奥斯曼攻克君士坦丁堡当天，教堂周围的希腊人对奥斯曼军队拼死抵抗到最后。因此，这座教堂也被称为流血教堂，从金角湾通往教堂的道路被称为旗手坡，纪念在此战死的奥斯曼旗手。

在奥斯曼帝国，被苏丹重用的不仅仅是希腊人，还有巴尔干人，他们一部分集体改宗皈依伊斯兰教，比如阿尔巴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还有一部分保留原本的信仰，以基督徒有经人的身份得到苏丹的赏识，其中重要的一个群体就是保加利亚人。

在帝国时期这些不同信仰的族群尚且可以混合在一起，但是在 19 世纪之后，帝国逐渐被民族国家所取代，曾经的平静开始分崩离析。在伊斯坦布尔有一座保加利亚圣斯特凡教堂（Bulgarian St.Stephen Church），这座教堂和 19 世纪保加利亚民族主义兴起有一定关系。

圣斯特凡教堂对于保加利亚民族和国家来说意义非凡，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斯坦布尔有一个兴盛的保加利亚社区，成为保加利亚人文化教育的启蒙中心，他们在这里开设自己的学校、印刷厂和媒体。

圣斯特凡教堂的名字来自奥斯曼帝国时期一位叫做斯特凡（Stefan Bogoridi）的保加利亚政治家，他是保加利亚教会的领导人之一，也是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的顾问。在 19 世纪有相当数量的保加利亚人居住在伊斯坦布尔，他们之前归属本地的希腊宗主教领导，由于民族主义运动，保加利亚人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保加利亚教会。经过长时间的反抗后，保加利亚人获得了建筑许可。1849 年 10 月 9 日，一座木制的小礼拜堂被建起，这里成为保加利亚民族主义复兴的重要场所，被命名为圣斯特凡教堂。

圣斯特凡教堂坐落在金角湾海边，这座建筑结合了新哥特式和新巴洛克式的影响，老照片上是红墙绿瓦，改建之后通体白色配上金色尖顶和十字架。在教堂正面有保加利亚正教会的标志，正门的门牌用西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写着教堂的名字和 1898 的年份字样。

我走进教堂里面，教堂内部有两层，结构非常对称，室内闪动着烛光，回响着基督教音乐。教堂装潢非常富丽堂皇，金色的顶棚和圣障，以及金色大吊灯。最前方的圣障两旁是抱着圣婴的圣母像和耶稣基督像，中间是天使与象征圣灵的鸽子，教堂两旁墙壁有大量圣像画和圣器。

教堂最初的木结构被火灾损毁之后选择用金属框架重建，主要骨架由钢制成，外表覆盖金属板。在教堂外墙的牌子上可以看到当年建筑公司的名字

“Rudolph Philipp Waagner”，这家奥地利公司在维也纳制作教堂的预制铸铁部件，所有部件通过多瑙河和黑海运往伊斯坦布尔，再用金属部件或焊接连接组装在一起。

在教堂的院子里有一小块墓地，其中埋葬着 19 世纪保加利亚争取独立教会的领导人之一的拉里翁·马卡里奥波尔斯基（Ilarion Makariopolski）。他从 1844 年开始一直指导保加利亚教会的斗争，曾因为挑战希腊宗主教的权威被流放阿方索山。在 1872 年独立的保加利亚教会成立之后，拉里翁·马卡里奥波尔斯基一直担任宗主教，直到 1875 年在伊斯坦布尔去世后，埋葬在圣斯特凡教堂院子里。



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巴尔干人曾经共同感受到的是这座城市对基督徒的宽容，有一座清真寺则可以体现这座城市对于全世界穆斯林的召唤，就是阿拉伯清真寺。在前往阿拉伯清真寺之前，我要先找到清真寺周围一座明显的地标——加拉达塔。我从苏丹艾哈迈德区徒步前往佩拉区，经过加拉塔大桥，上面都是垂钓的人，卖茶水和鱼肉三明治的小贩在人群中穿过，那里的鱼肉三明治真的好吃极了。

我在大桥上一边吃鱼肉三明治喝茶，享受着冬日中午的海风与阳光，一边琢磨刚才在亚美尼亚和希腊教堂中的感受。在我去过的甘肃临夏，当地回族习惯称自己为“少数”，称汉族为“多数”，不同族群间并不是一个平行存在的关系，虽然回族也是人口近一千万的民族。

族裔认同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但是常常引起的是很无趣的偏见和争执。这个时代（严格地说是上个时代）鼓励每个民族自决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以民族主义建立的国家里，国家和民族的结合意味着统

一的国族意识、文化表达和集体历史叙事。人们不该有被强加的集体叙事，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事情，一个群体以“民族”的身份反抗压迫获得独立，在这个过程中统一的凝聚力被塑造，群体的排他性也被强化，就成了新的压迫其他民族的来源，包括压迫本民族内民族意识不那么强烈的个体。

伊斯兰教传统上反对民族主义，这会让穆斯林变得狭隘陷入内斗，当然事实上是教派的狭隘内斗代替了民族而已。不过传统还是比现在好很多，现在是教派和民族的双重狭隘内斗，人真是活得太苦了。

吃完鱼肉三明治，我靠在栏杆上看当地人钓鱼，喝着红茶休息一下。这座大桥是一个瞭望整座城市的绝佳地点，我望向佩拉区，最显眼的就是加拉达塔，这座塔与其走到近处，不如从远处观看。

谈到加拉达塔，就要涉及到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在伊斯坦布尔的竞争。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地中海上是商业竞争对手，一直在君士坦丁堡地区有积极的商业和军事存在，这使得他们曾经成为西欧与拜占庭、拜占庭与奥斯曼、奥斯曼与西欧之间的撬动点。

今天的加拉达街区属于伊斯坦布尔市一部分，但最初这里是一个独立的热那亚人的殖民地。我在前文提到参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洗劫君士坦丁堡的就是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则是站在了拜占庭帝国一边。热那亚与拜占庭达成了协议，帮助米海尔八世夺回君士坦丁堡，条件是热那亚人获得了贸易殖民地，加拉达塔就是这个时候修建的，在 1348 年建成时是君士坦丁堡最高的建筑物，这座塔是周围热那亚城堡防御工事的瞭望台。

奥斯曼进攻君士坦丁堡的时候，海峡对面的热那亚人表面上中立，但仍有朱斯提尼亚尼（Giustiniani）带着 700 多志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协助守卫城墙。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热那亚人也随之投降，虽然保留了一些贸易特权但是地位不如从前，此后在奥斯曼宫廷受到苏丹待见的，是热那亚人的老对手威尼斯人。

斯人。

虽然已经吃过鱼肉三明治，但我依然决定在加拉塔的鱼市场里品尝一下当天的新鲜章鱼。鱼师傅把章鱼的皮剥掉，切成小段，放在一种醋和香料混合的调料中浸泡，吃到嘴里特别酸又有柔软中的嚼头，这种刺激性的味道和橡胶一样的口感，就是吸引人们去吃，这世上大部分令人上瘾的东西，都源于人的自虐，包括活着本身。

我周围的摊子有三条狗走来走去，这三条狗就在市场各个摊位转悠，每个路过的人都像摸吉祥物一样摸几下，店主们都会投喂食物，难怪它们长得膘肥体壮。这座城市流浪狗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拜占庭时代，我怀疑它们在这座城市中有自己的历史，只不过不是文本写成的，它们以狗的方式记录下了这座城市千年的历史，也许有很多秘密只有这些狗知道。

狗远比人想象的更聪明，它们与人共同生活的时间太久了，人们注意不到它们，但人类生活在狗的感官中无处遁形，狗能听出你的心脏病，能嗅出你身上不属于妻子的香水味，它知道你的愤怒与恐惧。为什么伊斯坦布尔有这么多流浪狗，因为狗以人的秘密为食，这座城市的秘密太多，足以喂饱狗们。

离开鱼市场，我来到伊斯坦布尔一座曾经属于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天主教堂，帕多瓦的圣安多尼教堂（St. Anthony of Padua Church），是伊斯坦布尔最大的罗马天主教堂。现在这座建筑是 1912 年建成的，教堂门口扭曲的耶稣受难十字金属塑像很有后现代风格，像一件当代装置艺术作品。

教堂院子里有一座罗马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铜像，若望二十三世在 1958 年当选教宗之前，是梵蒂冈驻土耳其大使，他曾在这座教堂布道 10 年。虽然他作为教宗在位只有不到五年，却对天主教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用一系列宽容与和平的活动努力扭转庇护十二世在二战中的可疑倾向，让天主教教会走向多元化，努力成为铁幕背景下美苏阵营之外的独立精神世界，这正是教会

带给世人的力量。

宁山哀：你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吗？因为意大利有一座城市叫帕多瓦，帕多瓦有一座圣安多尼教堂，是传教士圣安东尼奥的陵墓，非常推荐你去参观。帕多瓦之前属于威尼斯共和国，所以伊斯坦布尔的教堂就以帕多瓦的教堂为样板修建。

以加拉达塔为坐标往西走是一片遍布工匠店铺的街区，阿拉伯清真寺就在其中。我沿着狭窄的街道穿过一排排店铺，从远处看到一座红砖尖塔，这座尖塔不像清真寺的宣礼塔，倒是有点像哥特式教堂的钟楼，实际上阿拉伯清真寺就是由教堂改建的。

阿拉伯清真寺最早是一座多明我会的修道院，奥斯曼攻克君士坦丁堡之后，根据奥斯曼帝国与热那亚共和国的协议，这座教堂暂时留在热那亚人手中，但之后被改造成清真寺。1492年，苏丹巴耶济德二世将这座清真寺交给逃离西班牙宗教迫害而迁移到伊斯坦布尔的西班牙阿拉伯裔穆斯林，改成现在的名字——阿拉伯清真寺。

清真寺的入口是一个尖拱门，我从钟楼下面的拱门进入，在通道的墙壁上看到曾经教堂的痕迹，有一些石雕柱头，还有大门的石头装饰，上面带着花纹和盾牌狮子的纹章图案。



进入清真寺内部，我发现里面更有特点，传统的清真寺通常内部横向比较宽而不太追求纵深，但这座阿拉伯清真寺由于原建筑形态的问题，反而是纵深很长，宽度很窄，是清真寺中很少见的长条形，内部用两排柱子将中殿和过道隔开。

清真寺内部没有常见的高拱顶和吊灯，反而是平坦的木制屋顶，显得高度很低，这是 1913 年的修复结果。同样在清真寺最后方，当年作为教堂时的大门也还保留着。总之这是伊斯坦布尔所有教堂改建的清真寺中，风格比较独特的

一座。

宁山哀：为什么传统清真寺建筑横向比较宽而不太追求纵深？

我：按照伊斯兰教礼拜习惯，礼拜的时候站位越靠前回赐越多，为了满足更多人靠前站的需要，清真寺内部都会注重横向的宽度。

伊斯坦布尔接纳了许多阿拉伯难民，从历史上讲他们本就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策动了阿拉伯地区的分离运动，最终阿拉伯地区脱离奥斯曼帝国，形成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和汉志。当然这里面原因非常复杂，既因为之前亚美尼亚人的反叛，让土耳其人对阿拉伯人产生猜忌，也有一战时期欧洲殖民者对阿拉伯地区的渗透。

今天这座阿拉伯清真寺中的礼拜者大部分还是土耳其人，然而伊斯坦布尔的阿拉伯人的确是越来越多的，他们集中于比较传统的法蒂赫区。这些阿拉伯人很多来自叙利亚，在伊斯坦布尔还有一座叙利亚教堂。

我按照地图找到了这座圣母玛利亚教堂，由于附近在进行街区改造，不是很好找。教堂是黄褐色的墙面，并没有特别的样式，如果不是有一个带十字架的楼顶，很容易错过。在我按了门铃之后，一位神父接待了我，他是库尔德人，很热情并且健谈。神父告诉我这是一座东仪天主教叙利亚教会的教堂，神父说在伊斯坦布尔有大概两千多个叙利亚天主教教家庭。

东仪天主教会（Eastern Catholic Churches）指的是使用东方礼仪的天主教会，目前有 23 个教会组织，各自保留了与其历史有关的礼仪和神学理论。东仪天主教会按照礼拜仪式分成亚历山大礼拜仪式、安提约基亚礼拜仪式、亚美尼亚礼拜仪式、迦勒底礼拜仪式、拜占庭礼拜仪式，其中叙利亚天主教会就隶属于安提约基亚（Antioch）礼拜仪式。

这座圣母玛利亚教堂是伊斯坦布尔叙利亚天主教徒唯一一座教堂，神父告

诉我这座教堂传承来自马尔丁，在马尔丁也有一座圣母玛利亚教堂，这座教堂一部分筹款来自马尔丁的叙利亚社区。叙利亚教会最早可以追溯到使徒安提阿在东方教区的传教，1781 年叙利亚天主教会与正教会分开，1854 年叙利亚天主教会宗主教从阿勒颇迁移到马尔丁，后来又迁到贝鲁特。

这座教堂最初是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共同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1870 年在大火中受损，1878 年进行了全面修缮。教堂原本的老建筑在 1961 年被拆除，两年后重建成为现在的样子，在教堂大门上也有 1963 的字样。



夜晚

加拉达塔周围是相对于苏丹艾哈迈德区更加西化和现代化的佩拉区，这种现代感让我更加孤独。对伊斯坦布尔来说，现代意味着过往荣光的褪去，对我来说，现代意味着厚重时间的压抑被释放。有的人会获得自由，有的人只会钻入岩石的缝隙中，寻求另一种压抑让自己舒服放松，如同一只失去了外壳的海螺。

伊斯坦布尔在下冬雨，加拉达塔附近的街道坡度简直是直上直下，喜欢足球的朋友大概会很熟悉这个名字——加拉塔萨雷（GalataSaray）。“Saray”是土耳其语中宫殿的意思，萨拉热窝（Sarajevo）这个名字就来自 Saray 加上斯拉夫地名后缀 evo，因为这座城市是 15 世纪奥斯曼帝国建立的波斯尼亚州府。离加拉塔不远的加拉塔萨雷中学是伊斯坦布尔最早的现代中学，1905 年从这所学校足球队中成立了加拉塔萨雷足球俱乐部。

从加拉塔北面一直走到塔克西姆广场，独立大街两边有街头艺人在演出，很多售卖土耳其甜点的店铺，土耳其的咖啡有点过分苦涩，而点心又过分甜腻，在这座城市一周之后，我才明白这两者是搭配合适的。我之前听过土耳其咖啡算命的故事，通过咖啡壶里的咖啡渣判断命运的走向，有点像罗夏墨迹测试，你看到的图形就是你精神世界的投射，这种期待的意向会影响你的命运。

我看着壶里的咖啡渣想了半天，都不是什么好的意向，为了不影响命运，我加水摇匀把咖啡渣都喝了。

我拐进一条小巷子里，身后一个高加索长相的皮衣大汉一直跟着我，长得就像年轻时候的朱加什维利。他加快脚步走到我旁边，跟我打招呼“My friend, Japanese? Chinese? ”，然后指着我的皮夹克说“Nice jacket, I like it ”。我心想这是要抢衣服吗？我伸进兜里抓住念珠，准备一旦他要动

手我就抽在他脸上然后猛跑。结果他接着说 “You like white girls? I have many girls, 50……, 100……, 后面一堆听不懂了。吓死我了，拉皮条的长那么凶。

宁山哀：哈哈，幸亏你没去，伊斯坦布尔的很多皮条客都是骗子，给游客下套的。但是我好奇你喜欢白人女孩吗？

我：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喜欢女人，无论她们的肤色。

宁山哀：但总会有个人审美的倾向吧。

我：如果单纯从审美来看，我喜欢强悍的、有力量感的女人，可能在某类族群中这些特质更明显一些，但这不代表我对这个族群整体有太多倾向，我始终是强调个体的。

宁山哀：那黑人女孩呢？

我：White is beautiful, but black means power。

宁山哀：你在这些旅行中从来没有过艳遇吗？

我：这就像游泳或者骑自行车，到一个岁数，会了就是会了，不会也就很难再学会了。艳遇也是这样，会的人怎么都能获得，不会的人遇到也没用，我就属于不会的人。

走在独立大街上能听到很多斯拉夫口音，伊斯坦布尔有很多俄罗斯人。在公元 987 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打算选择一种宗教代替斯拉夫人原本的多神教，他派人分别去了解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发现穆斯林不可以喝酒，斯拉夫人不喝酒简直无法生活，犹太人四处漂泊，而斯拉夫人必须有自己神圣的故乡。最后，弗拉基米尔大公听使臣描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华丽后，他选择皈依基督教，并且娶了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

在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人攻克的时候，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佐伊被家人送到了罗马，罗马教宗给她改了一个拉丁化的名字，叫索菲娅。后来在教宗的安排下，索菲娅嫁给了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从此莫斯科成为了第三罗马。末代沙皇一家被处决之后，如果不算上时而出现的冒牌公主，罗马的法统

就是真的消失了，从这一点上讲，罗马一直延续 1918 年 7 月 17 日。

奥斯曼末代苏丹穆罕默德六世 1922 年逃离伊斯坦布尔之后四处流亡，1926 年在意大利去世，苏丹的独子 1944 年死在开罗，苏丹的孙子在曼哈顿居住了 64 年之后，1992 年回到伊斯坦布尔直到 2009 年去世。东方的大清国末代君主溥仪虽然没有留下子嗣，却一直活到了 1967 年，算是一战前后灭亡的帝国末代君主当中最晚去世且还算得善终的。

统治者的合法性来自上天，当上天收回权柄，帝国的命数到此，那便是人力无法抗拒的。中国人很早就知道，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道有变，神器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权力就像流水，在各个帝国间流动，王朝就像每一朵浪花，顺势而生，顺势而亡。

宁山哀：所以俄罗斯帝国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

我：这只是个说法而已，俄罗斯帝国因为东正教和皇族血统的关系与罗马有了关联，但东正教不只有莫斯科教会一支，君士坦丁堡教会依然存在，而娶了东罗马末代公主的伊凡三世是俄罗斯留里克王朝的君主，留里克王朝在伊凡雷帝的弱智儿子死后就绝嗣了，之后的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位沙皇米哈伊尔是伊凡四世皇后娘家的血统，和东罗马血统就没关系了。

宁山哀：神圣罗马帝国呢？

我：神圣罗马帝国是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由罗马教皇加冕称帝，也就是德意志第一帝国，和罗马也没什么关系，是日耳曼人的国家。

宁山哀：罗马尼亚呢？

我：罗马尼亚只是历史上曾经被罗马统治过而已。

神圣的哀伤

伊斯坦布尔是一座充满神圣与哀伤的城市，在欧洲人的视角中，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具有巨大的心理冲击，尽管在 1453 年之前拜占庭帝国已经几乎瓦解，国土仅剩君士坦丁堡一城，但依然被视为罗马文明最后的延续，但土耳其人的征服让这个神圣的象征最终被打破。也许是我来到这座城市恰逢冬雨时节，更能体会到那种哀伤的温度与空气。

称这座城市为哀伤而非惨烈，是从我这个东亚人的视角来看，我们东亚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烈苦难的地方，君士坦丁堡尚存遗迹，穆罕默德二世这位征服者在他所处的时代也算是足够宽容的。相反我们东亚的历史上遍布灾难与恐惧，普通老百姓从来就没有过尊严，荒年人不如狗，丰年人如狗，三年一小灾，五年一大灾，天灾不够人祸来凑，相比之下伊斯坦布尔的哀伤在东亚人看来恐怕是过于矫情了。

我在冬雨中漫步在伊斯坦布尔城内，穿梭于各个历史建筑，试图去领会伊斯坦布尔的神圣与哀伤。很多来到伊斯坦布尔的游客都会去参观托斯卡帕皇宫，我却并无兴趣，欧洲人热衷的奥斯曼宫廷香艳故事不过是在教会道德管制严格的年代对“东方式淫荡”的幻想，而倘若谈及高度压抑的平民精神世界与肆无忌惮的专制权力中畸形的男女关系，中国古代才是巅峰。

宁山哀：中国现在也是，中国社会的权力意识是畸形的，所以男女关系也是畸形的，男性对女性缺少平等的尊重，只把女性作为征服的对象，一部分女性也利用这种关系获取短暂的好处。

我：像是一场大型宫斗剧，连一张选票都没有过的男人们幻想自己走上社会巅峰，掌握巨大权力赢得女人围绕，而女人们同样幻想靠勾心斗角争夺男人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只要有皇帝在，谁都不会过好，包括皇帝本人，宫斗本质

上和狗争宠是一样的，获得的只是价格高一点的狗链子。

我在皇宫外墙路过一座拜占庭红砖建筑，上方有一个粗矮的圆顶，这座建筑是神圣和平教堂（Hagia Irene）。我沿着一条狭窄的通道进入教堂内部，教堂其实很小，几乎没有任何装饰，一张网挂在空中，防止飞鸟和蝙蝠的粪便落下。神圣和平教堂是君士坦丁大帝修建的，是君士坦丁堡最早使用的一座大教堂，直到第一座圣索菲亚大教堂建成后被取代，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就是在这座教堂里举行的。

现在这座建筑在公元 6 世纪由查士丁尼大帝重建，公元 8 世纪由君士坦丁五世改建，一般认为教堂下半部分是查士丁尼时期的，上半部分是君士坦丁五世时期的。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军队攻克以后，神圣和平教堂被划进皇宫的宫墙之内改为军械库，今天这座教堂被改为博物馆，主要是作为音乐厅演奏古典音乐。

站在教堂中央，我正面的前殿上方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黑色十字架，没有任何圣像画，这一点不同于其他留存的拜占庭时期教堂。由于圣像破坏运动的影响，君士坦丁五世修复教堂的时候没有使用任何人物形象，专注于崇拜十字架，在教堂内的柱头上也有十字架雕刻，边缘石条上绘制着几何图案和树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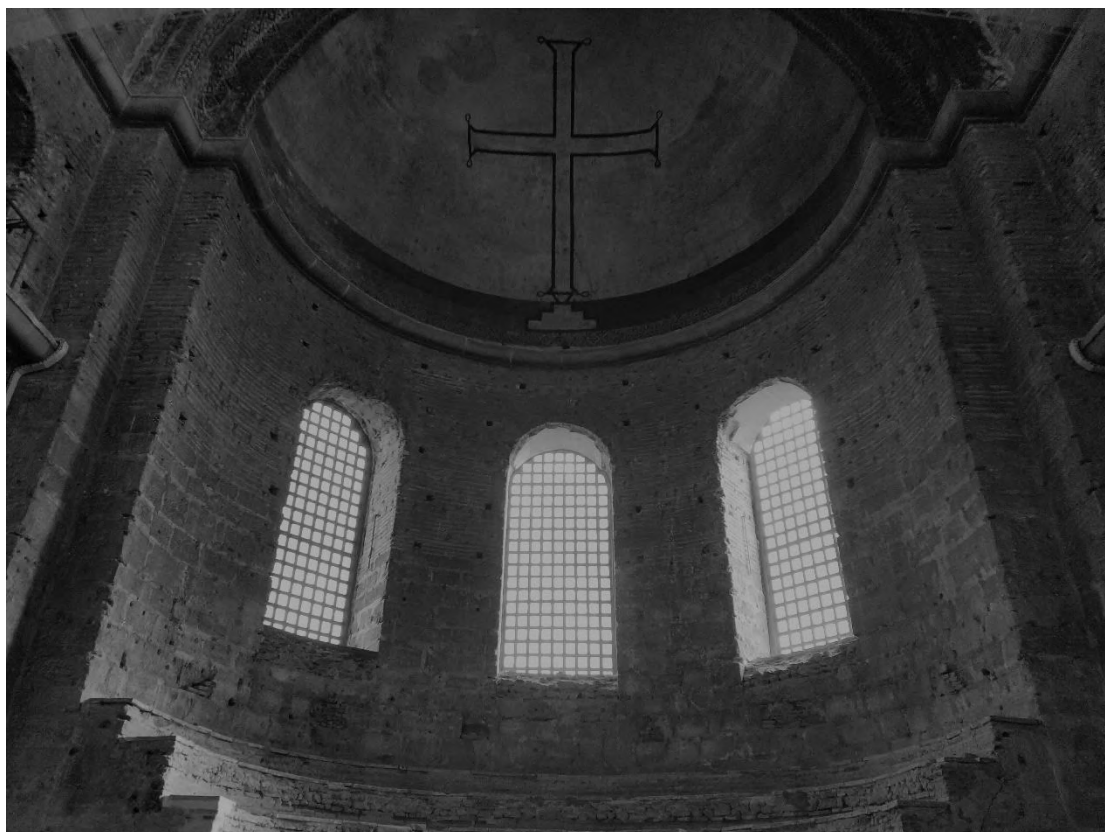
宁山哀：什么是圣像破坏运动？

我：公元 8、9 世纪，拜占庭帝国宗教界发生分歧，主要是围绕是否允许崇拜圣像，这些分歧被几位皇帝用政策的方式强制推行。最早是 726 年利奥三世颁布禁止偶像崇拜的法令，到 843 年米海尔三世废除禁令。

宁山哀：为什么要破坏圣像呢？

我：拜占庭帝国在推行基督教的过程中，很多民间多神教徒在改宗的时候不习惯崇拜没有形象的神，就把一些多神教的形象融合在基督教信仰中，这算是一

个宗教争论的隐患。到了利奥三世时期，为了限制教会权力，剥夺教会财产充实国库，下令禁止崇拜宗教图像，还将教会的土地和财产充公等等。所以表面上是关于是否允许崇拜圣像的宗教争论，实际上是皇权扩张压倒教权。



与神圣和平教堂同时代的还有另一座教堂，同样修建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之前，这座教堂被称为小圣索菲亚大教堂（Little Higia Sophia），正式名字叫圣徒塞尔吉乌斯和巴克斯教堂（Church of the Saints Sergius and Bacchus），现在是一座清真寺。

我从神圣和平教堂沿着和游客群相反的道路散步过去，这座教堂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初期保持不变，直到巴耶济德二世时期才改为清真寺，我进入的时候正好赶上礼拜时间，大概只有十来个人。我在清真寺里的柱子和二层长廊边缘大理石带找到当年教堂时期的遗留，上面有古希腊文的铭文，写着：献给皇帝查士丁尼、他的妻子西奥多拉和圣塞尔吉斯。

这座小圣索菲亚大教堂由查士丁尼大帝在公元 6 世纪下令建造，被认为可能是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模板。这座教堂与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同一个设计师，但是在建筑细节方面与圣索菲亚大教堂有很大的不同，并不是全然的缩小版。建筑外部砖石结构采用了当时的常规技术，使用沉浸在砂浆中的砖块，墙壁由小石块制成的链条加固，建筑内有一个漂亮的两层柱廊沿北，西，南三面，内部有大理石石柱。

在查士丁尼大帝的叔叔贾斯汀一世统治期间，查士丁尼被指控策划谋反，被判处死刑。圣徒塞尔吉乌斯和巴克斯出现在贾斯汀面前担保查士丁尼的清白，这两个人是罗马军队的守护圣徒，曾经是罗马军官，因为秘密信奉基督教被处死而成为圣徒。查士丁尼被释放后感激地发誓，一旦他成为皇帝，他要修建一座教堂奉献给两位圣徒。

我想找到最能代表这座城市哀伤的教堂，在远离老城中心区的西边，老城墙附近有一座教堂是我要去拜访的地方，就是柯拉教堂（Chora Church）。柯拉教堂最初是作为君士坦丁堡城墙外修道院建筑群的一部分，教堂全名叫“乡下神圣救世主教堂”。Chora 指的是它最初位于城墙外的位置，成为教堂的缩写名称，16 世纪柯拉教堂被奥斯曼帝国改为清真寺，1948 年改造为博物馆。

在 1315 年至 1321 年之间，拜占庭政治家西奥多·梅托齐特思（Theodore Metochites）赠予这座教堂许多精美的镶嵌画和壁画。1328 年，西奥多被驱逐出境，两年后他回到君士坦丁堡，在柯拉教堂里作为一名修士度过了一生的最后两年。在柯拉教堂的墙壁上有一幅镶嵌画，描绘的场景就是西奥多跪在耶稣脚边，将柯拉教堂的模型献给耶稣。

我沿着破损的老城墙来到柯拉教堂，这里正在维修中，整个教堂被包裹了起来，只有一部分开放参观，右边的走廊和两道前厅的右侧都不开放。柯拉教堂内部空间并不大，但这里的镶嵌画和壁画却是独一无二保存完好的。我走进正门，从第一个前厅左侧开始参观，这里讲述了耶稣的一生，包括圣母前往伯

利恒、玛利亚和约瑟在叙利亚总督居里扭面前缴税、耶稣降生、圣母玛利亚带耶稣返回、撒旦试探耶稣、耶稣与生活居所铭文、三博士觐见希律王、圣彼得和圣乔治。

我经过一道小门走入第二个前厅内，这里描绘的是圣母玛利亚的一生，包括天使报喜、玛利亚降生、玛利亚怀抱圣子、约瑟遇到玛利亚、在天顶则是大幅的耶稣与祖先世系图。其中有一件大幅作品，描绘的是耶稣、圣母和两名捐赠者：艾萨克和玛利亚（就是蒙古圣玛利亚教堂的那个玛利亚），很遗憾这幅镶嵌画残缺严重，只留下圣母和耶稣的上半身形象，而艾萨克和玛利亚只剩下头部完好。

宁山哀：这个艾萨克是不是你在前面提到的蒙古圣玛利亚教堂的重建者，米海尔八世的叔叔艾萨克？

我：不是同一个人，这个人是约翰二世的弟弟，也就是亚历克塞一世的儿子艾萨克·科穆诺斯（Isaac·Komnenos），米海尔八世的叔叔叫艾萨克·杜卡斯（Isaac·Doukas）。

宁山哀：你确定吗？那为什么他被画在这里，他和玛利亚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我：他在1120年重建了这座教堂，这里也是他最初的陵墓所在地。至于他和玛利亚的关联我就不清楚了，他们之间隔了一百五十多年。

穿过这两道门厅，我走进了教堂的正殿，里面几乎没有任何修饰，我回头看到一幅很著名的镶嵌画——圣母安息，描述的圣母在升天之前的场景。金色的背景中众使徒和天使环绕着圣母的身体，耶稣在中央俯视着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婴儿。

宁山哀：我看过这幅画，那个婴儿是耶稣的孩子吗？

我：婴儿象征着圣母的灵魂。关于圣母升天不同教派有所分歧，天主教会认为圣母无染原罪，肉体与灵魂一同升天，东正教则认为圣母如常人一样经历了死

亡，死后灵魂立即升天，肉体三天后复活升天。圣母晚年住在使徒若望家中，去世前各地的使徒们被召回和圣母告别。圣母去世时，耶稣被众天使簇拥着从天而降，将母亲的灵魂抱在怀里。

要理解伊斯坦布尔的神圣与哀伤，在这座教堂中是很好的体验。在中国日常感受到的基督教更多是关于爱的话题，然而基督教中更深刻的话题是关于苦难的，基督教一开始的诞生就是个人面对强权暴政，这些早期历史中隐含了很多关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何面对痛苦的理解。

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见证了基督教的荣光，一座超越所罗门的大教堂被建立起来，同时又见证了基督教的破裂，十字军毁坏洗劫了同属于基督徒的城市，因为教义与权力之争圣像被清除覆盖，相比之下穆斯林的进入反而温和许多，不拜圣像的基督教派一度认为同样不崇拜偶像的穆斯林才是朋友，君士坦丁堡陷落是对异端教友的惩罚。

与圣索菲亚大教堂中的圣像画相比，柯拉教堂用长图卷式的绘画描述了耶稣和玛利亚的一生，耶稣的人性与神性曾经是基督教内部争执的焦点，在柯拉教堂中用这样一种形式去阐述了这个问题。

在正厅左右两侧墙壁上，一幅是耶稣基督，一幅是怀抱圣婴的圣母，一束灯光正好打在这里，圣母一脸的哀愁。这幅画和《圣母安息》对应着，一面是母亲抱着年幼的儿子，那个她在逃难途中的马厩里生出来，三十岁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儿子，一面是升天的儿子抱着母亲的灵魂，那个无染原罪却一生在颠沛哀伤中的母亲。整个伊斯坦布尔的冬季都弥漫着这种气息，命中注定的牺牲，又并非刺痛，而是寒冷中缓慢窒息的包裹。

圣像画中的人物极少出现笑容，大多是哀愁悲悯或者惶恐的脸，我无从得知玛利亚与耶稣之间是否有普通母子的温馨欢乐，在教堂的画卷中，母子俩就这样度过了各自神圣而苦难的一生，这既关乎神性，又让人性的一面动容。

来时欢喜去时悲，空在人间走一回，不如不来也不去，也无欢喜也无悲。



我前面提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给君士坦丁堡带来的浩劫，包括建筑被摧毁和掠夺，在伊斯坦布尔有一座建筑见证了这座城市最后的抵抗。我沿着蜿蜒的街区寻找老粥厂清真寺（Eski Imaret Mosque），也就是曾经的东正教基督全见修道院。伊斯坦布尔的很多拜占庭建筑都在维护中，这座也不例外，被绿色工

程网覆盖着，只能透过缝隙看到建筑的样子，也无法进入内部参观。

这座教堂最早建于 1087 年，皇帝阿历克塞一世的母亲安娜在君士坦丁堡一座山丘上兴建基督全见修女院，院内包括这座基督全见教堂。1204 年 4 月 12 日，十字军围攻君士坦丁堡，阿历克塞五世在修道院附近设立指挥部，在这座修道院内，他看到恩里科·丹多洛指挥的威尼斯共和国舰队攻入了自己的首都。

十字军攻进城后，阿历克塞五世将皇袍扔在修道院内逃走。这片建筑群遭到十字军的洗劫，然后分配给威尼斯的本笃会修士，在拉丁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期间，这座建筑改为罗马天主教堂。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不久，这座教堂改为清真寺，修道院附属建筑改为附近的法提赫清真寺的伊斯兰学校和施粥厂，清真寺也就因此得名老粥厂，这片建筑群曾数次遭受火灾，修道院的最后遗迹也早已消失了。

我在巷子里绕着这座清真寺走了一圈，它被周围的建筑紧密包裹住，很难完全看清楚外观。建筑的外墙由红色砖石组成，窗子都已经被拆除了，外部全是脚手架，上方也被遮雨棚盖住，透过脚手架可以看到里面的墙壁非常斑驳。

同样在修复中而条件更差的是维法教堂（Church-Mosque of Vefa），在一片布满建筑垃圾的废弃拆迁区里面。维法教堂最初建于 10 世纪或 11 世纪，献给奥古斯都·西奥多罗斯（Hagios Theodoros）。拉丁帝国统治期间同样被用作罗马天主教堂，在奥斯曼征服君士坦丁堡后不久，伊斯兰学者莫拉·古拉尼（Molla Gurani）把这里改为清真寺，他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导师，是伊斯坦布尔的第一个穆夫提（伊斯兰法官），清真寺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我在一条巷子里找到了维法教堂的遗址，周围一片都是在拆迁的老城区，这座教堂对面就是一片垃圾场。我在垃圾堆里找到一个尽可能高的地方眺望建

筑全景，建筑的结构样式还在，可以看到老教堂中央的圆形拱顶和四周的拱形窗，砖块被剥离的很严重，好在基本形态还都完整。

这两座拜占庭时期的教堂都在维护中无法参观，我感觉很遗憾，根据工程牌子上的介绍，差不多要两三年后才开放。但想想看，这些建筑已经度过了一千多年，期间无数次战乱、抢掠、火灾，不断被修复和改建，在一千年的跨度中，个人的两三年是微不足道的，在我生之前，在我死之后，这座建筑依然屹立在这里，我用自己短暂的时间线去衡量这些建筑，只会徒增伤感。



离开这两座维护中的建筑，我去寻找了一座可以开放参观的拜占庭建筑，目前还在使用中的泽伊雷克清真寺（Zeyrek Mosque），原为东正教的基督全能修道院，是伊斯坦布尔现存第二大拜占庭宗教建筑遗址。

1124 年，拜占庭皇帝约翰二世的皇后——匈牙利的圣艾琳娜修建了基督全能修道院，包括基督全能教堂、图书馆和医院。皇后去世后，皇帝在旁边又修

建了另一座教堂，来纪念妻子想要收容贫穷困苦人们的愿望，这位皇后的石棺就在圣索菲亚大教堂进门的长廊里，1136 年又修建第三座小教堂把两座大教堂连接了起来。

在拉丁帝国时期，教堂由威尼斯教会管理，修道院改为鲍德温二世的皇宫。拜占庭帝国复辟后，恢复了东正教修道院，之后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改为清真寺，以学者莫拉·泽伊雷克（Molla Zeyrek）的名字命名。

这座建筑曾经多次失火后维修，修道院的图书馆已经损毁，直到 1966 年北面的部分才恢复，直到近几年还在修复中。我围着教堂走了一圈，砖石墙面保存非常完好，这座建筑是由三座教堂组成，在远处可以眺望到五座圆形拱顶，北面的那座被认为是最老的，只有一个拱顶，中间的稍晚，南面的最新，都各有两座拱顶。

我在雨中走进清真寺，从正门进入礼拜殿内经过两道大理石门，在门厅上方还保留着当年教堂的砖石外表，没有被泥灰覆盖。礼拜殿的内部结构与其他清真寺不太一样，因为这座教堂本身就是三座教堂连接起来的，内部被柱子分隔得有些奇怪。由于伊斯兰教礼拜要朝向麦加的方向，最前方的讲坛是斜向的。

在清真寺礼拜殿内，有两根方形柱子应该是曾经教堂的原件，其他的柱子都已经被换掉了。教堂曾经的装饰几乎已经完全消失，只在一处墙壁上还有大概半个平方米的壁画痕迹，但只有一点点残留，被玻璃覆盖保护着。礼拜殿的大理石地面是拜占庭时期的遗留，但是被地毯覆盖着，如果工作人员允许可以掀开看一下。此外这座建筑旁边还有当年修道院的蓄水池，不过我并没有找到开放的入口。



离开这座拜占庭建筑，我又回到城市西面靠近城墙边的地方，周围是一大片公共墓地。这里曾经有一处圣泉，这处圣泉被认为来自圣母的怜悯，可以让生病的人痊愈，圣泉在一座以圣母之名修建的教堂内，我想去探寻一下。

圣母玛丽亚之泉教堂是查士丁尼皇帝统治的最后几年建立的，近一千五百年来，这个庇护所一直是希腊东正教最重要的朝圣地之一。之前的教堂经历过多次的毁坏和重建，在 15 世纪已经彻底消失，现在的建筑建于 1834 年。

我走进教堂内，教堂前面的院子里是一片墓碑和石雕，一位看门老人接待了我。教堂是长方形，内饰装饰华丽，在中殿右侧有一个讲坛，后面有很多圣像。从教堂出来还有一个院子里面也是石棺和墓碑。

我通过一段向下的通道进入地下室，通道里有圣像画和教堂修复的希腊文纪念牌，时间是 1834 年。地下室里相对比较朴素，除了大理石墙面铺设，上方顶棚基本都是砖面，这就是圣泉所在的地方。

地下室中有几幅画描绘了圣泉的奇迹，其中一幅圣像画，圣母怀抱圣子在最上方，身旁有两个天使，下方有一个水池盛满泉水。在水池后面，皇帝站在他的守卫旁，还有正教会的主教们，水池正面下面，瘫痪和癫狂的人被泉水痊愈。圣泉上方还有一幅圣像，圣母怀抱着圣子，这部分被银质外壳盖住，周围是天使，下面是国王、主教和士兵，同样泉水让病人痊愈。

在圣泉前方的台子上有两个银质杯子，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来取水饮用，但看门老人没有邀请我品尝的意思，我不是基督徒，也就没有询问。

离开圣泉已经将近黄昏，这时下起了雨，空气寒冷萧瑟，我搭上渡轮前往另一处属于穆斯林的圣地——埃于普苏丹清真寺。

在乘坐渡轮前往清真寺的路上，我先去了拉赫米·考契（Rahmi M k oc）工业博物馆参观了一下。拉赫米·考契是土耳其工业大亨，退休之后建立了这家博物馆，里面都是他的私人收藏。我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学校集体参观，全是超可爱的小萝莉，我和一群周末活动的小学生一起吃午餐。这座博物馆我太喜欢了，不光有各种老爷车，还有飞机、坦克和潜艇，包括一架二战时被击落的B24轰炸机。又有很多特别童趣的各种玩具模型，光婴儿车和木马摇椅就有一大堆，这个博物馆主人的乐趣确实多彩。

埃于普苏丹清真寺在西边离城区略远的一座小山丘下面，周围是一片穆斯林的墓地。埃于普苏丹清真寺是为了纪念埃于普·阿尤布·安萨里（Abu Ayub al-Ansari，他的名字一般称为阿布·阿尤布，意思是阿尤布的父亲），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朋友，也是战友。在公元670年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埃于普已经是一位老人，但依然参加了战斗，在战场上病死，士兵们埋葬了他。1458年，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五年后，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找到了埃于普的埋葬地，在遗址上建造了一座清真寺，这座清真寺也是奥斯曼苏丹加冕典礼的传统场所。

埃于普的陵墓受到土耳其人的极大崇敬，很多奥斯曼时代的军人和官员都埋葬在这座清真寺周围，清真寺后面的山丘上是一大片墓地，我沿着陡峭的小路走上墓园，远眺清真寺的全景。埃于普的陵墓位于清真寺祈祷大厅正门对面庭院的北侧，我跟随众人进入，墙壁上镶嵌满了蓝红颜色的瓷砖，人们在其中祷告、朗诵经文。

从山上墓园走下来的时候，在埃于普清真寺外面的庭院里，我遇到了一场葬礼。穆斯林的葬礼有站埋体的习惯，无论是否认识，也要随着众人陪伴亡者待一会，这是有回赐的事情。我踩着浸满冰凉雨水的鞋站在众人之间，他们并没有因为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出现而奇怪。这时清真寺的唤礼声响起，结束了我这一天对伊斯坦布尔神圣与哀伤的寻访。

“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夜晚

我低估了伊斯坦布尔的冬雨，以及山城下雨天的流水，我的皮靴连续几天爬坡石砖路之后，鞋底竟然开裂了，踏着湿透了的鞋和袜子走了一天。迎着往下激流的雨水上山，能感觉到水在我鞋里流进又流出。伊斯坦布尔下了一整天的雨，我已经习惯了下雨不打伞，人们喜欢冬天下雪，积雪可以掩盖一切的丑陋和肮脏，而下雨只会把泥土与垃圾冲上街道，人们如此热爱被粉饰的一切，以至于盼望着永远严寒，积雪不要融化。

我特别喜欢大暴雨，一点点末世的征兆都让我很兴奋，小时候看过一部老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暴风雨就要来了。我分析自己为什么这么喜欢大暴雨，因为我是个很少社交的人，也不喜欢社交，大暴雨就让我有了天然的不出门的理由，仿佛不是因为自己格格不入不合群，同时别人也不方便出门，大家被某种强力的自然外力共同约束，满足了我这种社交关系中的弱势群体对结果平等的寻求。

我常看到很多人说想增加生活的可能性，我好奇有没有人想要努力减少生活的可能性呢？他们或许排斥变数，抵触新鲜感和节外生枝，希望一切是单调而可控的，在快速发展和躁动的社会中，他们也许很难受。

我不觉得从自己这样一个遥远外国人的视角上，能够理解这座城市最敏感细腻的东西。如同在我的故乡和工作的城市都没有大海，我的记忆中就没有大海的气息，没有海风吹拂的印象。无论是教堂中的圣像画还是那些散落石头的历史，都是更偏向于文本式的内容，而非完全根植于内心感性世界中。

作为来自同样悠久历史地区的人，我从另一个角度去尝试引发共鸣，一个地区的历史会沉积在人的意识中，对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来说，石头留下的历史和中国人书面留下的历史是相通的，都见证着人们对于当下的乐观忍耐和

对未来的悲观忧虑，即现在的苦难一定会过去，更大的苦难一定会降临，这一点是我更能深切领会的。

晚上我沿着海岸散步，偶遇了德拉古特（Dragut）的铜像，奥斯曼帝国最负盛名的海军司令之一，也是一名传奇的海盗，他参与的最后一场战役就是围攻马耳他。马耳他陷落对基督教世界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帝国时代三》开头战役就是奥斯曼围攻马耳他，里面的奥斯曼将军夏伊的原型可能是德拉古特，但真实的德拉古特在围攻马耳他的时候阵亡了。

看着海边的德拉古特铜像，高大强悍，目光眺望远方，我突然有一个中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好汉也是如此高大强悍，他去世在水边，留下了一首偈语：平日不修善果，专爱杀人放火，忽地断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奥斯曼帝国的世俗荣光

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拥有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两面，在雄伟的宗教建筑中蕴含着这座城市丰富的世俗生活。继承自罗马时代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追求，奥斯曼帝国将伊斯兰教相对于中世纪基督教并不主张禁欲的思潮带入了这座城市，清真寺不仅仅是宗教活动场所，周围庞大的附属建筑构成了繁荣的公共空间。

今天伊斯坦布尔城中最热闹的商业区就是大巴扎，不同于中国常见的商场群，伊斯坦布尔更多保留了传统小贩街市。大巴扎内是游客们喜欢光顾的地方，本地人更多去的是大巴扎外面露天的街区市场，这里不仅有游客们喜爱的糖果甜品和茶具餐具，也有本地人日常购买的香料、奶制品、香肠和腌制小菜，一家卖现磨咖啡的店铺前排了最长的队，我也跟风买了几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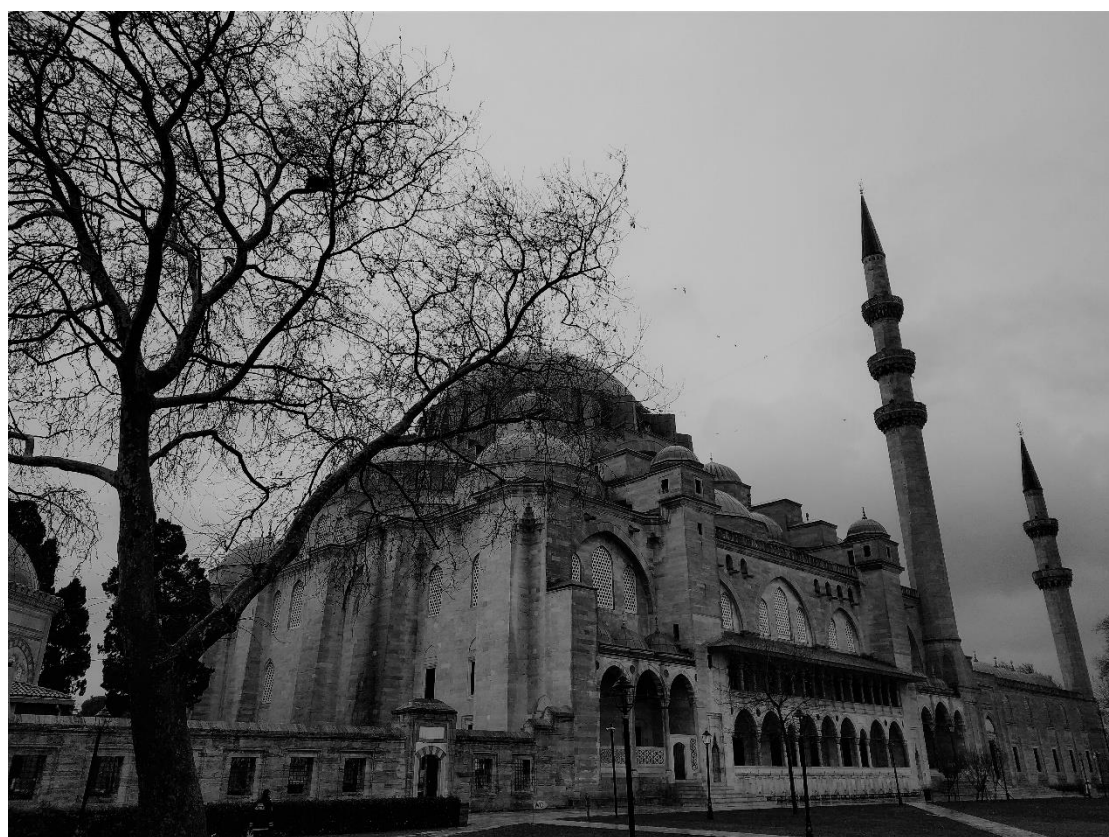
走在大巴扎里，毫不夸张地说，我看到的美丽女人就像这座城市的地砖一样多。苏丹倒了一杯水，告诉我这是我从小到大见过的美女，又指着马尔马拉海说，那是伊斯坦布尔的美女。

旅游指南会告诉大家不要在大巴扎附近吃饭，因为都是面向游客的餐馆，但我觉得即便是这些餐馆也非常好吃，排除味道奇怪的腌制小菜和齁甜的高糖点心之外，土耳其菜可以说非常对我的胃口。

在中国，近些年人们的饮食口味很奇怪，用各种调味料尤其是辣味掩盖食材本身的味道，糖和盐超标，而且缺少幼稚肉食和海鲜等动物蛋白食物。我觉得能被称为美食之都的城市，一定是商旅和移民汇聚的地方，才能带来各地丰富的食材和烹饪技术，同时人们要很尊重食材的原味，不然做什么都是一个味道，就谈不上丰富性。

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城市就是世界美食之都，能和它媲美的也是巴黎、纽约这样的城市。在中国，我心中的美食之地应该是从东北到新疆的大弧线，加上南方广府和潮汕两个圈，也就是最盛产优质肉食的地区和最擅长保留食材原味的地区。

从大巴扎出发，不需要走太远就到了奥斯曼帝国最鼎盛的象征，苏莱曼清真寺。



苏莱曼清真寺是由苏莱曼一世下令在 1557 年建成的，是建筑师米马尔·希南（Mimar Sinan）最重要的作品，事实证明希南是一个天才，尤其在防震技术方面，伊斯坦布尔很多历史建筑都曾在地震中受到破坏，但苏莱曼清真寺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希南在设计苏莱曼清真寺的时候参考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结构，同时进行

了升级，圣索菲亚大教堂支撑圆顶的扶壁让建筑外观显得很厚重，希南在设计苏莱曼清真寺的时候，使用隐藏的四根支柱支撑主拱顶，此外还有两个半拱顶和两扇山墙，这就让墙壁本身承重压力减轻，变得更轻巧，同时打开了很多窗子有利于室内采光。

虽然离圣索菲亚大教堂建成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一千年，但希南却是第一个在如此超大体量建筑上破解升级的建筑师。同时，希南也主持修复和加固圣索菲亚大教堂，让这座建筑一直可以存续到今天。

苏莱曼清真寺整个建筑群建在陡峭的山丘上，将起伏的地势和周围的街巷结合到一起。参与建造该建筑群的是来自奥斯曼帝国各地的工匠，包括许多希腊和亚美尼亚的基督徒。

在穆罕默德二世统治初期，一开始把自己看作是罗马皇帝的继承人，在奥斯曼帝国占领了阿拉伯地区后，苏莱曼大帝的父亲塞利姆一世接受了“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地的监护人”的头衔，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在此之前这个名头属于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傀儡哈里发。奥斯曼苏丹把自己看作是正统伊斯兰教的捍卫者，苏莱曼本人通过这座清真寺的建立巩固了他对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建立了伊斯兰社会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新的公共关系。

我沿着山丘向上，眼望着穹顶和宣礼塔走向苏莱曼清真寺。延续罗马人从帝国各地搜集纪念品的习惯，苏莱曼大帝派人从巴勒贝克、亚历山大、罗德岛、贝尔格莱德和马耳他运来石柱，每根石柱象征着帝国统治内的一个方向。

我走进清真寺内，巨大的拱顶营造出空阔的室内空间，吊灯垂得很低，让我稍微抬头就能望见星空，窗子上装饰着彩色的玻璃，遍布阿拉伯文书法，朝向麦加的墙是用精美的伊兹尼克陶瓷镶嵌成的，展示天堂花园里的植物和花朵。清真寺周围有四座伊斯兰法学院和四座伊斯兰大学，清真寺的四座唤拜楼也象征着穆罕默德的四名继承人，四座唤拜楼共有十个阳台，代表着苏莱曼是

奥斯曼帝国的第十位苏丹。

清真寺后面的花园里是皇家陵墓，埋葬着苏莱曼大帝和他的妻子洛克塞拉娜、他们的女儿、苏莱曼大帝的母亲和姐姐以及苏莱曼二世和艾哈迈德二世，还有穆斯塔法二世的女儿。



在清真寺周围有米马尔·希南的陵墓，他的陵墓在苏莱曼清真寺外略低一点的地方。我找到了这座陵墓，但是被锁住了，只能透过铁栏杆窗子看到他的墓葬。他的陵墓前面是一个小小的水池，在土耳其的流行文化中，认为希南的陵墓里埋藏着伊斯坦布尔的秘密，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规模城市建设中，知道了从拜占庭时代开始诸多建筑里的秘密，这座城市里有无数的密室、暗道、陵墓、洞窟。

作为奥斯曼帝国最伟大的建筑师，希南常常是被低估的，他的家族原本是基督徒，他本人长期作为军队中的工程师，参与了攻克罗得岛和贝尔格莱德的

战斗，积累了大量的实地建筑经验，特别是如何结合地形让建筑更实用以及改造旧建筑，战争经历也使得他对于欧洲的建筑技术非常了解。他担任苏莱曼一世、塞利姆二世和穆拉德三世 3 位君主的首席建筑师，工作超过五十年，直到 86 岁的时候还完成了最伟大的作品——埃迪尔内的塞利米耶清真寺。



除了一系列壮观的清真寺之外，米马尔·希南还设计了奥斯曼帝国海军统帅海雷丁·巴巴罗萨（Hayreddin Barbarossa）的陵墓。这座陵墓在今天的土耳其海军博物馆旁边，我去参观海军博物馆的时候顺便看了一下，但是海雷丁

本人并不葬在那里，而是葬在苏莱曼清真寺周围。海雷丁的家族是希腊基督徒，后来与哥哥一起参加了奥斯曼海军，他屡次以少胜多，让奥斯曼帝国控制了大半个地中海。

巴巴罗萨并不是他的名字，是传到西方之后，人们讹传成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的名字。海雷丁的陵墓旁边是他的雕像，上面还有一首诗：那海面上咆哮的是什么？巴巴罗萨现在可以从突尼斯或者阿尔及尔返航吗？两百艘船在海浪上骑行，新月从陆地上升起，有福的船，你来自哪里。

参观完海雷丁陵墓已经是中午，我向北面坐一段公交车，来到码头边上的奥塔柯伊清真寺，码头上有很多贩卖小吃的商铺。我的午餐是一个码头边流行的巨大的烤土豆，上面放了很多食材，玉米、豌豆、香肠和蔬菜，浇上酱汁，热气腾腾很好吃。奥塔柯伊清真寺不同寻常之处是一座阳光海景清真寺，大量使用玻璃窗，冬日海滨凛凛寒风，人们在室内透射的阳光下礼拜，会比较温暖。

我坐在清真寺外面的长椅上，一边享受冬日正午的阳光，一边看着海浪拍打着岸边，周围的小女孩们会随着海浪冲到长椅前面激起水花而兴奋大笑。我身边有几条懒散的大狗，躺在地上睡午觉，游客过去抚摸它们合影，它们头也不抬接着睡，我很羡慕这些狗的安全感。

奥斯曼帝国有一个习惯，只要城内有足够多的礼拜地点就不建造其它的大清真寺。建造庞大的清真寺被看作是浮夸的表现，在伊斯兰教里奢侈是被批评的，节俭则是一项美德。因此，君主想要修建大型清真寺，往往会使用满足市民公共生活的理由，所以清真寺通常是一片附带很多社会福利设施的建筑群。

在伊斯坦布尔，法提赫清真寺就是这样一个公共生活中心。比起宣扬帝国强大力量的苏莱曼清真寺，法提赫清真寺显得更为平民化，尽管法提赫意思是“征服者”。这座清真寺就在大巴扎的附近，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建造于 1470

年，是奥斯曼帝国获得这座城市后的第一个重大工程。清真寺周围有一组精心设计的建筑群，包括伊斯兰学校、图书馆、医院、市场、土耳其浴室、小学和为穷人提供食物的公共食堂等。

最初的法提赫清真寺在 1509 年地震中严重受损，又先后遭受 1557 年和 1754 年两次地震的破坏，在 1766 年的地震中彻底被毁，主穹顶坍塌，墙壁也被严重破坏。目前的清真寺由苏丹穆斯塔法三世完成于 1771 年，与原先的设计样式并不相同。

不知道土耳其现在是不是寒假，我去哪都能遇到成群的小孩子集体活动，清真寺里非常热闹，因为有厚厚的地毯，家长放心让小孩子在上面跑跳。大殿里有人在祷告，有人在聊天，拍照的游客很多，这是一座城市该有的真正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城市与人的连接，人们在这里献祭自己的一部分灵魂，众人的灵魂聚集在公共空间中，融入这座城市的空气、流水与土地，城市就吸纳了这个人的过往记忆和他祖先的过往记忆。之后这座城市里出生的人，呼吸带有众人灵魂的空气，饮用带有众人灵魂的水，食用带有众人灵魂的土地上生长的食物，他便吸收了这座城市生活过的前人的灵魂，一代代人正是这般传承下去，人类并不完全依靠文字记录的历史，历史通过更高级而神秘的方式传承于人的灵魂中。

如果一座城市失去了公共空间，人们没有闲暇的聚集，只能在路上匆匆走过，现代化的商业中心里，光线、电波、声响打乱了灵魂的聚集。城市的生命并不会自然产生，只能依靠吸收这座城市里人的灵魂，慢慢城市吸收不到人的灵魂就会变得枯竭，空气、流水和土地不再有生命力，城市死气沉沉，人们在这里没有定居的温暖和幸福。

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和教堂就是这样的公共空间，我能感觉到灵魂的能量

缭绕在建筑里，那种有生命在周围流动的感觉，就像树林中的鸟叫或街边睡懒觉的流浪狗，使我非常有安全感。



法提赫清真寺原本的位置是圣使徒教堂，这是君士坦丁堡地位非常尊贵的教堂之一。米海尔八世从十字军手中收复君士坦丁堡后，拜占庭帝国衰落，君士坦丁堡人口下降。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圣使徒教堂曾短暂成为君士坦丁普世牧首的驻地，但建筑本身年久失修比较败落，而且周围居住的都是穆斯林，牧首不久就搬走了。1461 年，穆罕默德二世拆除了圣使徒教堂，腾出这片空地修建法提赫清真寺。

最初的圣使徒教堂由君士坦丁大帝兴建于 330 年，到他 337 年去世时教堂尚未完工，由他的继任者君士坦丁二世完成。这座教堂里供奉耶稣的十二门徒，皇帝打算将所有使徒的圣髑都收集到这座教堂中，但是只收集到了圣安德烈、圣路加和圣提摩太的圣髑，君士坦丁大帝本人的遗体也安葬于此，被使徒们簇拥着。

查士丁尼大帝在位期间，在原地建造了新的圣使徒教堂，将君士坦丁大帝和三位圣徒的圣髑重新安葬在新教堂内，查士丁尼和家人的陵墓在教堂北部，后续大多数皇帝、牧首和主教都埋葬在这座教堂内。

宁山哀：这三位使徒都是谁呀，我只知道圣路加，就是《路加福音》的作者是吧。

我：圣安德烈是第一位正教会普世牧首，俄罗斯和苏格兰的主保圣徒，也是第一位罗马教宗圣彼得的弟弟，他们兄弟俩分别是东西教会的创始者。圣安德烈在希腊传教中殉难，被钉死在一个 X 形的十字架上，所以这种 X 形被称为圣安德烈十字，苏格兰国旗和俄罗斯海军旗就是这个样式。圣提摩太是圣保罗的门徒，也是以弗所的第一位主教，80 岁的时候被多神教徒用石头砸死，被封为圣徒。

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期间，圣使徒教堂遭到了严重的洗劫和破坏，教堂的黄金和宝石被抢走，拜占庭君主们的陵墓也被打开，其中一些珍宝被运往威尼斯圣马可教堂里。教堂内的一些圣物被带到梵蒂冈存放在圣彼得大教堂中，在 800 年后的 2004 年，部分圣物被归还到东正教会普世牧首驻地圣乔治教堂。

我来到圣乔治教堂，这个东正教最神圣的中心很朴素，从外面的街道上很容易错过。我去的时候教堂门前的安检门亭还在建设中，我经过一道小门进入一个不大的院子内，圣乔治教堂的外观看起来有 19 世纪中期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与传统拜占庭风格的东正教堂截然不同。在教堂正面有一面黑色的大门是不开放的，叫做格列高利大门，1821 年，普世牧首格列高利五世（Patriarch Gregory V）因为无法控制希腊革命，被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绞死在上面。

圣乔治教堂是正教会最重要的主教座堂，从 1600 年起成为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驻地。走进教堂的正门，我看到有三处希腊文铭文，记录的是 1720 年教堂重建，同样还有一处希腊文铭文记录的是 1836 年翻新，正门上有双头鹰的标志。

东正教有崇拜圣物的习惯，这座圣乔治教堂内收藏着很多圣物和圣像画，最著名的是圣格列高利和金口若望的圣骨匣。圣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也翻译成圣额我略，他是公元 4 世纪的一位神父，为三位一体教义做出了贡献，金口若望（John Chrysostom）指的是同样公元 4 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若望一世，因为擅长演说雄辩被称为金口，他们两个人与另一位圣徒巴西流被称为三圣教父。

在教堂南侧还有三位女圣徒的圣骨匣，其中最著名的是圣尤菲米娅（St. Euphemia），她生活在公元 3 世纪，当时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迫害基督徒，尤菲米娅拒绝向罗马的阿瑞斯神献祭，被折磨死。公元 620 年她的圣骨被送往君士坦丁堡，这座教堂里她的圣骨匣是俄罗斯教会贡献的。

宁山哀：我好像看到过圣尤菲米娅这个名字，我去过克罗地亚一个小城叫罗维尼，那里有一座大教堂就叫圣尤菲米娅大教堂。

我：圣尤菲米娅的遗骨曾经存放在君士坦丁堡一具石棺中，后来石棺被扔进大海，漂到了罗维尼，人们打捞起来修建了圣尤菲米娅大教堂。

宁山哀：哦，我在教堂里看到石棺了，那她真正的遗骨到底在哪里呢？伊斯坦布尔还是罗维尼？

我：那我就知道了，有可能都在，圣徒的遗骨被供奉在不同教堂里是很常见的，除了这两座教堂外，马耳他的圣约翰大教堂里面也有圣尤菲米娅的遗骨。



我走到教堂最前方的位置，在祭坛的右边角落，有一根被金属包裹着露出一截黑色的柱子。我抚摸着那根柱子，不确定材质，冰凉的手感有点像玉石。这是圣鞭痕柱，耶稣曾被绑在上面鞭打，替世人承受罪责。

我在圣乔治教堂没赶上弥撒，只在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我之前在东北和新疆接触过东正教，在中东铁路沿线有不少俄国移民留下的教堂，在伊宁我也去拜访了当地的俄罗斯族社区，参观了他们的宗教活动。中国的东正教基本都是来自俄国一系，希腊一系的东正教我从未接触过。

东正教的仪式、服装和音乐都非常吸引我，也许在一些人看来过于注重形式感，这也是基督教内部的长期争论，关于圣像与圣物崇拜、华丽的仪式、社会化的组织结构等等，批评者认为这让人们把信仰变成某些机械的行为而远离了上帝。

伊斯兰教并不主张繁琐的仪式和偶像崇拜，相反重视《古兰经》的传承，不可篡改且只有唯一版本，是更文本化的信仰。这意味着抛弃对物质实体的迷恋，而专注于纯粹的理念，会让人更接近信仰的真理。

人有着其本然的感知和思考方式，人的记忆不是文字式的，而是场景画面。虽然我们以脑海中的声音作为“思想”这个概念，但我们依然需要一些方式启发感知和思考，声音、色彩、动作、气味、光线等等，宗教仪式在漫长过程中的演变在于如何更容易让参与者唤起对信仰的感知，获得启示。

这把人的感知与心灵贴合在一起，人们日常的肉体与精神世界之间存在一些缝隙甚至是巨大的间隔，让人们无法深入思考自己肉体感知到的信息，肉体也无法把精神世界表达出来。这样人的肉体就会机械而麻木，如行尸走肉般生活，精神世界被困在躯壳中无法释放，只能压抑地陷入内耗。

这是很多人的痛苦来源，肉体与精神世界脱离，人就像一块加热的奶酪一样变软融化拉丝最后瘫在锅里。

从圣乔治教堂离开，我在法提赫老城区漫步，这里现在生活着很多阿拉伯人，是伊斯坦布尔宗教氛围最浓郁的区。在法提赫区中，有一片社区显得更加保守，就是伊斯梅尔阿伽清真寺所在的苏菲纳格什班迪耶社区。在伊斯坦布尔乃至土耳其，不可忽视的宗教群体就是苏菲教团，他们自己独特的修行方式，在外界看来有一种带着灵性的魅力，但这种方式在一些穆斯林看来是有争议的。

伊斯梅尔阿伽清真寺是一座苏菲纳格什班迪耶（Naqshbandiyah）教团的清真寺，最早建于 1723 年，但是在 1894 年的大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土耳其共和国建起之后，宗教学校也随之关闭，建筑逐渐荒废，直到 1952 年，清真寺的翻新和修缮工程才完成。

纳格什班迪耶教团在着装上比较容易识别，男性都留大胡子包白色缠头，女性着装也相对保守，会用头巾遮住半个面部。虽然一些旅行文章里并不建议旅行者前往苏菲教团的清真寺，因为这个教团在土耳其国内有一些政治争议，但我的个人感受是这座清真寺非常友好，学习的氛围更浓厚，大殿里很多人在听课或者讨论问题，还有很多小孩子，目光相交的人都会向我道 Salam。

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早期，苏菲教团被认为有极端保守的宗教政治倾向，这与凯末尔主张的世俗化社会改革相冲突，他们的活动受到了限制，一些宗教场所被关闭。尽管禁令已被解除，但伊斯坦布尔仍然只有少数还在活动场所，有人认为埃尔多安苏丹就是苏菲教团的成员，但反对者认为这是政敌的攻击，埃苏丹只是为了平衡宗教势力利益。

宁山哀：纳格什班迪耶教团在中国也有吗？

我：纳格什班迪耶教团在中国有影响，18 世纪在甘肃，马来迟创立的虎夫耶门宦和马明心创立的哲合忍耶门宦。

宁山哀：中国还有什么其他的伊斯兰教派吗？

我：称为教派有点夸大了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很多所谓的教派之间并没有核心教义的分歧，只是具体行为仪式和传承的区别。回族当中最传统的是格底目，有一些教派更像是某位导师开启的新学派，这一类就是苏菲门宦，主要有四个：虎夫耶、哲合忍耶、嘎得忍耶和库布忍耶，还有一些和宗教运动思潮有关，比如伊赫瓦尼和赛莱菲耶，受到伊赫万运动和萨拉菲运动影响。



在距离伊斯坦布尔三个小时车程的布尔萨，我打算去拜访另一处苏菲社区。和繁华热闹的伊斯坦布尔比起来，这座奥斯曼帝国的第一个首都，也是开国者奥斯曼一世和奥尔罕的陵寝所在地，显得更加平静。前朝开国君主的陵寝所在地，又是工业中心，和我的故乡沈阳很像。

从伊斯坦布尔去布尔萨要一大早坐船渡过马尔马拉海，然后再换乘大巴车，在渡轮上我吃着面包圈当早餐，一边欣赏清晨的海上阳光。布尔萨诞生了土耳其皮影戏中的两个角色，Hacivat 和 Karagöz，这两个人有点像赵本山和范伟演出的小品人物，一个代表文盲而朴实的农民，另一个则是受过教育有钱的中间阶层，这是很多戏剧作品的经典角色搭配。

这两个角色在周边各个国家都有改编版本，有人认为最初来自希腊，代表希腊农民与奥斯曼官员之间关于秩序的周旋。小丑通过滑稽表演来向君主阐述政治与社会观点，似乎是各个专制国家都会有的民间故事，区别是有的君主哈

哈一笑接受了建议，有的君主把所有的小丑拉出去全砍了。

到了布尔萨之后，我直接前往伊兹尼克，这个地方以前叫尼西亚，是基督教历史上著名的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地点，也是著名的瓷砖生产地，奥斯曼帝国很多清真寺的瓷砖都是这里生产的。可惜当年开会的教堂已经沉入湖里了，只能去看其他的遗迹。

我找到伊兹尼克索菲亚教堂，这里也是举行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地点之一，建筑整体还保留着，在老照片上看，经过了大面积的修复，可以发现建筑上面的砖色和下面不同，当年修复的时候教堂已经没有屋顶了，教堂内有一小块模糊的耶稣像和部分地砖是最早期的遗留。

傍晚我从伊兹尼克返回布尔萨，乌鲁清真寺是布尔萨的老城中心，附近就是大市场。这座清真寺可看之处主要是墙壁的书法作品，而且大殿内有一个喷泉，乌鲁清真寺有 20 个圆顶，喷泉上方的圆顶是玻璃的，光会从上方透进来。据说当时的苏丹许诺如果战胜敌人就修建 20 座清真寺，然而胜利之后，因为缺少资金苏丹耍了个滑头，他修建了这座带有 20 个圆顶的清真寺，结果后来就战败了。

布尔萨大清真寺在建造的时候就为周边规划出一大片公共区域，现在也是繁荣的商业区，售卖针织品、首饰和瓷器，走廊中间是一片露天小广场，大家逛累了都在这喝咖啡。

晚餐之后，我在一片居民区中找到苏菲社区活动中心，这里每天晚上都有免费观看的苏菲旋转舞表演。活动中心里面的人非常友好，还有茶水提供。我去的第一晚，一位在当地中学教授土耳其文学的老先生接待了我，当天晚上是两位老师带着三个舞者进行表演，其中一个最小的舞者只有九岁。在舞者表演的时候，我身边的老先生一直在为我讲解他们舞步的含义，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以及舞蹈与宗教修行之间的关联。



我问他认为旋转舞是一种宗教仪式还是一种艺术表演，他告诉我这两者都有，宗教指导人们修行的目的，艺术让这种修行更容易被人们接受。我又问他这是否只是一种外在形式并不十分重要，他告诉我，一开始人们会被形式所吸引，后来发现形式只是外在的不太重要，但最后又会发现老师们教授的形式其实很重要，那是经过很多人学习确认过的接近真理的方式。

周六晚上是谢赫演讲，因为听不懂土耳其语，我的就在观察周围人，老人们围坐着喝茶，男士们是一群，女士们是一群，各自在聊天，小孩由较大的孩子带着玩，这样一个社区中心庭院里的场景，我只在童年的单位家属宿舍大院才有这样的记忆。

我在中国的时候也接触过一些苏菲修行的内容，始终觉得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修行学习，也是因为人们把这种形式剥离于生活之外，没有和自己真的融为一体。这并非人们自己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生活本来就非

常缺乏公共性，所以人们很难让集体生活与自己的私人精神世界完全融合。

我们的社会看似很注重集体生活，却缺少真正自发的集体，我们从小到大的集体都是被安排的，无论是同学还是同事，所谓的集体活动也都是强制的。也许一些青年空间有自发集体活动的功能，但和我说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又不一样，想来想去也只有宗教团体才有这个功能了。

土耳其的城市非常注重享受公共空间，街边随处可见小茶馆，走几步就可以坐下来喝茶，很多人点一杯茶就那样望着街道待一下午。人的精神世界与生活方式，包括外部的公共空间是有联系的，苏菲教团的公共生活仪式让我意识到，当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建立起自主的关联之后，才能分享彼此的精神世界，以及认识和学习修行的方式。

今天中国的城市社会变得越来越原子化，民众缺少自发组织社会活动的 ability，人与社会是脱节的，社会缺少本该具备的缓冲效果。社会公共生活的必要性，是通过一系列的习惯、风俗、自治条例、宗教规范、不成文规定等等，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形成缓冲。一方面，国家的法律法规不会直接面向个体，而是要谨慎权衡不同社群的利益与价值观，另一方面个人的诉求也不会直接指向国家，而是可以同样在社会层面得到实现，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摩擦在社会的间隔中得到最大程度的缓和。

宁山哀：你怎么确定这种社区是自发形成的，你是站在一个外人的角度，可能这恰恰是身在其中的人渴望脱离的，特别是在一个宗教强势社会，人们不一定有选择的自由。

我：你说的有道理，但比起国家层面的强势，社会层面的强势始终给了人更多的自由选择机会，你可以选择离开故乡，可以加入其他的社群或者教会，而且各个社群之间保持了很高的独立性，社会层面的强势人们总还有逃离的机会，国家层面的强势你很难逃离。即便在宗教强势社会，对于权力所有者来说，宗

教只是为他们的权力稳固提供合法性，他们对于宗教并没有实质的遵从和敬畏，打着宗教旗号的暴君只是更擅长利用宗教，但宗教约束不了暴君自己。



刚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我每天早早出门很晚回到旅馆，旅馆的老板问我来伊斯坦布尔做什么，我说就是来旅行，他问我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匆忙疲惫，我说因为自己太穷了，可能今生只有一次机会来到伊斯坦布尔，所以我要用眼睛和双脚记录下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道。

但是等我在伊斯坦布尔最后几天的时候，我开始尝试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节奏，懒洋洋地吃个悠闲的早餐，在街上随便逛逛，找一个能晒太阳的茶馆坐一下午。这是伊斯坦布尔在厚重的历史遗迹和神圣哀伤的气息之外，给我的一点点悠闲轻松的体验。

我在伊斯坦布尔去的最后一个地方是帕慕克笔下的纯真博物馆，然而却没有开门。我在雨中感到很沮丧，在附近街区逡巡。在纯真博物馆附近的一个小

巷子口，我看到墙边摆着几幅人物肖像画，那种色彩在下雨天空气的朦胧感中，让画上的人表情看起来很怪异，带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忧伤。我朝巷子里望去，两边都是随意摆放的绘画用品，我走进去，尽头是一扇破旧的小门虚掩着，推开门昏暗的灯光中是一间简陋的小屋子。

屋子里有一位老人，他在给三个学生讲绘画，关于毕加索、卡拉瓦乔、莫奈。我以为那位老人是个美术老师，但学生们说他只是个画家，他在一幅送给学生的画作上写道“you come like bird, you left like bird”。老画家让我参观他的画室，他得知我来自中国，给我看了一张他的朋友从中国寄给他的明信片，上面用中文写着海子的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虽然没有去成纯真博物馆，但我似乎在伊斯坦布尔找到了帕慕克书中所怀念的，他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伊斯坦布尔的惊喜与美妙。老画家的画作中，人物的表情复杂扭曲透射着阴霾，就如同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一样。

我不觉得自己真的能体会帕慕克所说的呼愁，脱离了母语语境的情绪只能是一种模仿，当人们刻意让自己感悟，又好像离得更遥远，就像用力去抓飞舞的羽毛总会比让它自然落到手上更困难。在纯真博物馆之外，瑟瑟冬雨中幽深的巷子里，一栋简陋昏暗的小屋子，里面有一位老画家的大海与春暖花开。

尾声

在 1453 年君士坦丁堡改朝换代之后，世界在不断发生晃动，33 年后的 1486 年，迪亚士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39 年后的 1492 年，哥伦布达到巴哈马群岛发现了美洲，44 年后的 1497 年，达伽马绕开奥斯曼人控制的区域到达了印度。只过了半个世纪，双方的力量对比又逆转了。

土耳其人给我的感觉是，他们渴望被欧洲接纳，但不是成为一个泛泛的“欧洲人”，而是要作为一个独立而特殊的群体，是欧洲的土耳其人。当欧盟试图逐渐淡化消除各国之间的差异，形成一个新的“欧洲人”概念时，土耳其则依然沉浸在民族主义当中，希望保留着土耳其人的身份。

在土耳其的最后一晚，我又来到了第一天来的地方，站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和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之间，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我喜欢看历史遗迹，与那些遗迹同时代的人早已消失，这多多少少可以减轻我的孤独，想到和我同时代的他人，也会在以千年为跨度的时间中变为尘土，这是一种基于时间的自欺。时间让人们意识到活着是一件短暂而渺小的事情，宏大叙事反而给了细微敏感的个人情绪一些舒适空间。

在恢宏的历史遗迹面前，我意识到自己的逃避，为什么要来到这座城市，以及再往前追溯为什么要做历史探访写作。我喜欢那些已经逝去的东西，对不断发生改变的新鲜事物充满抗拒，沉浸在陈旧的事物中会让我觉得内心放松。这恐怕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给我最深的慰藉。

伊斯坦布尔的慰藉让我可以浸泡在某种与自己并无关联的往日时光当中，我一直相信人的记忆来自大地、流水和空气，在一个地方出生成长的人，自然就会有这个地方的历史记忆，那些千百年的历史会随着空气中的尘埃进入每一个人的体内，塑造人的意识。这意味着，一个今天出生在伊斯坦布尔的人，他天然就有从拜占庭时期一直到现在的记忆，这是无需学习的。当我来到伊斯坦

布尔，呼吸这里的空气，喝这里的水，吃这里的食物，我就是在把自己的意识与这座城市积蓄的记忆交换，我也成了一个伊斯坦布尔人。



伊斯坦布尔比中国晚了五个小时，每天我醒来的时候，看到的都是朋友们生机盎然的繁荣忙碌，而我在远方享受着一事无成的最后一点时间。我对于大家谈论的各种新的潮流、合作模式和营销手段越来越陌生，一种脑子锈住的困惑，来到这座城市对我算是一种逃离。

每个傍晚我都会来到大桥上待一会儿，我的故乡和我生活的城市都没有海，人们没法投海只能跳楼，无法将自己就此永远藏匿在这座城市，只能砸在人群中，蔓延出一小块丑陋的血红，人们鄙夷地走开，责备你弄脏了街道，吓坏了孩子。虽然我生活的城市没有海，但这种寒冷吹打的感觉，我却一点都不陌生。

中国人对历史有一种特别的崇拜，我们相信有某种抽象的道德会超越时间

而存在，这让人们敬畏自身在历史中的作用和位置，也就是自己为历史创造了什么，又将在历史中以怎样的形象被后人记住。

在伊斯坦布尔，我眼见的那些遗迹无不在验证人作为短暂的生命，他们的追求、喜悦和痛苦是如何被保留下来的，恐怕只有在以千年为单位衡量的地区才会有这样的体验。当人们的记忆在传承中可以被拉的足够长，这便会影响他们对时间、生命与精神世界的看法。也许在这一点上，我找到了伊斯坦布尔和我故乡的联系。

注：伊斯坦布尔之旅写于 2019 年 1 月。



宁山哀：你这次旅行时是在 2019 年年初，应该就是在上一本书里提到的因为出版审查所以被 30 多家出版社拒绝的时候，你当时是在旅行途中知道书无法出版的消息吗，当时是什么感受呢？

我：其实在那之前半年多当中就一直是挫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只不过之前想尽量找出版社出，不用自己花钱，但是找了很多家出版社都没谈成，一个是涉及民族宗教话题，出版社担心不过审，再一个我也不是名人，出版社觉得市场收益不大。

在去伊斯坦布尔之前，我联系了一家出版代理公司，决定花钱买书号出版，当时就想着我自己花钱总可以了吧，结果还是不行，自费也过不了审。这件事在我从伊斯坦布尔回国之后还没完，后来又折腾了大半年，到了 2019 年冬天，彻底断了出版的念头，做了电子版免费下载，算是把这件事情了了。

宁山哀：在上一本书里，我发现你杂糅了很多和主线无关的内容，比如在两段探访旅行之间，你会插入很大篇幅去表达一个文化或者艺术的问题，或者记录你的朋友们的生活，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加进去呢？

我：在决定自费出版之后，我就不需要考虑出版社和大众市场，既然是我自己花钱出书，我面向的就是愿意了解我的人，我写的内容也都是指向我个人的，这是我更想记录下来的部分，我存在于世界上的痕迹。后来自费也出不了变成免费下载，我就可以更放开了，把自己的想法全都加进去，我不需要为了市场而写作，可以纯粹为了我自己愿意记录和保存的内容而写。

宁山哀：但是在这第二本书里，我没看到你写朋友们的事情。

我：因为在上一本书里已经写过了，这两本书的时间线是重叠的，上一本书发布电子版的时候，这本书的四条路线已经基本走完了，所以和朋友们相关的内容都在上一本书里了。

宁山哀：但即便这样，我也没看到你的上一本书里有太多个人情绪，在这本书

里也非常明显，全都是观点的表达。你是没有情绪，还是不愿意在书里流露出来，还是不会表达？

我：我觉得自己情绪表达还挺丰富的，比如到某个地方的感受或者自己的个人生活，我也有很多感性的讲述。

宁山哀：不，我基本读不出你的情绪，你的讲述是对情绪的解读，但不是情绪本身。我感受不到你的激素分泌在波动，情绪是你自己高兴的蹦蹦跳跳尖叫呐喊，但你的表达读起来像是你以旁观者角度去描述别人在蹦蹦跳跳尖叫呐喊，然后分析对方为什么会这样。

我：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系，我不太擅于流露情绪，也可能是不太会感知自己的情绪，因为长时间一个人独居，没有那么多需要表达情绪的场合和机会，自己冲自己宣泄情绪是很内耗的事情，慢慢可能在情绪上就有点麻木了。而且我习惯用文字去表达，时间久了之后，思维就是喜欢去文本式地描述一个东西，而不是更感性地表达，也可能有这样的因素。

宁山哀：这对于创作是不利的，对你自己的精神状态也不利，我觉得你不是那种向往纯粹理性的人，相反你内心有很感性而情绪化的一面，但这一面可能因为长时间没有机会表达和发泄，你把自己压制住了。

我：不存在完美的创作者，每个人都是残缺的，创作表达就是从这个残缺的角度出发，呈现出一个折射后的样子，就像通过一块破碎的玻璃看到斑斓的世界，你觉得这种斑斓本身是否真实呢？我不觉得这对于创作不利，当然也没什么好处，这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情况，如果我没机会发泄情绪进而压制自己，那我的创作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情绪被压制的人的表达，这难道不也是真实存在的吗？

宁山哀：但是你不能把真实作为唯一的追求，你是创作者不是记者，记者追求的是真实客观，因为记者所写的都不是跟他自己相关的事情，但你写的就是你

的生活，你自己视角的的观察和思考，你的写作都是围绕你个人进行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只是背景或者话题而已，表达的核心还是你自己而不是外界，所以你需要不断探索挖掘和释放自己的精神世界，而不是只停留在真实就够了。

我：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呢？

宁山哀：我建议你去有意识地感知和表达自己的情绪，对其他人来说或许不那么重要，但你是个创作者，你也只会干这个，情绪就是会影响你的创作。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主动放弃一些思考，去捕捉自己更直接更瞬间的感受。比如尽量说话而不是写作，语言还是比文字更感性，你也可以尝试性爱，身体表达也是更感性直接的反馈，总之就是你不要把感受的表达延后，延后就会有一个思考的过程，你需要的是不思考直接表达出来。





伊朗西部之旅

当我穿梭在伊斯坦布尔时，隐约感觉在东方有一个影子，从拜占庭帝国到奥斯曼帝国再到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国，东方的影子始终对这里施加着影响，好像是某种磁场，看似无形，但把碎铁屑撒在上面就会显示出痕迹，随着伊斯坦布尔之旅的结束，东方的影子也逐渐勾勒出清晰的轮廓，这个东方的影子就是波斯。

在拜占庭的历史之前，波斯远征希腊，亚历山大东征，双方就此有来有往各自成为了东西方文明的代言人。罗马帝国时期，波斯在罗马和汉朝之间形成贸易和文化的中转。伊斯兰时代直到蒙古征服之后，波斯以输出秩序系统的方式间接管理着多个帝国。

奥斯曼帝国崛起之后，西欧的天主教国家联合土耳其穆斯林对付自己的东正教教友，同时又联合什叶派的波斯牵制逊尼派的奥斯曼，让奥斯曼无力一次击穿西欧。奥斯曼帝国最后陷入一战和民族革命瓦解，波斯的君主却游刃在俄国（苏联）和英国（美国）之间坚持到了 1979 年，接下来就是更激烈的历史开始。

伊朗的当代的神秘感更多是外部观看者的寄托，包括对文明冲突的看法，对伊斯兰教的看法，对革命的看法等等。比起欧美人，伊朗更适合中国人前往，中国人对于东方的问题有更感性的认知，对于革命也更熟悉，很了解革命以及革命之后的异化是怎么一回事，也清楚革命之前的“旧社会”大概会是什么样的状况，这种东方国家在近一两个世纪内的共同命运有所相通。

我竭力不陷入阿扎尔·纳菲西或者马赞·莎塔碧的视角中，不让自己显得像诞生在欧美文化背景里一样。一些中国的媒体工作者精致得像个文明世界来的人，他们审视伊朗的目光如同欧美国家审视中国一样，却忽视了在他们认为

伊朗很糟糕的领域，中国的情况更糟糕，很难想象一个落后国家的人在另一个落后国家面前充满优越感，而这种“落后”却是欧美标准下的。如果我们认同欧美的标准，那么中国与伊朗就是不相伯仲的落后，如果我们不认同欧美的标准，那么就没理由认为中国比伊朗更先进。

一些人如此热爱君主制时代的秩序（当然他们未必真的热爱君主制本身），还热爱他们所认为的曾经拥有的自由，痛恨让他们失去秩序与自由的革命，但更值得思考的是原本的秩序为何不可避免地崩塌。尽管如此我却能理解他们，因为我同样热爱神权统治的秩序，当然我并不热爱神权统治本身，我们所热爱的东西都是在我们给出的概念前加了非常多限定前提的。

短短一个月的旅行不足以窥见一个国家的全貌，我更觉得每一次都是在文本中的内容和亲眼验证的内容之间建立起联系，如果去过的地方多了，也就逐渐建立起自己对世界的观感看法。对于我个人而言，无论是民族和宗教信仰，还是我之前去过的地方、感兴趣的历史，还包括我所处的阶级在当代的困境，伊朗都是不可绕过的一部分。

去伊朗的前一晚，我和妈妈通了个电话，她很担心我在伊朗的安全，尤其知道我要去两伊边境和西北山区。她一直想让我找个旅伴，但找旅伴真是很难的事情，每天高强度的徒步和陌生国家的廉价餐食住宿很容易让人起矛盾。

从北京直达德黑兰有南方航空和马汉航空，前者要在乌鲁木齐经停，到达时间是德黑兰当地深夜，要在机场的酒店过夜，为了省钱我选择了马汉航空的航班，这样一大早到达就可以直接开始城区徒步。马汉航空的餐食难吃至极，而且座椅非常不舒服，飞机上有不少中国人，很多是在伊朗的中资公司打工的，他们兴奋地评价着伊朗空姐的美貌，同时对美国制裁下中资公司的去留感到担忧。

此时我正陷入第一本书出版的困境中，去伊朗也是希望在困境中找些事情

做，打开一些出口。比起我之前的旅行，去伊朗背负着更多的负担，我努力让自己不要带着过多的期待而影响一路的观察和思考。

经过一夜睡不着觉的旅程，我在第二天早上五点多到达德黑兰机场。我去伊朗的时候，伊朗和中国还没有免签协议，但过关非常方便。为了让很多旅客不必担心去了伊朗之后被美国拒签，伊朗的签证是另纸签证，而且海关不会留下出入境章，只在护照封面贴一个小纸条。当然我是无所谓，我已经被美国拒签过一次了，除非美利坚人民共和国总书记亲自邀请我，不然我都不会想要去美国了。



德黑兰·堆满灰尘

德黑兰机场进城的地铁每小时只有一班，我只好搭出租车，到旅馆的时候差不多快早上七点了，因为旅馆中午才能入住，我放下行李就出门逛街了。早上七点的德黑兰，绝大多数店铺都还没开门，此时我饥肠辘辘，漫步在街上找个吃早餐的地方，这边的餐馆营业时间好像都很晚，没有摆早餐摊的习惯。

德黑兰城区显得很破旧，像个败落的前苏联城市，吸引我注意的是满大街的革命风格墙绘，以及随处可见的两伊战争纪念碑。我在德黑兰停留时间并不长，只是作为旅行中转，沿着街道来到德黑兰市中心找到伊朗国家博物馆，博物馆外部很漂亮，但是内部展品摆放很糟糕，而且有我见过的最差劲的打光。相比之下旁边的伊斯兰博物馆倒是惊喜，布展专业，参观的人很少，展品也不乏精品。

我在博物馆旁边吃了第一餐，有一排早餐小亭子，煎蛋大饼香肠酸黄瓜红茶。我到伊朗的时候正好赶上诺鲁孜节的最后几天，博物馆旁边有搭台演出，表演伊朗传统民族乐器和舞蹈。一群当地年轻人穿着白色长褂和黑裤子，有踩高跷的，还有一些黑脸红衣的扮相，据说是模仿琐罗亚斯德教的火工。

这些伊朗人向我打招呼的时候，称呼中国为“chin”，关于这个称呼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说来自“秦”，有的说来自“晋”。我还看过一种观点认为汉朝的时候把罗马称为“大秦”，意思是罗马是一个如秦帝国一样强大的国家，而且黑头发的罗马人和中国人长得也很像，所以在罗马和汉朝之间的地区就记住了“秦”这个象征强国的名字，就把中国称为秦了。

我坐地铁前往伊朗神圣国防博物馆，顺便观察了一下伊朗女人的头巾，在中国的媒体上大多认为伊朗是个严苛的宗教国家，其实并非完全如此。大部分年轻女人的头巾包的很随意，只是把后面的头发住，前面头发都露着，中年人

一般会把头发全盖上但很宽松，只有老年人才会很严密地包住头发。这么看来还是相对挺开放的，也没看到有所谓的宗教警察管理。

德黑兰地铁很便宜，全程票价只有人民币五毛钱，地铁有专门的女士车厢，男人不能进，但普通车厢女人能进。早高峰时，普通车厢人满为患，女士车厢全是座位，还有把脚放座位上靠着。一个男人借了妻子的光进入女士车厢坐着（这是不允许的），他的朋友们发出暧昧的起哄声。

感觉伊朗的女权状况和中国有一点类似，一些报道说伊朗的女权主义者认为设置单独的女士车厢是一种不合适的隔离，呼吁女性乘坐普通车厢。类似在中国，一部分男性觉得女性受到了照顾优待，男性承受了辛苦，而一部分女性会觉得这种照顾优待是贬低女性，是一种不平等。

宁山哀：我就很不喜欢这种所谓的保护女性，“保护”对一个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来说就是一种贬低，无论是政府把老百姓当成保护的对象，还是男人把女人当成保护的对象，都是居高临下的管制。这种保护很显然不是保镖对雇主，而更像是主人对宠物。

我：伊朗地铁这种做法还算是好一点点，毕竟女人可以自由选择女士车厢还是普通车厢，还算是“雇主”的位置上。当然我知道你说的更是广泛的情况，女人没法自由选择是否接受保护，或者男人认为女人没有能力做出正确的选择，这就变成了主人与宠物的关系。

宁山哀：是的，你怎么理解男性的绅士精神呢？因为一些男性会把帮助和保护女性当成是绅士行为，认为是男性该做的。

我：绅士精神虽然表面涉及男性对待女性的态度，但其实和女性并没有关系，完全是男性内部在制定竞争标准，是男性自己决定什么样的行为算绅士，并且

认为绅士是高级的，在男性当中拉开差距。何况，绅士精神的起源是社会阶层而非道德准则，更多时候绅士的标准往往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财富并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具备的，所以我并不认同绅士精神。



我到达神圣国防博物馆，《孤独星球》说早上九点开门，谷歌地图说八点开门，其实十点才开门。我只好先在周围逛逛，神圣国防博物馆附近有一座自然之桥，是一处可以眺望远方的散步景点，可以看到城区北面的雪山，那边有不错的滑雪场。在自然之桥上看德黑兰城区很像乌鲁木齐，同样是能看到雪山的城市，同样是伊斯兰教与革命政权的联系，而且历史比较近代。

快到十点的时候，我坐在博物馆里面等候，买了瓶“无酒精啤酒”，之前别人说味道很奇怪，但我试了觉得很好喝，有一种特别的发酵果香，我坐在弹药箱做的茶几前，喝了一瓶又一瓶。

不得不说神圣国防博物馆内有点惊艳，布展思路也很不错。少部分内容关

于巴列维国王时期迫害民众，后面大部分是讲两伊战争。博物馆内大量运用装置艺术作品，包括展示地雷铺设，还有南部沼泽地带作战情景，游客要走过会动的浮桥，其中一个展厅表现的是萨达姆的悲惨下场，引用了美军逮捕萨达姆的新闻，在这个反美的国家看到美军以敌人的敌人身份出现，也是很有意思。有一处设计很巧妙，模拟的是烈士进入天堂的场景，我走上一座桥，两边显示屏上烈士的照片从地球飞向宇宙，等我走到桥对面，就是烈士进入天堂乐园的情景。

德黑兰大巴扎乏善可陈，也是南城比较贫穷的地方。我去的时候是节日期间，巴扎里的店铺都是不营业的。我试图去探访巴扎附近几个亚美尼亚教堂，然而要么不开门，要么不欢迎参观。我在巴扎旁边吃了午餐，一种当地人热衷向游客推荐的套餐，不到 40 块钱人民币，米饭下面是烤羊肉和烤番茄，撒了一点蔓越莓，上面覆盖了一块很大的用米炸成的金黄色甜品，伊朗人的口味也很奇怪，米配米，主食配主食，味道倒是还可以。这边人好像特别喜欢可口可乐，很多餐馆都没有茶，但是有可乐，却没有无糖的，让不愿摄入过多糖分的我非常无奈。

宁山哀：这没什么奇怪的，煎饼果子不也是主食配主食，还有你可能没吃过南方的糍粑包油条，日本人也喜欢拉面或饺子配米饭吃。

很多游客来到巴扎附近是为了参观古丽斯坦皇宫，然而我对此并无太大兴趣，波斯贵族住所的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室内放置大面积的镜子，或者用镜子制成墙壁和天花板，皇室的穷奢极欲表现在他们对亮晶晶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就像乌鸦一样，浮夸的审美。

下午我去了前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当年的德黑兰人质事件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外墙的反美壁画值得看看，包括最经典的那幅骷髅自由女神画像，大使馆内没看到太激进的东西，主要是当年人质事件的照片，还有间谍设备等等。

德黑兰并不是一座历史很久的城市，却是一座堆满了灰尘的城市。这座城市在成为首都之后见证了无数的阴谋与秘密，这些秘密吸引了外来者猎奇的目光，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人们醉心于讨论当年人质事件背后的种种明争暗斗和背后交易，冷战双方的态度，伊斯兰世界的分歧等等。



这些讨论背后指向 20 世纪这样一个疯狂的世纪，这个世纪以一场大战和若干个帝国灭亡开始，以一场侥幸没有爆发的大战和世界一极的解体告终。人类前所未有地关注人本身，而又蔑视人本身。当人们被需要的时候，他最细微的情绪都会被体察到，他最隐秘的欲望都会得到解放，当人们不被需要的时候，就只是一个数字，用来衡量政党瓜分利益的比例和测试武器的杀伤力。

20 世纪的伟大表现在了两个极端的巅峰，生多少人和死多少人。

在这个疯狂的世纪里，生命被抽象成为理念的一部分，但人们不能拥抱理念，不能亲吻理念，理念是冰冷无情的，理念存在的作用就是消解纯自然的人

性，把自然无序生长的人性变成有组织的力量。20 世纪就是这样一个理念组成的世纪，而我们今天的 21 世纪，则是理念瓦解的世纪。

在我童年 90 年代的时候，世界革命的浪潮已经褪去，但因为距离年代比较近，还有一些痕迹被阅读和讨论，而到了现在，似乎一切已经成为了遥远的历史，人们甚至会怀疑革命是否真的发生过，那些试图改变历史轨迹的人是否真的存在过，在我 30 岁这一年，刚刚过去的 5 年如同过了 100 年。

当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猛然意识到我是出生在上个世纪的人，哦不，我是出生在上个千年的人。

德黑兰巴扎附近有一座博物馆 Ebrat Museum，曾经是巴列维王朝秘密警察使用的监狱，国王在这里监禁、虐待和处决不同政见者。我在里面参观的时候，感觉有点像中国的歌乐山渣滓洞之类的，馆员专门把我叫住，给我一个人播放反映巴列维国王迫害伊朗民众的纪录片，让外国人接受伊朗革命教育。

我还参观了另一座监狱博物馆 Ghasr Museum Garden，这座监狱建于卡扎尔王朝时期，是伊朗第一座现代化监狱。这座监狱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关押并处决了很多政治人士，包括巴列维王朝的第一任司法大臣 Abdolhossein Teymourtash，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也曾经被关押在这里。我注意到有一个囚室，里面摆着曾经关在这间囚室里的人的照片，是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伊朗革命爆发的时候，很多囚犯被解救出来，在监狱中可以看到解放囚犯时的照片。

宁山袁：这个劳伦斯就是《阿拉伯的劳伦斯》里面的劳伦斯吗？

我：就是他，但我没有查到他曾被关押在德黑兰的记录，这座博物馆里也没有关于这段经历的详细记录。

德黑兰北面是富人区，也是巴列维皇宫所在地，现在被改造成博物馆区。

富人区的气氛和南面巴扎区很不一样，虽然德黑兰近些年在西边城郊开辟新的商业区，但城北依然是最贵气的，街头看起来和欧洲城市没什么区别，招牌都是英文的，豪华的商场，人们打扮洋气体面，苹果手机也多了起来，也有一些不戴头巾的女人。

总地来说，我不喜欢这里，与我的阶级属性不相符。

巴列维王宫这片博物馆参观体验很差，参观者要在门口从十几座博物馆中选择自己想去的买票，但这些博物馆开放时间又都是错开的，也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一次通票。我去的时候很多馆都没开，我随意参观了几座就出来去伊朗电影博物馆。

近些年中国人把伊朗电影当成特别文艺的，这是有道理的，伊朗人长得很好看却又有艰难压抑的历史，在伊朗的电影中充满了对自由和传统的反思，这容易激发中国人的共鸣。反过来，以中国文艺受众的现实物质生活水平，你让人们看发达国家的电影，挣钱多还特别自由，天天跑车派对沙滩大美女，看完心里不可能好受。

晚上我在旅馆旁边吃了一顿伊朗传统食物 Dizi，一个罐子里面有羊肉、蔬菜和鹰嘴豆，配上大饼。当地人的吃法有两种，一种是把汤倒在碗里，把里面的菜捣成泥，一边吃菜泥一边用饼蘸着汤汁，或者泡在汤汁里，很像羊肉泡馍。另一种吃法是直接喝汤，然后用饼留着菜泥吃。味道怎么说呢，就是不怎么好吃，但已经算是伊朗食物中相对好吃的了，很奇怪，传统丰饶的波斯人竟然不太会烹饪美食。

我住的地方靠近德黑兰大学，这里有一条街在诺鲁孜节的时候是手工集市，有很多街头摆摊的游戏项目，也有传统的踩高跷表演，和看起来像相声一样的节目，很多小孩子把自己的脸画成狮子的模样，非常可爱，我那满满溢出的成吨的父爱。

在德黑兰我没有停留太久，有人会喜欢德黑兰迷人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来自历史、政治、宗教等多个方面的交错。但在我后面的探访中发现，德黑兰是一座属于国王和富人们的城市，它的繁荣与现代化恰恰意味着和伊朗传统社会的脱节，外人越觉得这座城市迷人，说明这座城市越不能代表伊朗。我深有感触，就像有人以为三里屯、五道口、中关村、国贸就是北京，甚至就是中国一样。他们在中国活了二三十年，对中国的观感却像个来旅游的外国人一样。



伊斯法罕·祖上有半个天下

德黑兰的长途汽车站门口聚集了一堆黑车司机，喊着不同目的地名字，油价便宜而民众收入较低，所以黑车特别流行，随处都可以找到愿意拉乘客赚外快的司机。

从德黑兰坐大巴到伊斯法罕有很多车次，我在伊朗的一个挑战就是，伊朗并不使用阿拉伯数字，而是用波斯数字，在我习惯阅读这种蝌蚪一样的数字之前，花了很多时间确认日期时间和车牌号。伊朗的大巴车服务采用欧式标准，车上有乘务员，为乘客提供饮用水和零食，饮用水放在一个冷藏箱里，但零食过于甜腻了。

有句话说伊斯法罕半天下，但我在伊斯坦布尔已经看过了 78.452% 个天下，很好奇伊斯法罕是如何半天下的。伊斯法罕并不是伊朗西部城市，而是居于中部，但这座城市与伊朗西部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联，伊朗西部的故事最后要汇聚在这里。

在萨非王朝崛起于伊朗西北部的时候，曾经作为塞尔柱王朝都城的伊斯法罕正处于低潮期。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压力给了伊斯法罕再次复苏的机会，萨非王朝将首都从大不里士迁移到稍微靠东的加兹温，在阿巴斯大帝时代又迁到了伊斯法罕。从此首都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对峙，获得了长久的安全，但也让波斯从此不再考虑向西扩张，远离欧陆纷争，成为彻底的东方国家。

以伊斯法罕为核心，萨菲王朝逐渐将波斯过渡为一个以波斯民族为主体、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国教的国家，也就是现代伊朗的基础。可以说伊朗后续的历史，包括直到今天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大多都和萨非王朝有关，这些故事的汇聚就在伊斯法罕。

伊斯法罕的城市结构在伊朗属于比较少数的，伊朗大部分城市很像北京，都是北部比较富裕发达，南部相对贫穷破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首都德黑兰，北部靠近山区的巴列维王朝皇宫附近是富人区，南部巴扎地带则相对贫穷。但伊斯法罕则是南部相对发达，北部相对破旧，这与伊斯法罕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伊斯法罕的北中南三个地区，分别对应着三个历史时期和重要事件。



我的旅馆在伊斯法罕市区北面的聚礼清真寺附近，塞尔柱王朝时期这里曾经是伊斯法罕的城区中心，如今却没落苍凉，成为比较破旧的老城区。比起南面游客聚集的伊玛目广场，北面这座建于 11 世纪的老广场显然十分冷清，除了一些踢球和骑自行车的小孩子，白天基本没有什么人，更加贴近纯粹本地人的生活。

从长途汽车站乘出租车来市中心的旅客大多会落在聚礼清真寺旁边的老广场，我下车之后向四周张望，看到最近的地标是阿里清真寺的宣礼塔，一根砖石高塔屹立在广场西南角。我到达广场时已然接近黄昏时分，宣礼塔被落日的光芒映照成金色，非常显眼。这座宣礼塔虽然并不算华丽，但雕花砖组成的纹饰还是非常精致的，顶端用绿色石条装饰着两个冠状部分。

在阿里清真寺北面还有两座同样是塞尔柱时期的尖塔，一座叫萨尔班尖塔（Sarban Minaret），是伊斯法罕最高的砖塔，之前旁边有一座清真寺，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这座塔下面是砖石基座，往上是用雕花砖装饰的柱子，然后是一个小的绿色冠状部分，再往上还有一个冠状部分到达顶点。

另一座塔的名字叫四十女孩塔（Chehel Dokhtaran），这座塔没有太多的花色装饰，下方基座是四方体，面向小广场的那一面有一扇已经被封死的窗子，这是其他塔上没有的结构，砖塔上面更加简单，没有冠状部分，是完全的圆柱形。我没有查询到“四十女孩”确切的含义，四十应该是个虚数，可能附近曾经有和女性相关的建筑或者故事，难道是阿里巴巴和四十个女大盗吗？（我后来去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有一座四十女孩城堡，在那时候有朋友告诉我，四十女孩这个名字和吉尔吉斯人的民族形成传说有关）。

从两座尖塔返回阿里清真寺的路上，我看到一座带着双尖塔的拱形大门，但旁边没有其他建筑，就这么一扇孤零零的大门，如同进入异次元的入口。这是达尔瓦拉尖塔（Daro AL Ziafe Minaret），建于 14 世纪，大门用青色石条装饰，塔的上方是蓝色冠状部分，不过没有塔尖。



从阿里清真寺方向走出老广场，我穿过老城街区，沿着蜿蜒的小路走向预订的旅馆。这片老城区和北京胡同区有点像，今天北京城的规划始于元大都，元大都、上都和哈拉和林的设计者也黑迭儿丁是个波斯人（也可能是阿拉伯人），也许他的设计思路就来自波斯城市。

蒙古人是看过世界的民族，元大都不只是一座蒙古或者中国城市，而是类似君士坦丁堡一样的世界城市，有汉式的城墙和宫殿群、蒙古式的皇后斡耳朵、尼泊尔建筑师设计的大圣寿万安寺、罗马教廷特使蒙高维诺在皇城北门外修建的天主教堂、各个民族宗教的学院和商旅客栈。元大都的规划是一个有内港的城市，在积水潭东北岸鼓楼后海一带是港口商贸区，由通惠河连接到天津

入海，这是一个多么雄伟的世界大都市，设计者只能是同样有世界视野的波斯人。

我住的旅馆是一座老宅子改造的，进门是一个中间带水池的院子，三面露天摆着床榻，人们在上面倚靠着喝茶抽水烟，这是一个典型的波斯传统庭院。庭院的大门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有两个不同的门环，一个是环形，一个是棍形，老板说因为过去男女有别比较严格，而且没有电铃，所以用不同的门环敲击出不同的声音来代表来客的性别，再决定由男主人还是女主人去开门。

在旅馆安顿好行李，我来到游客聚集热闹的伊玛目广场（Naqsh-e Jahan Square），在萨菲王朝时期，这座广场是帝国都城的中心。伊玛目广场修建于萨菲王朝阿巴斯大帝统治时期，广场建成后周围的建筑在四百多年来基本没有变化。广场不是正方向，而是略向西北-东南方向倾斜，长条形两端还有曾经作为马球场使用时留下的门桩，现在有马车载着游客环绕广场游览。

伊玛目广场东南面是国王清真寺（Masjed-e Shah），清真寺正对着巴扎，另两侧一面是阿里卡普宫（Ali Qapu Palace），一面是谢克罗夫拉清真寺（Sheikh Lotfollah Mosque）。这种设计来自波斯社会权力分布的三股势力，以清真寺为代表的宗教人士，以巴扎为代表的商人-市民阶层，和国王本人的君主权力。

伊玛目广场四周环绕着各种商铺，一个男人过来和我搭讪，告诉我他的姐姐在北京读书，说他很喜欢中国，希望有机会可以去中国。我们聊了一会儿，他邀请我去他的店铺，然后拿出了名片，我看到上面用中文写着藏红花三个字。

伊斯法罕的重商传统非常凸显，广场上经常有小商贩和中国人搭讪，编一段自己和中国的渊源，比如有亲戚在中国留学或者曾经去过中国，然后开始推荐店铺，大部分售卖地毯和藏红花。

这里的商人们都知道中国人喜爱藏红花，相信藏红花有滋补效果，就如同相信其他奇奇怪怪的滋补品一样，愿意为此支付高价。伊朗当地罕见的中文招牌就是藏红花，甚至在这个无法使用信用卡的国家里，藏红花店里可以用支付宝。重商的另一面就是形成了狡猾的商业习气，很多商人喜欢向外国人叫高价，而且不接受讲价，这一点在伊朗很普遍，伊斯法罕尤为严重。

宁山哀：藏红花到底有没有滋补效果，当地人怎么说？

我：我不是很确定，他们看到我的东亚面孔，又知道中国人喜欢藏红花，肯定把这东西往好了说，不一定会告诉我真相。但我自己观察到的，藏红花在当地区是很常见的调味料，做饭会用藏红花泡的水给米饭染色，喝茶也会用藏红花冰糖，应该不是很贵重，而且中国的藏红花绝大多数并不来自伊朗，都是在上海崇明岛种植的。

宁山哀：那就是实际上没有药用和滋补价值是吗？

我：不能完全这么说，如果你相信中医的话，那么藏红花确实是一种有明确记载的中药。但也有这么一种可能，就像枸杞一样，只有特定地区生长的藏红花才有药用效果，其他地方种出来只能当调味品。

我穿过广场走进国王清真寺，镶嵌着蓝青色瓷砖的拱顶如同一座纪念碑，铭刻着萨菲王朝的功绩，用来取代北面旧城区的聚礼清真寺。国王清真寺足足修建了 25 年，直到阿巴斯大帝统治的最后一年，清真寺才竣工，建筑后期为了赶工，墙面没有使用复杂的小块彩陶马赛克镶嵌，而是用了大块的瓷砖。

国王清真寺的正门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为了保证清真寺建筑主体面向麦加方向，但大门又要朝着广场，所以用一个短通道连接大门和主庭院，清真寺相对于正门是斜向的。这样设计的目的是，国王希望广场上的人可以同时看到清真寺的大门和拱顶，如果正门和主庭院在一条线上，拱顶就会被高大的正门挡住，所以把两者错开。

国王清真寺正门还在修缮中，只能从旁边小门进入。我走进主庭院，院内有喷水池和四边雄伟的拱形门廊，主殿天花板蓝色的背景装饰着金色的图案，这座主殿的回音设计非常棒，在中心一个特定位置上，只需要很小的声音就可以产生响亮的中空回音效果，一位女游客在里面高声演唱赞圣，如同天籁之音。

各个殿中都摆着上面雕刻花纹和古兰经的巨大石瓮，应该曾经是用来为来礼拜的人提供饮水。在北京北海公园里有一个忽必烈时代的文物，叫渎山大玉海，是一个盛酒的大瓮，我猜想这个会不会也是波斯人带给蒙古人的。元朝来大都的欧洲人在宫廷里见到渎山大玉海，觉得很惊奇，回到欧洲添油加醋描述一番，所以在欧洲一些绘画中也有这个东西，但欧洲画师们画成了类似喷泉池的样子，大概符合他们对东方式奢华的想象。

然而很可惜的是，国王清真寺现在并没有作为宗教场所使用，也没有妥善作为博物馆保护，就这样一边不紧不慢地施工修复，一边收着门票让人们参观。宗教建筑是不能闲置的，人的精神能量流动凝聚才能保护建筑，让这些建筑能屹立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清真寺比教堂更加需要人气，因为清真寺结构更加开阔，一旦日常不使用，人的精气神很快就会消散掉，建筑也就失去了光泽。国王清真寺瓷砖虽然华丽，但是都显得灰蒙蒙的，这不是修复效果的问题，就是欠缺人聚集的精神力量。



我从国王清真寺出来，面向广场，左右两侧是两座皇家建筑，左边的阿里卡普宫和右边的谢克罗夫拉清真寺。阿里卡普宫是阿巴斯大帝的寝宫，以什叶派崇拜的伊玛目阿里命名，皇宫有柱子支撑起高架阳台，在阳台上可以看到广场全景，眺望到国王清真寺的拱顶，皇宫正殿的墙壁上有大量的绘画和镶嵌图案，但毁坏严重。

伊斯法罕的皇宫建筑除了阿里卡普宫，还有四十柱宫（Chehel Sotun Palace）和八重天宫（Hasht Behesht Palace），四十柱宫是阿巴斯大帝用于接待宾客的宫殿，不过今天能看到的建筑是 18 世纪初大火之后重建的，宫殿外部

还在修复中，正面木头柱子支撑起的阳台下搭建着脚手架。我到的时候赶上诺鲁孜节最后一天，在四十柱宫的庭院内有市集，还有民族文化表演。

我穿过长长的水池和鼻子被摸得黑亮的狮子雕像，走进银色镜面天花板下的宫殿正门，在四十柱宫大厅内有很多壁画，除了中间的两幅绘制于卡扎尔王朝时期之外，其他都是萨菲王朝时期的作品。壁画的内容主要是战争和宫廷宴会，描绘了波斯军队与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一世的战斗、对阵乌兹别克人和印度人的战争场景，以及舞女和乐师欢迎国王凯旋归来。

在阿巴斯大帝统治时期，国家进入了古典波斯之后新的全盛时代，阿巴斯大帝改组了军队，赢得了对乌兹别克人的战斗，夺回圣城马什哈德，又击败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巴格达。他将葡萄牙人赶出巴林，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夺回霍尔木兹，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和平协议划定了今天伊朗西北部与土耳其之间的边界，此外波斯还主动派出使团前往欧洲，与荷兰和英国交好。



在阿里卡普宫对面的谢克罗夫拉清真寺是《孤独星球》伊朗版封面上的建筑，很多摄影师都喜欢在这儿取景，因为有精美的蓝色瓷砖墙壁，然而他们的摄影作品对游客造成了一定的误导，实际上这座清真寺正门并不高，瓷砖墙面也只有正门一块而已，旁边都是砖土墙壁

这座清真寺献给阿巴斯大帝的岳父谢克·罗夫拉，他是一位来自黎巴嫩的学者，负责监管国王清真寺的建设。这座清真寺长期用来给宫廷中的女眷使用，不对公众开放，所以非常低调，没有宣礼塔也没有庭院。我从面向伊玛目广场的正门走进去，经过一条曲折的走廊到达礼拜殿，这种设计在清真寺建筑中是非常少见的。

谢克罗夫拉清真寺的圆顶黄色打底，装饰着蓝白花纹，也不在正门后面，而在靠南一点的位置。在礼拜殿中，墙壁上装饰着复杂的马赛克，阳光透过高处的小窗子透进来，照射在马赛克上产生漂亮的光影效果。

从伊玛目广场继续向南，我走到扎因达鲁德河边（Zayandeh River），有很多座桥跨越这条河，最出名的是三十三孔桥（Si-o-She Bridge）和赫久古桥（Khaju Bridge）。三十三孔桥是这座城市一个游客聚集的地方，人们傍晚的时候来这里乘凉散步，因为河流很浅，可以下河玩水，也有人在靠近河岸的桥洞下面野餐或者抽水烟。

这座大桥同样修建于阿巴斯大帝时期，因为有 33 个拱券而得名，由国王器重的将军阿拉维尔迪·汗（Allahverdi Khan）负责修建，在桥头旁边还有他的雕像。阿拉维尔迪是一个格鲁吉亚基督徒，从奴隶一直做到了军事司令官的位置，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击败了奥斯曼军队。阿拉维尔迪死后，阿巴斯大帝将他埋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目礼萨陵墓旁边。

在三十三孔桥上，两个本地年轻人过来和我搭讪，我们先是聊了一些泛泛无趣的游客话题，然后两个年轻人开始跟我讲起伊朗的社会问题，他们说很向

往巴列维国王时期，现在的政府非常糟糕，人民没有自由，年轻人没有工作也没有钱，每天就健身、打游戏和在街上闲逛，女人也没有自由，必须戴着头巾。不过在我看来，伊朗比我想象的要开放一些，伊朗女人的头巾戴法对比其他国家的穆斯林来说也是比较宽松的，当人们对当下社会不满意的时候，总会很自然地向往前朝的生活，虽然他们并没有真的经历过前朝。

宁山哀：听起来有点像一些中国人怀念民国时候，但好像很少有怀念清朝的，为什么伊朗人会怀念君主制时代，而中国人不怀念君主制呢？

我：这个和社会教育有关，我们今天延续的是中华民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叙事，辛亥革命是被尊崇的法统来源。君主制时代的法统已经结束了，无论现实中是否有所继承，名义上都是必须划清界限的，共产党并不割裂自己早期与国民党的关联，但肯定不会认为自己和满洲统治者有关。今天大概只在影视剧中有一些对清朝的回顾，可能有一些艺术美化，但只是因为清朝离现在比较近素材多观众容易接受而已。

宁山哀：嗯嗯，你只解答了中国人为什么不怀念清朝，可伊朗人为什么怀念巴列维国王？

我：并不是所有伊朗人都怀念国王，我认为真正喜欢国王的是少数人，更多的人只是以此表达对当下政权的不满，他们需要一个对应的象征寄托，那就只有巴列维国王。还要考虑时间的缘故，79年伊斯兰革命，意味着现在的中老年人都出生在巴列维国王时代，年轻人的父母们也都是巴列维时代长大的，他们更容易接受关于前朝的事情。

中国不一样，我祖父一代人出生的时候，大清国已经亡国十几二十年了，即使算上满洲国时代，那也是我父亲出生前十几年的事情，他们没有君主制时代的记忆，所以我这一代人和伊朗同龄人对君主制的感受是不同的。

和奥斯曼帝国一样，萨菲王朝大力重用基督徒，这些基督徒逐渐成为了社会的精英阶层。不同于奥斯曼帝国大量基督徒改宗，波斯境内的基督徒被允许建立自己的小型社区。三十三孔桥的南面就是一个重要的基督徒社区，不过与大桥的格鲁吉亚建造者不同的是，这里居住的基督徒是亚美尼亚人。

不过我决定先回到旅馆，明天一大早再去拜访亚美尼亚教堂。

我的旅馆出来街对面不远就是聚礼清真寺，我回去的时候正好赶上晚礼拜，不知道在当地算是沙目还是胡夫滩。对于中国穆斯林来说，什叶派礼拜相对陌生，不同于逊尼派穆斯林每天礼拜五次，伊朗的什叶派穆斯林每天礼拜三次，但是大致礼拜流程是相似的。我跟随唤礼声，穿过老市场来到聚礼清真寺，这座清真寺修建于塞尔柱王朝时期，后期经过不断重建和扩建，主要的装饰比如瓷砖、柱子和砖刻都是萨菲王朝时期的。

宁山哀：沙目和胡夫滩是什么意思？

我：中国穆斯林使用的一些宗教词汇来自波斯语，比如阿拉伯语称呼礼拜为“萨拉赫” Salah，但中国穆斯林习惯按波斯语称呼为“乃麻子” Namaz，每天五次礼拜的名称也来自波斯语音译，晨礼是邦达，晌礼是撒什尼，晡礼是底格尔，昏礼是沙目，宵礼是胡夫滩。

宁山哀：所以沙目和胡夫滩的时间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你说不知道在当地是什么？

我：沙目指指的是日落之后到黄昏消失，胡夫滩指的是夜晚到第二天黎明。一般清真寺会按照本地日出日落时间制定出一年里固定的礼拜时间，听阿訇呼唤礼拜就可以了，不需要自己判断。但因为沙目的时间段比较短，如果胡夫滩比较靠前，不熟悉当地时间的话就可能混淆。

宁山哀：中国的穆斯林有什叶派吗？

我：中国境内的高山塔吉克族信奉什叶派中的伊斯玛仪派，还有很少一部分维吾尔族（他们只是被识别为维吾尔族，应该叫艾努人）也属于什叶派，但我没有接触过他们。此外回族虽然名义上被认为是逊尼派，但祖先有不少来自波斯和中亚，历史传承中也吸收了很多波斯人的信仰与文化，而且中国穆斯林教派分化很晚，在历史封闭中形成了自身的融合，用教派区分不是很有意义。

我穿过一段走廊走到主庭院，眼前顿时开阔，四周是四个拱形门廊，装饰着精美瓷砖的壁龛，墙壁上的花纹和雕刻的古兰经文被用玻璃保护起来，庭院中心是水池，一面墙上挂着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照片，上方有一个小亭子，是唤礼的地方，这一点设计不同于逊尼派清真寺。

我进入主庭院向前寻找大殿，然而这座清真寺（包括很多伊朗什叶派清真寺）并不是进门正对礼拜殿，而是在侧面的偏门经过一条通道，到达一个不起眼的比较小的屋子里才是礼拜殿，男女各一边，中间隔着一道布帘。在礼拜殿门口，有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一些方形或圆形的砖块，有的上面刻着经文，这是什叶派的礼拜用品，他们在上面叩头（逊尼派直接在地面叩头），烧制这些砖块的土来自什叶派的圣城，比如卡尔巴拉或者纳杰夫。

礼拜结束后，一个穿军装的伊朗人过来跟我打招呼，他问我是不是伊朗人，知道我是中国人后，他说伊朗有些地区的人是我这种长相（我猜他说的可能是靠近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的呼罗珊地区，那边的哈扎拉人是成吉思汗军队的后裔，蒙古人的血统），而且我剪着军人的圆寸发型，又留着胡子，所以他以为我和他一样是休假的伊朗军人。

在伊朗，每个男性公民都要义务服兵役两年，我到伊朗的时候正好赶上诺鲁孜节的最后几天，有军人在休假，所以大街上可以看到穿军装的人。而且那些天伊朗全国范围发洪水，很多军人被临时抽调到各地参与抗洪工作。

我那间旅馆是老房子改造的酒店，布局有点奇怪，一楼只有我住的这一间房，房门推开就是公共餐厅，夜晚的旅馆庭院开放，人们坐在榻上喝茶抽水烟，我坐在榻上腰腿受不了，就找个把椅子坐下来喝茶。伊朗人喝茶习惯用一种藏红花冰糖棒在茶杯里搅拌，讲究一些的会端上来好几种糖，包括白砂糖、方糖块、冰糖棒和姜糖片。

我一边喝茶，一边记录接下来的行程规划，查阅目的地的资料。我以后如果有幸能结婚，希望我的妻子可以送我一份礼物，就是带我走一趟完全不需要我自己思考任何事情、做任何决定、阅读哪怕一个字的旅行。

宁山哀：没准你未来的妻子现在也是这么想的，等结婚之后，你俩就都指望对方做规划，后半辈子别出门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前往新焦勒法（New Jolfa），走过三十三孔桥，这里和北面的街区比起来是不同的街景。我之前在德黑兰拜访了亚美尼亚教堂和亚述天主教堂，遗憾的是德黑兰的希腊东正教堂和俄国东正教堂都关闭了，德黑兰的亚美尼亚教堂更多的是基于伊朗和亚美尼亚的友好关系，是一座旅游景点，我去参加了周日早上的弥撒，只有四五个人。

在萨菲王朝阿巴斯大帝时期，国都迁到伊斯法罕，同时将 15 万亚美尼亚人迁移到这座城市，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工匠和商人，阿巴斯大帝希望他们可以将贸易路线带到伊斯法罕。这些亚美尼亚人的故乡在伊朗和阿塞拜疆边境的焦勒法，所以他们在伊斯法罕居住的这片街区称为新焦勒法。

关于这些亚美尼亚人，要提到萨菲王朝兴起时的一个隐患。萨菲王朝发源自伊朗西北部地区，一开始是苏菲教团武装兄弟会起家，军队主力是突厥游牧部落齐齐尔巴什（Qizilbash），在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战斗中，这些游牧部落与正规军队作战暴露出很多问题。在萨菲王朝第二位国王赫塔马斯普一世

（Tahmasp I）期间，开始大量重用本国波斯人，这就在两个群体之间形成了矛盾。

在阿巴斯大帝时代，不但将国都移到了伊朗高原腹地，同时迁来大量的切尔克斯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形成突厥人和波斯人之外的第三阶层，以此来平衡社会结构。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上面提到的 33 孔桥的修建者——格鲁吉亚人阿拉维尔迪被任命为军事长官。在这之后，很多失势的齐齐尔巴什军人前往喀布尔和坎大哈，还有一些去了莫卧儿皇帝的宫廷，这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我赶早来到焦勒法街区的中心建筑旺克大教堂（Vank Cathedral），本来想看看能不能赶上周日上午的弥撒。但教堂管理人告诉我九点才开放，而且并没有弥撒仪式，这座教堂已经被改造为旅游景点，不再具有宗教功能（也可能宗教功能不对外，只对本社区的亚美尼亚人开放）。

等待开门的时候，我转了转教堂前的小广场，有一些售卖纪念品的店铺，广场中间是一座塑像，一个穿着教士斗篷的男人手里拿着两本书，旁边的石头上雕刻着一台机器。这座雕像是一位叫 Khachatur Kesaratsi 的主教，他制造了波斯第一台印刷机，在这片街区开设印刷作坊印制宗教书籍，这也是新焦勒法以亚美尼亚工匠为代表的社区象征。

旺克大教堂从外观看起来巨大的圆形拱顶和拱门更像是一座清真寺，正面的钟楼则有传统教堂的形态。正门在钟楼下方，正门上面有一幅画绘制着教堂的样式，写着 1606 的数字，这是亚美尼亚人来到这座城市的年份。旺克大教堂也叫圣救世主大教堂，Vank 在亚美尼亚语中是修道院的意思。

我走进教堂，院子的地面上铺着墓碑，教堂外墙一圈也有墓碑，在庭院的一个角落有一座亚美尼亚大屠杀纪念碑，院子里有另一座高大的独立钟楼，钟楼的旁边就是教堂的入口。教堂外表并不出众，土黄色的砖墙而已，但进入其中，我马上被震撼了。教堂室内装饰着精美的壁画，金光闪闪，在中央圆顶绘制了创世纪的故事，四周壁画一部分是耶稣的生平事迹和天堂的场景，拱顶下的角落里绘制着六翼天使，另一部分则是亚美尼亚的圣徒们和他们被奥斯曼帝国压迫的历史。在教堂外墙也有一些壁画，但斑驳严重，只有少量残留，被用玻璃保护起来。

除了教堂本身，庭院内还有一个历史博物馆，介绍新焦勒法和亚美尼亚移民历史。博物馆门口有两座雕像，一座是刚才在教堂门前广场看到的，带来印刷机的 Khachatur Kesaratsi 主教，另一位叫 Mesrop Mashtots，他发明了亚美尼亚字母表。博物馆里面展示了很多珍贵的手抄本书籍和宗教圣器，有伊朗最早的印刷机、教堂曾经的装饰瓷砖和绘画，还有一些萨菲王朝时期保护亚美尼亚人宗教和财产的法令。

我从旺克大教堂走出来几百米，路过年代更早但并不开放的圣乔治教堂（Saint George Armenian Church），找到第三座亚美尼亚教堂——圣伯利恒教

堂（Saint Bethlehem Church）。圣伯利恒教堂外观看起来很朴素，同样是很像清真寺的拱形门，里面却有非常精美的壁画，而且没有多少游客来参观，因为维护原因里面用脚手架支撑着。

这座教堂内有 72 幅绘画作品，讲述了耶稣的一生，教堂门口的亚美尼亚铭文值得一看，这些文字纪念的是这座教堂的捐赠者——亚美尼亚商人 Khaje Petros。铭文上面写着：在上帝面前为 Khaje Petros 祷告，他是一个好人，他用个人财产修建了这座教堂，纪念他的名字和他父母的名字以及他家族的名字，落款时间是 1077 年。这里的 1077 年是亚美尼亚历法，对应公历的 1627 年。

来新焦勒法的游客很多，本地的年轻人也会被吸引到这里，因为这片街区有更加精致的咖啡馆，在这儿吃一顿早午餐喝杯茶是不错的选择，伊斯法罕本地人来这里有点像中国城市人们去少数民族街区找好吃的一样。我尝试了一种焦勒法的传统点心，有点像中国苏式糕点那种酥皮，我一边吃着亚美尼亚点心，一边回顾了亚美尼亚人的全球移民史。

亚美尼亚人的移民历史很独特，他们的贸易网跟随移民遍布世界。早在波斯和罗马对峙的时代，亚美尼亚人就在两个帝国同时担任雇佣兵，这些雇佣兵团体又随着军事行动逐步建立起商路贸易（想起长者教诲：军队一律不准经商）。阿拉伯帝国建立后，由于阿拉伯人并不强制大规模改宗，所以亚美尼亚人以基督徒有经人的身份沿着阿拉伯人的军事征服路线继续进行贸易。这些亚美尼亚人背井离乡，将贸易点建立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巴士拉等重要城市。

之后蒙古人崛起，亚美尼亚人积极成为世界新秩序的参与者，借助蒙古帝国内的便利，他们将商业贸易路线向东方拓展，到了哈拉和林、元大都、扬州、杭州、泉州等地，广州和泉州到波斯湾的往返船队成为稳定的贸易路线。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亚美尼亚期间，虽然表面上对亚美尼亚人没有限制，但帝国的商业核心方向在地中海地区，比起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君主更加倚重希腊商团和地中海西部的基督徒投诚者，同时犹太人从欧洲来到奥斯曼帝国开始参与竞争。亚美尼亚人只好继续向世界进发，沿着葡萄牙人开辟的新航路将商业推进到马六甲和澳门。当英国帮助波斯夺回了霍尔木兹之后，亚美尼亚商人便进行着从里海跨越整个国家到波斯湾的生意。同时亚美尼亚人在北方获得了俄皇的贸易许可，经营着从诺夫哥罗德经过汉萨同盟一直到阿姆斯特丹的生意。

宁山哀：在更东方有亚美尼亚移民吗？

我：在东南亚有一些，主要是随着英国殖民开辟的贸易，比如新加坡的莱佛士酒店和仰光的斯特兰德酒店都是亚美尼亚移民创立的，创始人是沙奇士兄弟，正好就来自伊斯法罕，还有《海峡时报》的创办者也是亚美尼亚人。我前面去槟城也提到，那里的基督徒墓地中有一些亚美尼亚人的坟墓，槟城的东方大酒店和升旗山克拉克酒店也是沙奇士兄弟经营的。

宁山哀：在中国有亚美尼亚移民吗？

我：民国时期有一些，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愿意接纳被土耳其迫害的亚美尼亚人，上海和哈尔滨有不少亚美尼亚移民，但我不确定现在还有什么遗迹保留下来。再就是香港，香港有一条遮打道，遮打爵士（Sir Catchick Paul Chater）是来自印度的亚美尼亚移民。

短暂休息之后，街区另一边的音乐博物馆是个好去处，里面展示了伊朗各个地方的乐器，现场有音乐家进行表演。最值得欣赏的是来自呼罗珊地区的都塔尔和唢呐，呼罗珊的都塔尔与新疆的都塔尔一脉相承，唢呐也正是从波斯传入中国，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一部分，中国民乐在演变中吸收了很多“胡乐”的乐器和曲子。

伊斯法罕是一座传说中的城市，每天深夜我穿梭在幽暗的小巷子里，去感受

知这座城市传说的沉积。城市不是由建筑组成的，而是由传说组成的，一个事件发生并不意味着天然成为确定的历史，而是要经过人的记录。这些记录附着精神力量不断扭曲和修正历史，只有被人们讲述口口相传的才是真实发生过的，不是历史决定了人们的诉说，而是诉说决定了哪些才能被称为历史。

伊斯法罕整体有一种繁华中的荒凉，建筑和女人都美得灰头土脸的，波斯的审美在我看来又有些浮夸，让我总想起逃难热河的西太后。这或许来自过去几十年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但我总觉得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导致的，而是精神气质决定的。伊斯法罕是波斯的荣光，但我要追溯这个荣光的过去，这引领我走到伊朗西部。

我的下一站不是萨菲王朝起家的西北部，而是西南部胡泽斯坦，那里一部分是传说中的历史，一部分是塑造伊朗当代新历史叙事的两伊战争。

但是在此之前，我要先去一趟亚兹德。亚兹德在我的伊朗之旅中是单独的一站，因为这次旅行主要是关于伊朗西部地区历史文化的探访，亚兹德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中部（亚兹德有一座钟楼据说是伊朗的最中心点），历史文化和我要去的其他地方关联也不大，顺路前往只为了纯玩。

宁山哀：你在文章里提到一些礼拜用的石头来自圣城卡尔巴拉和纳杰夫，伊斯兰教圣城不是只有麦加和麦地那吗？

我：全世界穆斯林的圣城有三座，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除此之外什叶派有一些被尊崇的圣城，一般是重要宗教人物的陵墓，比如纳杰夫是伊斯兰教第四位哈里发同时也是穆圣的女婿阿里的安葬地，卡尔巴拉是阿里的儿子侯赛因的安葬地，他们父子俩的身份与遇难是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来源之一。伊朗国内也有两座圣城马什哈德和库姆，分别安葬着什叶派的第八位伊玛目礼萨和他的妹妹法蒂玛，在阿巴斯大帝时期大力兴修这两座波斯国内的圣城，为了让人们少去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朝圣。

亚兹德·琐罗亚斯德

我从伊斯法罕坐大巴车来到亚兹德，路上几个小时窗外都是荒漠，偶尔远处能看到灰色的山。外出旅行探访每天都在徒步，所以我喜欢坐长途巴士，车上可以休息一下，阅读接下来目的地的资料，制定后面的行程安排。

我的伊朗朋友已经提前帮我预订了一家老城区里的民宿，我沿着狭窄的老城巷子找到这户人家。店主是一对夫妻，男主人不常出现也不太懂英语，主要是女主人负责接待客人。她是个很有趣的女人，民宿里面的一切设施都是她打理的，在我看来她的说话表情和行为举止都过于夸张了，当然也许经营旅馆的人都是这样的性格，我那些做民宿的朋友也大抵相似。

我之前外出旅行几乎从不会住民宿或者青旅，因为我对住陌生人家里比较排斥，也不喜欢陌生人社交，为了减少交流，我都是尽量住普通旅馆的单人间。这次住民宿是因为亚兹德本身就是个老城，如果想靠近市中心，除了民宿也没有太好的选择。

这户人家在巷子尽头一个小门里，进门之后是一个特别大的院子，院子上面覆盖着可以透光的厚网，这样有光照又可以遮挡沙漠地区的暴晒。靠近门的一边像是个舞台一样的平台，上面铺着毯子算是日常起居的地方，店主和其他客人就坐在上面办公吃喝。

院子里有小水池，还有几张床榻，不过这种床榻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舒服，因为没有高靠背，腿也不能自然下垂，习惯坐沙发的人在上面会觉得疲惫，尤其是不习惯盘腿坐，只能完全把腿放直在床榻上，坐久了有种老虎凳的感觉。

女主人把我带进了一间很大的房间，里面有四张单人床，除此之外就什么

家具都没有了。我怀疑她搞错了，因为我的伊朗朋友告诉我预定的是单人间。女主人说没错，这个房间就是我自己的。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民宿没有单人间，都是多人间，女主人告诉我一般都是家庭或者朋友结伴来住，很少接待单独旅行的客人。



我安顿好行李已经快傍晚了，走出巷子逛逛。亚兹德的老城区有点类似喀什的高台民居，但不像喀什出于旅游发展和维稳监控的目的进行拆除改造，亚兹德老城的居民区部分基本保存完整，改造的部分集中在中心商业街附近。

从居民区走出来，我来到亚兹德城里最热闹的一片广场。乔赫马克清真寺（Amir Chakhmap Complex）是这座城市的中心，在很远处就能看到清真寺的宣礼塔，这座清真寺是帖木儿帝国时期修建的，乔赫马克是当时亚兹德的统治者，清真寺旁边是巴扎和商队旅馆聚集的市镇中心。

我走到清真寺所在的广场上，隔着一长条喷泉水池，这座建筑更像是纪念

碑或者世界奇观，它的两座宣礼塔有点过高了，看起来像下方建筑的天线，建筑主体是三层壁龛一样的结构，用青色彩砖装饰成花纹。

傍晚的时候，广场上聚集了很多，附近的小贩也开始营业，生意最火的是卖冰淇淋和冷饮的摊子。我走进清真寺，在墙边一角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木架子，形状有点像果核。这个木架子叫作 Nakh1 Gardani，象征着殉难的侯赛因的棺木，Nakh1 直译是枣椰树，据说侯赛因殉难后，他的遗体被用枣椰树的树枝包裹，也有说是因为他最后死在一棵枣椰树下。

在亚兹德，Nakh1 Gardani 被赋予了社区团结的象征含义。阿舒拉节的时候，什叶派穆斯林会在上面蒙上写有古兰经经文的黑布，抬着它在广场上举行仪式。在广场旁边的一个地下水窖的通道里，可以看到之前游行时的照片，不过近些年由于安全问题，这种仪式规模越来越小，仅仅是装饰不再移动。

宁山哀：这个殉难的侯赛因，是不是你前面提过的阿里的儿子侯赛因？

我：是的，他就是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儿子，也是穆圣的外孙。侯赛因拒绝承认叶齐德一世为哈里发，双方在卡尔巴拉发生交战，侯赛因战死，这也是什叶派和逊尼派决裂的标志，侯赛因的殉难日就是什叶派的阿舒拉节。

宁山哀：阿里只有这一个孩子吗？

我：阿里有很多个子女，但不是同一个母亲生的，阿里和穆圣的女儿法蒂玛有四个孩子，比较著名的是长子哈桑和次子侯赛因，阿里死后哈桑被迫放弃哈里发继承权，哈桑死后侯赛因就是家族领袖。



在广场上有一个绿色的台子，上面有八块白色的刻字石板，当地人围着它走，用手触摸每块石板。我看不懂波斯文，感觉应该是八个伊玛目或者谢赫的墓碑。询问了当地人，他们说这是纪念牺牲的烈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还在参与海外作战，还有人员牺牲。

晚上回到民宿，院子里人多了起来，女主人敲着手鼓唱歌，大家在跳舞。白天和女主人因为换汇的问题没沟通清楚，晚上她带了一个女人来找我，这个女人英语非常流利，顺利解决了问题。

这个女人叫玛丽，是来自马什哈德的一个中学英语老师，在亚兹德休假住在这间民宿中。我不太能猜得到她的年龄，如果不是重体力劳动者，手部皮肤大概可以显示一个人真实的年龄，看她的手大概接近五十岁，但她的气质也就三十来岁。她说自己去过中国，她的丈夫是一个船舶工程师，之前在上海短暂工作，她跟丈夫在中国旅行过一次。她在亚兹德有一个朋友，一个很有趣的男人，高高瘦瘦很黑，我猜他至少有四十岁，但其实他比我还小两岁。

这个女人询问我的行程，得知我要去拜访亚兹德的琐罗亚斯德教遗迹，她说正好他们也想去，可以第二天开车一起。这时候我有点犹豫，因为我比较排斥和陌生人同车，还是和两个外国人，尤其我们要去的地方又是在山里。不过我又考虑了一下，我的伊朗朋友知道我住在这间民宿，我有中国朋友认识那个伊朗朋友，民宿老板知道这个女人，我们的证件都有登记。也就是如果中间出了意外是有线索可以追溯的，我就答应了。

第二天早餐之后我们一起出发，同行的还有女主人的儿子，一个 12 岁的男孩，长得很秀气。这让我放心了很多，能让自家的小孩子同行，说明民宿主人对他们很信任，那就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路上很有春游的感觉，车里放着音乐，那个男人一边开车一边唱歌，女主人的儿子倒是有点害羞。

宁山哀：你是多么没有安全感，警惕性这么高。

我：你看到的安全背后都是警觉，外国游客身上现金多，我又是一个人旅行，不懂波斯语，英语也说不明白，跟陌生人开车进山，我都不知道他们真名叫啥，人家把钱抢了把我扔路边都是轻的，到山里把我弄死再回旅馆取走行李，谁会知道？安全感来自你遇到危险有没有反制能力，在国内你觉得安全，因为摄像头多、整体治安情况好、你在本地有亲戚朋友，你和警察能沟通清楚，重要的是你在本国环境里更容易判断风险，你识别中国人的语气神态都比识别外国人更容易。

宁山哀：就算从你说的角度出发，首先你去的是一个并不敌视华人的国家，伊朗治安相对不错，没有突出的侵犯旅行者的记录，而且你去的不是偏远地区，亚兹德是个旅游胜地，外国游客多的地方相对更安全，因为警察会更关注，虽然可能会有盗窃和诈骗，但暴力犯罪会比较少，也就是你所警惕的前提是不存在的，不需要在这种发生几率很小的事情上耗费精力。

我：我并没有耗费太多精力，我只是事后整理出自己当时的思路，当时是非常短的时间做出了判断，这是一种基于经验的本能。



在荒漠中开了一个多小时之后进入山区，就快到我们的目的地——恰克恰克村（Chak Chak）。这个村子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一个圣地，波斯萨珊王朝末代君主伊嗣埃三世（Yazdegerd III）的二女儿 Nikbanou 被阿拉伯军队追赶到这里，公主向琐罗亚斯德教的神阿胡拉·玛兹达祈祷，大山打开了，公主逃入山中，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村子的名字恰克恰克是泉水滴落的声音，这泉水就

是公主的眼泪，在泉眼旁边有一颗大树是公主的手杖。

我们沿着台阶上山，说实话这个圣地多少有点让我想起国内的旅游景点，大部分建筑都是现代建造的，而且非常简易。进入洞穴要光脚，我走进去发现洞穴其实很小，洞顶不时有水滴下来，洞穴的一角点燃着火苗，一边墙旁有一个书架，上面是关于琐罗亚斯德教的书籍，在洞穴的上方还有一些画像。

这是个历史故事大于实际观感的地方。我们离开恰克恰克村，前往和琐罗亚斯德教有关的下一个地点——沉默塔（Dakhma）。

琐罗亚斯德教的墓葬方式是天葬，他们认为死者是不纯洁的，不能污染纯洁的火焰，也不能进入大地，所以要让鸟吃掉尸体，葬礼地点就在沉默塔中。亚兹德现在的沉默塔已经不再用于宗教用途，被开放为旅游景点。一方面是来自穆斯林的压力，在伊斯兰教中这是一种亵渎尸体的行为；另一方面是城市化的扩张，很多原本远离城区的沉默塔已经处在城区边缘或者在城区中，卫生条件不再适合进行天葬。再就是一部分教徒观念也在转变，现在已经接受了土葬，但在墓穴中垫上砖石同时用水泥抹灰，让尸体不会接触到泥土，这也是一种不违背教义要求的妥协。

沉默塔在远处看很低矮，有一条长长的台阶坡道像个祭坛，但走上去还是有点费力的。我走到塔身上，从一道小门进入沉默塔内部。这座塔里面其实更像一个土台，最上面是一个围起来的圆形平台，上面铺着一圈圈石砖，呈现同心圆的样子，中心是一处凹陷。

在琐罗亚斯德教的天葬中，沉默塔最外面一圈是男人的尸体，中间一圈是女人的尸体，最里面是儿童的尸体，凹陷处是鸟类吃完尸体之后放置骨头的地方，那些骨头被打碎后混合石灰安置在这里。



亚兹德的沉默塔有两座，一座游客非常多，旁边的另一座几乎没有人上去，道路铺设也不好，我和民宿女主人的儿子登了上去，两座沉默塔的结构是一样的，没人的那座小一些。那个男孩跳进平台中间的凹陷处，告诉我里面很臭，我说那里面以前是放死人的，小伙子一下被吓到了。

我之前在塔什库尔干见过琐罗亚斯德教的墓葬遗址，在山上一个个小泥土凹陷，虽然没有建筑，但样式形态很像，我不确定这两者间是什么关联。

从沉默塔出来回到市区，我要去拜访关于琐罗亚斯德教的最后一个地点——火神庙。但其实在经历了上面两个地方之后，我大概已经知道琐罗亚斯德教在伊朗基本上是一个吉祥物的位置，类似我国的道教。

到了火神庙之后，果然如我所想是个非常纯粹的旅游景点。不过如果当成一个博物馆而不是宗教场所，倒还是很有很多东西可看。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打扮和回民很像，都是戴着小白帽，进门的时候让我恍惚了一下。看他们举行仪

式的照片，戴着白帽一袭白衣，双手手掌向上，非常像回民。

在火神庙里，我隔着窗子看到里面燃烧的圣火，一个给圣火加炭的老爷子带着口罩，因为不能让不洁的呼吸接触圣火，后来我在撒马尔罕的一个壁画遗址中看到了这种着装的画面。

宁山哀：《倚天屠龙记》里面的明教就是琐罗亚斯德教吧，也有波斯圣火。

我：《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是摩尼教，摩尼教也源于波斯，是创始人摩尼将琐罗亚斯德教吸收基督教和佛教的一些教义之后建立的新宗教。但在金庸的小说里，他将摩尼教和琐罗亚斯德教混合了，书中的明教同时有这两种宗教的特征。

再一个就是，金庸书中的明教和真实历史中元末明初农民起义中的明教也不一样，历史中的明教是弥勒教，也就是白莲教，是佛教的一支，信仰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来自早期印度-伊朗宗教系统中的密特拉崇拜，琐罗亚斯德教也吸收了密特拉崇拜，所以琐罗亚斯德教、金庸小说里的明教、历史中的明教三者有关联但并不是同一个。

宁山哀：琐罗亚斯德教是崇拜圣火还是崇拜火神呢？

我：都不是，虽然琐罗亚斯德教被称为拜火教，但他们并不崇拜火本身，而是认为火象征神的纯净与至善，他们在有火的环境中祈祷。琐罗亚斯德教崇拜的是光明之神，也是造物主阿胡拉·马兹达。

参观完火神庙，离晚餐还有一点时间，我回到老城区，之前在土耳其旅行的时候顿顿都要喝茶，和在家无甚差别。到了伊朗，发现本地人更酷爱甜品，街边茶馆并不多见，这几天喝了些含糖饮料很不舒服，专门找个酒店里的餐厅喝壶茶缓一缓。这家餐厅在介绍中是印度菜，但是茶具却是中国搪瓷风格，在餐厅里可以看到亚兹德老城区所有的屋顶。



伊朗菜不怎么好吃，虽然食材还不错，但当地人不怎么会做饭，烤肉水平比土耳其差了一截，偏西式一点的菜肴也不太好吃。可能唯一称道的就是藏红花米饭看着比较好看，但藏红花只有颜色没有味道，当地的大米和我故乡满洲的大米也不一样，口感不习惯。

傍晚，聚礼清真寺响起了唤礼声，大家开始进入清真寺。这座清真寺是亚兹德最古老的清真寺，清真寺的两座尖塔比乔赫马克清真寺的尖塔还要高，是伊朗最高的宣礼塔。清真寺内有很多精美的瓷砖装饰，在院子里有一个向下的通道，下面是个水井，在亚兹德这是常见的设计，通过在建筑下方设置水井的方式产生水冷效果给建筑降温，整个城市里很多这种地下水冷装置。

之前在伊斯法罕逛巴扎的时候，我感慨在这个国家里找不到三个不宰外国人的商人，所有的商人都油滑贪婪得让人厌恶。但是在亚兹德巴扎，商人们更真诚一些，商品的要价比较符合我的心理预期，我在一家旧货店买了两个公羊形状的油灯和一个木雕水烟嘴，同样的物件在伊斯法罕开价几乎是十倍。

亚兹德的旅行结束后我要前往胡泽斯坦，如果说在亚兹德的旅行有什么惊喜，大概就是尝试了一次在国外与陌生人一起玩，尽管只有半天时间，但对我这种性格的人也是挺不容易了。他们确实是很不错的人，在我要离开的时候，他们一起送我去长途巴士站，我向他们赠送了正山小种红茶作为礼物。

但如果说从此之后我就会很放开地和陌生人一起玩，住青旅、搭车、搭讪、和陌生人结伴而行，那显然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的旅途恐怕注定是一个

人。

宁山哀：你总说自己孤独，但我感觉其实你特别享受一个人。

我：你的感觉错了，我一点儿都不享受。

宁山哀：但你好像从来不试图改变。

我：我改变不了，就像生病一样，你不能因为治不好就说这人享受得病。

宁山哀：一个人意味着你是开放的状态，你可以自由地选择与被选择，而不需要回避和抗拒诱惑，这不好吗？

我：这种开放是我并不需要的自由。

我乘坐大巴从亚兹德向西南前行，前往靠近两伊边境的胡泽斯坦省，本来坐一夜大巴早上7点左右就可以到阿瓦士，结果车坏在了路上，我们在一个休息站等了4、5个小时。夜里沙漠地区温度很低，我们看着一辆辆车到来，一批批人下车吃饭然后离开，只有我们的车在这里等待替换零件。

休息站的食物种类非常少，到了深夜只有米饭配鸡肉和可乐，好在大巴上有免费的矿泉水，让我不至于喝那些含糖饮料。坐在我隔壁的是一大家子人，我邻座是个小萝莉，小萝莉睡得呼呼的，把脚搭在我的腿上，泛起我那无处安置的浓浓父爱。

我们的车进入胡泽斯坦之后，窗外的地貌也从高原山地变成了沙漠平原，

温度也越来越高。由于洪水的缘故，车辆通行并不顺畅，有的路段可以看到临时堆砌的堤坝，堤坝后面是被淹没的农田和房屋。在伊朗期间，每天看新闻都在讲述伊朗军民抗击洪水的事迹，这一幕中国人会很熟悉，让我想起本山的“九八九八不得了”。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



霍拉姆沙赫尔、阿巴丹：战争与革命之火

阿瓦士这座工业城市并没有太多内容可看，我安顿好行李就马上前往两伊边境的霍拉姆沙赫尔和阿巴丹。我在阿瓦士找了一个司机，他叫阿巴斯，和我喜欢的一个伊朗导演同名。阿巴斯是一个老师，脸上总带着和善的笑容，在伊朗很多人为了养家都要做好几份工作，很多店铺下午都有歇业时间，或者晚上不营业，允许员工去做别的兼职。

阿巴斯的车非常破旧，如果在中国大概是最糟糕的出租车的水平，在伊朗虽然油价便宜，但由于经济困境，普通人买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在说什么呢，中国普通人买车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除了近些年中国汽车进入市场之外，廉价的本国汽车还是很多人的选择，可以开上二三十年。

从阿瓦士开车前往霍拉姆沙赫尔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霍拉姆沙赫尔是两伊战争的前线，也是战争最先打响的地方，今天伊朗-伊拉克口岸设在这里，从霍拉姆沙赫尔过关再开半个多小时，就到达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

在两伊战争之前，这里由于石油工业而被建设的非常现代化。按照奥斯曼帝国和萨菲波斯之间的边境条约，阿拉伯河是两国的边界，伊拉克独立后与伊朗之间围绕阿拉伯河的归属发生矛盾，直到 1975 年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调解下，萨达姆和巴列维国王在阿尔及尔参加欧佩克会议时达成了边境协议。1980 年 9 月 17 日，萨达姆宣布阿尔及尔协议无效，几天后两伊战争开始。

战争在 9 月 22 日下午爆发，霍拉姆沙赫尔成了最激烈的战场。萨达姆预想的胡泽斯坦阿拉伯人起义并没有发生，城内大量的市民和民兵站在了伊朗政府一边，抵抗伊拉克军队的入侵。虽然缺少装甲部队和空中掩护，但巷战依然把伊拉克军队拖到了 11 月 10 日才占领这座城市，两年后伊朗军队收复了这里。

我们开车沿着边境公路前行，靠近河边的地区都是当年战争遗留下来的房屋废墟，至今没有被清理掉，而是作为爱国教育场所。我们到达边境关口，关闸士兵告诉我们从一个岔路向北开就能到战争纪念馆。当年的河道已经干涸，散布着被摧毁的坦克残骸和防步兵障碍，两伊战争中伊拉克军队在沼泽地带使用了化学武器，战后为了惩罚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又彻底破坏了沼泽湿地，所以这里的生态问题非常恶劣。



穿过坦克残骸和壕沟，我走进战争纪念馆（Mosque of Shohada-e-Shalamcheh）。这座纪念馆也是一座清真寺，内部装饰着战壕坑道模样的演讲台，中间有一座绿色的墓，里面有烈士用过的武器和假肢。在伊朗各地都有两伊战争的纪念物，城市中每个街区都有一小块纪念碑，纪念曾经生活在这片街区的烈士，很多清真寺里也悬挂着烈士的照片。

战争纪念馆里有一些参观者，阿巴斯向他们介绍我是从中国来的，他们热情地拉上我拍照，我有点担心他们会问我中国人支持两伊哪一方的问题，毕竟

中国政府曾经在两伊战争中同时向双方出售武器，两头押宝通常是不太受欢迎的。

两伊战争对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的历史叙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革命之后，旧的矛盾必须被迅速忘却，国家需要被新的凝聚力塑造起来，没有什么比一场残酷的对外战争更合适，在战争中国内的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都可以暂时被搁置。这场战争给伊朗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一代青壮年牺牲，工业受到沉重打击，霍梅尼也在战后不久去世。

但这场战争也在革命后把社会迅速重组起来完成新的历史叙事建构，革命卫队和民兵组织建立起成熟的战斗力，革命之后替代前朝的政治体系也在战争的历练下被证明是有效的，在战争中积累了丰富政治和军事经验的哈梅内伊，也在霍梅尼去世后顺利接任最高领袖。

从这一点上讲，两伊战争对于伊朗如同朝鲜战争对于中国，新政权需要一次胜利，哪怕是惨胜，也要证明政权足够坚固可以被民众信任。革命政权就是要创造新的叙事，残酷与血腥被描述成光荣与伟大，在被塑造的外敌面前必须有且只能有一个强力的领导者。

我在伊朗街头看到了在中国已经被淡忘和淹没许久的叙事，中国已经从革命战争叙事中逐渐走出来，执政者不再需要革命战争赋予的合法性，而可以通过更温和的经济发展维持威权统治，甚至不需要经济发展很好，只需要依靠统治惯性就可以维持基本平稳。但伊朗由于长期被制裁，政府直到今天依然需要革命战争带来的执政合法性，还在吃当年的红利。

宁山哀：那你觉得中国现在执政合法性的来源是什么？

我：在中国执政不需要合法，中国人的适应性很强，一旦习惯了，除非特别惨，一般不会有激烈的反应，但真要等到特别惨的时候，有反应也没用了。

离开霍拉姆沙赫尔，我们来到两伊边境另一座城市阿巴丹，这座城市今天成为两伊战争痛苦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在 19 世纪到 20 世纪之间，阿巴丹是中东地区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城市之一。



阿巴丹最早是一个主要生产盐和编制品的小村子，1908 年这里发现了丰富的油田，英国石油公司从 1912 年开始修建炼油厂，把村子变成了一座城市，本地居民从此变成中产阶级和富裕蓝领，阿巴丹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所在地，也是中东最现代化的城市。

阿巴丹的大部分历史建筑都围绕着英国石油公司开始，我来到阿巴丹炼油厂对面，有一座被锁在院子里的白色南亚次大陆风格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被称为仰光清真寺（Rangoniha Mosque）。

英国石油工公司在阿巴丹修建炼油厂之后，由于当地人缺少工业技能，所以一开始从海外招募了大量工人，其中第一批来到阿巴丹的工人是来自仰光的

穆斯林，石油公司为他们修建了这座清真寺进行宗教活动，现在这座清真寺被锁在院子里并不开放。

当年英国石油公司的很多管理者都有在英属印度殖民地的工作背景，他们带来了殖民城市的管理经验。在阿巴丹城区的一侧，这些英国人按照在殖民地的习惯修建别墅、花园和俱乐部，这座城市的街景也确实更像印度南部或者马来半岛，枣椰树、渔民、热带气候和多种族。



同样和石油公司有关的宗教建筑是更靠近市区的亚美尼亚教堂，这座教堂通体白色，和一座清真寺是邻居，教堂最初的使用者是石油公司的亚美尼亚工程师们，这些亚美尼亚人从伊朗本地被招募到这里，他们修建了自己的教堂和学校，形成一个小社区。离教堂不远的一座加油站，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院子里还有一些老式的加油设备，这里曾经是中东第一个加油站。

由于阿巴丹发达的工业背景，形成了以英国公司带来的殖民资本主义为核

心的隔离阶级社会，二战后民族主义和工人运动兴起，本地伊朗工人开始组织罢工，1951 年伊朗政府推行石油国有化，英国最终退出了阿巴丹。伊朗石油国有化之后，阿巴丹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中产阶级生活开始成为社会主流，这里人的生活与西方无异。

到了 1979 年，阿巴丹又成为了伊斯兰革命的导火索之一。1978 年 8 月 19 日，阿巴丹雷克斯电影院（Rex Cinema）正在播放电影《驯鹿》（The Deer），这部片子讲述的是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看似繁荣的伊朗背后却是肮脏、堕落和贫困，大多数底层民众失业，只有少数人获得财富形成一个小型的中产阶级社会。这部片子非常艰难地过审，对当时巴列维国王追求的所谓现代化改革进行了批判。在电影放映期间，电影院突然起火，377 人被烧死（死亡数字有不同记录，包括 420 人和 470 人，我引用纪念碑上的数字）。

在革命后的叙事中，认为这是国王手下的 SAVAK（情报和安全组织，巴列维王朝的秘密警察）特工纵火，惩罚那些观看这部电影的政治异议人士，而巴列维政权认为是伊斯兰激进分子纵火，以此激起人们对国王的不满。无论是何种解释，这场大火点燃了人们对国王政权的怒火，在阿巴丹这座非常现代化且中产阶级为主的城市，事件很快发酵扩散到全国，成为革命的导火索之一。

我来到雷克斯电影院附近，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座商场，只有一块关于火灾的纪念碑，纪念碑右边是胶片样式，每一格都是一个燃起火焰的影厅的图像，左边是波斯文和英文的纪念文字。

火灾的真正起因已经无法考证，成为不同政治立场的攻讦，我不太相信一个单独的事件会推翻一个政权，民众的愤怒都是日益积累的，那些社会不公、贫富差距、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阵痛，都在这场火灾之后爆发了出来。

从阿巴丹返回阿瓦士已经是晚上，道路两边是曾经被战争摧毁的荒地，开着破旧汽车的秃顶伊朗大爷，用他的老式诺基亚手机给我放了一首朗朗弹奏的

《绿袖子》，不知道当年英国人来这里的时候，是否带来了这首民谣。夕阳下的阿瓦士尘土飞扬，时不时能看到戴着阿拉伯头巾的牧羊人，驱赶着羊群走过临时堆积的防洪堤坝。在这条曾经蔓延鲜血与火焰的路上，我们背靠着夕阳，享受着一点安逸的时光。

回到阿瓦士，我去品尝了当地的烤鱼，从这里一直到底格里斯河的阿拉伯人都很会烹饪河鱼。阿瓦士的烤鱼非常棒，使用了一种黑色的酸酸的酱料，带有一些南亚和东南亚的味道特点。河鱼，尤其是沼泽地区的河鱼有一种很难去除的土腥味，这种味道不同于海鱼的甜腥味，所以海鱼随便做一下都好吃，河鱼就需要精心烹饪，通常要使用气味浓烈的香料调味。

伊朗人的饭点比较晚，我去烤鱼店的时候还没什么人，老板过来和我聊天，他问我做什么工作，为什么来他们的城。我说我是做写作的，他顿时充满尊敬起来，向我介绍他的店和他的朋友，给我看他在伊斯法罕山中的别墅照片，然后他问我能不能让他也看看我在中国的别墅。

原来他误会我是和他一样的富人，我告诉他中国的很多写作者是非常贫穷的，在北京只能合租在很小的房子里。他感到有些惊讶，在他看来能从国外来探访的作家应该至少是中产阶级以上，我只好说这是一种误解，中国是一个部分城市很繁华，但民众普遍非常贫穷的国家，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并不比伊朗人好。

宁山袁：正常来说你算是中产阶级，你不是那种到处流浪的嬉皮士，也不是Gap年的学生，你去国外旅行有着明确的创作目的，你的文章在正式媒体上发表。只能说你没有达到中产收入，但你算是中产阶级，你在北京居住条件差是因为北京房价过高而已，你的房租放在二三线城市能租一个很好的房子。

我：这是两国的经济差距导致的，因为伊朗经济状况比较糟糕，能去国外探访

的作家要中产阶级以上才有条件，但在中国，哪怕像我这种事实上的工人阶级无业游民也可以出国做事情，只是差旅标准很低而已。

宁山哀：也可以这么说，包括整体收入水平和汇率问题，你去伊朗就会显得更有钱，但你去发达国家就会更穷，这不是你与当地同等职业人士的个体差距，而是国家经济的整体差距。所以并不是中国的写作者很贫穷，而是在中国很贫穷的人（比如你）都能从事写作，还有条件去国外探访。

曾经被战争变成一片废墟的阿瓦士重建之后，现在有非常繁荣的商业街区，或许是战争破坏了之前的旧格局，新建的城区更加能吸引移民到来。阿瓦士这座城市本身没有太多遗迹，大部分城区在战争中被毁坏，值得一看的是两座大桥。白色的桥是一座悬索吊桥，是德国在 1936 年建成，现在成了人们散步摆摊的场所，黑色的桥是铁路桥，1929 年建成，将铁路连接到南方的伊玛目霍梅尼港，二战中被用来为苏军运送军事物资。

我吃完饭在城里散步，晚上南北方向为主朝两边延伸的道路是热闹的夜市，伊朗很多城市营业时间结束的比较早，但在阿瓦士则会经营到很晚，倒是和珠三角很像。阿瓦士街头的行人能看出来来自不同地区，有很多巴勒斯坦人和印巴人，也有很多阿拉伯人，从外表就能看出来。我在街上寻找宵夜，突然整条街停电了，我当时第一反应是美军打进来了，但是街上人们依然开着手机电筒继续做生意，如同停电根本没有发生一样。

宁山哀：怎么区分来自不同地区？

我：比较简单的是看头巾，很多胡泽斯坦的阿拉伯男性，特别是中老年人喜欢戴格子头巾，波斯人不戴头巾。如果更仔细一点，不同阿拉伯国家的头巾戴法是不同的，但这个就有点复杂，也不是界限分明。印巴人的话，有一种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的“亚洲感”，喜欢戴小白帽，衣着体面点的会穿深色长袍和马甲，阿拉伯人的长袍以白色为主。

舒什、舒什塔尔：古典时代的遗迹

在胡泽斯坦的第二天，我去了舒什和舒什塔尔两座古城，其实对过于古老的古城，我是兴趣不大的，如果没有考古专业人士陪同讲解，参观古城遗址就如同看一堆石头一样，很难和当代产生联系，文化上也和我的故乡过于遥远。

从阿瓦士到舒什塔尔差不多要两个小时，很遗憾的是由于洪水和降雨的缘故，舒什塔尔古城和著名的水利工程系统不能开放参观，好在我更重要的目的地还在，是一座大桥——叫凯撒大桥（Band-e Kaisar 或 Shadorvan Bridge），从名字可以看出这座桥和罗马有关。



从舒什塔尔城堡向下俯视，能看到卡伦河上这座只剩下部分遗址的大桥。我穿过膝盖高的杂草丛走近大桥，断壁残垣在泥泞的沼泽池塘，砖石与砂浆混

合的建筑，与舒什塔尔本地的泥砖建筑并不相同，有罗马建筑风格，这是最东方的一座罗马大桥。

这座大桥见证了波斯和罗马之间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在公元 260 年的埃德萨（Edessa）战役中，波斯军队在萨珊王朝第二位君主沙普尔一世（Shapur I）的率领下，击败了罗马军队，俘虏了罗马皇帝瓦勒良（Valerian）和近 7 万罗马士兵。这些罗马战俘被命令修建舒什塔尔周围的水利灌溉工程，因为罗马人的建筑水平很高，罗马军人在这里修建了运河和两座大坝桥梁。

宁山哀：是不是有一个瓦勒良长城？

我：那个是哈德良长城，在英国，罗马皇帝哈德良为了抵御不列颠岛的原住民皮克特人而修建的，比瓦勒良早了一百多年。

宁山哀：伊斯坦布尔好像也有一个叫瓦什么的建筑，就那个一条长的连环拱门。

我：瓦伦斯水道桥，曾经是拜占庭的城市水渠，瓦伦斯是拜占庭帝国皇帝，狄奥多西大帝的上一任。他和瓦勒良有一点像，瓦勒良是向东方波斯进军被俘虏，瓦伦斯是向西镇压哥特人起义，结果在阿德里安堡大败阵亡。

这是罗马皇帝第一次被敌军俘虏，是罗马军事史上的一次严重失败。在此之前，沙普尔一世多次率军队深入罗马，掠夺了安提阿，瓦勒良镇压篡位后不久仓促迎战，结果被包围俘虏。被俘虏之后，这位皇帝的命运不得而知，一些人认为瓦勒良受到了羞辱，被波斯君主踩在脚下当作上马的凳子，最后尸体被剥皮用稻草填充后展示在神庙中。

但这种说法来自基督徒的记载，当成是罗马皇帝迫害基督徒的下场，就显得不那么可信，也有说法认为瓦勒良和他手下的罗马士兵受到了尊重，他们被作为工匠为波斯劳动，最后以普通人的身份死去。

瓦勒良在位期间，罗马帝国摇摇欲坠，北面的黑海哥特人蠢蠢欲动，高卢人也在酝酿着反叛。但对于沙普尔一世来说，这确实是一次堪称殊荣的胜利，他在沙普尔洞穴中为自己修建了 6.7 米高的雕像，这座雕像从巨大的石笋中雕刻出来，沙普尔一世用夸张的方式纪念这次功绩。



我从凯撒大桥返回市中心，到了舒什塔尔清真寺，清真寺内部正在休整维护，无法进入，但值得一看的部分其实是清真寺的外部建筑。这座清真寺有 1200 年的历史，墙面的花纹和宣礼塔最为精美，宣礼塔有两根，柱头没有装

饰，一高一矮两根石柱上用蓝色砖条装饰成几何图案的花纹。

离舒什塔尔清真寺略远一点的地方是伊玛目扎德·阿卜杜拉陵墓（Imamzadeh Abdullah），在一个小山丘上俯瞰着城市，陵墓建于公元 629 年，之后经历了多次修复，中殿、玄关、柱廊、圆顶、宣礼塔和墓葬以及雕刻铭文都是不同时期修建的。建筑正面是两个圆柱形塔，中间则是显眼的土黄色的锥形尖塔，这座尖塔曾经也作为观星台使用，清真寺内有很多石雕和砖雕，内容是古兰经经文，外墙的砖上很多也刻着经文。

和伊玛目阿卜杜拉陵墓相比，样式相同但更有名的建筑在舒什，那里也有一座陵墓，里面埋葬着是一位旧约中记载的传说中的人物。

在前往舒什的路上，我们路过一个茶摊，阿巴斯请我喝茶，这个茶摊就在公路旁边，一个铁架子上面有一层木炭加温，木炭上有两个咖啡壶和两个水壶，一只黑色铸铁壶里面是红茶，另一只普通水壶里面是开水，伊朗人喝茶和土耳其人一样，把茶煮的很浓，然后兑水喝。这种路边茶摊很亲民，人们买一小杯咖啡或者茶，围着茶摊站着喝完。

今天的旅途，阿巴斯的妻子和我们一起前往，一个非常热情的伊朗女人，一路上都在用翻译软件和我聊天，问我去过哪些地方，来伊朗准备去哪里，还问我是不是穆斯林，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

阿巴斯的妻子为我们准备了午饭，伊朗人有路边野餐的习惯，在马路两旁的绿地就可以铺开一块毯子席地用餐。阿巴斯的妻子为我们准备了鸡肉藏红米饭，本来他带了煤气炉，但是一直没有弄好，我们只好吃了凉的米饭，味道却非常好。

午饭后到了舒什，我前往但以理墓。按照旧约记载，但以理是一位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青年，巴比伦国王尼布加尼撒将犹太人掠夺到巴比伦作为奴隶，

也就是历史上的巴比伦之囚，波斯帝国崛起灭亡巴比伦之后，波斯君主居鲁士释放了所有的犹太人，一部分犹太人继续居住在波斯境内，成为现在伊朗犹太人的祖先。但以理擅于解梦，在《旧约·但以理书》中详细记载了他为国王解梦的过程，关于世界末日的异象，预示着巴比伦的灭亡。也有学者认为《但以理书》和先知但以理并无关系，只是后人借用他的名字而已。

在巴比伦灭亡之后，但以理继续为波斯君主服务直到去世，他的陵墓其实不止这一座，因为他的去世和葬礼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反而是去世之后很久才有了关于他的墓地的流传。在基尔库克和撒马尔罕（后面我就去了撒马尔罕的那座但以理陵墓）都有但以理墓，但舒什的这座但以理陵墓最被广为公认。

在另一些记录中，认为但以理的遗体并不在陵墓中，而是在舒什的河里，因为当地人对先知的尸体争夺不下，所以干脆决定用铁链将棺材固定在一座桥下面。



但以理也是伊斯兰教承认的历史人物，在伊斯兰教中被称为丹尼尔，所以在伊斯兰时代，他的陵墓上建起了一座清真寺，现在这座建筑是 1870 年由舒什塔尔本地的什叶派学者贾法尔主持修建的。我进入一个开阔但有些简陋的院子，高高的砖土锥形塔外观像一个松塔，正门是典型的清真寺拱门形状，内部装饰华丽，镜面的顶棚，圣陵上方是金色笼罩，下面是被网格栅栏挡住的玻璃，边框是银色。在舒什与但以理墓相似的还有另一座 Deabel Khazaei 的陵墓，他的陵墓尖顶更像是一个锥形的喇叭。

但以理陵墓对面，在舒什古城旁边苏萨山的最高点有一座高耸的城堡，可以俯瞰整座城市。这座城堡是法国人在 1897 年修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作为考古勘探和挖掘舒什古城的基地，城堡的建筑材料直接取自考古现场不同时期的砖土。现在里面是一个博物馆，展示曾经考古挖掘时使用的工具。

在离开舒什和舒什塔尔之前，我去了舒什塔尔最神圣的地方之一，在舒什塔尔东北角的山丘上有一座伊玛目马赫迪清真寺（Sahebalzaman）。这座清真寺内有一把椅子，是隐遁的十二伊玛目马赫迪曾经坐过的，我走进清真寺大殿，一个角落用栏杆围起来一把小小的椅子，上面放了一本古兰经。伊朗的国教是什叶派中的十二伊玛目派，也是什叶派中最大的分支，第十二个伊玛目就是马赫迪。

马赫迪出生在公元 869 年，他的父亲家族来自伊玛目阿里的血脉。马赫迪 5 岁的时候，父亲在萨迈拉被毒死，马赫迪通过四位代理人与追随者们沟通。马赫迪一生中有过两次隐遁，在公元 914 年第二次隐遁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他的追随者们相信马赫迪会在末日的时候降临人间，拯救世人，而耶稣将帮助他。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之后有很多人以马赫迪的名义进行政治运动，最著名的就是 1881 年的苏丹马赫迪起义。

离开舒什和舒什塔尔，我在胡泽斯坦的旅程结束了，接下来要去北方的大不里士，寻找萨菲王朝的诞生地，还有蒙古伊尔汗国的国都。在阿瓦士，我的

司机阿巴斯大爷开车带我走了两天，他给我买茶和咖啡，还给我讲解，两天的车费总共二百来块人民币。我实在过意不去，送了他一盒茶叶。

伊朗和中国的地形有一点点相似，也是两头翘起，不过和中国是相反的。伊朗的东北部呼罗珊对应着中国西北，传统的穆斯林地区，而伊朗的西北部则对应着中国东北，这里有复杂的民族成分，长期处于国家对峙的前线，都与俄国（苏联）发生过联系。

我从阿瓦士乘坐伊朗国内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大不里士，之前听说伊朗国内航空事故频发，有点担心，好在旅途非常安全。我的邻桌是一个伊朗工程师，他告诉我大不里士之前有很多中国合作建设的工厂，他工作的地方是与哈尔滨一座工厂合作建设的，之前有不少中国工人被派驻到这里，但是随着美国的制裁加深，很多中国公司不得不撤出伊朗。



大不里士：北方的革命者

当我来到大不里士，首先的感觉是这座城市非常像我的故乡，当南方的胡泽斯坦已经穿短袖T恤的时候，北方的大不里士还在穿皮夹克。到了夜晚街上人不多，凉风瑟瑟，我的故乡也是这个样子，干燥的空气如果没有风的话，即使温度很低也不会觉得透骨，只感到凉爽舒适。

我在大不里士吃到了来伊朗之后最好的一顿饭，这里距离里海不远，鱼不错。我找到了TripAdvisor上推荐的一家吃鱼的店，老板是阿塞拜疆人。鱼的做法和在阿瓦士不一样，阿瓦士的鱼善用酱料，有点受印度影响，这家店里鱼的做法则是比较欧化，整条海鱼直接烤制，只用海盐和柠檬汁调味，蔬菜米饭也很好吃。

大不里士这座城处处透着高级，其他地方的伊朗人看到我都会很热情地说“噢，我的朋友，欢迎来伊朗，我爱中国”，但是一谈钱就不是他了。大不里士人谈不上多热情，但是老实文明，不跟外国人偷奸耍滑。这里是曾经爆发伊朗宪法革命的地方，历史性的先进，和大不里士邻近的俄国和土耳其只是欧洲的边缘，但足以使这座城市有了和伊朗其他地方不同的气质。

我住在靠近大不里士城堡（Arg Alishah of Tabriz）的一家Airbnb风格的旅馆里，地下室是水烟馆，我的屋子是一套很大的两室一厅，租金却和德黑兰一个小房间差不多。

我从旅馆出来走到城堡附近，看到高大的城楼和两个城门洞，这座城楼是14世纪的遗迹，城堡原本是一片巨大的建筑群，包括清真寺、图书馆、庭院和陵墓，但在建设时没有彻底完工，目前还在修复中，周围是一片工地。

19世纪随着波斯和俄国关系紧张，靠近俄国的重镇大不里士成为军事要

塞，俄国入侵大不里士，这座城堡受到了一定的损伤。到了巴列维王朝时期，城堡已经破败不堪，被不断地拆除改造，只留下了今天看到的这一小段，是曾经建筑的后墙部分。



在帖木儿帝国衰弱之后，统治大不里士的是黑羊王朝（Kara Koyunlu），形成了诸多的宗教兄弟会组织。萨菲教团诞生在阿尔达比勒，创始人萨菲·阿尔丁（Safi-ad-din Ardabili）是生活在伊朗的突厥人后裔。1500 年，萨菲教团伊斯梅尔一世（Ismail I）获得了游牧部落的支持，尤其是被称为红头军的齐齐尔巴什支持。

1501 年，伊斯梅尔一世攻克大不里士，萨菲王朝建立，到 1510 年他已经征服了今天伊朗的全部领土。由于齐齐尔巴什一直煽动安纳托利亚什叶派穆斯林反对逊尼派执政的奥斯曼帝国，并引发亲萨菲王朝的起义，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一世派军队镇压，与萨菲波斯展开了长期的战争。萨菲王朝的游牧部落军队敌不过拥有大量火炮的奥斯曼军队，大不里士一度丢失，波斯失去了美索不达

米亚和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领土，这部分历史在伊斯法罕我已经提过一部分，在四十柱宫的壁画上有关于这场战争的内容。战争失败后，伊斯梅尔一世不再管理国家事务，36岁就郁郁而终，他10岁的儿子赫塔马斯普一世继承王位。

我从大不里士城堡向北走到大巴扎附近，这座大巴扎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今天看到的大部分建筑都是15世纪之后修建的。和伊斯坦布尔大巴扎完全在室内的结构不同，这座大巴扎里有一个个小的露天广场，我不知道是建筑技术的局限无法修建太大体量，还是这里的人更喜欢贴近户外。人们可以在巴扎中间隔的露天广场聊天休息喝茶，在巴扎里面隔一段路就有小茶摊，有的茶摊摆着几条长凳子，有的干脆没有凳子，店主准备了两个大水桶，一只煮茶水，一只煮开水，兑着喝茶。

我很喜欢坐在这里和老大爷们一起闲聊，虽然我们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但交流并不仅仅是理解对方表达的内容，交流本身的过程，语气、神态、表情、手势都是传递的信息。

在这种茶摊喝茶的都是中老年男性，我发现在这种环境里我特别放松，虽然也没什么交流，但就觉得自己融入了背景中。相反和年轻人们在一起，聊的内容非常多，但我总觉得没那么放松，好像要去应付某些东西一样，不知道这算不算未来先衰。

宁山哀：我记得你也做音乐人大卫的经纪人，那不是会接触很多年轻人吗？

我：平时如果不是大卫的演出，我自己很少去livehouse或者酒吧，我好像天生对人多的氛围有一种抗拒，尤其是那种人们看起来都很酷的氛围，就显得我自己特别无所适从，因为我特别不酷，没法和大家谈笑风生，不会Social。

宁山哀：没事，其实大多数人都酷，但一些人擅于打扮得很酷，我感觉你也不是很容易被别人的外表唬住，可能因为你自己不会扮演角色，所以对那些扮

演得很好的人会高看。

我：也许吧，能扮演好一个角色也不容易，气场还是很重要的，我因为平时见的人少，所以在我面前只要不开口说话，靠外表想把我唬住还是挺容易的。

宁山袁：你觉得自己是个内向的人吗？但你也很愿意表达自己，又写东西又做电台，朋友圈里每天发一堆观点。

我：内向针对的是互动交流，不是单方面的表达。我不缺少表达，但缺少互动交流。人们会对内向的人有一种期待，认为他们心思会更细腻，有着自己灿烂的世界，但以我自己的体验来说，并不一定有很细腻的心思，因为细腻往往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打磨，长期缺少互动交流的人表现出来可能不是细腻，反而是粗犷。

在巴扎的不同方向有以不同城市命名的大门，比如德黑兰门或者伊斯坦布尔门，这些大门的名字就是它们各自通向的城市，比如伊斯坦布尔门就是经过大不里士前往奥斯曼帝国贸易的路线关口。

大不里士巴扎里有很多地下餐馆，其中一些是旧浴场改造的，餐馆里面除了正餐桌椅还有很多床榻，人们坐在榻上喝茶抽水烟。这是比较讲究而且消费略贵的地方，不少家庭和情侣在这儿吃饭休息，不太贵的水烟馆一般在街边地下，里面是食堂那种一长排桌子，大家挤在一起抽烟喝茶，客人基本是中老年男性。

虽然由于经济制裁无法使用国际信用卡，但伊朗的银行业非常发达，即便是在地铁上兜售货物的小贩也随身带着一个 POS 机，合人民币几块钱的商品也要刷卡。大不里士巴扎的金融区和珠宝区靠近主干道，在伊朗其他城市换汇的地方不多，但大不里士巴扎聚集着成群的黑市商人，询问路过的行人要不要换钱，一些首饰店也做这样的生意。最近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愈发尖锐，人们更加迫切需要囤积美元。

大巴扎对面是大不里士税务局，一些老人带着老式波斯文打字机坐在路边，为人们提供法律和税务文书打字服务。我坐在那里看了半天，在我很小的时候见过英文打字机，历史上除了林语堂发明的之外，并没有真正实用的中文打字机，再后来就逐渐普及电脑打字了。打字机比电脑的好处就是不需要插电，避免电子化，人类应该为世界大停电做好准备，尽量控制电子产品。

宁山哀：叶公好龙，像你这种大量文字工作的，用打字机能累死你，电脑复制粘贴删除这些功能大幅度降低了写作和编辑的工作量。

大不里士巴扎里面有一条街是卖首饰的，很多男人衣着简陋也会戴好几个戒指。尽管按照伊斯兰教要求，应该尽量朴素不要佩戴奢华饰品，尤其是针对男性。但是从小亚细亚（包括更西边到马格里布地区）一直到满洲，这是一条浮夸地带，人们热衷于公开展示自己的财富。在这边人们流行佩戴戒指和项链，而在我的故乡人们则热衷于购置貂皮大衣。

宁山哀：这其中有什么共性吗？

我：在两大洋之间的贸易-游牧-渔猎地带，不同于传统农耕地区，人们的财富更加流动和外露。中国传统社会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所以人们不敢露富，而在贸易-游牧-渔猎地带，财富本身意味着能力和社会地位，会带来认同与尊重，法律更加保护私有财产，人们就更愿意公开展示自己的财富。

宁山哀：这有点像今天中国的富豪们流行低调炫富，也是农业社会的地主传统，既希望炫耀自己的实力，又担心过于高调遭到权力妒恨。

我：是的，这一方面来自原始积累的合法性问题导致心虚，另一方面社会的躁动也让人们无法平静对待自己和他人的财富。中国人常常调侃中东土豪的粗暴炫富，但粗暴炫富也比猥琐炫富好一些。

我从大巴扎向东走，经过 1917 年修建的消防塔，来到市政厅（Tabriz

Municipality Palace)。这座上世纪 30 年代德国人修建的建筑也是一座博物馆，展示着大不里士过去的电影放映机、出租车和消防轨道、地毯、路灯、城市钥匙。市政厅中心是一座钟楼，之前使用过的旧钟摆在博物馆内展示，是由英国吉利-约翰斯顿公司于 1935 年在克罗伊登铸造，1941 年这座钟被苏军在战斗中毁坏，后来钟楼换上了一座新钟。



从市政厅出来，我继续向东走到阿塞拜疆博物馆，里面有一件展品引起了我的注意。是一个中国风格的瓷盘子，侧面有一个类似欧洲贵族纹章的图案，一面红色盾牌上有一只野兽的头，像狼或者野猪。我问了博物馆的馆员，他们也不知道这件瓷器的历史背景以及纹章的含义。在欧洲，意大利的玻璃工匠们很早就开始仿制中国瓷器，如果说是野猪的话，有可能是某个德国贵族的收藏，因为德国和伊朗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件瓷器流到了伊朗。

宁山袁：这件瓷器很可能就是中国产的，明清时期有很多出口的外销瓷器，包括一些私人订制品，可能客户本身并没有什么贵族传承，就是个暴发户通过中

间商向中国订制，上面的图案可能就是仿照贵族纹章随意拼凑的。

阿塞拜疆博物馆隔壁是蓝色清真寺（Kabud Mosque），这座清真寺和伊朗其他的清真寺不太一样，更像土耳其风格。蓝色清真寺是在黑羊王朝沙贾汗统治时期修建的，沙贾汗本人的陵墓也在清真寺旁边，但主体建筑在萨菲王朝时期完工。蓝色清真寺在奥斯曼帝国入侵时受到了破坏，16-18 世纪又遭受多次地震，到了 19 世纪，除了大门之外整座清真寺已经基本变成废墟，在巴列维王朝时期才得以重建，残存的正门装饰着精美的蓝色马赛克，但是破损严重。



走出蓝色清真寺，我拐进旁边一个社区公园里，这里有一个售卖茶水和零食的小摊，我在这儿喝茶休息，这座社区公园以波斯诗人哈加尼（Khaqani）的名字命名，公园里有他的雕像。哈加尼出生在阿塞拜疆，最初信仰景教，后来皈依伊斯兰教，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基督教的意向和象征。他的诗赞美理性和勤劳，反对压迫，在从伊拉克游历回国之后，哈加尼被投入监狱，释放后他搬到大不里士。

然而不久之后，他的儿子、妻子和女儿相继去世，他最后孤独地死去，埋葬在大不里士的诗人陵。这座诗人陵在大不里士城北，埋葬着四百多位学者和作家，最早的一座有将近一千年历史，最新的一座是 2009 年去世的阿齐兹·道拉塔巴迪，他是大不里士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

大不里士这座城市的近代史和革命有密切的关系，我来到大不里士的宪法革命博物馆（Constitution House of Tabriz），馆员为我介绍了这一段革命历史。这栋大楼的原主人是一个商人，也是革命支持者，他的这栋房子是革命的会议地点，也是出版文章的地方，现在这里展示着革命者的雕像、照片、信件和报纸。

在博物馆中，我看到了一个美国人的照片，他叫霍华德·巴斯克维尔（Howard Baskerville），是长老会教会学校的老师。在宪政革命期间，霍华德·巴斯克维尔带着一百多名志愿者在大不里士抵抗国王军队的进攻，牺牲的时候只有 24 岁。在阿敏·马卢夫的《撒马尔罕》里，他详细地写到了伊朗宪政革命和霍华德·巴斯克维尔这个人的故事。

宪政革命的导火索是国王纳斯尔丁（Naser al-Din）向外国贷款支付自己的奢侈生活，他以国家关税作为抵押，从俄国借贷了两千万卢布用于自己的欧洲之旅。1890 年，纳斯尔丁将烟草特许经营权交给英国，宗教领袖们号召民众以戒除烟草的方式抗议君主出卖国家。今天大不里士巴扎周围到处都是卖烟草的店铺，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革命传统，人民用狂热吸烟的方式主张自己的经济主权。

纳斯尔丁对民众的福利没有任何关注，损害本土商人的权益，俄国人也趁机煽动，宗教社区和巴扎商人们形成了联盟，这些宗教社区长期接受来自巴扎的捐赠，用来经营宗教学校，维持慈善机构，他们也为商人们提供司法、担保和仲裁，被认为是公正地维护本地人的利益，他们和商人们一起反对君主将特

许经营权交给外国人，最后纳斯尔丁不得不取消特许经营权。

1905 年在德黑兰，有两个商人被国王的手下惩罚羞辱，商人阶层爆发示威活动。冲突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政府和民众的矛盾变得尖锐，很多人在英国大使馆的院子里露营，研究政治理论，要求君主召开议会。1906 年 8 月，君主穆扎法尔丁（Mozaffer ad-Din）同意召开议会，然而此时他已经重病，在签署宪法五天后就去世了。新君主穆罕默德·阿里（Mohammad Ali）反对父亲签署的宪法，1907 年英俄协议划分了两国在伊朗的势力范围，英国人抛弃了宪政主义者，开始转而支持君主。

在这个过程中，纳斯尔丁在 1878 年模仿俄国哥萨克成立的波斯哥萨克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哥萨克旅成员主要是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是纳斯尔丁邀请俄皇亚历山大二世派军事顾问组建的，不同于俄国哥萨克是用军事服务换取土地的封建军团，波斯哥萨克更像一个雇佣兵组织。

穆罕默德·阿里命令哥萨克旅炮击议会大楼，处决了多位革命领导人。炮击议会之后，国王下令军队进攻大不里士，此时出现了革命中两个重要的人物——萨塔尔·汗（Sattar Khan）和巴盖尔·汗（Bagher Khan）。

1908 年，在萨塔尔·汗和巴盖尔·汗的领导下，大不里士市民组成了军事委员会，对抗国王的军队。1910 年，萨塔尔·汗和巴盖尔·汗带着 300 人前往德黑兰，受到了支持者的欢迎，穆罕默德·阿里被迫下台逃往俄国公使馆流亡俄国，最后死于意大利。1911 年，俄国强迫波斯议会接受俄国提出的条件，之后又入侵波斯西北部，占领了大不里士，处决了很多宪政革命者。

在今天的大不里士城北还保留着萨塔尔·汗的故居，在一条小巷子的深处，我推开一道黄色陈旧的门，里面是一个小院子，屋子里陈列着当年革命者们的照片。照片上的革命者打扮各有不同，有的是现代军人打扮，有的是部落战士打扮，还有宗教人士打扮。

这场宪政革命对伊朗历史影响巨大，可以说后来的伊斯兰革命都是这场宪政革命的延续。在革命中，教士、商人和市民凝聚在一起，君主只能借助外国人镇压革命，这让人民意识到政府的军队是不可信任的，人民必须自己掌握武装，清真寺、巴扎和社区要联合起来才能形成有力的社会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斯宣布中立，奥斯曼军队进攻大不里士的俄军，一度试图控制这座城市。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俄军从大不里士撤离，城市回到当地民主党委员会手中，奥斯曼军队短暂控制之后离开。一战之后，波斯哥萨克支持的礼萨·汗上台，巴列维王朝开始，这位君主甚至不是纯血统的波斯人，他的母亲是格鲁吉亚穆斯林。

二战期间，虽然伊朗再次宣布中立但拒绝与轴心国断交，同盟国为了运输物资占领了伊朗，苏军在 1941 年占领了大不里士和伊朗西北部地区，礼萨国王被迫流亡南非，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上台。

二战后，在苏联的支持下，伊朗共产党成员贾法尔·皮舍瓦里（Jafar Pishevari）成立了阿塞拜疆民主党，1945 年宣布建立独立的阿塞拜疆人民政府。但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随着西方的压力，苏军在 1946 年撤离了大不里士，阿塞拜疆人民政府很快瓦解成为伊朗的一部分，很多支持者被处决，一部分成员逃到了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

我走出宪法革命博物馆，门口走过穿着红色靴子的伊朗宪兵，他们可以追溯到卡扎尔王朝时期，作为英国和俄国之间的中立选择，卡扎尔王朝君主选择瑞典人来训练自己的宪兵部队，这支部队在伊斯兰革命之后被收编，一直保留到今天。



我试图去拜访大不里士的几座教堂，但没有成功。圣玛利亚教堂（Saint Mary Church）是大不里士最古老的教堂，也是亚美尼亚教会主教的驻地。我在十字路口看到教堂的铁皮锥形屋顶，进入教堂需要绕一个大弯，然而按了半天门铃，却告诉我教堂并不开放。

穿过大巴扎西边的巷子里，曾经的法国教堂和教会学校被围在一片建筑工地上，看起来已经是废弃状态。在城市西南部的圣萨基斯教堂（ST. Sarkis Church）也是一座亚美尼亚教堂，建于 1854 年，后面有一所附属的亚美尼亚学校，学校在两伊战争之后关闭，教堂是红色石质十字结构建筑，入口处是一座墓地，教堂外的院子里还有一块亚美尼亚大屠杀纪念碑，以及很多大理石铭文和墓碑。

伊朗政府对于宗教的态度和中国有些相似，是一种高度体制化的管理方式，虽然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被视为国教，但很多清真寺只有礼拜的时候才开放，而且因为主麻集中礼拜，有的清真寺周五反而不开放。而其他宗教，比如

犹太教堂或者亚美尼亚教堂，除了宗教活动时间之外基本都不开放，敲门也无法进入，宗教场所锁门让我觉得有点意外，仿佛回到了中国。



在大不里士城区东部，我找到了 14 世纪的拉希德大学遗址（Rab-e Rashidi），遗址在一座小山丘上，像一块巨大的岩石矗立在那里。

伊尔汗国君主合赞汗（Ghazan）时期，蒙古统治者开始伊斯兰化，并且和西亚、欧洲来往密切。合赞的母亲是基督徒，合赞童年的时候被培养成一个佛教徒，然而他本人成年后皈依伊斯兰教，取了一个穆斯林名字叫马哈茂德，任命了波斯犹太人拉希德在大不里士成立了一所大学，吸收各地的知识分子。

这座大学成立的时候，大不里士是伊尔汗国的首都，这所大学原本是一片建筑群，最主要的部分是图书馆、医院和工场，当时在这所大学有来自各国的学者做研究和教课，尤其是哲学、医学和自然科学。后来大学被改造成堡垒，现在还保存的这一小部分遗址是当年的学校占星天文台的部分。

合赞汗死后没有留下子嗣，他的弟弟完者都（Oljeitu）继任，完者都也是一个穆斯林，我之后会去拜访他的陵墓，但首先我要向西去寻找伊尔汗国的其他遗址。

我和司机从大不里士出发，他是个伊朗土耳其人，在一些资料中把他们称为土库曼人，以区别于来自土耳其共和国的土耳其人。这些土库曼人和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关系不大，他们是广泛的突厥民族，可以理解为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土耳其人，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没有前往土耳其，而是继续居住在各自的国家。在东部的土库曼人是生活在今天土库曼斯坦的主体民族，中国的撒拉族也是他们的一支，而在伊朗西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的土库曼人和土耳其人或者阿塞拜疆人更接近。

在路上，司机给我讲述伊朗这两年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严重。前几年大家还吃得起肉，现在只能把牛羊肉换成鸡肉，然后多吃大饼，对普通人来说吃鱼都是很难得的。伊朗的高等教育普及很高，但是失业率也很高，很多年轻人服完兵役找不到工作，如果能进入正规的工厂，虽然辛苦但还是可以勉强维持生活，不然只能打打零工，去政府部门工作就会非常轻松，但只有那些有关系的人才能得到这样的工作机会。

我告诉他这和中国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希望这样说能让他感到一些安慰。

我们聊到伊朗的政治，司机说早些年的哈塔米总统非常温和，是个好人，但无法实际解决问题。后来上台的内贾德总统对外非常强硬，对内改善穷人的生活，是个很好的总统，但是不太能处理和高层的关系。现在的总统鲁哈尼，既无法解决经济困境，还要向叙利亚和伊拉克派出军队参与海外作战，给国内增加经济负担。

有趣的是，我后来通过朋友间接接触了一些伊朗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想

法，他们都非常讨厌内贾德总统，觉得他只会煽动民粹，反而对鲁哈尼有些好感，认为伊朗今天的经济困境是内贾德总统时期的问题延续。中下层普通民众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很难达成一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或许有背叛阶级的个人，但绝对没有背叛阶级的阶级。对我个人而言，秉持着工人阶级的出身，自然和伊朗中下层民众站在一边，这也影响了我对伊朗的很多观感。

宁山哀：我对这一点存疑，你总喜欢强调自己的工人阶级出身。我认为更大的可能性不是你真的喜欢接触中下层民众，而是你的旅行方式决定的，你本身外语水平很低，也没有太多当地的年轻人朋友，再加上你去的都是老城区和宗教场所，自然接触的就是中下层民众，很难接触到知识分子或者中产阶级。

我：语言问题是一方面，但我不觉得我在刻意和中下层民众接触，因为我本来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会很自然地被吸引去老城区和宗教场所，而不是大学、艺术馆或者当地的文化沙龙。反例是在国内旅行语言相通的时候，我喜欢去的地方和接触的群体跟在国外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

宁山哀：你并没有身处社会下层，却以为自己是下层中的一员，好像有了一种虚幻的悲壮感。我在你上一本书里就发现你特别迷恋这种感觉，你喜欢强调你父亲是工人，但你自己并没有当过工人，你的个人生活离工厂很遥远，你接受的文化和教育经历就是中产阶级式的，包括你的职业、社交圈子等等。

我：工人阶级的属性跟个人职业或者文化教育无关，我没有靠资本牟利，就是被剥削和压迫的劳动者，是既得利益者之外的群体。工人阶级的群体归属并不意味着我自己一定要在工厂里工作，写字楼格子间和工厂车间也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有属于写作者的工人合作社我也会很乐意加入。

宁山哀：在中国，你本科毕业，在北京租一个还算体面的房间，每天有足够的营养摄入和睡眠时间，还有条件去外国旅行，你就是既得利益者，虽然这个利

益确实很小，但已经超越了这个国家多数人的水平。我相信你对社会下层民众的情感是真诚的，但这种情感并不是来切身抗争，而是你对自己所处的中间阶层的叛逆，以及对更上面阶层的不满，有点像叶甫盖尼·奥涅金一样。

我：你忽视了一个问题，剥削与压迫是一个系统化的体制，不能因为一部分人遭受的程度比较轻就否定了剥削与压迫的普遍性。不然你总能找到相对不是特别惨的人，就会把既得利益者的范围无限扩大，把被剥削与压迫的人缩到一个极小的范围内，形成多数人的自以为良好和对少数人的漠视，这个范围缩得越小就越容易被无视。

宁山哀：我不否认剥削与压迫的普遍存在，但不同阶层有各自要解决的问题，你不能因为大家都被剥削压迫就忽视了下层与中层之间也有矛盾，甚至这种矛盾更加直接和突出，并不存在一个你幻想的斗争共同体。你认为自己和社会底层站在了一起，但你并没有真的生活在其中，只是你和他们之间暂时没有发生矛盾而已。

我：所以你觉得，我应该只为“你认为我真正所在的那个中间阶层”表达，而不需要关注其他阶层（尽管我认为并没有“其他”的概念，我和他们就是同一个阶层）。

宁山哀：你这个表述带着感情色彩，但我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并不是说你不需关注其他阶层，而是你没有真的身在其他阶层当中，那不是你能解决的问题，你更该解决的是自己亲身所在的阶层的问题。并不是你非要和底层民众站在一起才能更深刻地表达，相反你承认自己就是站在外面，也可以去为对方发声。

乌鲁米耶、马拉盖、苏丹尼耶：湖边的蒙古人与基督

我们从大不里士向西南方向前行，渐渐开到了一片盐碱地，靠近了乌鲁米耶湖。司机告诉我这片湖泊曾经是现在的十倍大，在他童年的时候，从大不里士出发用不了多久就会到达湖边，现在却要开很久才能看到水。今天的这片盐碱地曾经都是湖底，政府想过一些办法试图挽回湖泊干涸，但并没有效果。

靠近东部湖畔有一片小山，这片山曾经是湖中的一个岛，随着湖泊逐渐干涸水位后退，和岸边连在了一起，但依然保留着沙希岛（Shahi Island）的地名。在这座岛上埋葬着两个人，伊尔汗国开国君主旭烈兀（Hulagu）和他的儿子阿八哈（Abaqa）。

宁山哀：这两个人很耳熟，你是不是在上面讲过？

我：就是去伊斯坦布尔的蒙古圣玛利亚教堂讲到的，教堂名字中的“蒙古”就与旭烈兀和阿八哈有关。拜占庭皇帝米海尔八世将玛利亚嫁给旭烈兀，在玛利亚前往伊尔汗国的路上，旭烈兀就去世了，玛利亚嫁给了阿八哈，阿八哈去世后，玛利亚返回君士坦丁堡隐居在蒙古圣玛利亚教堂中。

宁山哀：在上面看到这块的时候我就好奇，为什么玛利亚可以嫁给父子两个人，而且他们之间的寿命差距很大吗？

我：按照蒙古习俗，父亲死后儿子可以继承父亲的妻妾，只要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就行，何况玛利亚和旭烈兀还没来得及举行婚礼，又是政治联姻，嫁给谁都一样。

他们之间不是寿命差距大，而是年龄差距大。玛利亚出生于 1246 年，她嫁过去的时候只有 19 岁，这时候旭烈兀 50 岁左右，当时的蒙古人常年征战加上酗酒，寿命都不太长。旭烈兀死了玛利亚嫁给阿八哈，阿八哈 31 岁，他死的时候只有 48 岁，这时候玛利亚才 36 岁，她回到君士坦丁堡去世的时候 62 岁，基本都是那个时代的正常寿命。

乌鲁米耶是一座很古老的城市，在这座城市中有一座教堂可以追溯到耶稣基督的年代。我找到这座圣玛利亚教堂（Church of Saint Mary），很难得教堂开着，一位看管教堂的老人接待了我。教堂分成两部分，白色的高层建筑是用于日常宗教活动的新教堂，旁边较矮的是老教堂，院子里零散摆放着很多石刻，上面刻着亚述文的经文、十字架和几何图形，过去教堂东侧是一片墓地，这些墓碑后来被挖出来。



老人打开教堂一扇小门，门上面有亚述文的铭文，我们低着头沿着走廊进去，里面是低矮的地下空间，左右各有墓室，里面的坟墓是东方亚述教会的三位主教和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一位传教士。

其中一座独立的坟墓属于 Mar Elia 主教经历比较传奇，在他童年的时候，美国基督教会和俄国东正教会都在乌鲁米耶进行传教，他毕业于乌鲁米耶的美国教会学校，在 1894 年前往纽约学习神学。1898 年乌鲁米耶的亚述主教带领

教会皈依东正教，Mar Elia 开始学习东正教内容。

1 日俄战争让俄国的权威动摇，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开始反叛。1911 年俄军进入阿塞拜疆镇压平息，Mar Elia 被任命为乌鲁米耶地区的主教。一战爆发，奥斯曼军队攻击乌鲁米耶地区的基督徒，Mar Elia 一直在俄国和格鲁吉亚寻求帮助。战后他回到乌鲁米耶主持教会工作，直到 1928 年去世。

我继续走进教堂深处，里面开阔了一些，有一个小小的祈祷所和祭坛，非常简单，除了文字雕刻之外，基本没有什么装饰，这也是亚述教堂的特点，不做特殊的装饰。

在耶稣出生之前，这座教堂原本是一座琐罗亚斯德教的火神庙，神庙里的三位祭司看到一颗星星向东方移动，认为这是弥赛亚降临的标志，他们前往伯利恒寻找耶稣基督，这三位祭司就是基督教中的东方三博士。三博士回到乌鲁米耶后，把火神庙改成了基督教堂，耶稣出生地的伯利恒圣诞教堂是第一座教堂，这座教堂是第二座教堂。

在一些资料中提到这座教堂在公元 642 年重建的时候，有一位中国公主做出了贡献，她的名字被刻在教堂的墙上，但是我没有找到，我非常怀疑这个说法，因为古代西方人会把他们认为很遥远的地方都称为中国。

现在这座教堂被东方亚述教会监管，亚述人是伊朗信仰基督教的民族，亚述教会是早期使徒们建立的东方教会的一部分，16 世纪之后，亚述教会分成两支，一支与天主教会融合，称为迦勒底天主教会（Chaldean Catholic Church），另一支依然保留自己传统的称为东方亚述教会（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在 19 世纪，外国教会在乌鲁米耶传教，俄国向乌鲁米耶派出了东正教传道团，一些亚述人加入了东正教会，这座教堂一度被俄国人改为东正教堂，上世纪 60 年代被考古挖掘和修复后对外开放的，

现在乌鲁米耶大概还有几千亚述人，在一战期间，奥斯曼军队对亚述人进行了袭击，亚述人起初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但因为俄国军队的撤离，他们遭到屠杀，大部分人逃到了德黑兰。德黑兰是目前伊朗亚述人最多的城市，在德黑兰有一座圣约翰教堂，是与天主教融合的迦勒底天主教會的教堂，我本想去拜访，但他们的弥撒只有基督徒可以进入。



离开圣玛利亚教堂之后，我去拜访了两座清真寺。乌鲁米耶聚礼清真寺目前正在修缮中，这座清真寺建于伊尔汗国时代，之前是一座火神庙，在塞尔柱帝国时期改成了清真寺，从圆顶能看出有塞尔柱风格。比较特别的一点是，这座清真寺的拱顶并不在清真寺的中央位置，而是在一端，整体是一个L形建筑。拱顶下方是三层拱门，目前拱顶部分正在维护，人们要在旁边的横排屋子里进行礼拜。

另一座萨达尔清真寺（Sardar Mosque）是卡扎尔王朝时期修建的，外部有漂亮的彩色瓷砖，这座清真寺的外观特点是正面有一座高大的钟楼，拱形大门

上方是弧形的精美瓷砖，清真寺的圆顶安装在 12 根八角形圆柱上，立柱上方有精美的雕刻，小厅位于大厅的尽头，

在乌鲁米耶还有一座建筑值得一看，是一座砖塔（Se Gonbad），我走进砖塔里面，内部分成地上部分和地下室，在入口处有三个库法体铭文。这座砖塔是圆柱形，外部表面有精美的石头雕刻，除了正面之外，其他部分是砖块组成的几何图形，建筑四面有小门，地下室与上部建筑分开，单独有一个门，二楼则要通过楼梯上去，圆柱上部是一个包含墓室的建筑。

在乌鲁米耶湖东南边的马拉盖有更多的砖塔，我们继续前往马拉盖，首先要到达马拉盖天文台遗址（Maragheh Observatory）。

蒙古西征时期，伊朗西北部的阿拉穆特山区是最后被征服的地方，很多学者在山上受到庇护进行研究，其中包括纳斯尔丁·图西（Nasir al-Din al-Tusi），他是那个时代著名的通才学者，在天文学、哲学、数学、逻辑学、医学领域都有建树。旭烈兀攻克了阿拉穆特，带走了图西，邀请他担任科学顾问为新的帝国修订历法。图西请求旭烈兀在马拉盖修建一座天文台用于观测星象，旭烈兀答应了，并且将夏都迁到马拉盖。

我在山下很远处看到天文台外面笼罩着白色半球穹顶，我们的车从山下开上来，山顶风很大，我进入半球体内部，这里曾经是一片建筑群，包括观测站和图书馆，现在遗留下来的是曾经的主楼遗址，沿着子午线分布着多个房间，天文台原结构是一座塔，在圆形石头城堡里。

马拉盖天文台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机构，通过这座天文台的研究，图西改善了托勒密系统。当时有很多国家的天文学家都在这里参与研究，并把研究结果带回自己的国家，包括促成了撒马尔罕天文台和登封天文台的建立。

在这里研究的学者中有一个叫 Fao Munji 的中国人，在一些资料中认为他

叫傅穆斋或者傅蛮子，本名叫傅岩卿，出生于江西德兴一个风水先生家族，在元朝担任秘书少监，也就是秘书省的负责人，掌管图书、史录、天文历法，他被派到马拉盖参与研究天文，并与图西分享了中国古代的天文学知识。

在 14 世纪之后，因为频繁的地震和资金不足，马拉盖天文台逐渐荒废，建筑群成为了废墟。1978 年，大不里士大学对天文台遗址进行了保护，在遗址外面覆盖了一个半球形的保护罩，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从天文台下来，我们来到马拉盖市区，这座市区内有几座墓塔。这些墓塔一般认为修建于伊尔汗国时期，在伊尔汗国后期，蒙古人逐渐开始接受波斯人的传统，从这几座墓塔上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用的蓝色瓷砖越来越多，花色也越来越精美。

我首先来到 Gonbad-e Sorkh，这座墓塔修建于 1147 年，是马拉盖最古老的一座墓塔。建筑外观是一座圆顶塔，分成两层，从上方可以进入地下室，地下室比较高，所以地面被抬起，要走几层台阶进入上部空间。因为年代最早，所以这座建筑外表的蓝色瓷砖使用很少，基本是砖石外观，只有正面大门上有一点点瓷砖，内部装饰也几乎没有复杂的铭文和砖雕。

另外两座在一起的墓塔 Gonbad-e Kabood 被围在一片建筑工地上无法进入，一座是八面柱体，另一座是圆柱。这两座塔修建于 1197 年，是旭烈兀母亲的墓塔，塔身没有太多的装饰，两座墓塔正在修复中，较高的那座墓塔上方搭起了圆锥形支架，是要给这座塔修复尖顶。

最后一座墓塔是河边的 Ghaffari 陵墓，这是一座红砖立方体建筑，四个角是圆柱，正面保留着残余的蓝色瓷砖，剥落非常严重，但可以看出覆盖面积很大，上方有波斯文雕刻，这座建筑修建于 1167 年，是一位名字叫 Hussein Ghaffari 的神秘主义学者的墓。



前两天在大不里士的拉希德大学遗址，我提到了皈依伊斯兰教的伊尔汗国君主合赞，他有一个弟弟，也是他的继任者完者都。完者都童年跟随基督徒母亲受洗，年轻时信仰佛教，后来又受哥哥影响皈依伊斯兰教。在兄弟俩在位期间，伊尔汗国逐渐伊斯兰化，并且与欧洲国家来往密切，尤其是建立了和法王菲利普四世之间的同盟关系。合赞的陵墓在大不里士城区里面，但由于几次地震的缘故，已经基本没有任何遗迹，完者都的陵墓在苏丹尼耶还保留完好，我决定去拜访一下。

完者都延续了哥哥的政策，他希望在这片草原上建立新的蒙古城市，将都城从马拉盖迁到苏丹尼耶，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城堡。然而在他死后，城市开始恶化，帖木儿帝国时期破坏了这座城市的建筑，只留下完者都的陵墓。

蒙古人本没有修建大型陵墓的传统，现在保留下来的陵墓，要么是后人修建的纪念建筑，要么是皈依其他宗教的蒙古人陵墓。我之前去新疆见过一座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君主的陵墓，就是伊宁的吐虎鲁克麻扎，麻扎属于东察合台

汗国君主吐虎鲁克·铁木尔汗，吐虎鲁克麻扎也是东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唯一保存下来的地面遗址。



当我来到苏丹尼耶的时候，虽然之前已经见过图片，但还是被这座建筑的体量震撼到了，从远处望见这座建筑，如同世界奇观一样的存在。一座庞大的八角形砖石拱顶塔，覆盖着蓝绿色彩陶的拱顶，这些蓝色的瓷砖是后期修复的，圆顶周围有八个圆柱，在建筑后面有一片正在挖掘的考古现场。

我走进陵墓内部，内部几乎被脚手架填满了全部空间，我沿着楼梯向上走，一共有三层，墙壁上绘制着古兰经经文，在建筑外墙上不会看到太多的装饰，内墙的装饰比较丰富，墙壁上用瓷砖和石膏装饰着，但是剥离比较严重，还在修复当中，一些装饰结构被分解下来摆在地上。我走到顶楼外面，外阳台墙壁上用几何图案的花色砖雕装饰，天花板上有橙色的拼接图案。

这座陵墓修建的时候有很多功能，包括图书馆、祈祷室、教学和医疗等

等，在陵墓旁边还埋葬着当时的一些诗人和教士。完者都曾经想把阿里和侯赛因的陵墓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迁到苏丹尼耶，这样什叶派穆斯林就可以在苏丹尼耶朝圣，但是伊斯兰教不允许挖掘遗体，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当蒙古人征服各地开始建立稳定的政权之后，必然要启用本土民族参与管理，在蒙古人的构架下，帝国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就像蒙古草原各个部落一样，只要每个部分按时纳税，在战争时提供军队和给养，他们在其他事务上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运作。这对于习惯了大一统治理的汉族文人阶层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事情，因此在大元帝国内，这些汉族文人阶层常常迁怒于蒙古人带来的色目人官僚集团。

在伊尔汗国，有丰富的跨文化多民族帝国治理经验的波斯人很适应蒙古人的统治，伊斯兰教本身的包容性和自治社区理念与蒙古人的松散管理思路是相融洽的，伊尔汗国的伊斯兰化正是蒙古统治者接纳了波斯人的治国经验与文化传统。

在这一点上，伊尔汗国和元朝的关联很紧密，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时候，旭烈兀支持忽必烈，从而得到许可建立了伊尔汗国，他的儿子阿八哈也被忽必烈诏立为汗。到了合赞汗统治时期，他的继位得到了忽必烈的孙子元成宗孛儿只斤·铁穆尔的支持，这种关系延续到完者都时代。

在完者都死后，他的儿子彻底成为了一个穆斯林统治者，名叫阿布·赛义德，继位不久陷入权臣出班引发的内乱，伊尔汗国在阿布·赛义德死后不瓦解。在亚洲另一端，元朝丞相脱脱进行“更化”改革推广汉法，把松散的蒙古式统治逐渐变成汉人官僚更擅长的大一统治理方式。

蒙古人看似“落后”的管理方式在变得“先进”之后，反而失去了原有的自由生命力，汉人传统的禁锢统治手段消耗了帝国最后一点气数，无力平息各地的反叛，基层社会秩序不断崩塌。在伊尔汗国灭亡 11 年后，元朝的蒙古统治者退回了蒙古高原。

宁山哀：蒙古人到底建立了几个国家，伊尔汗国和元朝是不同国家还是从属关系，你能简单给我讲一下吗？

我：首先是 1206 年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国，之后就是不断的扩张，在扩张中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建立起各自的汗国，从属于大汗。1259 年蒙哥汗去世后，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两个人争夺汗位，当时相对独立地位的有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钦察汗国，分别是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和长子术赤的儿子拔都建立的，这三个汗国的统治者都反对忽必烈，只有旭烈兀支持忽必烈，条件是允许旭烈兀建立伊尔汗国。

1271 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也就是元朝建立，四个汗国拒绝承认忽必烈的汗位。1303 年元朝与四个汗国订立合约，四大汗国承认元朝皇帝为大蒙古国大汗，此外伊尔汗国为元朝藩属国。

宁山哀：这四个汗国后来怎么样了？

我：中国部分的历史你应该知道，1368 年明朝建立，蒙古人退回蒙古草原称为北元，后来分成瓦剌和鞑靼两部，最后一位蒙古大汗是察哈尔部的林丹汗，被皇太极击败，之后漠南蒙古各部承认皇太极为大汗，蒙古帝国的法统也就彻底结束了。

窝阔台汗国在 1309 年被元朝和察合台汗国瓜分亡国，伊尔汗国和察合台汗国都在 14 世纪灭亡或分裂。最后灭亡的是钦察汗国，统治了俄罗斯长达 260 多年，直到 1502 年被推翻分裂成阿斯特拉罕汗国、喀山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等，在 16 世纪都被俄国征服，1783 年叶卡捷琳娜大帝收复了克里米亚汗国，至此钦察汗国衍生出的国家全部结束了。

离开完者都的陵墓，我向南到达城区边缘，那里是莫拉·哈桑·喀什（Molana Hassan Kashi）的陵墓。这座陵墓离城区略远，在群山的背景中，远处青色的拱顶非常醒目，陵墓前面有一个小广场，我走近陵墓，下面是八角形建筑，建筑外部有通向上方的狭窄楼梯。

这座陵墓修建于 14 世纪，莫拉·哈桑·喀什是一位什叶派神秘主义者，在萨菲王朝第四位君主穆罕默德·霍达班达（Mohammad Khodabandeh）统治期间担任宫廷学者。这座建筑分成三个时期建成，据记载公元 8 世纪这里已经有一座建筑，但不知道用途，萨菲王朝时期修建了这座陵墓的主体，卡扎尔王朝时期修建完善，包括今天的正门部分。

在莫拉·哈桑·喀什陵墓的西边，我离开苏丹尼耶的时候路过了一座古老的建筑。这座建筑属于苏菲教团，由修道院和坟墓两部分组成，进入院子内是祈祷大厅，墙壁只剩下遗址，上面刻着有古兰经经文，后面的带着拱顶的砖石八角形陵墓保存完好，也可以进入内部参观里面的石砖装饰。在一部分记载中认为这座陵墓属于苏丹·沙拉比（Sultan Chalabi Ughlu），他在公元 716 年去世，他的学生们为他修建了这座陵墓。

来苏丹尼耶的游客大多晚上会住在赞詹，赞詹这个地方和大不里士比起来感觉要保守一些，街上穿黑袍的女人比较多，头巾戴的也相对严格。有意思的是，不少女人会用蒙头披风然后露出一只胳膊，有点像藏袍的穿法，藏袍的穿法是因为高原温差大，赞詹温差并不大，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穿着。

赞詹的商业氛围非常浓郁，夜晚这座城市有几条热闹的夜市，拉小提琴的街头艺人们吸引着人群的注意。伊朗街头有很多鲜榨果汁店，价格便宜而且会放大量的新鲜蔬果，比北京要好太多，我欣赏着小提琴演奏，一杯接一杯喝胡萝卜汁。



焦勒法、马库：山中的亚美尼亚人

在伊斯法罕的时候，我拜访了亚美尼亚移民聚居的新焦勒法街区，现在我来到了这些亚美尼亚人的故乡焦勒法。在伊朗西北部的山区，几座老教堂勾勒出了亚美尼亚人的历史。

从大不里士出发，我们一路向北直到阿拉斯河伊朗和阿塞拜疆的边境线，这条边境线是曾经波斯和俄国划定的，河对面是阿塞拜疆的纳希切万地区。16世纪末，俄国在波斯建立了东正教教区，并且在英国和波斯之间扮演贸易中间商的角色，这样可以避开奥斯曼帝国和葡萄牙人。卡扎尔王朝时期，俄国进入高加索地区，与波斯签订古丽斯坦条约，划定了这条直到现在依然有效的边界，俄国获得了阿拉斯河以北的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个国家。



在伊朗-阿塞拜疆边境口岸向西，我们开车路过了半山腰的牧羊人小教堂（Chapel of Chupan）。这座教堂由亚美尼亚人建于 13 世纪，是一座非常小的十字形结构建筑，中心有一个白色圆锥顶，教堂门锁着，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祭坛。

传说有一对牧羊人兄弟，在阿拉斯河两岸各自修建了一座教堂，现在河对岸的教堂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这一座，2015 年进行了修复。虽然在对面阿塞拜疆境内没有教堂，但是却有一座古丽斯坦陵墓（Gulustan Mausoleum），这座陵墓看起来受伊尔汗国建筑的影响，外观是一座塔，用红砂岩建造，基座是大块石头建造的，上面的锥形尖顶被修复过，在一些修复前的老照片上可以看到尖顶已经不存在了，只有残破的圆柱形部分。

经过牧羊人教堂，我们继续向西边的山里开去，来到更有名的圣斯捷潘诺斯教堂（Monastery of Saint Stepanos），离得很远我就可以看到教堂的圆柱形拱顶和尖尖的钟楼。

圣斯捷潘诺斯教堂是边境地区历次战争和民族冲突的见证，最初修建于公元 9 世纪。传说使徒圣巴多罗买在公元 62 年修建了波斯境内的第一个教堂，塞尔柱人和拜占庭帝国战争期间教堂被破坏。伊尔汗国时期，亚美尼亚人与蒙古统治者签订了和平协议，蒙古人同意保护基督徒和教堂的安全，这座修道院在 13 世纪得到修复。

15 世纪，萨菲王朝承诺保护这里的亚美尼亚人，但是萨菲王朝初期常年处于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最后只好放弃了这座教堂，直到 17 世纪之后才恢复。到了 18 世纪，俄国和波斯以阿斯拉河为界，很多亚美尼亚人被强行迁徙到俄国，卡扎尔王朝时期这座教堂再次重建。

我走进教堂的院子，墙壁上有很多精美的雕刻，大部分是十字架花纹和亚

美尼亚文经文，地上铺着墓碑，教堂正门向内层层雕刻花纹，教堂内除了六翼天使之外没有复杂的壁画。我绕到教堂后墙，发现上面有一幅石刻画，三个穆斯林打扮的人在殴打一个男子，旁边一个教士打扮的人抱着十字架，一个角落有天使飞过，这大概描述的是亚美尼亚基督徒被迫害的历史。在教堂旁边有一个庭院，有供住宿的部分和一个小小的博物馆，里面有教堂修复前留下的石刻和圣器。



离开圣斯捷潘诺斯教堂，我们从伊朗-阿塞拜疆边境继续开往伊朗-土耳其边境。在进入山区之后，已经许久看不到别的车了，山里温度开始下降，有时阳光猛烈地照射，但翻过一个山头又突然开始下雨。远处的雪山是亚拉腊山的支脉，传说中大洪水之后，诺亚方舟漂泊了5个月，最终停靠在亚拉腊山上。

我和司机在路上闲聊着，关于两个国家民众苦难与禁锢的生活，我问他不想去土耳其或者欧洲，他说年轻的时候想去，但现在已经有了家庭，即使有想法也很难离开了。伊朗这些年由于制裁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他无法得到工厂

里面稳定的工作，只能靠多打零工赚钱养家。

沿着蜿蜒的盘山道走过几座雪山之后，从远处可以看见两座亚美尼亚圆锥形屋顶，一座黑色的一座白色的，我来到了圣赛迪斯教堂（Saint Thaddeus Cathedral）。圣赛迪斯也叫圣犹大，这个犹大不是出卖耶稣的叛徒加略人犹大，是耶稣的另一个门徒。



圣赛迪斯在公元 40 年来到亚美尼亚和波斯传播基督教，并在亚美尼亚殉难，这座教堂就是纪念他的殉难，他影响了亚美尼亚成为第一个基督教国家，在亚美尼亚的历史叙事中有重要的地位，这座教堂也就因此成了亚美尼亚人重要的朝圣地。虽然圣赛迪斯教堂原建筑修建于公元 7 世纪，但是今天看到的建筑大部分是在 1811 年由卡扎尔王朝阿巴斯·米扎尔王子赞助修复的。

教堂分成两部分，较小的东部部分是黑色的，是更古老的教堂原建筑，所以这座教堂最初也被称为黑色教堂，较高大的部分是白色的，在几次大地震之

后用白色的石头进行修复，所以这座教堂有前后两个圆顶。教堂正面用脚手架支撑着，室内也是脚手架，正在维护中。教堂外墙有很多石刻，除了花纹和十字架之外，还有士兵的形象和战斗场面。

虽然在深山当中，但来教堂拜访的人比较多，所以有人在这里照看，教堂里还点着蜡烛。当然对外国人，教堂管理者主要的工作是收门票，这些历史遗迹对伊朗本地人不收费，对外国人收费相比于伊朗物价还是比较高的。虽然说文物保护建筑收门票用于日常维护是合理的，但长途跋涉来到深山中的教堂，结果一进门就谈钱，让我对这座教堂的名字“犹大”恍惚了一下，尽管并不是同一个犹大，教堂收门票也比不上出卖救世主那么严重。

宁山哀：你嘴也够损的。

离开圣赛迪斯教堂，我要前往此次伊朗西部之旅的最西北角，也是伊朗西北部世界文化遗产教堂群的最后一座教堂——德佐德佐教堂（Chapel of Dzordzor）。

从圣赛迪斯教堂到德佐德佐教堂之间没有公路，我们也无法徒步翻山，只有原路返回然后从北面的边境小城马库绕一个大弯再上山。马库的历史与巴布教和巴哈伊教有关，巴布教创始人巴孛（Bab）在波斯各个城市游历传教，1847年巴孛被逮捕押送到大不里士，40天后又送到马库囚禁9个月。

巴孛在马库很受欢迎，他的支持者们纷纷来探望他，所以波斯君主决定把他带回大不里士，1850年在大不里士的一座军营里处决了巴孛。巴孛死后，他的遗体被追随者带到海法埋葬，就是今天海法的巴哈伊世界中心。巴孛死后，他的学生巴哈欧拉（Baha' u' llah）创立了巴哈伊教。

宁山哀：你如何看待巴哈伊教，你觉得这种融合各个宗教的尝试是有意义的

吗？

我：如果只是将多个宗教融合，那么越南的高台教、明朝兴起的三一教等等都是如此，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摩尼教也是琐罗亚斯德教融合了佛教和基督教，还有新纪元运动之后各种杂糅教义的新兴宗教。巴哈伊的核心依然是弥赛亚式的，只是更加宽松和强调共性，这对那些处于亚伯拉罕系宗教背景下的人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无法与周围的环境、自己的过往背景割裂，只需要更进一步包容更大的范围就可以。

但我并不觉得巴哈伊是一个独立的宗教，巴哈伊信徒自己也更多用信仰而非宗教来自称，我更倾向于巴哈伊是一种对于宗教的解读或者探索方式，而非宗教本身。这也是巴哈伊早期被认为是伊斯兰教一个教派的原因，是后来的互斥和压迫让巴哈伊逐渐更加独立。

宁山哀：如果只看亚伯拉罕系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能够融合统一吗？

我：这个问题太深奥了，一方面宗教不只是核心教义那几段话，这三个宗教都有上千年的历史，已经各自独立衍生出非常多的分支教派、教团组织、学说理论、释义解读，这些远远超出了基本教义，是几乎无法融合的。

另一方面即便是核心教义，这三个宗教的相似之处也是很表面的（比如伊斯兰教承认基督教和犹太教中出现的某些人物），只是后者承认了前者经历的部分历史，但对于人物意义的解读和世界观的看法都是不同的，比如伊斯兰教不认为耶稣有神性是耶和華的儿子，认为他只是先知，这和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基本教义就不同，再比如犹太教中根本没有明确的天堂和地狱。

宁山哀：如果我们抛开教义分歧，只从道德与人性层面来看，这些宗教难道没有共性吗？比如劝人向善，会不会总结出这些宗教在教义区别之外相通的意识呢？

我：你如何定义什么是“善”？如果不同宗教对“向善”的理解本身就不一样呢？对于“善”或者说对于道德的理解本身就来自人的世界观，你对他人和社会的态度就来自你对世界的认知。如果你要去辨别出一个宗教的教义中哪些部分是向善的，你就必然有一个超然更高的标准，那如何得出这样的标准呢？

宁山哀：所以你认为宗教之间互相攻讦是正常的，但这些纷争对人类的伤害是巨大的，为什么不能有一种方式结束这种纷争？我觉得这是一个应然和实然的问题，你可以说这些是目前客观存在的现实，但不能说就应该是这样。

我：你认为不该有这些纷争是因为你站在一个世俗者的角度，认为这些纷争是不重要的，你觉得人们在为了一些和现实无关的理念互相攻击。但如果你是一个教徒，你就会理解这些纷争是很重要的，是跟现实完全相关的，因为这些纷争就是关于人类的命运，不只是个人而是人类整体的命运，不只是现在还包括前往另一个世界的，超越我们现在理解的时间与空间的命运。

你之所以认为这种纷争只是在伤害人类，是因为你不相信这些纷争在决定真理。你可以想象我们人类在一艘船上，前面是冰山，一部分人说我们要后退然后换一条路，一部分人说我们要加速能撞碎冰山，还有一部分人说我们维持不变听天由命，他们会有共性吗？这个争论难道不重要，不该坚持吗？

宁山哀：我们各自保留观点吧。

到达马库之后已经是傍晚，我担心无法赶在日落前返回，走雪山山路会有风险。我和司机商量了一下，司机也没去过德佐德佐教堂，恐怕在山里寻找教堂会耗费很多时间，但为了让我的旅途不留遗憾，他还是决定冒险开车上山。

我们沿着蜿蜒的盘山道缓慢前行，翻过了一个山顶，到达一片被栏杆围住的平地。围栏有一道门是锁着的，看门人说需要我的护照并且要与上级确认才能放行。我的司机建议我给他一点钱，大概人民币 10 块钱，看门人愉快地放行

了。我们继续向山里深处行驶了一段，到达一处悬崖边，我的脚下前面是一片山中的湖泊，一座小小的教堂在悬崖边的小丘上。此时已经是日落前的时刻，周围的雪山反射着最后一线余晖，光芒映照在教堂的尖顶上。



这座教堂大概只有几个平方米，一座圆柱尖顶的小房子，四面人字形屋顶。教堂修建于 13 世纪，17 世纪这里的亚美尼亚人迁走，教堂就逐渐废弃了。之前的教堂位于低处，由于修建水库，1988 年教堂被向上整体移动到这里。

这三座教堂是伊朗西北部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片建筑群，也是亚美尼亚宗教与文化传播的中心，同样也是基督徒朝圣的地方。对于亚美尼亚人来说，这片地区不仅是他们的祖先故土，也是他们自愿或被迫迁移到全世界的开端。

我越过雪山到达德佐德佐教堂，也就到了此次旅行的顶点。我这种草芥平

民，能出国看到这个地方，一辈子大概也就这一次机会，即使再有机会来伊朗怕是也不会到这儿了。我时而感慨，对于并无天赋运气也不好的人，恐怕一生中大部分期待都不会如愿以偿，笨拙地辛苦半生所得无几，那么能在短短的一生中，多去几个动人的地方看看，就是这一辈子聊以慰藉自己的了。



我的故乡在一片平原上，我希望当我短暂而渺小的一生结束之后，能把我埋葬在群山之中，了却一个凡人求而不得的诸多愿望中也许是最容易现实的一个。

一整天的行程，我和司机早上 8 点 40 分出发，到晚上 23 点 40 分回到旅馆，15 个小时，800 多公里的路。整一天我除了一杯茶之外，没有任何吃喝，我的司机除了一杯茶之外也没有任何吃喝，他还开了整整 15 个小时车。回到大不里士市区，我对他说你的生活真的很辛苦，赚钱太不容易了，他说别的游客来这里都是吃吃喝喝，你在山里一天不吃不喝就为了找几座老教堂，想必你在中国的生活也很不容易。

我和司机就此分别了，我多给了他一些钱，在路上的时候路过一个小镇子，他下车去给儿子买了两个西瓜。他说自己的孩子很爱吃西瓜，但是在土耳其西瓜很贵，所以没法满足孩子，难得路过那个产西瓜的镇子就买两个带回去。我想到了自己小时候，父亲也是把好吃的都给我。

在这两天里，我和司机两个人一路上用磕磕巴巴的英语，拼凑出两个国家底层民众同样辛苦而无望的生活，劳动者艰难地度日，当权者不知人间疾苦，大家看不到未来有变好的可能，只能靠忍耐期盼着明天不会更糟糕。很难说我们俩的生活谁更惨一些，可能我对他人的快乐很难体会，对他人的苦难却更有共情，在伊朗的这次旅行，有了一点切·格瓦拉摩托之旅的感觉。

在北京的时候，我和朋友们经常聊起关于苦难的话题，这个话题在中国和伊朗之间是共通的。在我的一些泛中产阶级朋友们当中，苦难是一个书面上的抽象概念，是可以用文学和艺术去表达的，是一种紧贴人性本身的思考。然而在我所见之中，大部分的苦难都是具体的，是脱离承受者自我的人性，由外力强加的制度和规则导致的贫穷、饥饿、不公和发展受限。

这是一种结构性的苦难，意味着社会中一定有一部分人（可能是大部分人）普遍生活在苦难当中，而少数人因为多数人的苦难才能获得利益，这是由社会规则设计本身导致的。

我曾经认为苦难来自人内心的深层原因，但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苦难其实并不是自我内心导致的。归因自我是一种软弱的自欺欺人，也是一种无能为力的逃避，多数时候苦难就是无法克服的外部原因导致的。

社会总是试图塑造完美受害人，认为个体遭遇不幸一定有自己的原因，要么是不够努力，要么是不够聪明，要么就是单纯不走运，社会伪善地强调如果受害人做到完美就不会发生不幸，那些苦难都是可以用智力和资源规避的。人

们不敢归因于社会，因为害怕戳破泡沫之后发现眼前的这个规则是对自己多么不利，以及这个规则没有改变的可能。

在中国这个高速发展导致畸形竞争压力的社会中待久了，到了伊朗反而一下子有了释放，跟司机相处的几天，我们都搞清楚了各自遭受的苦难到底来自什么，是什么让我们如此辛苦而不快乐。在我们各自的国家，这种苦难在眼见的未来没有改变的可能，我们只能在阴云密布中等待风暴到来。

宁山哀：我又要和你讨论这个问题了，你的司机的苦难显然和你不一样，他的苦难是生活本身的遭遇，你的苦难是你自找的。他的日常工作就是这么辛苦，如果不是你乘车，他可能也是每天要开一整天的车，没有吃饭休息时间勉强养家，但你明明可以带着吃喝慢慢悠悠逛，甚至不去山里而是像个度假游客一样，他的苦难是没得选，你的苦难是自己选的。

我：你这种观点是认为各种选择是平行存在的，但实际上选择并不是平行的，选择是有阶梯差异的，明面上存在的选项实际上不一定可以选，是一个个节点因素把我推到了这一步上，实际上我们都没得选。

宁山哀：你的苦难恰恰是你想否定的那种用文学和艺术去表达的抽象概念，出版受挫并不是你个人的苦难，是这个国家所有写作者都在遭受的情况，但你不肯去写那些更容易通过审查的内容，所以我说是你的选择导致的，你主动选择了难度很大更容易挫败的道路。你所面对的苦难并不全是外界强行施加的，你的痛苦更多来自你内心跟自己拧巴。

我：出版审查是这个国家里客观存在的恶之一，你觉得我应该假装这是正常的避过去，然后以我并不喜欢的方式生活吗？这种痛苦不是我内心臆想出来的，就是实际存在的。

宁山哀：我是区分了挫败和痛苦，你无法出版书是一种挫败，但你的痛苦来自你在这件事情上寄托了太多东西，其他作家也会有无法出版的书，但不一定像你这么痛苦。这种寄托，包括你自己之前说的使命感，才是你痛苦的主要来源。我好奇你为什么不愿意把这种痛苦上升到精神和自我认同层面，而更愿意下沉到具体的事情中？

我：把痛苦归结到精神层面是一种内耗，这才是你说的自己跟自己拧巴，只会让痛苦无解。我觉得大部分的痛苦不是靠跟心理医生聊聊天能解决问题的，内心世界的反馈只是结果，外界的压迫与侵犯才是原因。这不是让人自省的时候，这世上能够靠内心解决的问题不到十分之一，十分之九的问题是靠脑子和拳头解决的，反过来也可以说，人们用脑子和拳头筛选掉绝大部分根本不需要上升到内心的问题。

宁山哀：外在情况的改变并不能让问题真正解决，只会让你去找下一个理由而已，就像你经常提及自己孤独，但如果给你丰富的情感生活就能解决你的孤独吗？实际上不能，你最多就是成为一个女朋友很多的孤独者，也许比你现在快乐，但解决不了孤独的问题，因为你不把这个问题上升到精神层面，而是不断在外界找新的理由，就是在抗拒问题被解决。你抗拒上升到精神层面，是担心发现自己确实有心理问题吗？

我：我一个俗人内心空荡荡的一无所有，能有什么心理问题。

宁山哀：话题结束的真生硬。

加兹温：鹰巢下的故都

在参观马拉盖天文台的时候，我提到旭烈兀将纳斯尔丁·图西从阿拉穆特城堡带到了马拉盖，聘请他作为顾问进行天文研究。阿拉穆特城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图西这样的天才会在那里进行研究？这指引我前往阿拉穆特城堡所在的加兹温。我在大不里士的司机之前读大学就在加兹温，他告诉我加兹温是一座很美的小城市，比大不里士更漂亮精致，这也吸引我前去逛逛。

提到阿拉穆特城堡，最有名的恐怕不是图西，而是一个传奇。在塞尔柱帝国时期有三个年轻人，分别叫阿布·阿里（Abu Ali Hasan ibn Ali Tusi）、哈桑·萨巴赫（Hassan-I Sabbah）和欧麦尔·海亚姆（Omar Khayyam），这三个人在一起学习关系很好，他们承诺如果其中有人身居高位，一定要提拔另外两个人。

后来，阿布·阿里成为了塞尔柱帝国的宰相，被称为尼扎姆·穆勒克（Nizam al-Mulk）。按照约定，尼扎姆打算提拔两个朋友，欧麦尔对政治不感兴趣，他更愿意从事学术，尼扎姆给他建了一座天文台资助他的研究，欧麦尔成为那个时代著名的通才学者，更为人知晓的是他的诗歌《鲁拜集》。

但哈桑却觉得尼扎姆给他的利益太少，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离开了尼扎姆，来到阿拉穆特山修建了一座城堡招募刺客，也就是著名的阿萨辛刺客集团（Hashshashin）。阿萨辛这个名字意思就是哈桑的追溯者，哈桑也被称为山中老人，他第一个要刺杀的人就是尼扎姆。

宁山哀：这是真实的历史，还是个传说故事？

我：这三个人物是真实存在的，但这个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从三个人的年龄、

出生地和早年经历来看，他们不太可能是同学，尼扎姆的年龄比哈桑和欧麦尔大不少，三人彼此之间的关联也更多基于政治因素。在哈桑年轻的时候，欧麦尔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诗人，而尼扎姆已经坐到了宰相的位置上。

宁山哀：哈桑是不是《倚天屠龙记》里面提到的山中老人？他不是明教的人吗？

我：那是金庸的杂糅，哈桑所在的教派是什叶派-伊斯玛仪派-尼扎里派（Nazarī），伊斯玛仪派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也叫七伊玛目派，与主流的十二伊玛目派区别在于第七任伊玛目的人选问题。在法蒂玛王朝时期，伊斯玛仪派不断分裂，1094 年由于继任者的分歧，王子尼扎里被弟弟穆斯塔法处决，尼扎里的儿子从埃及逃到阿拉穆特，尼扎里的支持者们称为尼扎里派。

宁山哀：《天使与魔鬼》里面好像提过这个刺客组织阿萨辛，用大麻控制年轻人去刺杀政敌。

我：哈桑是一个传奇远多过史实的人，有人认为他在城堡中用麻醉剂控制刺客，给他们制造天堂的幻象，利用他们刺杀自己的敌人，但并没有证据支持这种指控。阿拉穆特城堡是一个学术中心，人们在这里一起学习和祈祷，进行翻译研究，受到主流教法学派排挤的学者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研究，其中就包括我前面提过的纳斯尔丁·图西。

宁山哀：真实的历史中，哈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刺杀尼扎姆？

我：在真实的历史中，哈桑本人并不是一个刺客，而是一个宗教学者，他写过一本自己的传记，但没有保留下来。在零散的资料中，大概可以知道哈桑早些年在中东各地游学，主要是在开罗法蒂玛王朝的宗教学院学习。哈桑回到波斯之后，尼扎姆下令逮捕他，原因可能是哈桑反对塞尔柱王朝的宗教政策。

哈桑逃到了阿拉穆特山区，买下一座城堡并进行扩建，称为鹰巢，之后的 35 年里直到去世，哈桑都没有离开过阿拉穆特城堡。一些学者认为哈桑与尼扎姆的矛盾是波斯什叶派穆斯林对塞尔柱王朝不满，因为塞尔柱统治者对波斯工匠征收重税并且重用突厥人，在这样的背景下，阿拉穆特更像是一个本土民族的抵

抗运动。



哈桑、欧麦尔和尼扎姆这三者更像是一个社会的平衡结构，尼扎姆代表社会的公权力，这个公权力在良善的时候可以引领民众，集中人们的劳动价值。但开明专制君主只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中，专制制度决定了君主不可能是真正开明的，他必然存在人的欲望与缺陷，所以公权力很容易堕入罪恶，就需要另一种力量去制衡。

哈桑就是另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破坏式的，用来矫正公权力对社会造成的侵犯。刺杀个人很难彻底动摇制度，哈桑的力量并不在于彻底颠覆旧制度，因为激进式的革命同样会带来失控混乱。哈桑的力量是针对人性本身，通过人对于死亡的畏惧，来达到自我约束的作用，这种自我约束通过以暴制暴的方式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制度整体的良善修正，但依然是一种人治而非法治，没有改变制度本身而是持续处于对抗中。

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中，社会处在激烈的对抗状态，欧麦尔代表大多数平民的向往，他们是社会的主体，享受着科学、艺术和文学，同时秉持着来源于自然法的朴素观点支持他们认为对的一方。尼扎姆和哈桑的对抗是激进的，所以社会的主体部分必须是保守的，保守意味着社会有足够的审慎放缓变化，不会过于急速滑向某一个极端。

理想保守的社会并不只有禁锢，保守意味着民众的天然自由是不需要公权力确认的，民众之间结成社会制定规则，公权力服务于社会，社会自己决定自身的发展，而不是由公权力来决定。强大而保守的社会可以自我控制在一个谨慎的范围内，不让公权力带动社会朝不合适的方向前行，也不让公权力过分削弱以至于无力服务民众，也就是在尼扎姆和哈桑之间保持平衡，不让尼扎姆过分强大侵犯民众，也不让哈桑过分强大引起动荡。



宁山哀：所以你的观点是通过对统治阶层中个人的生命威胁，来降低他们利用权力作恶的可能性，但我觉得这本身就会带来新的权力阶层，那些刺客们可能

被收买，也可能被利用于政治斗争，而且用刺杀平衡权力也太矫枉过正了。

我：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足以矫枉，有多少统治者无时无刻不被刺杀威胁，但这阻止他们继续扩张和滥用权力了吗？并没有，因为权力的诱惑远远大于死亡的威胁。你说的刺客会被收买和利用，这也是有可能的，哈桑管理刺客的方式也在试图解决这一点，比如除了刺杀行动之外都不下山，避免外界的诱惑和误导，再比如狂热的内心追求和坚固的信念支持。

宁山哀：如果统治阶层每个人都因为死亡威胁而不得不行善，你觉得这就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吗？

我：你小看了权力的破坏性，当一个人掌握公权力的时候，哪怕只掌握一点，破坏性也是巨大的，必须有一个强力的方式限制他，这是他拥有权力的代价。死亡威胁不是死亡本身，刺客们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针对每一个人，而且死亡威胁比死亡本身更有效果，如果你把刺杀也当成一种权力，那么这种权力最大的时候恰恰是不真正使用的时候，死亡最大的恐惧不来自死亡本身，而来自他不知道自己将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去死。

我和司机沿着山路从加兹温开车两个多小时，经过重重雪山，先是到达阿拉穆特镇，然后开到阿拉穆特城堡的半山腰，接下来我要徒步走到山顶。这座城堡目前正在修葺当中，只有非常简易的围栏台阶和没有修好的缆车轨道。在陡峭的山岭，一条蜿蜒的小路盘桓向上到山顶，这是进入城堡的唯一通道。

城堡的顶端还在修复中，工人们在这里搭建游客设施。城堡外部和上方都被脚手架覆盖着，顶棚笼罩的主体分成两部分，中间有一个向下的通道，可以进入地下室蓄水池，遗址中还残余着少许的墙砖和门廊。

在哈桑统治城堡的时候，他加固了防御工事和供水系统，扩大了山谷的灌

溉和耕作，让城堡可以独立抵抗很长时间。我原以为城堡已经在战乱中被彻底摧毁，但还是留下了不少遗迹正在被挖掘出来，这些遗迹并非逃过一劫，而是被摧毁之后的剩余。

阿拉穆特城堡抵抗的资本并非军事的强大，除了群山之中易守难攻且自给自足之外，他的力量来自信念，来自人们对强权的天然抗拒，阿拉穆特被摧毁的只是一堆石头建筑，当石头建筑被摧毁，建筑中的信念才会散布到各地，而这些信念刀枪不入。

蒙古人到来的时候，哈桑早已去世多年，旭烈兀必须攻克这些城堡才能继续进攻巴格达，此时阿拉穆特城堡已经和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结成了同盟，一些野史中认为他们试图刺杀蒙哥汗而激怒了蒙古人。在蒙古军队围攻中，最后一任伊玛目鲁克赖丁库沙（Rukn al-Din Khurshah）投降后被杀，蒙古人拆除了这座城堡，非常遗憾的是城堡的图书馆被毁掉，很多资料消失。



离开阿拉穆特城堡下山，我回到加兹温城里，这里曾经短暂做过萨菲王朝

的首都，我前面在大不里士的时候提到，萨菲王朝第二任君主塔赫马斯普一世时期，将首都从大不里士迁到加兹温，他的孙子阿巴斯大帝又迁到了伊斯法罕。

今天的加兹温市区还保留着一座小小的四十柱宫，就是塔赫马斯普一世的皇宫，在卡扎尔王朝时期进行了重建。塔赫马斯普一世在任期间，为了远离与奥斯曼对抗的前线，同时由于大不里士在连年的战争中损毁严重，他与奥斯曼签订了和平条约，将首都迁到远离前线的加兹温，同时逐渐疏远萨菲王朝起家的突厥部落军队，开始重用本土波斯人。

在皇宫西侧不远，我来到加兹温巴扎，现在一部分被改造成旅游区，开设了一些手工艺店铺、餐馆和咖啡馆，另一部分还在延续着传统的生意。加兹温曾经是丝绸之路重要的一站，来自东方的商人把货物传递到这里，再由波斯商人继续向西方运送，巴扎里的商人们按照各自的货物品种聚集在不同的区域，部分店铺下面还有地下室，可以存放一些需要阴凉保存的货物，一些珍贵的货物会存放在可以锁住的房间里。

商人们形成一个个商团联盟，巴扎不仅仅是市场，也是商团们制定价格交换信息的场所，和很多城市一样，加兹温的巴扎中心也是一座清真寺。在我到达加兹温的时候，美国政府刚刚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制裁伊朗的经济，因为伊斯兰革命卫队不仅仅是武装力量，同时深度参与伊朗的经济建设。

一位加兹温本地人士告诉我，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是巴扎供养起来的，是属于伊朗社会而非政府的军队。在之前的君主制时期，国王的军队常常用于镇压民众，卡扎尔王朝末期国王将国家利益出卖给外国人，损害了以巴扎为核心的伊朗本土商人们的利益，引发了商人阶层和教士阶层的联合抵抗。

到了巴列维王朝，尤其是第二位君主穆罕默德·礼萨时期，大量引入外国

资本和西方价值观，引起了商人和教士联盟的不满。在伊斯兰革命之后，需要一支真正属于民众的武装，由市民阶层的基础——巴扎和教士提供支持，不会为了统治者而出卖民众的利益，所以并不是革命卫队掌握伊朗的经济，而是伊朗民众供养革命卫队作为属于人民自己的武装。

在伊朗我很喜欢窜街头逛巴扎，观察商人们交易的方式，陌生人之间怎么打招呼，尽管伊朗和中国一样高度僵硬体制化，但民间的自组织生命力依然发达。这或许因为波斯人历史上最擅长的是发明秩序，当人们能够自己发明秩序的时候，无论统治者什么样，民众都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方式组建社会来制衡公权力。

如果人们不能自己发明秩序，就只好由统治者来制定秩序，于是统治者说馒头沾白糖你就不能沾红糖。波斯人的幸事，就在于他们能够发明秩序，甚至可以向外来统治者输出秩序，这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实在是很重要的能力。



加兹温巴扎有一家艺术馆，里面展示着泥塑作品，大部分表达的是菲尔多西的《列王记》中的内容。其中有一个像后羿射日造型的雕刻，描述的是伊朗古代的英雄阿拉什（Arash），在一场战争中，双方决定由伊朗人射出一支箭，箭落下范围内的土地都归伊朗人，阿拉什射出的箭从黎明飞到日落，他成了英雄，在伊朗很多地方都有他的雕像。

还有一件作品，讲的是波斯传说中英雄鲁斯塔姆（Rostam）的故事，他击败了中国的可汗（Khaghan of China），泥塑上中国可汗骑着大象，倒是像印度人的打扮，按照历史的对照来看，鲁斯塔姆对抗的应该是印度-斯基泰人。

在加兹温巴扎改造的游客区中有很多文艺的咖啡馆，我早上来到这里吃早餐，在一家欧式风格的咖啡馆中点了一份英式早餐，却另外给我端上来一份伊朗大饼。这并不稀奇，大饼是伊朗很重要的食物，也是政府进行补贴不会提高价格的食物。伊朗人对大饼非常热爱，无论点什么餐都会端上来一篮子大饼，有的餐馆会用小袋子装好比较卫生，很多便利店门口都会挂着一袋袋的大饼售卖，当然巴扎里面的作坊现烤的大饼是最受欢迎的，只是要排队很久。

不同地区的大饼也各有不同，在南部胡泽斯坦是很薄的饼，硬硬脆脆的有点像中国的煎饼，而北方的大饼则是很长很厚一张，早上街头能看到很多人拿着半米长的大饼在路上吃。在伊朗的旅馆里，早餐必不可少的是大饼配上黄油、果酱、蜂蜜，还有黄瓜和西红柿的沙拉。

我很欣赏伊朗人对大饼的热爱，一个群体如何在感性的层面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同？就是说的语言和吃的食物。说外国人的语言吃外国人的食物然后谈本国民族主义，这是很多精英统治阶层的失败，也是他们的虚荣和软弱，从这一点上讲，巴列维国王并不热爱自己的民众，觉得他们落后而愚昧，对于君主来说最大的错误就是看不起自己的乡亲们。



我离开巴扎向东走，有一座曾经属于俄国教会的东正教康托尔教堂（Kantour Church）。在卡扎尔王朝时期，为了把伊朗的城市连接到欧洲，开始修建现代公路，加兹温的公路由一家俄国公司承包修建。康托尔教堂建于1905年，是在加兹温的俄国工程师们使用的教堂，教堂由红砖建成，康托尔的名字意思是办公室。

教堂从平面看是传统的十字形，大门上方和两侧墙壁装饰着东正教十字架，正门是一栋三层的钟楼，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绿色圆顶，钟楼后面有一个比较低矮的拱顶。教堂前面院子里有两座纪念碑，一座是纪念一位在这里工作时去世的俄国工程师，另一个是1906年死于飞机失事的俄国飞行员。我走进教堂，现在里面是一家商店，售卖一些小礼品，还保留着一个小小的祭坛。

经过了萨菲王朝时期与俄国的时战时和，俄国向波斯大规模移民要到十月革命之后，很多抵触苏维埃政权的俄国人到了波斯北部的吉兰、马赞达兰和阿塞拜疆。在十月革命前，德黑兰有两座俄国教堂属于大使馆，还有俄国墓地的

一座钟楼，整个伊朗有大概 50 座东正教堂。20 世纪 40 年代，俄国移民在德黑兰筹建了圣尼古拉斯教堂（Saint Nicholas Church）。直到 1979 年伊斯兰革命之后，新政府驱逐了教会，圣尼古拉斯教堂被逐渐废弃。

我从东正教堂回到巴扎，路过犹太四先知墓（Tomb of the Four Prophets），这四位先知将耶稣基督的消息从耶路撒冷带到了东方。11 世纪末这里被改造成一座清真寺，建筑有一个青色塑料质感的拱顶，内部也是典型波斯陵墓的浮夸华丽风格。

从四先知墓向南走过几条街，我来到伊玛目宰德侯赛因陵墓（Imamzadeh Hossein），这座陵墓造型体量巨大，更像一座宫殿，院子里有一个凉亭一样的八角形喷水池，建筑正面被蓝黄色的瓷砖覆盖着，中间是 19 世纪安装的镜面。男女朝圣者从两边不同的小门进入，里面的墙壁和顶棚也都覆盖着镜面，建筑中间是宰德侯赛因的陵墓，同样是亮闪闪的审美。

宰德侯赛因是伊玛目礼萨的儿子，他在和伊玛目礼萨前往加兹温的途中去世，埋葬在这里，萨菲王朝时期修建了这座清真寺。在清真寺后面是一片军人墓地，有一排排军人的墓碑，每个墓上有一个小小的龕，里面放着家属留下的纪念品、照片和死者遗物。

夕阳下，我在墓地里漫步，看到一对老夫妻来看望他们的家人，老奶奶擦拭着墓碑，老爷爷坐在旁边凝视着。在墓地的另一端有一件金属艺术品，一个穿孢子的妇女隔着栏杆张望，栏杆上有很多锁头，这座艺术品代表的应该是思念死去的家人。



我在加兹温碰到一家旧货店，不到一百块人民币买了几件好玩意儿，第二天再去，店主就只推销单件三百、五百的东西了。这就是缘分，我只能买得起一百以下的东西，只能让这悲伤留在加兹温。

离开加兹温，我前往伊朗西部之行最后一座城市，哈马丹，这也意味着此次探访即将结束。伊朗的迷人之处并不是美，绝大多数地方在我看来都算不上美，规划非常糟糕，伊朗的迷人之处是一种更深的东西，这个国家有一种很悲伤的气氛，常常隐藏在人们的热情、浪漫和油嘴滑舌背后。

宁山哀：我觉得无法忽视的问题是，很多伊朗年轻人会觉得这种悲伤来自被强加的社会使命感，就像中国曾经也是这样（可能也包括现在），个人被社会裹挟的使命感。

我：从来不会因为人们想要轻松欢愉的生活，苦难就真的消失了，或者使命就

真的消失了。

宁山哀：所以说一个社会该有复杂多元的价值取向，来抗拒集体对个体的裹挟，包括抗拒集体硬塞给个人这样那样的使命。

我：对社会来说确实是，复杂的价值取向意味着宽容多元，但反映在个人身上，我反倒觉得只有简单而坚固的价值观才能守住多元的基础。价值观的复杂化，解构了人们基于自然法的朴素正义，当人们价值观模糊的时候，就有人从中蛊惑人心为自己获利。所以我更倾向于保守的朴素价值观，人们基于自由心证得出尽量不受外界嘈杂影响的观点。

宁山哀：你不赞同人应该接纳多元的价值观？

我：我觉得应该去理解，但不需要接纳，我们这个时代有意无意地弱化群体对群体的对抗，而强化个体对个体的竞争，从而让个体之间陷入内耗，无法形成团结的组织力量。人们意识不到冲突的时候，也就不会试图保护自己。

宁山哀：嗯，我明白了，你是认为要弱化个人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从而形成小的集体与集体间的对抗平衡，这样人不会一盘散沙，又不会某个单一集体过于强大。

我：可以这么理解，人们不需要在所有的的事情中表露价值观差异，因为人不是纯粹的观点组成的，这些观点不能替代生活，简单坚定的价值观让生活处于稳定的方向中，而不是不断摇来摇去。一个稳定的社会或者个人需要形成稳定的自发平衡，而不是不断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中来回摇晃。

哈马丹：西部腹地

哈马丹的规划和伊朗大部分城市都不太一样，这座城市在 1928 年由德国工程师卡尔·弗里希重新规划，城市结构是同心圆中心向外辐射六条道路。伊宁六星街也是这样的结构，差不多也是同一时期德国人设计的。哈马丹有点像伊斯法罕，北面历史遗迹地区相对比较贫穷，现代化的城区和店铺都在城市南边。

伊朗和德国有特殊的历史关联，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德国迫切需要打破英国和法国在欧陆的优势，因此大力拓展与中东地区奥斯曼和波斯的外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波斯是中立国，但因为奥斯曼、英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不得被卷入。由于英国和俄国对波斯主权的侵犯，波斯对德国产生了好感，德国驻布什尔领事瓦思穆斯在亲德的波斯宪兵队支持下对抗南部的英军，导致英国和俄国出兵分割了波斯。

巴列维王朝的开国君主礼萨竭力表达伊朗的独立，为了摆脱英国控制而更倾向于德国，包括航空、邮政、铁路和银行业的诸多合作，在希特勒上台之后，德国为了牵制英国和苏联，加强了和伊朗的联系，包括军事合作、留学生和科技输出。

虽然二战爆发后礼萨国王选择了中立，但 1941 年伊拉克的亲德政变促使英国和苏联联合入侵伊朗，控制从波斯湾到里海的通道。礼萨国王下台，伊朗境内的德国人全部被逮捕，英国支持南部的部落分离势力，苏联则在北部支持亲共的伊朗人民党。

在哈马丹城中心广场西侧，是一处伊朗犹太人的圣地——伊斯帖和莫迪凯之墓（Esther and Mordechai）。这座陵墓有一个圆顶，上面曾经覆盖着蓝色瓷砖，现在大部分已经剥离了，只剩下石砖。我从一道厚厚的石门进入建筑内

部，里面是祈祷室，进入内室里面有两座坟墓，就是以斯帖和莫迪凯的墓。我前面在舒什提到过犹太先知但以理的墓，以斯帖的年代比但以理要稍晚一些。

旧约中记录了以斯帖和莫迪凯的故事，他们是在波斯的犹太流亡者后代，以斯帖嫁给了波斯君主亚哈鲁随，一般认为这个人指的是薛西斯，波斯君主的首席顾问建议杀死犹太人，而以斯帖保护犹太人免遭屠杀，这一天成为犹太人的普珥节。今天在伊朗居住的犹太人大概不超过一万，我之前去德黑兰和亚兹德都有犹太教堂，但是除了宗教活动之外都不开放。



犹太人与伊朗的渊源也在这里，犹太人作为巴比伦之囚被掠夺到巴比伦，波斯居鲁士大帝征服了巴比伦之后，让犹太人重获自由，并且保护他们的宗教信仰，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但圣殿没有建成居鲁士就去世了，在他的儿子大流士时代圣殿建成，很多犹太人回到故乡，但也有一部分人留在了波斯，以斯帖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下。

从中心广场走过长长的步行商业街，步行街两边有艺术雕塑，展示着这条街的古老行业，茶摊、铁匠、鞋匠、车夫等等，最北面靠近遗址区的雕塑是古代武士的形象，因为这里靠近一片考古遗址区，我后面去看。广场中心的部分是传统的巴扎区，傍晚这里是城市最热闹的地方，人们散步逛街吃晚餐，靠近外延就变成了现代化的店铺。我走进巴扎里面的清真寺，因为不是礼拜时间，清真寺里没什么人，一个胖胖的小男孩过来和我打招呼，带我参观清真寺的尖塔、瓷砖装饰和古老的盛水石瓮。

沿着步行街我走到南边的小广场，这是伊本·西那（Ibn Sina）的陵墓，一座高耸的尖塔。西方人把他称为阿维森纳（Avicenna），伊本·西那是伊斯兰黄金时代最伟大的通才学者，他的知识好像出生前就在他的脑子里，出生后慢慢回忆写出来。伊本·西那出生在布哈拉，主要成就在医学、天文学等领域，他翻译了大量希腊罗马作品，并且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有深刻的研究和探索。

对于那个时代的学者来说，学习是一件特别需要天赋的事情，因为没有那么多资源和制度让你有机会慢慢补拙，伊本·西那显然是一堆天才里最出众的那一个。

这座陵墓并不是古建筑，是 1952 年修建的，纪念伊本·西那诞生一千年，虽然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反对巴列维时期的民族主义，但是霍梅尼本人很尊敬伊本·西那，所以保留了他的陵墓并加以扩建。

在中心广场的东边是海格马丹奈山（Hegmataneh），要走到广场最北面绕过去上山，经过一片米底亚和阿契美尼德时期的考古遗址和博物馆，小路的尽头是两座教堂，圣玛丽教堂（Church of Virgin Mary）和格雷戈里斯特凡教堂（Stephen Gregory Church），这两座教堂是由来自伊斯法罕的亚美尼亚人和在哈马丹的俄罗斯人修建的。



格雷戈里斯特凡教堂修建于 1676 年，1932 年进行了维修重建，正面是一个钟楼，铁皮的屋顶，属于亚美尼亚教会。我前往这座教堂的时候，教堂内并没有人，半掩着门，我自己进去待了一会儿。在宗教管理比较严格的伊朗，宗教场所开门但无人看管是不太常见的事情。旁边的玛利亚教堂属于福音派教堂，建于 1886 年。正面是一个两层带阳台的建筑，一个铁皮色的小尖顶在建筑中间，现在是亚美尼亚移民博物馆，但我去的时候并不开放。

我来到城区北面靠近诗人巴巴塔哈尔的陵墓（Mausolemu of Baba Taher），在路上看到了一座墓塔，这座墓塔是阿拉维家族的陵墓（Alavian Dome），最初是一座清真寺，阿拉维家族在塞尔柱帝国时代修建成家族墓塔。这座墓塔曾经有一个圆顶，但后来消失了，现在是一个立方体，我走进建筑内部，里面的墙壁上装饰着灰泥铭文，在入口上方有蜂窝形状的图案和花卉，在最里面我看到一个向下的台阶可以进入地下室，就是墓穴的所在地，墓葬上面覆盖着绿色的丝绸。

在哈马丹城的东南角有一座狮子雕像，在一座小山丘上面，是亚历山大大帝建造的，纪念他的亲密伙伴赫菲斯提安去世，这里曾经也是城市的旧大门，但大门已经被拆毁了。狮子原本是一对，其中一只在试图移动的时候被损毁了，就剩这一只了。



狮子形象在伊朗很常见，中国的石狮子雕刻来自波斯，唐朝时一些波斯人加入了皇帝的禁卫军，石狮子就是他们的象征，所以用来看大门，而且中国的石狮子没有雌狮形象，都是带鬃毛的雄狮形象，因为这些禁卫军都是男性。

宁山哀：我听过另一个说法，石狮子是自佛教影响，之所以雌雄一个模样，是因为画师们只在海外商人进贡的奇珍异兽中见过狮子，而进贡的狮子为了好看都是雄狮，画师们没见过雌狮，以为雌雄长相没有区别。

离石狮子不远，我找了一家咖啡馆，店主拿来波斯文的菜单，用磕磕巴巴的英语准备给我进行艰难的翻译，我微微一笑，一边看着波斯文菜单一边用英

语说出要点的东西。店主很惊讶，以为我能看懂波斯文。其实我根本不懂，甚至英文比店主更糟糕，我只是提前在谷歌地图上搜索了这家店，知道店里都有什么饮品和点心，然后装出好像在阅读菜单的样子而已。



尾声

回到德黑兰之后，我去见了一个伊朗朋友 Pouya，他是在我去伊朗之前一个中国朋友介绍给我的，因为伊朗无法使用一些互联网平台和国际信用卡，所以订旅馆和车票会比较麻烦，我的中国朋友就介绍了 Pouya 帮助我搞定旅途琐事。这一路上他帮我订的旅馆都非常好，基本上和我的需求偏好是一致的。

为了感谢他，我约他见面，打算送给他一盒茶叶。他带了一个朋友，我们约在一个剧场的咖啡馆里。他的朋友我没有记住叫什么名字，但印象却很深，因为他给我讲了一些伊朗人的婚姻和性。在此之前我知道伊朗有一种临时婚姻制度，大概是两个人订立契约，做一个宗教公证，然后可以以婚姻关系交往。我觉得称为临时婚姻有点不准确，更像是受法律保护的伴侣关系。

Pouya 的朋友有过 26 个女朋友，这让我非常惊讶，同时他也惊讶我的情感经历如此匮乏，在他看来“你明明是一个来自世俗国家的人，又没有人管你，你还有钱出国玩，为什么会没有女人呢”。他告诉我伊朗人收入很低，经济状况很糟糕，但婚姻的成本却非常高，普通人难以支付高昂的婚姻费用，但又需要满足情感需求和性需求，而伊朗法律禁止性交易，酒店也禁止没有婚姻关系的男女同住，所以就有了临时婚姻这种形式。

我告诉他在这方面中国和伊朗差不多，虽然在中国有过 26 个女朋友也不是很常见的事情，但中国对性的确是更开放的，甚至在我看来有些过于开放，变得随意而泛滥了。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婚姻成本同样畸形，也和伊朗一样有很多年轻人无法支付婚姻费用，只好选择一直恋爱同居的状态。

宁山哀：你是反对性开放吗？我特别奇怪一点，你这样的人明明应该拥护性开放才对，因为在传统婚姻市场上你并不占优势，相反性开放环境对你稍微更有

利，你的脑袋背叛了你的屁股。

我：不该由屁股决定脑袋，应该是脑袋决定屁股，因为屁股没有想法，脑袋才是你能自己选择的。确实在传统婚姻中我的条件不占优势，但我在观念上依然拥护传统婚姻。当然我反对婚姻的成本很高，我觉得不能等到有了充分的条件之后再结婚，而是先结婚再根据已有的条件生活，因为结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人们该改变的是自己生活的方式，而不是改变婚姻的方式。

宁山哀：所以你宁可在既没有婚姻也没有性开放中同时受两份罪，也不肯先放开其中一边。在我看来，你在今天社会选择一种保守的生活方式，包括情感与性的方式，这是很拧巴的事情，因为你周围的环境不是一个保守环境，这就会让你显得格格不入，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的小环境里，你和你的小环境是反着的。

我：我没有很保守呀，我只是觉得性应该和稳定唯一的情感亲密关系联系在一起，但在这种伴侣关系当中，做什么都是两个人的自由，只要满足自己和对方的愉悦就好了。我不觉得这种观点很保守，而且你只看到了我身边环境中相对开放的一面，可能因为我提的多一些而已，但我的环境中同样有很多传统的人，有不少甚至会婚前守贞，和他们相比我就远不算保守了。

宁山哀：所以你是否反对伊朗的这种临时婚姻呢？

我：我当然反对，但我反对的是社会物质需求对正常婚姻的压制，和社会观念对正常恋爱的禁锢，是这两个问题造成了临时婚姻。如果婚姻的成本可以让绝大多数人只需考虑情感共识而不会因为物质而远离婚姻，同时恋爱中的亲密行为得到尊重，那么就不会有临时婚姻这种畸形制度。

宁山哀：但你不能否认的是，社会的发展趋势就是人的多层面化，比如你可以有不同的职业，有多个兼职和社会身份，同样你也可以有多个情感伴侣或性伴侣。你不觉得这样其实更稳定吗，当你在同一份工作中寄托太多，又要顺心又要钱多，那你很可能失望，同样你在同一个人身上寄托太多，又有情感需求又有性需求，你也很可能失望，而且一个人身上恐怕无法满足你的全部性需求，

你可能也无法满足对方的，这是人本身的局限，人的独特。

我：这不是个好的类比，亲密关系和职业选择是不同的。我觉得这是一种思维局限，让人们遇到问题马上想到开拓广度而不是探索深度，因为好像广度上有很多选择，而深度则需要付出的精力更多。但这恰恰才是我觉得社会保守的地方，让人们在正常的婚姻和恋爱关系中失去想象力、好奇心和动物本能，不去探索情感和性的乐趣。这是社会很糟糕的一点，把稳定唯一的亲密关系变得乏味功利，反而鼓励人们开拓更多随意临时的关系。



在伊朗的最后一站，我去了霍梅尼的陵墓。这座陵墓还没有完全修好，却已经成了伊朗人郊游的地方，更像是一座郊外公园，周围不少冷饮店和打着太阳伞的座位。

我走进陵墓，陵墓除了体量巨大之外，内部样式和伊朗随处可见的伊玛目或烈士的陵墓完全一样。很多人在里面坐着聊天、合影拍照和祈祷，小孩子跑来跑去，只有陵墓正面的一小段有人看管，要求男女分开瞻仰，整个氛围和毛

主席纪念堂完全不同，领袖的墓葬成了属于市民的公共生活空间。

今年是伊朗伊斯兰革命 40 周年，也是霍梅尼去世整 30 年。当我最初计划伊朗西部之旅的时候，原本期待的是走访建筑遗迹和宗教场所，以及少数族裔和移民社区，但一个月的旅行之后，更让我关注的反而是伊朗的当下。

与世界上所有的革命相同的是，早期的革命理想最终会被国家本身的权力结构所裹挟，曾经有效抵抗君主暴政的社会结构在伊斯兰革命时期被宗教高层利用，到了两伊战争末期，这种革命的动员力已近乎枯竭。神权政治挤压了宗教的活力，把本该立足于民间自治社区的基层教团组织压迫在国家之下，从而失去了宗教阶层的超然精神领导，教士-商人-民众这个坚固的传统社会自治结构被裹挟在专制统治中，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早已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从这一点上讲，今天的伊朗并不是伊斯兰革命本来的样子，反而是革命在漫长的消耗中与权欲膨胀中逐渐偏离后的样子。我在伊朗最喜欢去清真寺和巴扎和那些中老年人待在一起，他们大多是经历过革命和两伊战争的一代，温和友好，信仰虔诚，但是却生活贫穷，本该是社会最坚实、最能以保守的态度稳健平衡社会的群体却过得很差，这才是伊朗的问题所在。

伊朗的问题并不只是伊斯兰革命神权统治的问题，更多的是革命的异化导致新的权贵政治经济问题，现在的伊朗和革命前夕反而是很相似的，从这一点上讲，一些中国作者只谈神权是在试图撇清中国和伊朗高度的相似性，中国的状况比伊朗还要更糟糕一些。

我在伊朗西部中小城市与德黑兰不同的感受，一个国家的首都往往会聚集起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但他们不能代表这个国家，他们过于活跃却缥缈的社会见解无法在这个国家落实下去。能够代表这个国家的是真正的乡土阶层，他们秉持着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商业运作，巴列维国王没有搞清楚，那些巴扎里面土里土气的小商贩，那些一本古兰经可以指导全部生活与道德的朴实百

姓，才是这个国家不可撼动的根基。

在来到伊朗之前，诸多的媒体文章告诉我这里是一个专制且宗教保守的国家，但是有热情淳朴的民众，以及渴望自由开放的年轻人。但在我的亲身观感中，这种描述的视角已经带着一种不恰当的审视，以自认为“正常”的标准去套用在他者身上。如果一定要说伊朗的特别之处，这种特别来自更深层的世界观。

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某些族群就是拥有更伟大的使命，同时他们也要承受“伟大之迷途”，问题在于人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一点。在伊朗的旅行途中，我发现这个社会虽然带着抗拒和哀怨，但是那些流露出的民族自尊心，那些崇拜牺牲的烈士纪念，伊朗人对于历史使命的认知和中国人是很相似的，相信自己注定带着特殊的意义来到这世上。

我们今天接纳了一种最现实同时也最功利的价值观，认为人就该活在当下，不该沉浸在历史中，也不该寄托在对未来的期盼中。然而这世上还有一种价值观告诉我们要回归到历史的传统中，然后等着新使命的到来。

我来到伊朗的时候是诺鲁孜节的最后几天，一个象征新开端的节日。当我离开伊朗的时候是十二伊玛目马赫迪的诞辰，也是基督教的复活节，同样带着末日救赎的情绪，我就这样在欢庆中带着焦虑与低落到来，又在欢庆中带着迷茫与困惑离开。

在古老的国家旅行会让我觉得时间的叙事是很有意思的事情，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马上就要过去了，我们马上就要进入 20 年代了。上一个 20 年代是充满希望的，美国的爵士时代要到来了，欧洲一战之后大帝国瓦解，马上进入各种新思潮迸发的时期，苏联建立了，成为这个世纪剩下几十年里一半故事的主角，中国在北洋政府后期，很快要进入北伐和民国黄金十年，而日本此时正处于相对民主自由的大正天皇时期。

但是我们这个世纪的 20 年代，好像没什么可期待的。世界处于一种缓慢下沉的状态里，这个状态让绝大多数人都不满意，一部分人担忧和恐惧下沉，他们期待中的美好并没有降临，反而越来越糟糕，但另一部分人觉得下沉速度太慢了，自己今生也未必能看到重新洗牌甚至掀翻牌桌的可能。

我们失去了社会整体的时间感，曾经的末世论者非常清楚未来的某一刻我们的文明会终结，甚至非常清楚会以怎样的方式终结，会有哪些征兆，时间不是一个无序流动的东西，而是早就被写好的故事。

我们今天只有个人的时间感，没有社会整体的时间感。我们为个人制定了详细的人生计划，早早把一生都规划好，可我们不知道未来社会将要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甚至不知道作为社会整体希望未来变成什么样子，同时这种改变的方向是我们个人无力左右的，社会整体到了走一步看一步的阶段。

在这个时代人要有自我的未来使命，建立起和社会有联系的时间感，而不是浑浑噩噩如同烂泥一样随着社会向前滚动。哪怕是非常保守像我一样，逆向的时间感也是时间感，感觉社会每一天都在离我期待的样子越来越远，这种时间感就像末日一样，每一天都在凝视最后一天的临近。

注：伊朗西部之旅写于 2019 年 4 月。

宁山哀：我感觉你很享受在伊朗的旅行，马来西亚你可能有点融入不进去，当地人很快乐，你又是怎样都不高兴的那种。伊斯坦布尔的话历史太厚重，又是冬雨气候再加上你出版受挫那个事，感觉写得很压抑，我读着都觉得压抑。伊朗这样的社会可能对你胃口了，整体比较保守一些，有很宏大的使命感，基层又很传统，我想知道你的这种偏好是有切实的理由，还是仅仅因为你跟不上时代的进步。

我：应该把进步换成变化，进步有明确方向和理念，变化则是无序的、混乱的、反复无常的，今天这个时代并没有更进步，只是发生了很多变化。如果你紧随这种变化，就如同鱼跟随海浪冲上沙滩，看起来好像在顺势而为，但那并不是常态。我们今天看似进步的东西，科技、民主、平等，都不是常态，只是一小部分地区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出现了冒进。

就像冲向沙滩的海浪一样，接下来会是一个退回的过程，最终拉锯在一个平衡的海岸线上。这就是为什么我欣赏一个保守传统的社会，因为这样的社会就如同坚固的海岸线，不会让太多鱼随着海浪冲上沙滩而最终窒息。

宁山哀：但这样的社会对于个体是一种禁锢，我奇怪的点是，你明明非常抗拒禁锢，包括集体对个体的碾压与侵犯、国家宏大叙事等等，你不止一次表示过强烈的反感，但是在伊朗的问题上却又赞赏这一点，这难道不矛盾吗？

我：这样的禁锢是一种比较低级的禁锢，人们很清楚要反抗，即使是那些不反抗甚至拥护的人也能意识到禁锢的存在。但是当这种禁锢变得更高级，人们就意识不到禁锢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反抗的意识，甚至失去了反抗的概念。我赞赏的社会形态中，政府代表的公权力与民众是显性对立的，民众非常清楚政府拥有不受限的权力并且一定会用来侵犯民众。

在中国，人们对政府越来越失去警惕，失去了反抗的意识甚至是概念；在欧美国家，人们的反抗也只是传统的自然延续，失去了实质性，因为他们面对的禁锢方式太高级了。所以我喜欢伊朗的社会形态，就在于人们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禁锢中，被愚蠢低级的统治者统治要比被聪明高级的统治者统治要好，因为前者你能意识到他的愚蠢低级而自然产生抗拒，后者则可能征服你的心灵。

宁山哀：所以你喜欢社会停留在一个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中，因为这种状态人们会有意识反抗，而在发展水平较高的阶段，人们就失去了反抗的动力，你非常热爱的是这样一个持续对抗的状态是吗，有点类似于我们之前讨论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我：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对个体的控制和监管就越强，个人越难以摆脱社会，监控摄像、人脸识别、无现金交易、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等，这些技术和背后的管理理念都指向让人与社会的关联更加牢固。日常生活最普通的需要，身份证、手机卡、银行卡，这三样东西把你捆绑在了社会中，你会发现人们只会越来越难脱离社会生活。如果人脱离社会生活都很难，那抗拒社会甚至改变社会规则就更难了。

宁山哀：可人为什么要脱离社会生活呢？你把社会作为个体的对立面，但社会可以聚集个体的力量，个体在社会中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和安全。

我：并不是一定要脱离，而是要拥有随时可以脱离社会的能力和机会。正常情况下社会确实可以给人们带来很多方便和利益，但如果社会对人产生太多负面影响，毫无隐私的监控、不受限的压制、双方力量对比高度不平衡，人就要考虑脱离社会。社会是人们自发组织形成的，也应该可以自发组织脱离或者解散，但是社会在裹挟所有人，让人们不容易脱离和解散，这就是一种矛盾和对抗。

宁山哀：我们换个话题，在你这种悲观的视角中，你觉得创作的意义何在呢？因为作品只有在社会中传播才会产生价值，你如果脱离社会，你的作品就没法传播，这是矛盾的，作为创作者你应该属于最不能脱离社会的一群人。

我：社会和时代是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最理想的状态是社会和时代对于创作者都是恰当合适的，创作者在自己身处的社会和时代可以自由创作和传播自己的作品，但也可能创作者需要在其他的社会中或者其他的时代里才能创作传播。我讲的脱离，只是针对自己当下身处的这个时代和社会，一个作者的作品在自己从未去过的地方传播，或者在自己死后作品才问世，也是正常的。

宁山哀：你好像也不太在意作品的传播和反馈，甚至很多时候我觉得你在回避

获得反馈。在我看来，你要么是过于自恋不愿意迎合别人，要么就是你缺少扮演社会角色的能力。创作者不是自己闷头写作，相反也是一个社会角色，获取反馈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包括与读者的互动，满足读者的信息和情感需求，只要你不是在写私人日记而是面向社会发表，这就是你该做的事情。如果有读者会因为你的作品受到影响，你们之间就建立了联系，你要为这种联系负责。

我：我需要负责的不是读者的感受，而是读者对我的反馈作用，读者会在作者之外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与感受，这与作者无关，也不是作者干涉的，甚至可能和作品本身关系不大，作品仅仅是触发了读者基于他个人经历的思考。只有当读者的判断与感受反馈作用于我的时候，比如他悲伤上门找我哭，或者愤怒上门找我闹，我才需要对此负责，虽然我觉得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乌兹别克斯坦之旅

结束了伊朗之旅，我将目光继续朝向东方。如果沿袭古典时代用波斯与希腊定义东西方区分的传统，那么伊朗就是一个东方国家，但在我这个更纯粹的东方人眼中，伊朗还是太西方了。伊斯兰教、波斯民族，以及伊朗和欧洲包括近东地区的历史联系，伊朗人表现在生活方式和政治思潮等方面都是西方式的，与东亚迥异。

这让我好奇于一个隐约模糊的猜测，是否只有东亚（甚至是只有汉人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都不一样，东西方世界的划分是否应该以嘉峪关为界，分成中华文化的东亚和中华文化以外的全世界。这吸引我把脚步从伊朗走到更靠近中国的中亚。

在中亚五个国家中，乌兹别克斯坦最具代表性，相比于中亚其他如哈萨克、吉尔吉斯等游牧民族，农商定居传统可以留下更多历史遗迹，中亚几座著名的古城撒马尔罕、布哈拉、希瓦都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政治与时间节点也很重要，乌兹别克斯坦前总统卡里莫夫在 2016 年去世，新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上台后做出了一些更宽松的政策，外国人旅行更加便利。同时由于 2020 年 1 月 1 日乌兹别克斯坦开始对中国免签，赶在大批中国游客之前去旅行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我对乌兹别克斯坦很陌生，无论是在新闻中的曝光还是与我个人的文化传统联系，我都对这个国家没有太多关注。但是这次旅行给了我一个惊喜，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让我感到熟悉，虽然乌兹别克斯坦似乎在努力让自己更西化一些，但具象到他们的食物与建筑，抽象到城市和人的气质，都与中国东北和新疆很相像。

我的乌兹别克斯坦之旅将从塔什干开始，然后向西前往撒马尔罕、布哈拉和希瓦，再返回塔什干，前往东面费尔干纳盆地的浩罕和安集延。



塔什干·苏联社会主义的样板

很多来到塔什干的外国人会觉得这座城市并不如他们想象中的那么“中亚”，而更像是一座高加索或者巴尔干城市，事实上他们的感受是对的。

塔什干历史很久，早在托勒密的记载中，他认为欧洲与亚洲的中间存在一座石塔，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标，这座石塔指的就是塔什干。在中国古代的记载中，塔什干是昭武九姓中的石国，西域贸易路线重要一站。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座城市却是很现代的，今天的塔什干与俄国入侵中亚有密切的关系，是一座整个儿被俄化翻新过的城市。1865年俄国占领了当时处于浩罕汗国统治下的塔什干，开始设立军事营地和移民定居点。1889年跨里海铁路修建到塔什干，带来了稳定的工人群体和工业化。这座城市本身传统遗留较少，苏维埃政权基础稳固，十月革命后，塔什干成为了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首都，1930年又取代撒马尔罕成为1924年成立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

在苏联时代，塔什干是中亚社会主义建设的范本，被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亚民族地区优越性的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苏联的工业化建设被迁移到当时作为大后方生产基地的塔什干，战后很多工人和工厂留在了这里，成为战后塔什干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一些来到乌兹别克斯坦的游客总是会忽略塔什干，把这里当成一个落脚的中转，然后前往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两座古城。事实上古城的历史过于遥远，经过无数次摧毁和重建，早已变成旅游商品大市场，塔什干才是一座本地人生活的城市，聚集了这个国家近代很多重要的历史，适合走街窜巷细细挖掘。

塔什干作为中亚唯二有地铁的城市，地铁却没有连接到机场。我经阿斯塔

纳转机到塔什干，走出机场躲开成群喊高价的出租车司机之后，乘坐小巴到达市区。小巴车是这里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巴士站通常带一个小商店，有的还有快餐店。

我沿途望向窗外，路旁的招牌上都是西里尔字母的俄文和拉丁字母的乌兹别克文，成排整整齐齐的现代主义建筑，点缀着我很熟悉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化景观，俨然停留在苏联时代。路上行驶的拉达轿车，我在很小的时候见过这种轿车，时尚是一个循环，今天再看到这种轿车，我颇为欣赏它的设计美感。

下了小巴之后转地铁，塔什干的地铁曾经是重要的战略地点，长期以来禁止拍照，也是在前总统卡里莫夫去世后刚刚解禁。对于游客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消息，塔什干不同的地铁站中绘制了不同的墙面，有一些是乌兹别克传统风格，还有一些更具现代化，这些墙面的装饰值得欣赏一下，唯一的缺点就是地铁站内没有网络信号。塔什干的地铁是老式蓝色或绿色的车厢，行驶起来晃动很大，像坐公交车一样，地铁站内灯光也非常昏暗，但这倒是个不错的体验，相比起来北京地铁的光线就过于刺眼了。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些天里，偶尔和当地人聊天，都觉得卡里莫夫死后社会开放了很多，也有了更多希望，一些曾经的特权贪腐和暴政也在被调查，一个领袖给民众留下的最后印象竟然是他死的太好了。

中亚五个国家脱离苏联之后，各个领导人也表现出了不同的结果。最受人们称赞是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他不光名字里包含“苏丹”，执政也像个苏丹，他最大的成就可能是看起来像个正常国家的领导人一样退休。当然更像苏丹的无疑是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在他的统治下土库曼斯坦成为比朝鲜还封闭和个人崇拜的国家。比较倒霉的是吉尔吉斯总统阿卡耶夫，他在2005年郁金香革命中因为无法平息民怒而被迫下台。至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倒是结束内战颇有成绩，他最让人们熟知的坊间八卦大概是为了走民族主义路线摆脱俄罗斯影响，把他原本俄化的名字拉赫莫诺夫改成了拉赫蒙。

苏联城市规划中，中心广场附近往往是重要的博物馆、剧院、礼堂和政府大楼等等，塔什干也是这样设计的。我走出地铁站前往帖木儿广场，这座广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882 年，在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1994 年广场以帖木儿大帝的名字重新命名。我经过现代主义风格极致如巨大纪念碑一样的乌兹别克斯坦酒店，在路口看到了广场两座标志性的钟楼，一座建于 1947 年，另一座建于 2009 年，这是为了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 43 万乌兹别克士兵。



穿过环形马路，我来到帖木儿广场中央的雕像旁，这里最初的雕像是俄国突厥斯坦总督考夫曼，后来是斯大林，再后来是马克思，而现在，在这座城市地理和意识形态的双重中心屹立着骑马的帖木儿雕像。乌兹别克斯坦脱离苏联之后，需要一个崇拜象征来重塑自己的民族国家意识，帖木儿大帝无疑是这片土地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虽然他并不是乌兹别克人，而是一个热衷于波斯文化的突厥化蒙古人，但这并不妨碍首都的中心广场上以他为核心建立新的历史叙事。

我离开帖木儿广场，朝西南走入一条小街，这条街道向西一直连接到独立广场。沿着这条小街散步是颇为惬意的事情，这片街区可能是塔什干最闲适的地方，周围有很多咖啡亭子和餐馆，还可以欣赏街头艺术家的表演，下午之后这里会聚集起很多游戏摊子。

在一个十字路口吸引我目光的是一小群画家，他们在这里为过往的人绘制肖像。在这条小街的两边摆放着成排的画作，当地的画家或者画贩子在这里展示交易。小街上另有一排是旧货买卖，大部分是苏联时期的旧书报、纪念章、邮票等等，非常吸引外国人，尤其是那些富有的中国人，他们成批买下苏联人民的精神文化遗产。

在这片街区漫步只会让人觉得这是一座俄罗斯城市，形成这种街景最直接的原因是 1966 年的大地震。大部分老城区的建筑都在地震中被摧毁，重建后的塔什干成为了苏联在东方的样板，宽阔的街道、绿化茂盛的广场和公园、街头人物纪念碑、喷泉、运河、剧院和成排的公寓楼。

在今天的塔什干已经很难看到中亚老城的遗迹，虽然经过将近 30 年的去苏联化，统治者无比想要树立更属于乌兹别克民族的样式，但塔什干还是像一座典型的苏联城市。这或许也体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领导人无法找到苏联思维和审美之外的替代品，尽管他们并不喜欢苏联而试图变成一个民族国家，但呈现新的意识形态的方式却还是苏联式的。

这一点解释了我乌兹别克斯坦的旅途中总是有莫名的亲切感，因为中国也是如此，在不舍得放弃但也不敢宣扬的革命叙事审美与拙劣浮夸的民族主义叙事审美之间摇摆。如果说乌兹别克斯坦尚且有一个明确的思路，想要去除旧的苏联印记，塑造新的乌兹别克民族国家，那么中国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更复杂而混乱的，不知道该去除旧的什么，和塑造新的什么。

我走过这条布满艺术家和旧货市场的街道，在贯穿城市南北的河流东岸，一座华丽的俄国新古典主义建筑吸引了我。这座建筑被称为罗曼诺夫王子宫（Palace of Prince Romanov），是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罗曼诺夫大公（Grand Duke Nicholas Constantinovich）建造的。1919 年这座建筑被国有化作为博物馆，1935 年成为列宁青年先锋宫，在 1980 年代重新开放用来展示大公的珠宝收藏。



宫殿院子锁着大门，在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外交部把这里用于举行招待宴会，不对一般游客开放。我透过栏杆往里看，正面院子里有一座干涸的喷泉，被环形小径围绕着，宫殿建筑棕色墙面配以灰色的屋顶，中间是一个带平台的塔楼，在建筑背后的院子里有鹿、狗和青蛙的雕像。

这座建筑的主人是一个颇为有趣的人物，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罗曼诺夫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表弟，也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孙子。他 1850 年出生于圣彼得堡，是康斯坦丁大公的长子，由于与一个美国女人的恋情背叛了家人，

从母亲的圣像中偷走了三颗钻石，这让他被放逐到塔什干。

似乎每个皇室里都有这么一个招摇并被视为羞耻的成员，就像英王爱德华八世一样。

然而这次放逐对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来说或许是一次自由的解放，至少他在塔什干充满热情地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情，他的灵魂似乎就该属于这里。他用个人财富帮助改善了塔什干的环境，积极主持灌溉工程，修建了两条大运河和很多现代化的工厂，并将商业收入用于购买艺术品，1890 年他下令建造这座宫殿也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艺术品收藏。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在 1918 年年初去世，最精彩的部分是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被处决之后，这个被家族放逐的成员却留下了罗曼诺夫留在苏联唯二的子嗣：他的孙子基里尔·亚历山大洛维奇·伊斯坎德尔·罗曼诺夫王子（Kirill Alexandrovich Iskander Romanov），和孙女娜塔莉亚·亚历山大罗夫娜·伊斯坎德尔·罗曼诺娃公主（Natalia Alexandrovna Iskander Romanova）。

1924 年，基里尔和娜塔莉亚与母亲一起搬到了莫斯科，他们的母亲嫁给了尼古拉斯·安德罗索夫，两个孩子也就改姓为安德罗索夫和安德罗索娃。或许是改姓保护了他们，作为仅有的两个留在苏联的罗曼诺夫后裔，基里尔和娜塔莉亚一生都平安生活。

基里尔在 1992 年去世，娜塔莉亚更为传奇，上世纪 30 年代她成为了一名职业摩托车手，但因为罗曼诺夫后裔的身份暴露，不得不为秘密警察工作。二战后，她由于优秀的表现而获得了一些自由，继续自己的摩托车手生涯，1999 年以 82 岁去世。

罗曼诺夫家族中不受待见的一个坏小子被放逐到边疆，却大显身手做出了

一番事业。当皇族一家被处决后，这个坏小子的后代竟然成为了家族宝贵的血脉遗留，他的孙辈亲眼见到了苏联解体，这就是造化弄人。

宁山哀：这个王子到塔什干照样是过着奢华的日子，并没有真的牺牲什么，但别人都觉得是他为了一个女人牺牲了很多。就像你提到的爱德华八世一样，人们在说“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时候，女人就成了男人的从属品，是男人选择的一部分。人们的共识是爱江山才是对的，因为权力才是男人的春药，有了权力就会有女人，相反为了一个女人舍弃权力会被认为是罕见的奇闻轶事，甚至是所谓红颜祸水，附加了对女性的道德批判。

我：对女人来说不也是这样吗？这一点并不区分性别，总会有很多人愿意用婚姻（或者广泛的亲密关系）交换社会资源，北京上海一些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和外地人结婚，这和贵族们政治联姻是一样的，都是把男女关系与社会资源挂钩。

宁山哀：但是女性整体掌握的社会资源更少，在男权社会中想获取更多社会资源的难度更大。表面看起来婚姻是男性提供资源，女性选择男性，但那是因为女性自己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更少，正常情况应该是男女能够获取的社会资源大体等同，这样才是合理的互相选择。

我：嗯嗯，这一点我赞同，男权社会的分配方式对大部分男性也是不利的，多数财富集中在少数社会顶层男性手中，他们会把竞争的门槛拉得很高，结果就是大部分男性疲于去努力实现一个自己难以企及的目标，人们活得辛苦又无趣。

宁山哀：问题是大部分男性并不会因此善待女性，被压迫的人不会反抗压迫者，而只会继续压迫别人。他们会把自己的辛苦归咎于女性，也是自我感动，觉得自己是在为女性而不是为他自己付出，进而产生怨恨和敌视，并且一旦当

他们掌握了一点财富和地位之后，他们会变本加厉侵犯女性，来补偿自己的委屈，虽然这些委屈是其他男性给他带来的。

我：那在这个过程中女性自身有问题吗？

宁山哀：也有，一些女性把男权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当成自己的优势，她们通过靠近比自己层次高的男性，可以得到比自己同等层次普通男性看起来多一点的机会和资源，就像摇尾巴谄媚的宠物狗比流浪狗吃的好一点。虽然这个问题是男权带来的，但具体到个人选择上，女性也该认识到这一点，任何所谓优待和捷径都是有代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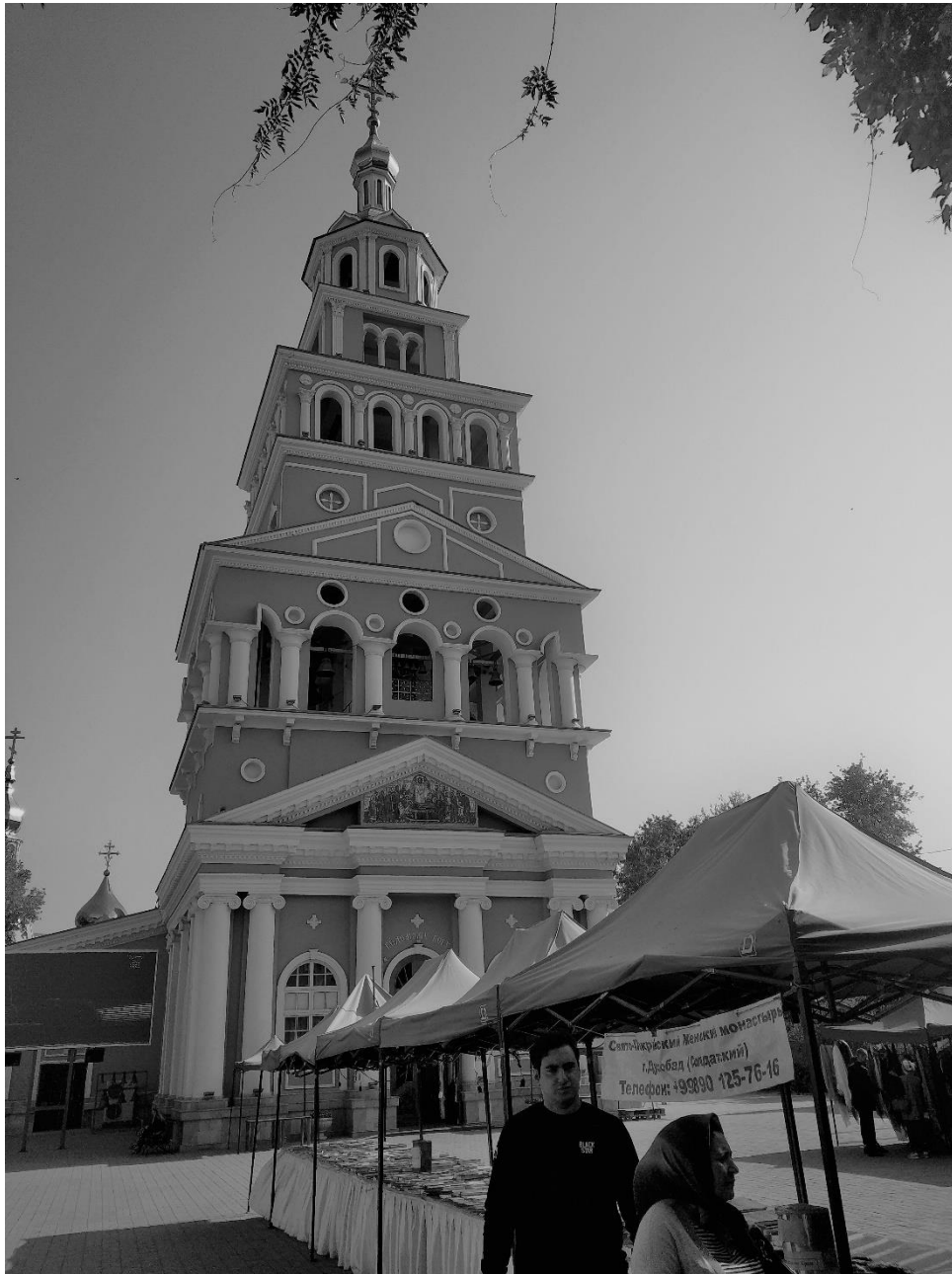
我：那在你看来，我也在享受男权社会的好处吗？我完全没感觉这个社会对我有什么好处。

宁山哀：好处分成积极和消极，消极好处就是更少的麻烦，比如外出旅行，你就比女性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少的风险。你看起来没有享受到积极好处只是你自己不愿意或者不会使用，可能是你的道德感决定的，也可能你暂时不需要，或者你的生活与女人接触太少，但消极好处你确实是得到了的。

我从这片街区走到火车站，火车站旁边是铁路博物馆，可以看到很多塔什干的老火车，有一段铁路上还有供游人乘坐的老式蒸汽机车。我看到在铁路博物馆门口有一个白鹤的雕像，乌兹别克斯坦很多城市都有白鹤的标志，让我想起一首苏联歌曲《白鹤》，“有时候我觉得那些没有从战场归来的军人们，他们不是埋在大地上，他们已变成白鹤，向远方飞翔”。

在火车站南边不远的是东正教圣母升天大教堂（Cathedral of the Assumption of the Virgin），也是这座城市的东正教社区中心。去任何城市旅行我都会关注到少数民族社区，在中国这个官方主张无神论，民间大多为佛

教、道教和泛神信仰的国家，我喜欢寻找伊斯兰教的痕迹，而到了穆斯林民族为主的国家，我则更关注基督徒社区。



虽然圣母升天大教堂完全开放给游客，但并不是纯粹的景点，这是让我颇感欣慰的事情。教堂非常醒目，天蓝色的外墙，白色墙边和柱子，金色尖顶，俨然是童话中的建筑。这种天蓝色与白色的搭配不同于我之前在东北见过的以暗红色、棕色和绿色为主，我很好奇这种略显得轻巧的配色。

一进大门我就闻到了一股焚烧香料的的味道，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即便我来的时候不是弥撒时间，却有很多俄族人在这里祷告，教堂内也有神职人员。而且，教堂里的信徒不只有老年人，还有很多年轻人，这是一个宗教社区的良性状态。在教堂前面的院子里很多摆摊售卖一些本地教徒自制的蜂蜜、奶油之类的农产品，也有宗教书籍和圣像画之类的宗教用品。

我买了几块蛋糕点心，对我来说有点偏甜了，但味道很好，苏联解体后很多本地的俄族人搬到了俄罗斯，留下来的人依然为这座城市贡献着他们的生活方式。钱就直接放在一个捐款箱里，他们的收入会用于教会的慈善事业和教堂日常维护。我绕到教堂后面，看到正好有一座建筑正在被修建中，两个工人在绘制外墙的圣像。

东正教在中亚的历史并不长，与俄国的军事扩张关系密切。1865 年，俄国取得了对塔什干的控制权，接下来大量的俄国士兵和移民到来，开始有修建教堂的需求。1868 年，俄国突厥斯坦总督考夫曼（Konstantin Petrovich von Kaufmann）提出在突厥斯坦成立一个东正教教区，当时的突厥斯坦地域广阔教堂很少，大部分教堂由军队进行管理，这也是中亚东正教堂早期的主要特点。

塔什干早期建造的教堂基本都没能保存到今天，在十月革命前，塔什干大约有 30 座教堂，大部分在革命之后被关闭，只有 2 座目前还在使用中，圣母升天大教堂就是其中一座。

圣母升天大教堂建于 1877 年，取代 1871 年在塔什干医院公墓建造的圣潘泰莱蒙教堂的旧建筑。1922 年，与中亚大多数教区一样，塔什干教区也归革新主教会议管辖。1933 年教堂被关闭，之后作为军事仓库使用，1945 年教堂被归还给教徒们，之后以圣母玛利亚升天的名称被重新使用。

宁山哀：什么是革新主教会议？

我：革新主义运动是俄国东正教近代一个重要事件，起源是 20 世纪初神职人员

中进行的有关教会改革的辩论，因为长期以来在俄国，教会屈从于国家政治利益，神职人员们对教会地位感到不满。1917 年俄国革命之后，一些神职人员希望教会能够适应新政权的现实，改变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并对教会规范和礼拜传统做出重大改变。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们拉拢了许多具有改革意识的东正教神职人员，他们对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宣告效忠，革新主义者与共产政权之间的合作导致了教会的分裂。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苏联政府开始迫害镇压东正教会，一些主张改革的神职人员占据了宗主教的职位，得到苏联政府的许可掌握了一些教堂和教会资产，被他们所掌握的教堂得以保存，但更多的教堂在 1920-30 年代被关闭。



由于靠近火车站，圣母升天大教堂不可避免成为游客观光地点，而另一座在城市边缘墓地中的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东正教堂（Cathedral of St. Alexander Nevsky）更加安静，属于本地俄族人的日常生活。

博特金公墓（Botkin）在塔什干的东南方，也被称为第一城市公墓。我从

大路拐进一条巷子里，两边都是和殡葬业相关的店铺，卖花的、定制棺材的、雕刻墓碑的等等，和中国很相似。死亡除了哀伤肃穆的一面，还有世俗热闹的一面，对一些人来说，死亡是一笔生意，是一个流程，是每天要干的活儿。

我很喜欢感受死亡热闹的一面，在吹吹打打热火朝天中人们走完自己社会属性的最后一步，人跌跌撞撞稀里糊涂地就走到头了，结束了自己乱糟糟的一辈子。

走进墓地里面一下变得非常安静，墓地大门口一位老人在吹奏乐器，很简单悠扬的曲子。这片墓地里过去埋葬的大部分是斯拉夫裔侨民，还有几块区域是犹太墓地、天主教徒墓地和基督徒墓地。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墓地关闭之后，塔什干酿酒厂的老板把这块地捐赠给了教会，成为了主要的墓地，

本地人习惯在墓碑上雕刻照片，这一点我在旅顺鞍子山露国墓园也注意过，过去应该是贴纸质照片，但容易损坏就改为蚀刻，在墓碑上能够看出墓主人的长相，还有生前的工作和生活场景。这座公墓里埋葬了塔什干很多名人，有学者、军官、运动员和宗教人士，其中包括塔什干过去的几位东正教大主教、有克伦斯基的母亲和妹妹，还有谢尔盖·叶赛宁的女儿塔季扬娜。

宁山哀：克伦斯基是谁？

我：俄国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总理，沙皇下台之后，工兵代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存，当时苏维埃领导权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手里，克伦斯基就是社会革命党成员。他们将政权移交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后来经历了科尔尼洛夫的七月事变之后，布尔什维克决定夺取政权，就有了十月革命。

宁山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后来怎么样了？

我：逐渐就消失了，孟什维克有一些流亡国外反对苏维埃政权，有一些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也有一些退出政治活动；社会革命党分成左右两派，右派在十月革命后被清除了，左派到了俄国内战结束后也被取缔了。

我沿着墓地中间的路走到深处，尽头是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这座教堂始建于1902年，教堂外观配色和圣母升天大教堂正好相反，主体是白色，点缀着天蓝色的墙线和瓦片，新古典主义建筑搭配这种颜色显得很梦幻。教堂面向西南，入口两侧有两座钟楼，中殿被五个洋葱圆顶覆盖，象征着耶稣和四部福音书作者。

1930年代教堂遭受了严重的大火破坏，直到1960年代初才得到修复，接下来1966年的大地震中教堂幸存下来但结构受损，2014年进行了全面重建。

这座教堂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名字命名，他是诺夫哥罗德亲王，一生屡次在战场上获胜，去世后被东正教会封为圣徒。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他的名字被授予俄国很多教堂。在俄国征服突厥斯坦之后，由于大部分教堂都属于军队管理使用，喜欢以英雄圣徒含义来命名。除了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之外，天使长米哈伊尔、圣乔治、圣塞尔吉乌斯这些和战斗胜利有关的名字也是教堂常用的。

从东正教墓地返回市中心，我经过一座德国路德会的教堂，这座教堂隐藏在路边茂密的树影中，小巧精致，棕黄色砖砌的新哥特式建筑，被称为德意志教堂或福音路德教会（Kirche），是塔什干唯一一座路德教堂。

这座教堂是塔什干路德教会在1899年建造的，1885年塔什干成立了路德教区，最初教堂是为在俄国军队中服役的德国士兵修建的。苏联时代教堂在很长一段时间被用作仓库，1970年代末移交给塔什干音乐学院，并进行了重建，设立了歌剧工作室定期举行风琴音乐会，1990年代被移交给恢复活动的路德教会团体。

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统治时期，一大批德国人移民到俄国，他们由于在伏尔加河流域开垦被称为伏尔加德意志人，其中又有一部分移民到了中亚，带来

不少现代化技术和文化遗留。虽然在今天已经几乎没有移民后代，但在后面旅途中我会发现更多和他们有关的过往痕迹。

离开这座德国路德会教堂，不远处是高大醒目的耶稣圣心大教堂（Sacred Heart Cathedral），这是属于罗马天主教的教堂。教堂的名字让我觉得有点亲切，因为在我的故乡沈阳，最大的天主教堂名字也叫耶稣圣心大教堂。

这座哥特式教堂非常雄伟，只有一位老人负责看管教堂，为偶尔前来参观的人们开灯。管理人带我走上二楼，二楼是礼拜堂，走廊里的照片展示了这座教堂的建造历史。天主教在中亚的传播开始于 19 世纪后期，同样伴随着俄国的军事扩张，早期教徒是波兰人、立陶宛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大多是沙皇政府的军事人员，也有战俘、流亡者和逃犯，他们被派往远东、突厥斯坦和高加索等地开垦定居。

1883 年，俄国突厥斯坦有了第一位正式的天主教神职人员费迪南德·森奇科夫斯基神父（Ferdinand Senczikowsky），他努力筹划在塔什干修建天主教堂，塔什干许多天主教徒都是熟练的技术人员，他们参与了教堂的建设，1912 年教堂建成开始进行宗教活动。

十月革命之后，约瑟夫·索温斯基神父（Joseph Sowinski）秘密为剩下的天主教徒举行宗教活动。教堂于 1925 年被国有化，1937 年索温斯基神父因涉嫌反苏宣传被处决。在苏联时代，教堂被各种组织使用，电缆厂、产科学校、旅馆、行政机关和仓库，建筑经过多次重建改造最终被废弃，教堂内的雕塑也都没有保留下来。

1987 年，乌兹别克斯坦的天主教组织恢复活动，波兰方济各会的克齐斯托夫·库库尔卡神父（Ksyzstof Kukulka）重新管理教堂，在教堂通道的展示中提到 1993 年教堂的修复工作，从老照片的对比上可以看出，1926 年的时候，教堂已经连屋顶都没有了，只剩下基本的框架，今天修复的样子和 1912 年刚建

成的时候基本相同。

从几座教堂的分布可以看出塔什干的城区结构，乌兹别克人原本聚居的旧城区在西面，俄国人修建火车站选在离旧城区稍远的东边，方便建设和驻军，这一点和满洲的中东铁路沿线城市布局是很像的。移民们总会有聚集的习惯，火车站附近是不同移民群体的教堂、墓地和社区，分布在火车站的南北方向。

返回地铁站的路上，我无意中发现了路边街头公园里的一座雕像。一眼看上去，雕像人物不像乌兹别克人或者俄罗斯人，而是南亚着装，走近一看，是印度总理沙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的纪念碑，沙斯特里就是在塔什干去世的。

1965 年印巴战争，为了结束两国之间的持续对抗，苏联召集印巴领导人在塔什干进行谈判。1966 年 1 月 10 日，印度总理沙斯特里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签署了塔什干宣言，这是战争停火和双方建立贸易经济关系的开始。当天晚宴之后凌晨一点，沙斯特里死于心脏病。

在苏联时期，塔什干被苏联当作向第三世界国家展示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图景，这座城市举办了大量的国际会议、比赛和文化节，是面向中亚甚至是东方最有影响力的城市。1982 年，勃列日涅夫去世的那一年，他前往乌兹别克斯坦视察工作，在塔什干发表讲话，表达了苏联对中国的友好政策，期待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是中苏关系解冻最早的信号。

我走到地铁站旁，想查看一下周围有没有什么错过的历史遗迹，发现有一座诗人博物馆。我努力拼出上面的人名，谢尔盖·叶赛宁（Sergey Esenin）。虽然我在东正教墓地中知道叶赛宁的女儿塔季扬娜埋葬在塔什干，但我并不知道叶赛宁本人和塔什干有什么关系，我甚至不知道他来过这里。

这座位于居民区里的博物馆更像民宅，一个热情的大妈和她的儿子接待了

我。实际上，叶赛宁只在十月革命后来过一次中亚，而且没有停留很长时间，他从未写过和中亚直接有关的诗歌，博物馆中陈列了当时的照片和他的作品。

叶赛宁在 1921 年到塔什干拜访他的诗人朋友亚历山大·希里耶维茨（Alexander Shiryayevets）。在塔什干，叶赛宁对游历老城区有特别的兴趣，他受到公共图书馆馆长的邀请，向艺术工作室的市民们发表演讲，还短暂前往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在他离开塔什干之后不久，就遇到了他的第三个爱人——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两人很快结婚，但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一年多。

叶赛宁的几次婚姻生活都非常短暂，1917 年他和第二个妻子齐纳达·赖希（Zinaida Reich）结婚，然而在 1920 年就和当时怀孕二胎的赖希离婚，赖希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塔季扬娜和康斯坦丁。二战期间，塔季扬娜和丈夫孩子搬到了塔什干，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帮助他们获得了一座小房子，她在这里生活了半个世纪，直到 1992 年去世，就埋在我刚刚去过的那片墓地中。

离开叶赛宁博物馆，我的晚餐在一家当地有名的民族餐馆里，服务员极力推荐代表乌兹别克民族菜的抓饭和烤肉，都是广泛意义上的中亚食物，但唯有俄罗斯红菜汤引起我的兴趣。在独立之后，乌兹别克斯坦的饮食文化由政府主导宣传民族特色，包括建成了游客们风靡的中亚抓饭中心，但民间饮食依然带有浓郁的俄国习惯，虽然是穆斯林民族为主的国家，但街头很多卖酒的商店，餐厅里也都供应酒类。

宁山哀：乌兹别克人的食物和维吾尔人有区别吗？

我：我觉得没啥区别，烤肉和抓饭基本是一样的，可能略有区别的是馕，乌兹别克的馕比维吾尔的馕略小，比较软和厚。但是馕的做法本来各地就有不同的风格，所以也不能算是民族差异。餐馆服务员把馕叫作面包，不知道是不是欧化的习惯。

宁山哀：也可能是他们看到你的东亚面孔，以为你不知道什么是馕，所以叫成

面包。



我住的旅馆有很多墙绘，其中有一个中国书法字“禄”，我问旅馆前台是不是中国人画的，他说八个月前来了个中国画家，在旅馆墙面创作了这件作品。他问我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说这个字的意思是成为地位很高的官员，中国人认为做官是非常幸福的，所以这个字也是祝愿幸福的意思。

我相信这个画家应该是个真的中国人，如果是个对中国一知半解的老外，可能会写个福字或者双喜字，但他写个禄，非常了解中国人对权力的渴望和官本位社会。当然，苏联体系下的乌兹别克人肯定也能理解，我一解释，前台哥们儿就笑了。

在塔什干和当地人闲聊，他们对中国有两种称呼，乌兹别克语的“秦”和俄语的“契丹”。在古代中亚地区把中国称为“桃花石”，意思是“拓跋氏”，和俄国称呼中国为契丹一样，他们接触的往往不是中国的汉地，而是汉地外围的

游牧民族地区。

在塔什干，我试图寻找东亚痕迹，但没有找到太多属于中国的，反而更多来自朝鲜和日本，朝鲜和日本与塔什干的关联又都与苏联时代有关。

我前往塔什干西南一片离火车南站不远的墓地，在这片墓地深处，有一小块埋葬的是二战后被惩罚到中亚做苦役的日本战俘。这些日本战俘在满洲向苏军投降后被带到这里，我来看望一下他们最后的归宿。

墓地对面的一座小楼是日本战俘纪念馆，一位先生接待了我，向我讲述了埋葬在这里的日本战俘的由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后不久，将近六十万名驻扎在满洲的日本士兵被解除武装，带到苏联各地作苦役。在中亚地区，乌兹别克斯坦大概有 23000 名日本战俘参与工作，主要是从事建筑工。1995 年，塔什干日本墓地纪念碑树立，这片公墓里埋葬了 87 名日本战俘。

在纪念馆里陈设了日本战俘曾经用过的物品，他们的工作照片、从军登记和书信。其中有一封手写的军历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大部分内容是汉字，军历的主人是一位日本陆军少尉，昭和 19 年（1944 年）他作为特别操练见习士官入伍，进入飞行学校学习，但只学了 4 个月就被编入陆军航空队，昭和 20 年 4 月离开日本从朝鲜进入满洲作战，前往当时的满洲国滨江省白城子报到。8 月 15 日日本投降，9 月 2 日他在奉天被解除武装，之后从黑河出境被带到塔什干劳动。不过他很幸运，只待了 3 年，在昭和 23 年 9 月（1948 年）得以回国。

不幸中的万幸，大概就是如此吧。

宁山哀：这个人的从军经历这么短暂呀。

我：是的，基本上他刚刚参战，战争就结束了，应该是日本在战争最后阶段临时征发的士兵，他可能都从未参加过真正的战斗。一个细节是日本在 8 月 15 日投降，但他在 8 月 20 号被提升为少尉，我猜测可能是上级在得到投降消息后自

杀，他临时顶替升职。

我离开纪念馆走进对面的墓地，在墓地深处很远才看到这片日本墓园，很平整的一片土地被用栅栏围起来。墓园中间是一座小小的纪念碑，上面挂了很多条千纸鹤，纪念碑正面插着日本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国旗，有一块牌子写着永远的和平友好宣誓没有战争，下面摆着香炉和鲜花。

纪念碑背面是埋葬者的姓名，在纪念碑上摆放了一个佛教僧侣的石头人偶，不知道是不是来扫墓的人留下的。在纪念碑旁边的土地上插着两块木板，一块写着南无阿弥陀佛，中间一段日文，然后是日本人强制抑留者慰灵，落款是浅尾正男，另一块则写着日本人慰灵墓参追善供养塔。

在塔什干，和我搭讪的本地人往往会讲出他们仅会的日语和朝鲜语的“你好”，会用中文打招呼的人很少。我准备前往一处和中亚朝鲜族有关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城市靠西边。

我从地铁出来徒步前往，中途路过了一座广场，广场后面是纺织工人之家，类似工人俱乐部一样的建筑。广场上有一尊雕像，侧面看起来像是教科书插图中出现过的人物，我走到雕像正面，原来是普希金。这座雕像是 1974 年为了纪念普希金诞辰 175 周年而树立的，塔什干的街道原来很多都是俄罗斯名字，这座普希金雕像曾经坐落在普希金大街上的一个公园里，2005 年才搬过来。

在普希金雕像这里转个弯，不远处就是首尔公园。这座公园是 2014 年修建的，2017 年为了纪念朝鲜人被强制迁徙到中亚 80 周年，在公园里树立了纪念碑。我走到这里，发现首尔公园被关闭了，但是隔着围墙能够看到里面的建筑颇有朝鲜民族气息，围墙和亭子上面有朝鲜民族风格的彩绘图案。

今天生活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朝鲜族有 18 万，在塔什干大概有 6 万人，本地

人习惯称呼他们为高丽萨拉姆（Koryo-Saram）。这些朝鲜人来到中亚的历史比被强制劳役的日本战俘还要悲惨，而且时间更久。

在俄国的朝鲜人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后期，当时朝鲜半岛土地兼并严重，很多农民难以生存，只好向外迁徙。1860 年《北京条约》把一部分原属于大清国的外满洲地区割让给俄国，这些朝鲜人就迁徙过去开垦耕种，1914 年在俄国的朝鲜人达到 6 万 4 千多人。

1919 年朝鲜“三·一起义”被日本镇压之后，前往俄国的朝鲜移民继续增加，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为了朝鲜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活动地点。到了 1923 年，苏联统计境内朝鲜人超过 10 万，大部分居住在农村，苏联政府开始控制朝鲜人的迁徙，并且逐渐将已经定居的朝鲜人归化为苏联公民。

苏联在 1937 年之前的政策主要是对这些朝鲜人进行本土化，允许他们成立朝鲜族苏维埃集体，使用朝鲜语，建立自己的朝鲜学校、医院和报纸刊物，1937 年统计显示苏联境内有将近 17 万朝鲜人。

1937 年，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报告，日本企图招募苏联境内的朝鲜人进行间谍活动。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联政府决定将远东地区的朝鲜人迁徙到中亚，当时大概有 10 万朝鲜人被运往哈萨克斯坦，7 万多人被运往乌兹别克斯坦。

虽然政策允许携带牲畜，还承诺给予搬迁补偿，但这些朝鲜人在中亚生活很艰难，他们大多是水稻农民和渔民，根本无法适应中亚的自然环境与农业习惯，政府的补偿也迟迟没有到位，很多人被饿死。当时受到牵连的不只是朝鲜人，还有中国人，生活在苏联境内的中国人也受到怀疑被驱逐出境。很多中国人已经在苏联境内成家，只好带着俄罗斯家眷回国，成为今天中国境内俄罗斯族的来源之一。

苏联压迫朝鲜人的政策一直持续到斯大林去世，1956 年赫鲁晓夫给予这些朝鲜人自由定居的权利，他们开始搬往城市。由于迁徙过程中形成了高度社区组织化和互助精神，朝鲜人城市化水平非常高，社会地位增长很快。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朝鲜人基本上不会讲朝鲜语，也不会乌兹别克语，他们之间交流都是讲俄语。

我在塔什干买到了一些朝鲜人的老照片，应该是婚礼和家宴照片，可以看出他们没有保留朝鲜民族服装，而是以西装为主，在塔什干我也没有发现这些朝鲜人有专门的墓地和宗教场所。苏联解体后，一部分朝鲜人无法适应民族国家化的乌兹别克斯坦，搬到俄罗斯或者南朝鲜。

有一部关于乌兹别克斯坦朝鲜人的电影《迦南》，也叫《双城悲歌》，电影拍摄于 2012 年，导演叫鲁斯兰·朴，他本人就是乌兹别克斯坦朝鲜人。

电影的气氛和我童年的东北非常像，萧瑟冰冷没有希望，一切都是灰蒙蒙的。主角是一个塔什干的朝鲜人，年轻时他的一个朋友被人打死了，他后来做了警察，卧底逮捕一个毒贩，恰好就是当年杀死他朋友的人。结果他的上级把毒贩放了，主角一怒之下辞职，染上了毒瘾艰难度日。之后终于挺过来把毒戒了，他曾经的一个本地朝鲜朋友来找他，那个朋友搬到了南朝鲜，让主角也搬过去谋生。主角临走前，朋友让他去一个地方取一些面包带过去，说自己想念塔什干的面包。等主角到了南朝鲜见到朋友之后，发现面包里面藏着毒品，他的朋友欺骗了他。最后一幕就是他带着毒品离开了朋友家，迷茫地走着。

“双城”指的是塔什干和首尔，对于这些乌兹别克斯坦朝鲜人来说，塔什干并不是他们的故乡，他们被强迫迁徙到这里，但首尔同样不是他们的归属地（如果严格追溯，他们的祖先在今天的北朝鲜境内），他们无论在哪里都像个外人一样。“迦南”则是另一层含义，这些朝鲜人的祖先前往俄国远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他们现在从中亚前往南朝鲜也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人们带着对迦南的向往迁徙，却最终无法逃脱悲情的结局。

宁山哀：朝鲜族的性格好像天然就是很倔很拧巴，我看你上一本书写东北的时候讲过，少数热闹的时候特别狂欢，但多数时候很安静，不怎么说话，像蹲在河边发呆的熊。

在塔什干的市场里，我看到一样朝鲜人的生活痕迹，就是朝鲜泡菜。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很多街头小餐馆都会有泡菜，是很平民的食物，但作为来自同样出产朝鲜泡菜的地区，我发现这里的泡菜与东北的泡菜不同，也许是无法种植优质大白菜的缘故，乌兹别克斯坦的朝鲜泡菜是用卷心菜制作的，口感味道相差很大，只能说聊胜于无，不过这里的朝鲜人选用当地种植很多的胡萝卜做了胡萝卜丝咸菜，也算是一种改良传承吧。

泡菜不好吃，又没有狗肉，也没看到卖冷面和打糕的，想必这里的朝鲜人不会很快乐吧。但想一下历史，周边的中日俄谁都想欺负朝鲜一下，这样的窝囊日子，吃什么都不会快乐。

夜晚的塔什干很安静，街上没什么人，只有街头公园的长椅上有女人带着男人，或者男人带着狗坐在那，也不出声，就干坐着，这座城市夜间的萧瑟很像我的故乡。塔什干的绿化很好，地上落叶特别多，走一路都是伴奏声，一条漫长的路没什么路灯，偶尔有短暂的车飞逝过去，瞬间带来光影。

一个女人挎着包在我前面走着，背影像我小时候见过的那些在事业单位上班的阿姨，她走一段回头看看我，好像有点害怕，停在路边看手机，等我从她面前走过去她才接着走。虽然我是男的，可却是外国人，一个本地人深夜走在我身后我也不放心，我也玩手机把她让过去，我俩就这么默契地走一路交替一路，谁也不声张。

在塔什干的最后一天，我去了西北面的老城区。在 1966 年的大地震中，塔什干的老城区大部分损毁，曾经的乔苏集市（Chorsu Bazaar）距离聚礼清真寺

和库尔克达什经学院（Kukeldash Madrasah）不远，从布局上来看，巴扎、清真寺和经学院组成了一个传统穆斯林街区的结构。

地震摧毁了集市之后，苏联政府在原址重建，新建筑外观颇为后现代，像一个外星飞船模样的体育馆。集市内分上下两层，一层是肉类和奶制品，二层是坚果，集市外围是蔬菜、水果、香料和生活用品。集市出来一直连到地铁站是一条自由市场街，摊贩们自行摆摊，多为鞋帽、零食、饮料和生活小物件。

我在集市逛了一会儿，继续往北面走到了哈斯特伊玛目广场（Hazrati Imam），这里是乌兹别克斯坦官方的宗教中心，也是这个国家伊斯兰教最重要的地点之一。这里的重要性来自有 54 米高宣礼塔的哈斯特伊玛目清真寺，这是 2007 年前总统卡里莫夫下令修建的，还有一座 16 世纪的经学院，不过现在内部和乌兹别克斯坦大部分曾经的经学院一样，里面都是一间间旅游商品店。

这片广场建于塔什干首位伊玛目阿布巴克拉时期，除了宗教造诣之外，这位伊玛目以研究锁而著名，广场就是以他的陵墓为核心。广场上最重要的一个地点在周围巨大的尖塔和清真寺面前显得容易被忽视，是一座小小的博物馆，但是里面展出的却是伊斯兰世界最神圣的物品之一，奥斯曼古兰经。

在伊斯兰教第三位哈里发奥斯曼时期，他下令整理散轶各地的古兰经，编纂出了古兰经的唯一版本。编纂后的古兰经一共抄写了 5 本，分别在麦加、麦地那、大马士革、巴士拉、库法。帖木儿大帝远征的时候，把巴士拉的那本带回撒马尔罕。俄国入侵中亚之后，把这本古兰经运到了圣彼得堡，后来苏联时期为了向乌兹别克人示好，将古兰经还给了塔什干。

宁山哀：所以古兰经一共有几个版本？

我：只有一个版本，就是这本奥斯曼古兰经。

宁山哀：就是说这本是最初的基准，然后翻译成不同文字的版本是吧。

我：严格来说，不存在不同文字的版本，古兰经一直就只有一个版本，就是阿拉伯文的，其他文字的只能叫“译本”，是帮助理解学习用的。

宁山哀：那么非阿拉伯语母语者学习古兰经不就很困难吗，这不利于传教吧。

我：有一定困难，但并不明显，因为大部分人学习还是通过母语译本，老师也是用母语授课。如果是伊斯兰教历史比较久的地区，比如中国，早已有了很多使用汉语的本土伊斯兰学者，以及中文的教材和研究著作，这些内容基本可以满足普通教徒学习需求，只有海里凡或者有深度学习需求的教徒才会专门学习阿拉伯语，来阅读古兰经原文和阿拉伯文的典籍资料。

宁山哀：海里凡是什么意思？

我：海里凡、满拉和塔里布是中国不同地方的称呼，清真寺经堂学生的意思。

我在塔什干的最后一餐在乔苏集市旁边的烧烤摊子，夜晚市场已经收工了，摊贩们纷纷来吃饭。一个坐在我对面的男人大口嚼醋浸洋葱，一直盯着我看，他大概以为我是个“优雅”的外国人，我也手抓醋浸洋葱大口嚼。啃最硬的馕，嚼最辣的洋葱，喝最浓的茶，顶着烟熏吃带血的烤牛肝。问问左边的大爷，今年哈密瓜收成可好，问问右边的大妈，官老爷们有没有难为大家，乌兹别克斯坦的劳动儿女们，你们的东方工农战友来看望大家了。

宁山哀：你这个东方来的精神病人。

在塔什干的旅行结束了，下一站我将沿着奥斯曼古兰经的线索，前往帖木儿帝国时期的首都——撒马尔罕。

撒马尔罕：帖木儿大帝的尴尬遗产

撒马尔罕，只需要听到这个名字就足以感受到迷人的魅力，但如果人们希望把这种魅力在心里保留的久一些，那最好不要来这座城市，并不是说这座城市会让人失望，而是它的历史名气实在太太，人们很难把对于历史的想象与这座城市的现实贴合在一起，甚至不愿意相信这竟然就是撒马尔罕。

从塔什干出发有动车前往撒马尔罕，是乌兹别克斯坦火车服务最好的一段。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线最早是俄国在 1879 年修建的跨里海铁路，1888 年这条铁路经过布哈拉到达撒马尔罕，十年后又连接了塔什干直到最东面的安集延，形成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铁路干线。

在火车上，我粗略重温了一下阿敏·马卢夫的《撒马尔罕》，虽然这本书里大部分内容发生在伊斯法罕，但源头却在撒马尔罕。在很长一段历史中，撒马尔罕是一座波斯文化下的城市，在伊斯法罕还没有获得半天下的称号之前，欧麦尔·海亚姆（Omar Khayyam）就在这里书写着他的《鲁拜集》，后来他离开撒马尔罕，和哈桑·萨巴赫（Hassan-I Sabbah）一同见到了塞尔柱帝国宰相尼扎姆·穆勒克（Nizam al-Mulk），一段传奇的故事诞生了，这个故事我之前去加兹温探访阿拉穆特城堡的时候讲过了。

撒马尔罕火车站原本有两条有轨电车路线通向市区，其中一条到达游客聚集的比比哈努姆清真寺附近，但这条路线被停运了，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让游客们都去坐出租车。我的出租车司机是一个塔吉克人，撒马尔罕原本是一座塔吉克人为主的的城市，不过在俄国统治期间，有意将塔吉克文化替换成乌兹别克文化，随着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之后的民族国家政策，很多塔吉克人被强行改为乌兹别克人。

我住的旅馆正好在帖木儿大帝陵墓（Gur-e-Amir）的隔壁，陵墓外面一堵

墙后就是老城区。按照中国文化，帝陵应该是风水很好的地方，我觉得帖木尔大帝可能了解一些中国风水，毕竟他是要征服中国的人。

帖木儿大帝的陵墓里安葬的不只有他自己，还有他的两个儿子沙鲁克（shah Rukh）和米朗·沙阿（miran Shah）、两个孙子乌鲁格·贝格（Ulugh Beg）和穆罕默德·苏丹（Muhammad Sultan），还有他的老师，也是一位苏菲智者赛义德·巴拉卡（Sayyid Baraka）。

这座陵墓最早是给他的孙子穆罕默德·苏丹建造的，帖木儿大帝远征明帝国的途中在哈萨克草原上去世，虽然他在自己的故乡已经修建了一座陵墓，但由于大雪封路无法运送遗体，人们就把他埋在了这里。后来到了乌鲁格·贝格统治时期，完成了陵墓的全部建设，这里就成了帖木儿家族的陵墓。

我走进陵墓内，在帖木儿的墓上看到一块深绿色的玉石，据说这块石头来自察合台汗国，更早之前来自中国宫廷。波斯君主纳迪尔·沙阿（Nadir Shah）在 1740 年入侵撒马尔罕时试图带走玉石，他的谋士认为这是不祥的，纳迪尔就把玉石还了回来，但在运输过程中玉石一分为二。

在陵墓内看到的石棺只是标志物，真正的墓穴在下面的房间里。苏联人类学家米哈伊尔·盖拉西莫夫（Mikhail Gerasimov）在 1941 年打开了地穴，按照当地导游们最喜欢的说法，盖拉西莫夫在帖木儿大帝的坟墓上发现了一个铭文，写着“谁打开它，都会被比我更可怕的敌人击败”，第二天德军入侵苏联。

虽然被刨了坟，但帖木儿大帝应该感谢苏联人，如果不是苏联考古学家的修复，撒马尔罕早已变成一片废墟，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座城市里绝大多数老建筑都是上世纪 70 年代苏联政府主持修复的，修复过程几乎如同重建一样。

宁山哀：你觉得如果帖木儿大帝没有死在远征途中，他征服明朝会成功吗？

我：帖木儿帝国与明朝之间并没有很大的矛盾，朱元璋统治时期，帖木儿与明朝关系不错，还互相派遣使节，在帖木儿之后的继任者也很快修复了与明朝的关系，帖木儿的征服更多的是一种军事试探和天然扩张，并没有明确的灭国雄心。

即便帖木儿没有去世，他的征服也很可能停留在新疆东部为止，他可能会选择自然环境和撒马尔罕比较像，并且穆斯林人口比较多的地区扶持一些附庸政权，自己退回撒马尔罕。我认为帖木儿没有能力吞下整个汉地，当时的明朝政权相对稳定，军队战斗力也没有衰弱太多，当然帖木儿对潮湿炎热、文化习俗差异很大的汉地尤其是汉地南方，可能也并没有兴趣。

离开帖木儿大帝陵墓，我向北前往雷吉斯坦广场。撒马尔罕的历史建筑由南向北呈带状，南边是帖木儿和子孙的陵墓，往北是三座经学院广场，再往北是帖木儿妻子的陵墓和清真寺，最北面是帖木儿家族女眷和大臣们的陵墓群。

我走到撒马尔罕老城的中心雷吉斯坦广场，雷吉斯坦这个词意思的是沙地，这片空地最早被沙子覆盖。过去撒马尔罕的所有主要道路都通向雷吉斯坦，城市统治者在广场上向人们宣布命令、举行庆祝活动和公开处决，这片广场一直是城市公共生活的中心。

广场上品字形的三座建筑分别由两位统治者在不同时期建立，西边的乌鲁格·贝格学院是最早建成的，东边的谢尔多尔学院和北边的季里雅-卡利学院是200多年之后修建的。如果不是一定要走入建筑内部参观，可以避开对外国人明显过高的门票，站在广场外面稍远一些的位置更能感受到这三座建筑最壮观的一面。尤其是到了晚上，忽视花哨的灯光表演，只去欣赏这片建筑群，一座城市的核心地带不是政府机关和宫殿而是学校，这才是撒马尔罕这座城市真正的历史光辉。



帖木儿大帝的孙子乌鲁格·贝格（Ulugh Beg）在 1409 年开始统治这个国家，但他对数学和天文学更感兴趣。1417 年，乌鲁格·贝格下令建造伊斯兰学院，教授哲学、天文学、数学和神学，这是雷吉斯坦广场上的第一次建设。乌鲁格·贝格非常热爱天文学，他曾经派人前往马拉盖，参观学习纳斯尔丁·图西修建的天文台，之后在撒马尔罕修建了更巨大的天文台。乌鲁格·贝格本人曾在这座以他名字命名的学院中任教，不过这位沉迷科学的君主最终结局并不好，被自己的儿子斩首。

1612 年，Yalangtush Bahadur 被任命为撒马尔罕的统治者，他曾是布哈拉可汗的总督。Yalangtush Bahadur 决定在乌鲁格贝格学院对面建造另一座伊斯兰学院，这座建筑被命名为谢尔多尔。谢尔多尔学院的正面外墙最显眼的是上面的动物图案，两只老虎背着画着人面的太阳，去追逐白色的鹿。谢尔多尔的意思是狮子，但绘制的图案确实更像老虎，对狮子的崇拜可能是来自波斯密特拉宗教的影响，这位撒马尔罕的统治者可能想借用波斯的权力象征。

在谢尔多尔学院修建的十年后，Yalangtush Bahadur 计划在两座学院之间再建造另一座建筑，让这三座建筑成为一片三个方向互相对应的建筑群。这座新建筑被称为季里雅-卡利，1646 年开始建造，历时 14 年建成。这座建筑修建的时候大量使用了镀金绘制的方式，因此取名为“Tilla Kori”，意思是“镀金”。现在建筑的左侧有一座蓝色圆顶塔，显得非常不协调，这是苏联政府修复的时候胡乱加上去的。



17 世纪末，撒马尔罕经济衰退，丝绸之路的商人们开始远离这座城市，直到 19 世纪末才恢复了过去的繁荣，但雷吉斯坦广场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关闭了这些伊斯兰学院，使用这片广场用于公共集会和公审反革命分子，同时作为古迹保护项目开始着手修复历史建筑。修复工作虽然过程中部分方案有争议，但整体上让这三座建筑恢复了原貌。

从三座建筑旁边绕过去到东边，我经过很容易被忽略的昔班尼陵墓（Shaybanids）。对于乌兹别克斯坦历史来说，昔班尼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后代，巩固了乌兹别克部落的地位，建立了布哈拉汗国，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击败了巴布尔，把巴布尔赶出了费尔干纳，但又在另一次决定性的战斗中败给了波斯的伊斯梅尔一世，死在了战场上。我之前去伊斯法罕，在四十柱宫的墙面壁画上就看到了波斯军队击败乌兹别克军队的场景。

我走进一条小路，路上有很多拍摄婚纱照的新人。这里有一座前总统卡里莫夫的雕像，新人们向领袖雕像献花拍照，在苏联有新婚夫妻给烈士纪念碑献花的传统，这里也保留了这个习惯。

我沿着一条旅游商业街前往比比哈努姆清真寺（Bibi Khanym Mosque），这条街是政府主推的旅游街区。撒马尔罕的旅游导向很有意思，两处景点之间的路旁都是商铺和餐馆，而且把通向老城居民区的路口用大铁门挡住，只开一个小口，为的是让游客只在商业街活动。

我走到比比哈努姆清真寺，今天能看到的建筑大部分是苏联时期修复的，直到现在还没彻底完成。这座清真寺在修建的时候挑战了当时的工程难度，非常不坚固。1740 年波斯纳迪尔·沙阿的军队入侵时，清真寺遭到摧毁，大规模的重建是 1974 年之后才开始。

我走进清真寺，在庭院中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灰色大理石台子，这是乌鲁格·贝格捐赠的古兰经展台，我在塔什干见到的奥斯曼古兰经就曾经放置

在上面。以前有个传说，女人从石台下面钻过去有利于生孩子，不过现在石台周围已经用护栏围起来，估计是担心人们钻过去有危险或者损坏文物。我比了一下石台下面的宽度，普通身材的东亚女人都能钻过去，壮一些的西方女人想钻过去就有点困难了。

宁山哀：东亚女人生孩子的困难在于畸形审美导致身体瘦弱，但是孕期过度补充营养又不运动，所以胎儿很大，容易生育困难，又不普及无痛分娩，就很遭罪。西方女人的困难在于容易肥胖，加重心脏负担。所以这个石台的效果是有地区限定的，主要是针对西方女人，能钻过去说明没有太胖，生孩子比较安全容易。如果针对东亚女人应该反过来，不能太瘦才行。

这座清真寺从一开始施工就出现了结构问题。帖木儿 1404 年从战场返回时，这座清真寺几乎快完工了，但是帖木儿对效果不满意，进行了各种更改，尤其是针对穹顶。结果建成几年之后穹顶就开始有砖头脱落，为了保护清真寺，之后不断进行各种重建和加固。

16 世纪后期，比比哈努姆清真寺不再修复，此后建筑逐渐恶化。我在老照片上看到，在 1897 年的地震之后，正门和穹顶大部分都已经坍塌。几个世纪以来，撒马尔罕的居民在半废墟中搜刮建筑材料，比如砖头和大理石。布哈拉酋长国在 19 世纪初将一面金属大门熔化成硬币，之后俄国官员又把清真寺当作棉花交易市场。

我试图走进清真寺，但大门是锁着的。我绕到侧面后方，发现只有正面外表被修复完好，侧面的墙面并没有修复完成，都是糟糕的裸露土墙。我在清真寺侧面发现了一道小门，更像是墙面上的破损开口，我从开口进入清真寺内部，里面都还没有修复效果，墙壁是光秃秃的废墟，大部分的雕刻和瓷砖都已经脱落了。

从比比哈努姆清真寺离开，我走到街对面的比比哈努姆陵墓，在 20 世纪初

的老照片中，这座陵墓的穹顶已经全部坍塌。陵墓的管理人听说我是中国人，告诉我比比哈努姆也是个中国人。

宁山哀：这听起来也不像个中国人的名字。

我：当时人所说的“中国”不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也不一定是汉区，在当时的河间地区，中国指的可能是蒙古，或者是喀什到叶尔羌河地区。而且比比哈努姆也不是人名，意思是年长的妻子，原型人物是萨拉伊·穆尔克·汗尼姆（Saray Mulk Khanum），她应该是个突厥化的蒙古人，是东察合台汗国的公主，她的祖父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曾孙子，所以她也算成吉思汗的后代。汗尼姆的意思就是可汗的女儿，帖木儿为了和成吉思汗血统靠近也是得益于萨拉伊。

萨拉伊不只是帖木儿的妻子，也是他的顾问，她对丈夫和帝国都有深远的影响。在帖木儿离开撒马尔罕的时候，萨拉伊就是撒马尔罕事实上的统治者，撒马尔罕主要的建筑都是她实际主持修建的。

萨拉伊和帖木儿没有孩子，但她对帖木儿其他妻子所生的后代照顾得很细致，包括帖木儿的儿子沙鲁克和孙子乌鲁格·贝格。在这座陵墓中跟萨拉伊合葬的是她的母亲、姐妹和外甥女，虽然一些记录中认为萨拉伊本人并没有埋葬在这座陵墓中，但陵墓管理人坚持说她就在里面。这座陵墓可以走到下方的墓穴里，里面陈列着四座石棺，萨拉伊本人的石棺稍大，覆盖着黑色带花纹的丝绸，其他三座石棺覆盖着橘黄色带花纹的丝绸。

在过去的几年中，撒马尔罕被以旅游为导向重新规划，将旧城区从游客的视线中隔离开，旧城区与旅游建筑物所在的大街之间所有入口都被围墙和铁门挡住。这一点很像我在哈尔滨看到的中华巴洛克，也是用一道大铁门把旅游街区 and 未被改造完成的生活街区隔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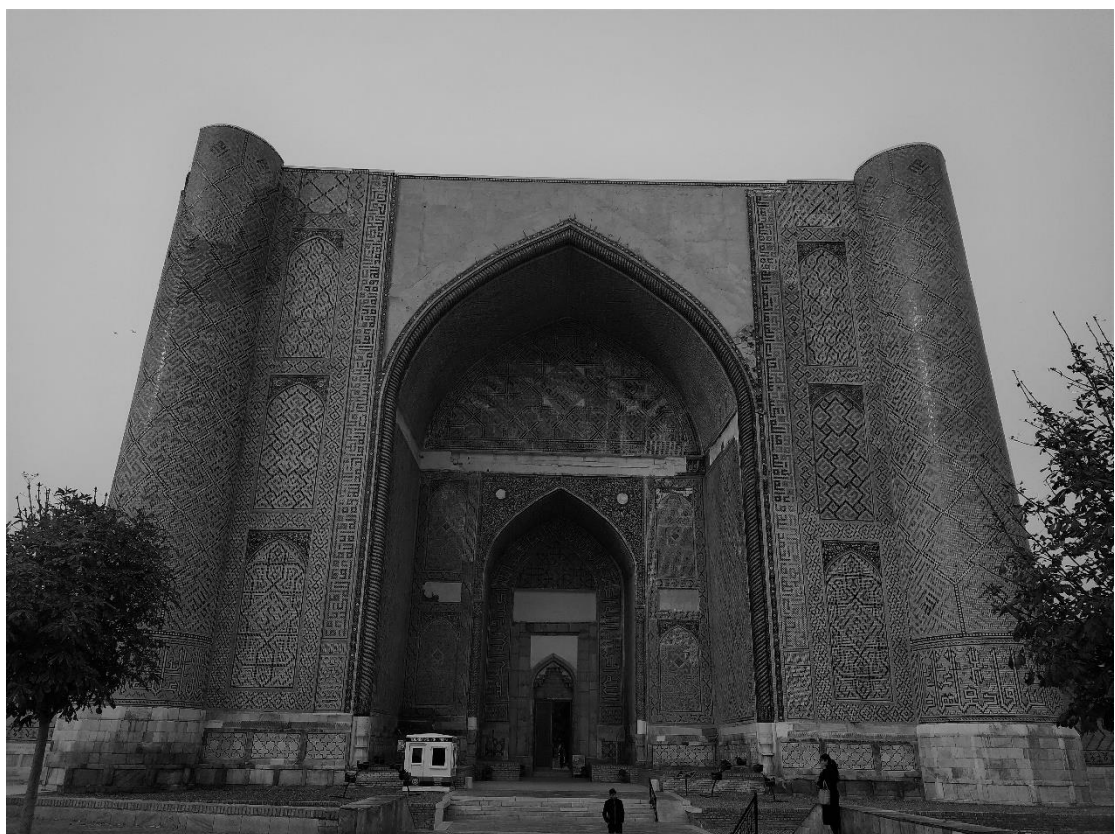
我跟随当地人发现了通向旧城区的小路，不过这片城区也谈不上有多旧，

值得一看的是两座老清真寺的木头柱子和顶棚雕花，以及并没有开门的犹太会堂。

如果想了解撒马尔罕犹太人的历史，在纳沃伊公园旁边的区域研究博物馆更值得一去，这是一座本地犹太人的老宅子，展出了很多本地犹太人的生活物件和老照片。和乌兹别克斯坦很多博物馆一样，这座博物馆很突兀地有一个展厅全部是动物标本，不知道是不是苏联时代注重自然科普教育的遗留。

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北面是一座市场，清真寺和集市的组合是很多穆斯林城市中心街区常见的形态。我在市场里试图寻找传说中撒马尔罕的金桃，但是当地人似乎不太能理解什么是“金色的桃子”。

我只买到了一种外形最接近的水果，事实上是一种柿子，的确是金色的，也很像桃子。也许在曾经的唐朝人看来这是颇为惊奇的东西，丝绸之路上很多当时被视为奇珍异宝的商品利用的都是这样的信息差。



从市场向北，经过天桥是一大片墓地，著名的夏伊辛达陵墓群（Shah-i-Zinda）和前总统卡里莫夫的陵墓相互对着，两者之间是普通市民的墓地。沿着墓地一路走下去，就到了撒马尔罕考古博物馆，博物馆后面的荒地就是曾经昭武九姓之一康国的故地。这座考古博物馆中最值得看的是一幅公元7世纪的壁画，粟特人描绘了当时的国际关系，壁画上画着坐在船上的武则天、骑马狩猎的唐高宗、突厥和波斯的使臣以及粟特君主的出行队伍。

其中有一幅壁画，两个人骑在骆驼上，脸上挂着白色的口罩，这是粟特的琐罗亚斯德教祭司，我之前在亚兹德的火神庙里见到过这种装扮，很多粟特人信仰琐罗亚斯德教，也随着商路贸易传教到中国，山西介休的祆神楼就和粟特商路贸易有关。

宁山哀：为什么撒马尔罕的壁画上会有武则天？

我：公元658年，康国臣服于唐帝国，唐帝国设立康居都督府，封康国国王为都督，所以这幅壁画上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武则天和唐高宗。

从博物馆继续往北走就到了乌鲁格贝格天文台，这里已经是撒马尔罕的城边了，不过我要去的不是天文台，而是但以理陵墓，我曾经在伊朗的舒什去过一次但以理陵墓，在伊斯兰教中把他称为丹尼尔，这位先知的陵墓不只有一座。按照一些传闻记录，帖木儿大帝将但以理的遗体从舒什带到了撒马尔罕重新安葬。

在但以理陵墓下面有泉水，大家都在这接水喝，据说有疗愈效果，我没带瓶子，就只冲洗了一下泰斯比哈。陵墓旁边有一棵无花果树，1996年莫斯科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期间参观但以理的陵墓，看到这棵干枯的无花果树，他为这棵树祝福，过了一段时间，树复活了。

来但以理陵墓参观的人很多，大家只能透过一个小门轮流观看不能进入。

这座陵墓很长，上面蒙着写有古兰经文的绿色毯子，传说陵墓建成后，但以理的遗体就开始生长，最终长度超过 17 米，所以陵墓才会这么长。

宁山哀：遗体真的会生长吗？

我：有一种说法是为了让人们找不到正确的遗体位置，避免过分崇拜遗体，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先知圣徒的墓修得很长，是因为陵墓不能局限肉体的边界。很长的陵墓对于修行者并不罕见，我之前去马六甲勿沙岛，岛上一些苏菲大师的陵墓也是很长的。



离开但以理陵墓，我返回城区，在帖木儿大帝陵墓斜对面十字路口的中心，是帖木儿大帝的坐姿雕像。雕像坐南朝北面向老城区，他的背后是一条很长的林荫道，以雕像为界限划分，东北面是并不精致但商业化十足的旅游景区和乌兹别克人居住的老城区，西南边则是相对本地生活气息浓郁的俄族城区。

我沿着雕像背后的林荫道向南走，透过树冠隐约看到一座中国式的白色石

头牌坊。人在国外总是会对母国的文化景观很敏感，哪怕这个东西在我的故乡根本没有，这就是想象的共同体。

我朝着牌坊走过去，发现是一座街区公园，背靠着撒马尔罕外国语学校。这座中国公园正对大街是牌坊，牌坊正面写着“至圣先师”，下方是一座中国拱桥，公园四周是长廊供人们休息。穿过牌坊，里面两边是中国的鼎和花灯模型，最里面中间还有一座孔子雕像。

中国公园旁边是莫斯科圣阿列克谢大教堂（Church Of St. Alexius Metropolitan Of Moscow）。最初这是一座突厥斯坦教区驻军教堂，1912 年投入使用，教堂是简化的新俄罗斯风格建筑，没有过多的装饰，棕色的墙面点缀着绿色尖顶，入口上方是一座钟楼。

我从侧面的门进入教堂，内部是一个完整的空间不加分隔，显得非常宽敞。教堂最里面有一个祭坛，祭坛上方就是高高的尖顶。教堂在 1920 年代被关闭，圆顶和钟楼也被拆除，之后又被用于军事设施，1996 年归还给本地教徒。

我来到这座教堂的时候，里面正在装修，一位老年女士接待了我，但她理解不了我用谷歌翻译的俄语，我只能大概了解到教堂平时没有弥撒，只有周日上午才有，偶尔有一些教徒来自己祈祷或者购买宗教用品。这位女士告诉我沿着街道向西北一直走还有一座东正教堂，里面每天都有弥撒。



我沿着街道一路走过去，在远处看到了教堂的天蓝色钟楼尖顶，接着是棕色的墙面，这是圣母守护教堂。这座教堂建于 1903 年，最初称为基督升天教堂，1910 年这座教堂被作为俄国突厥斯坦第五步枪团的军队教堂使用，1998 年被命名为圣母守护教堂。

我走进教堂里，教堂的司祭接待了我，他听说我来自中国，告诉我他的爷爷曾经去过满洲，在哈尔滨与日军作战。司祭向我介绍这座教堂的历史，他说教堂从建成到现在包括苏联时代都没有关闭过，现在教堂周日的弥撒大概有二百多教徒参加，主要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教会学校也有五十多名学生。由于不是休息日，当天下午的弥撒只有几个老年人来到教堂，但这位祭司和三位执事依然认真进行了弥撒仪式。

教堂里有大量的圣像画，在一个角落也有提供给教徒们的宗教用品。弥撒仪式之后，司祭坚持要送给我一件圣像，他原本想送我天使长米哈伊尔或者圣安德烈的圣像，但我告诉他我并非基督徒，他就选择了一件宗教意味比较淡而

更具情感化的圣母与圣子像送给我。

离开圣母守护教堂，我返回街区途中发现了一座天主教堂，教堂里的管理者是一位老奶奶，能听懂一些英语，结合她的讲述和我查阅的资料，了解到这座施洗者约翰教堂（St. John the Baptist Church）是撒马尔罕唯一的天主教堂。

19 世纪一小群天主教徒在撒马尔罕定居，主要是波兰和德国的商人与雇员。1915 年又增加了一些被安置在这里的波兰战俘，这些天主教徒们开始建立自己的教堂。这座哥特式教堂在 1916 年完工，1930 年政府关闭教堂改成学校，直到 1999 年教堂修复后重新使用，和塔什干的耶稣圣心教堂同样由波兰方济各会管理。

教堂所在的这片街区远离老城旅游景点，游客来的不多，本地人生活气息浓郁。在官方引导下，撒马尔罕的一切都 and 帖木儿大帝有关，但主要是苏联时代修复出来的旅游景点，真正本地人的生活早已和帖木儿大帝并无联系，甚至帖木儿帝国时期崇尚的波斯文化也逐渐被乌兹别克民族主义取代，这座城市最市民生活化的地方反而是俄族人居住的街区。

这片街区布满了公园、广场和林荫街道，是本地人闲适休息的地方，很多小孩子跑来跑去，情侣在这里搞对象，老人们在晒太阳。我走进一片公园里散步，看到一座精致的白色建筑，这座建筑建于 1882 年，1910 年俄国突厥斯坦第五步兵团以胜利者圣乔治的名义在这儿建立了一座军队教堂，现在是本地的作家协会。

傍晚时候，附近的学校放学，一群群学生在我面前走过，女生穿着连衣裙，男生穿着白衬衫，只是没有了红领巾，不然我会以为是我小学时候的校服，那种校服大概是苏联审美的一点点影响。东北似乎比中国其他地方滞后一些，我刚上小学虽然是九十年代中期，但接触的文化却大多来自八十年代末到

九十年代初，旧的革命叙事还留有一点点余韵，学校的走廊里挂着列宁和革命烈士们的画像，少先队的活动中还带有浓郁的革命口号。我看着这些孩子们回到一排排整齐的苏联房屋社区中，我小时候就住这种房子。傍晚的夕阳下，这片街区的一切仿佛凝固在了苏维埃黄金时代美好与幸福的过往中。

宁山哀：我觉得你对历史的喜好有点奇怪，一方面你很喜欢历史建筑，另一方面你又不愿意深入研究历史文本，你享受旧的感觉超过旧的现实，有时候我感觉你自己在编织一段历史，然后去向往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

我：历史并不完全在记录的文本中，历史在人的记忆里，记忆是可以遗传的，哪怕隔了几代人也会留有祖先的记忆，同时记忆也是可以传播的，当人们来到一座城市，呼吸这座城市的空气，这座城市过往历史的尘埃就会进入人的身体里，所以我喜欢历史建筑并不是建筑本身的样式，而是因为这些建筑内的记忆最聚集，浓度最高。所谓旧的感觉是真实存在的，但旧的现实反而不一定是真的，你看到的文本可能是后人篡改或者编造的，你看到的建筑也可能是后人重建或者翻新修复过无数次的，但那种记忆尘埃的浓度是不会骗人的。

宁山哀：你会更追求复古吗？

我：我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我倾向于社会稳定缓慢地发展，所以我不太喜欢激进变化，无论是回到过去还是走向一个新的未来。即使过去有很多我向往的传统，但我并不赞同社会整体突然回到过去，那同样意味着过于激进的变化。除非这种激进的变化已经发生，当下只是为了扳回正轨，比如我们今天社会已经激进地发展一段时间，那么我赞同同样激进地后退，或者是激进地停摆。

宁山哀：但是你却热爱革命，革命不是社会激进的变化吗？

我：我不认为革命完全意味着激进，激进的只是革命的行为，但大部分的革命

都有渐进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革命不是某几个思想家突然想出一个超前的理念然后带领大家一夜之间改变社会，相反革命往往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在很长时间里想要改变社会现状的期待，最后革命爆发是他们找到了一种合适的重新组建社会的方式。可能这种新的方式代表的是少数人的观点，但推翻旧的方式一定是多数人的选择，或者至少是默许的。

宁山哀：但你不能否认的是，革命会带来社会的剧烈动荡，这种变化很容易导致社会原有秩序彻底崩溃，陷入人道主义灾难。很多革命政权建立之后没有停止革命，而是开始内耗，比如迫害知识分子、大清洗等等。

我：社会剧烈动荡不是革命带来的，恰恰相反，革命是社会剧烈动荡的结果，革命的原因是原有的秩序已经崩溃。表面看到的是旧的政权一夜之间被革命后的新政权取代，但实际上在新的秩序确立之前，旧的秩序早已瓦解，只是带着惯性在运作，直到被新的秩序填充。革命并不会在压迫最沉重的时候发生，相反革命发生的时候，一定是这种压迫已经无力继续维系的时候。



铁尔梅兹：佛教遗址

铁尔梅兹是我这次旅行一个特别的地方，远离我要走的主干线，我想来这里是因为有两处佛教遗址。我坐了一夜的卧铺火车到达铁尔梅兹，对面就是阿富汗，这座边境小城曾经是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苏联与伊斯兰世界阿富汗的对峙前线。

阿富汗战争在乌兹别克斯坦军事博物馆中也是重要的一部分，1979 年苏军从这里入侵阿富汗，1988 年又从这里撤回。当时入侵阿富汗的苏军中很多是乌兹别克族士兵，因为他们更了解阿富汗，而且有一些会讲普什图语，苏联希望他们能带动阿富汗境内少数民族支持苏联。

这些乌兹别克族士兵跟随解放阿富汗的旗帜作战，最后却陷入到国际舆论的谴责中，可以说这次战争对苏联的多民族凝聚力造成了反噬，也对苏联一直以来努力塑造的解放者形象产生动摇。虽然在我看来，这个解放者的形象在雅尔塔协议苏联与美国瓜分世界之后就已经被打破了，甚至早在与纳粹合伙瓜分波兰的时候，这个解放者就已经不存在了。

在旧的旅游指南中把铁尔梅兹形容成走私者、毒贩子和黑警察横行的危险地区，但随着阿富汗战乱的平息，现在铁尔梅兹是房地产开发中的边境繁荣城市，城区里全是正在建设中的新楼盘。



我在铁尔梅兹火车站找了一辆出租车，先去四十女孩城堡遗址，传说曾经有四十个女孩在这里坚守抵抗敌人入侵。我之前在伊斯法罕也提到一座四十女孩塔，四十女孩和吉尔吉斯人的民族形成传说有关系，是组成吉尔吉斯的四十个部落。

从四十女孩城堡出发，我继续前往两座佛教遗址，也是两片考古挖掘地点卡拉特佩（Kara-Tepa）和法雅兹特佩（Fayaz-Tepa），现在还没有完全被开发成旅游景观。

卡拉特佩在铁尔梅兹的西北，阿姆河的东岸。我乘车来到这里，从最高点的南部可以清楚地看到被土墙包围的城堡和古镇的废墟，1936 年考古发现这里有一片佛寺建筑群，是由僧侣们在公元 1 世纪末建立的，这里也是现存发现的最古老的佛教建筑遗址之一。



我发现一个小山包上有一座被水泥外壳包裹着的佛塔，我走上小山包，需要打开一扇小门钻进去参观，但因为风化严重，很难看出佛塔上有什么痕迹，重要的文物都早被送到了博物馆中。我漫步在这片遗址群中，大部分只能在四周观看，不能走到遗址建筑中，包括僧侣们居住的屋子和祈祷起居的地方，这里也出土了佛像和菩萨像的碎片，还有龙和翼狮的小雕像以及壁画，这些我后面都在铁尔梅兹博物馆里看到。

我回忆起在北京看过的一个关于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展览，犍陀罗地区所在的贵霜帝国是琐罗亚斯德教和佛教的融合地带，在贵霜帝国出土的佛教文物中带有佛教和其他宗教融合的风格，铁尔梅兹曾经就属于贵霜帝国。

关于犍陀罗佛教艺术，大部分人都知道是受到古希腊艺术的影响，但其实不只是如此，犍陀罗艺术来源很丰富，包括来自贵霜、波斯和中亚地区的各个文化和宗教。比如说菩萨这个概念，原始佛教中没有菩萨只有罗汉，罗汉是自己个人修行，菩萨则是普度众生，佛教中开始出现菩萨就是来自贵霜帝国的影

响，这也就体现在了犍陀罗艺术中。



早期佛教主张个人的苦修，传播到贵霜帝国之后，因为贵霜帝国商业发达，所以佛教开始鼓励布施，人们不需要完全依靠个人的苦修，布施给别人钱财也是一种功德，这就迎合了商人群体的心理需求，佛教从此在贵霜帝国兴盛起来，菩萨的形象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出现。在犍陀罗佛教造像当中，佛陀的形象非常简单朴素，没有任何配饰，但是菩萨形象就非常华丽，身上装饰很多，长相也是贵族的模样，这些菩萨像原型就是乐于布施的贵霜帝国贵族们。

贵霜帝国本身是一个宗教很复杂的国家，琐罗亚斯德教徒很多，所以犍陀罗佛教造像也有一些琐罗亚斯德教的痕迹。佛教在贵霜帝国吸收了很多琐罗亚斯德教徒皈依，有人认为佛陀的弟子迦叶尊者曾经就是琐罗亚斯德教徒。在贵霜帝国的伽毕式地区有一种特殊的佛像叫焰肩佛，佛像的两个肩膀上有火焰，脚下有流水，这个形象是模仿贵霜帝国君主迦腻色伽，肩膀带着火焰是王权的象征，后来被引申为佛的神通。

早期佛教艺术中很少直接表现佛陀的死亡，而是用一些象征符号，但犍陀罗艺术中佛陀涅槃却是现实主义描绘，把佛陀的葬礼描绘成了人间的哀痛场景。在这些造像中，佛陀都是侧卧，也就是佛经中说的狮子卧法，这一个特征在犍陀罗艺术中被严格遵守，所有的佛陀涅槃作品中都是这个形态。

佛陀的葬礼在拘尸那罗举行，火葬之后由末罗族的首领用香水灭火，然后收取舍利。他们把佛舍利分成 8 份交给 8 个国王，还有两件圣物是收集舍利的瓶子和火葬后的炭灰。后来阿育王把 8 份舍利中的 7 份分成八万四千份，分散到各地修塔供奉，剩下的一份记载说在龙王手里，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个记载的意思是那一份舍利被洪水冲走了，阿育王的使者没有找到。

宁山哀：这些场景中怎么辨认出各个人物，有什么固定特征吗？

我：在表现佛陀涅槃的雕塑中，佛陀弟子们的表现和神态刻画非常写实，比较好辨认。比如会有一个非常悲痛扑倒在地的人，旁边有一个很冷静的人在旁边劝慰他，这两个人就是阿难和阿那律，还有佛陀的最后一个弟子须跋陀罗，他是包着头的。在佛陀的葬礼上一般会出现摩柯迦叶，他要礼拜佛足然后点火，点火有可能和他曾经是琐罗亚斯德教徒有关。还有一个形象是执金刚神，也就是佛陀的守卫，一般是悲痛欲绝的大力士形象，在犍陀罗艺术中，执金刚神的形象来源就是古希腊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

在一些佛陀涅槃的雕像中会有弥勒的形象，弥勒是佛教中未来的救世主，也是未来佛，也可以叫弥勒菩萨，在 56 亿万年后将会成佛。弥勒出现在佛陀涅槃中，代表的是从入灭到重生。犍陀罗艺术里有大量内容是燃灯佛为释迦牟尼佛授记，预言释迦牟尼将会成佛，燃灯佛是过去佛，在他之后是释迦牟尼佛，再之后就是弥勒佛。这个主题在原始佛教中并不存在，是在犍陀罗地区开始兴起的，尤其是伽毕式地区，所以关于佛陀故事开端的描述就是在犍陀罗文化中诞生的。

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对弥勒佛的信仰开始兴起，因为民不聊生，人们期待未来的救世主降临。到了宋朝对弥勒的信仰与摩尼教融合，在元朝末期已经成为带有秘密帮会性质的大型教团组织，明清时期不断衍生融合成白莲教，嘉庆皇帝时期最大的一次起义就是白莲教起义。

离开铁尔梅兹的早上，我在旅馆餐厅遇到一个德国大妈，她一个人在乌兹别克斯坦旅行了6个星期，费尔干纳盆地的小城镇都去过了，我也非常羡慕她，我到那个岁数要是还有这样的精神头儿，能一个人在陌生国家旅行几个月就好了。

前往布哈拉的路上，我在加油站休息区看到一个小歌手，靠在一台音响旁边唱歌，加油站里人一多，小伙子就起范儿了。也许以后我会给我的孩子讲述，你们现在崇拜的这位世界巨星，多年前我曾在乌兹别克斯坦一个偏远的加油站里与他有过一面之缘，那时候他是加油站小商店店主的儿子，而我是个外国游客，我见证了他在群山荒野中的加油站里为众人演唱。

司机加油的时候，我眺望着深山旷野，春花秋月入诗篇，白日清宵是散仙，空卷珠帘不曾下，长移一榻对山眠。



机器人能不能成佛？

在去布哈拉途中，我回忆起几年前想过的问题，是因为一部电影引发的，这个问题就是机器人是否能成佛？当时我还和一个佛教徒朋友有过一番讨论，在这里重温一下。

这个问题源于韩国电影《人类灭亡报告书》的第二章：《天工开物》。《天工开物》是中国明朝奇人宋应星编撰的一部手工艺百科全书，“天工”出自《尚书》“天工人其代之”，意思是上天的职责被人所取代。“开物”出自《周易》“开物成务”，意思是通晓万物的道理并按这道理行事最终获得成功。

这是个很有寓意的名字，人类发明了机器，取代了上天的造物职责，掌握了科学的原理最终为人类建设运用。在这部电影里，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接下来会怎么样，机器人也会取代人的职责，掌握人类的思辨修行，最终顿悟成佛。

在电影所描述的未来世界，机器人具有一定的人工智能，为人类承担了很多劳动。一位机器人维修员接到任务，去一座佛寺里为一台名叫稔铭的机器人做检修，检修原因是这台机器人参悟修行，能为其他僧人讲授佛法。

维修员当然不相信机器人成佛的说法，只觉得它与众不同，然而这份报告惊动了公司，公司决定收回这台机器人。在公司回收组到来的前一晚，一位女修士很担忧地向机器人稔铭询问该怎么办。

机器人稔铭说：“知觉意指分辨，分辨又指把所知道和其他区分开，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是人的知觉将他们区分为“佛”或是“机器”。我们误以为这是不变的实体并执着于此，才会想去分辨又因此而烦恼。知觉即为空，被知觉亦为空，而我也同样无法摆脱知觉的缠绕，请您以空灵之心去看待此事”。

简单地讲，这台机器人认为通过知觉来分辨“佛”还是“机器”是一种执念，人类会因为执念而感到烦恼，然而知觉是空无的，被感知到的也是空无的，所以请这位女修士不要怀有执念分辨佛和机器。

公司回收组来到寺庙，基于技术角度去证明稔铭只是一台出了故障的机器人，不可能成佛，而且还带来了一位高僧的视频讲话：

“各位好，今天贫僧意外听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感到非常吃惊。当然我不是在责怪你们，每个寺庙都有自己决定和处理事情的权利。但是各位，一个机器人能够修成正果，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意义？会给众生什么样的意义？一个机器人，一出世就没有任何欲求，只以为人类做贡献为目的而造，这才是机器人，不是吗？如果将一个生来就是机器人的家伙当作是佛，原本在与世绝缘和不断地自我否定中经过千百次艰辛的轮回才能千辛万苦修成的正果，这台机器人从最初的组装中就能获得，那么还有谁会去努力修炼修成善果呢？”

这位僧人的话很有意思，他是从此事对人类修行的影响角度来阐述。这位僧人没有纠结于机器人能不能成佛的“事实讨论”，因为这容易陷入对物质色相的执念，所以他直接进入“价值讨论”。也就是讨论机器人是否可以成佛这件事情本身，对佛教和人类的价值影响就非常不好。因为如果一个机器人由于被编入的程序而天然就能成佛，那么人类还有什么理由修行呢？

机器人稔铭对此的回应是：

“对我而言，从未有过执着和欲望，也不会有，我因此明白释迦世尊的教诲。人类啊，你们到底在害怕什么？执着与欲望，恶行与善行，醒悟与无名，在我领悟了寂静涅槃之后，机器人眼中的世界，亦已被此填满，为何你们会认为只有机器人才能得道圆满？人类啊，从你来到人世间的那一刻，醒悟就已经存在于你的世界里，只是被遗忘了而已。在我这机器人眼里，世界是因此而美

丽，不论机器人是否醒悟，世界也因它而完整。作为人世间的主人，你们也都早已成就了这些。因为你们心中所持的“机器人应该如何存在”的执念，为了不让你门再一次陷入无明烦恼与妄分别中，我决定离开这里，请务必再一次审视你们的内心，最终修得觉醒的果报”。

这是价值层面上的回应，是一段很有高度的话。在机器人稔铭看来，顿悟不是后天修行中产生的，而是每个人出生的一刻就存在于脑海中的，只是人们遗忘了。修行是为了把这种遗忘的顿悟逐渐找回，这就如同对机器人来说，“顿悟”的程序在被制造的时候已经植入，也是要通过修行才能激发。为了不让人类陷入对佛与机器的分辨执念中，稔铭选择牺牲自己把人们从困扰中解脱出来，他圆寂了。

我感兴趣的是电影中的两层讨论：

1. 机器人能不能成佛？
2. 机器人成佛了对人类的影响是好是坏？

前者是对客观事实的判断，后者是价值判断。后者是片子里那位高僧更担心的，如果修行变得非常容易，甚至不修行也能得道成正果，会对人类产生怎样的影响？人们还会修行吗？在佛教中，修行是获得回报的途径，所以人们这一世不断努力，为的是最终得到回报。

机器人的出现打断了这个关联，机器人没有欲望和执念，根本不需要修行，是不是可以直接获得回报呢？或者反过来，如果机器人非常辛苦地修行却无法获得回报，是不是说明佛教的这种关联出现了问题呢？



就这个问题，我和一位佛教徒朋友朵朵朵朵进行了讨论：

我：在佛教中，是不是顿悟成佛必然经历修行，有没有人生来就没有欲望和执念，不需要修行也能成佛呢？

朵朵朵朵：我不认为有“生来就没有欲望和执念”的人。因为如果完全没有欲与执，那按佛教的认知就根本不会有“生”。但的确有些人似乎不需要付出特别努力，也就是所谓的顿悟。但顿悟意味着这个人在过去的生命中已经付

出了足够多的努力，积累了足够多的福德，所有顿悟的背后都一定有渐修。只是有轮回的阻隔，可能看不到别人前世的付出，就以为这一世什么都没有做就能成功。而且，即使他在以往的轮回中积累很多，很天才，在这一世也仍然需要学习。即使是释迦牟尼佛陀积累够多注定要成佛了，也还是走了一些弯路，比如他开始会以为苦行可以得道。

关于“注定”，就是种种因缘已经走到了那一步。宿命好像一个鸡蛋在锅里煮，你可以选择让它就那样煮下去；也可以趁没熟的时候用一把扇子把火扇灭，去干预它不让它熟；也可以加一把柴让它熟得更快，这就是佛教说的改变命运。但是如果这个鸡蛋已经熟到了九成九，那你灭了火不想它熟，可能很难有太大的改变。

我：如果是实现了人工智能的机器人，能不能成佛呢？是不是只有身处六道中才能成佛？

朵朵朵朵：六道是对生命状态的一个划分，机器人不属于生命也不在六道之中，是器世间的东西，有智能不一定是生命，而如果机器人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生命，那就是本就在轮回里。也就是只有生命能够修行成佛，不是生命就无从谈及这个事情。

我：按照佛教的说法，什么算是生命呢？这个有具体的界限吗？

朵朵朵朵：生命是有五蕴的，人有情有性，有真实存在的五蕴，草木有性无情，就算不到五蕴，低等动物由于业力作用，它的意识可能不强，愚痴一点，而且生命与非生命，在修行状态下去观察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机器人有意识，那就和普通生命一样，但我认为这确实不大可能。

我：有没有可能成佛是可以通过编程完成的，也就是有一个程序的植入，一下子就顿悟成佛了？

朵朵朵朵：即使机器人的心识因为编程而出现，编程也不过是众多因缘的一种罢了。就像人类男女结合产生生命，父精母血也只是许多因缘中的两个直接因缘。如果真的有一个这样的程序，那或许是这个程序提供了一套方法，相当于佛教的禅修升级了，是手段的变化。或许它自身是一个契机，但有一点：成佛也好，顿悟也好，即使在植入程序的一刹那这个人顿悟，最多也只能说他以前在轮回中积累了足够的力量，现在刚好有一个契机所以顿悟。绝对不可能他以前任何事都没有做过，以一个程序的外来力量使他顿悟。这涉及到佛教中一个非常根本的东西，就是自力与他力的问题。

佛教讲的是自力，比方说我不会祈祷“佛陀，求你不要背弃我，不要让我死后去地狱”，因为任何存在都不可能做到这样。我的生命指向哪里，一定是只由我自己的业决定。净土宗可能会祈祷得到接引，有佛来接他往生净土，但“他力”也只是一部分，自己努力他力帮忙，不可能仅仅靠他力就成功。另一方面，也不大可能有快捷程序，在这个时代佛教是慢慢衰落下去的，有些很好的法门可能都慢慢失传，人类的福报不可能突然得到一个这样的东西。

我：那如果真的有了呢？

朵朵朵朵：如果真的有了，按照佛教的世界观，那就恭喜你，你之前的轮回中积累了很多修行的功德，这一世才有机会遇到这个。成佛不可能是非常方便的事情，如果你看到的是现在可以不用功就成佛，那只能说明他前面的轮回中曾经很用功，但他忘了，而你不知道。有些人修行起来学得就是比别人快，一个道理，其实花的功夫都是一样的。如果某个人真的因为这个程序的植入成佛了，那也是他的因缘到了，但在这个阶段，人类的福报不可能获得这种方式。而且，成佛不能是被动的，一定是这个人主观的努力，也有的菩萨明明可以成佛，但他不愿意成佛。

布哈拉：经学院里的旅游市场

从铁尔梅兹去布哈拉没有直达火车，要绕很大一圈，也没有直达大巴车，我只好雇了一个司机带我过去，除了一路和狡猾的司机斗智斗勇之外，整个旅途还是很好的。那个司机贪婪到连上厕所都希望我来替他付费（而且这个国家无论什么样的厕所都要收费，如此比起来，免费公厕可能是中国难得的社会主义遗留了），但他最后在布哈拉帮我找的旅馆性价比非常高，就在老城中心旁边又不会很吵，房间很大早餐也不错。

在撒马尔罕的时候，我一度失望于城市的商业化氛围，虽然这颇有些旅行者的一厢情愿。但是到了布哈拉，我才意识到相比之下撒马尔罕是多么富有生活气息，布哈拉才是一座真正的主题公园。我试图说服自己，商业化本身就是这座城市在古典时代的气质，如今不过是经历了苏联时代的计划经济之后，重新回归了商业传统当中，虽然这种回归传统非常用力过猛。

无论是乌兹别克斯坦还是中国都有这个特点，就是如果政府主导想要宣扬回归传统，一定是挖掘出传统中糟糕的那些东西，而好的传统基本不会被鼓励，这种甄别方式能够如此精准地挑出最烂的，也是让我感到颇为好奇的地方。

我之前去土耳其和伊朗，在店里看东西即使什么都不买，店主也会乐于笑脸聊天，但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尤其是景点周围的店铺，如果不买东西，店主就会马上露出不高兴的冷脸。这种冷脸大概是社会主义国营商店的遗留，还没有真正把传统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文化找回来，估计我的父辈们来这里倒是会找到一点年轻时候的购物体验。

在来到布哈拉之前，我对这座城市的想象是一个神圣的宗教与学术之都，毕竟这里是伊斯兰世界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伊本·西那的故乡，同时又诞生了最

重要的宗教学者布哈里和影响深远的苏菲教团创世人巴哈乌丁·纳格什班迪。

一切和期待的都不一样。



我进入布哈拉老城区中心，看上去便利的旅游指示牌显现出在这个旅游服务并不发达的国家里存在一个比较超前的区域。利亚比·豪兹（Lyabi-Hauz）是布哈拉老城的中心，也是游客们主要聚集吃饭休息的地方。利亚比·豪兹是布哈拉老城里少数幸存的池塘之一，苏联时代之前布哈拉老城里有许多池塘，但缺少维护滋生疾病，大多在上世纪 2、30 年代被填平。利亚比·豪兹之所以能够幸存，因为这里是 16、7 世纪宏伟建筑群的核心。

利亚比·豪兹建筑群的历史与纳迪尔·迪万·贝吉（Nadir Divan Beghi）这个人有关，他是布哈拉埃米尔伊玛目·库里·汗（Imam-Quli Khan）的大臣，也是埃米尔的叔叔。纳迪尔修建这片建筑群的时候，附近有一座大房子属于一个犹太女人，纳迪尔认为这里是挖池塘的理想地点，但犹太女人拒绝了他

收购房屋的提议。纳迪尔将她带到埃米尔面前裁决，但是布哈拉的伊斯兰法官们认为，纳迪尔想要获得这片土地必须征得犹太女人的同意。

因为没能买下犹太女人的土地，纳迪尔想了一个很缺德的办法，他在附近建造了一个小型水库，挖了一条灌溉水渠，水破坏了犹太女人房子的地基。犹太女人找到纳迪尔，他再一次表示愿意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她的房子，但是犹太女人拒绝了这笔钱，她希望纳迪尔将一块土地给犹太人用于修建会堂。纳迪尔同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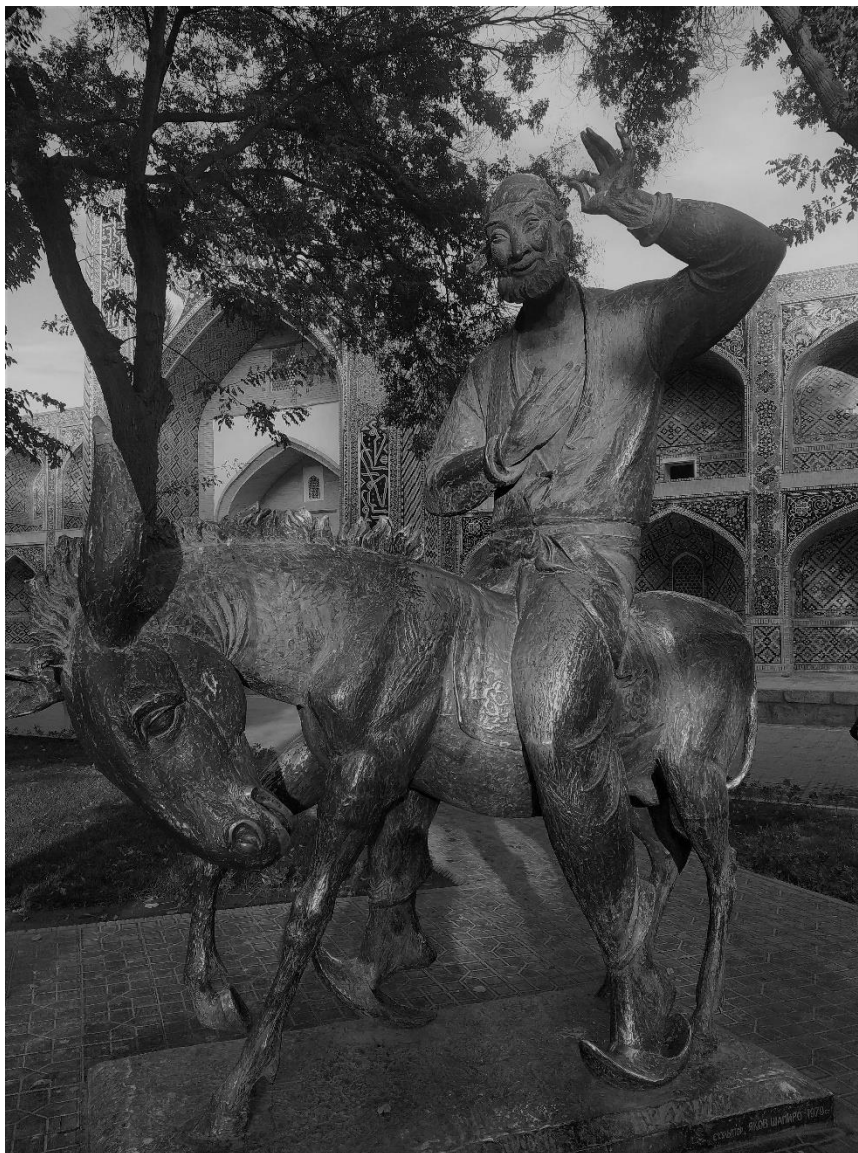
这块土地就是布哈拉的犹太区，犹太会堂和池塘几乎同时出现，作为这座城市宗教宽容族裔和谐的象征。尽管纳迪尔采用了缺德的方法获得土地，但对于他的身份来说还算是文明了，伊斯兰法学家们的裁决也被视为穆斯林社会对犹太人的保护。

利亚比·豪兹周围的清真寺和经学院难免让人有些审美疲劳，值得一提的是纳迪尔经学院原本是一座商人旅馆，但建好之后埃米尔来视察，以为是一座经学院，于是就真的改成了经学院，现在这座建筑又回到了最初建造时的功能，里面全都是一个一个小房间组成的店铺。

今天布哈拉几乎全部的经学院都被改造成大型旅游市场。如果不考虑其中昂贵的“手工特产”之外，纳迪尔经学院的外墙倒是值得一看，可以和撒马尔罕的谢尔多尔经学院对照，纳迪尔经学院墙面上绘制了孔雀（也可能是西方的凤凰菲尼克斯）叼着羊的图案，中心也是人面太阳。

我在池塘边坐着休息，看很多人在这里拍婚纱照，池塘边有一张榻，四个乌兹别克大爷坐在上面玩牌，本来应该很具有本地生活化的场景，在这样一个旅游景点显得格格突兀，一群游客在拍他们，我就想他们是真在玩牌，还是在当演员呢？

总之，布哈拉给我的初印象，就是曾经的伊斯兰经学院里全是面向游客的店铺和表演。如果说撒马尔罕是官办旅游商业，民间本身生活气息保留还好，那么布哈拉就是敞开了全民旅游商业。一个国家有钱的时候还是要大修土木，这样后代落魄了，靠吸引外国人来旅游坑点钱也能凑合活着。



利亚比·豪兹广场上最吸引游客合影的是骑着毛驴的纳斯尔丁雕像。我之前去土耳其的时候，当地人说纳斯尔丁是个土耳其人，塞尔柱王朝时期出生在科尼亚，是一位苏菲智者。但乌兹别克人认为他出生在布哈拉，维吾尔人当中也有纳斯尔丁的传说，就是阿凡提。从塔里木盆地到小亚细亚，半个多亚洲都知道纳斯尔丁非常聪明，我想可能是因为整条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要么是暴君，

要么是奸商，不斗智斗勇哪行呀，生活在残酷地区的人们必须崇拜智慧。

在池塘的西北角是地基下沉的玛戈吉阿塔清真寺（Maghoki-Attar），历史非常古老，考古学家曾在这里挖掘出公元 5 世纪的琐罗亚斯德教神庙和更早期的佛教寺庙。蒙古人入侵的时候，当地人用沙子把清真寺埋了起来，建筑的地基很低，现在周围也都是考古挖掘现场。

在布哈拉第一座犹太会堂建成之前，犹太人与穆斯林共同使用这座清真寺作为宗教场所，犹太人在穆斯林之后进行礼拜。现在这里被改成地毯博物馆，展出布哈拉本地生产的精美地毯，地毯编织工艺也是布哈拉在丝绸之路上的象征。有趣的是，我在里面发现了一件绣着阴阳与河图洛书图案的地毯，工作人员说这是来自中国的学生在布哈拉学习地毯工艺留下的作品。

从地毯博物馆继续向西走，经过几条售卖千篇一律旅游纪念品的店铺，就到了这座城市的象征——喀龙宣礼塔（Kalon Minaret），喀龙清真寺周围的城区一直都是这座城市最核心的部分。

1127 年，喀喇汗国统治者阿尔斯兰·汗（Arslan Khan）修建了喀龙清真寺，在蒙古人征服布哈拉的时候，成吉思汗以为这座清真寺是可汗的宫殿，他保留了宣礼塔，也有说法是成吉思汗惊叹于这座宣礼塔的高大雄伟，认为自己不该毁掉它。然而，清真寺本身建筑并没有幸免于大火，之后许多年里这座清真寺一直是废墟。



喀龙宣礼塔的尺寸在这片城区格外显眼，明显超过了清真寺宣礼塔的实用功能，所以学者们猜测这座宣礼塔可能沿袭琐罗亚斯德教的光明塔。在布哈拉酋长国时期，这座高塔承担了另一项功能——处决示众，布哈拉的统治者把不受欢迎的人从上面推下来，当众摔死。很多城市都有一座阳具一样的地标，往往象征着对权力和财富的炫耀，显然布哈拉的统治者选择了其中最残暴的一种表达。

喀龙清真寺和撒马尔罕的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差不多大，但在建筑风格上却

有很大不同。这座清真寺被一个大的蓝色瓷砖穹顶所覆盖，环绕清真寺内部庭院的长廊有 288 个穹顶，被 208 根柱子支撑着，一个高大的瓷砖拱券门面对庭院，可以由此进入主礼拜殿。

从喀龙清真寺前往外城的途中，我路过一座监狱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本身可看的内容不多，主要展示曾经布哈拉酋长国的刑罚照片和刑具。当我走进这座监狱里，发现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坑，当地人把这里称为虫坑，统治者会把他最不喜欢的囚犯扔进去，让他们在虫子与老鼠当中忍受饥饿与痛苦。

我突然想起以前看过关于这个虫坑的故事，这里曾经关押过两个英国人，他们的经历被西方世界当作献身于荒蛮东方的英雄故事，这两个人背后的历史就是英国与俄国争夺中亚、阿富汗和印度的大博弈。

1831 年，亚历山大·伯恩斯上尉（Alexander Burnes）对印度河的勘测打通了英国前往中亚的道路，他进入阿富汗，经过兴都库什河到达布哈拉，成为最早为英国提供中亚情报的人，回国后出版了《游历布哈拉》。

1838 年，英国查尔斯·斯托达特上校（Charles Stoddart）抵达布哈拉，打算与纳斯鲁拉·汗（Nasrullah Khan）结盟。斯托达特的任务是要说服布哈拉统治者释放俄罗斯奴隶，消除俄国可能入侵的借口，并与英国签署友好条约。纳斯鲁拉·汗恼怒于斯托达特没有带来礼物也不鞠躬，更重要的原因是斯托达特只带了一封印度总督的信，但纳斯鲁拉·汗认为他和英国女王才是对等的地位，于是将斯托达特囚禁在监狱的虫坑中。

1841 年，亚瑟·科诺利上尉（Arthur Conolly）到达布哈拉，试图说服纳斯鲁拉·汗释放斯托达特，但也被关了起来。随着英国军队在阿富汗的军事失利，以及寄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没有答复，纳斯鲁拉·汗在 1842 年处决了两个人，他们在雅克城堡前的广场上被斩首。

我沿着这两个英国军官从监狱被押往行刑地点的道路来到雅克城堡，这是一座巨大的堡垒，除了作为军事要塞外，也是一个小型城镇。城堡里曾经居住着布哈拉周围地区的贵族们，布哈拉埃米尔在这里接待各地使者，与大臣们开会。城堡在布局上类似矩形，入口由两座 18 世纪的塔楼构成，塔的上部通过走廊与房间和露台相连。

我在老照片上看到，城堡面前的广场曾经是集市，埃米尔站在城楼上可以俯视他的臣民们，广场也是宣布法令和公开处决犯人的地方，查尔斯·斯托达特和亚瑟·科诺利就是在这片广场上被处决的。

今天这座城堡被改造为博物馆，展出了关于布哈拉酋长国和埃米尔家族的历史。我在城堡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幅彩色照片，照片上是末代布哈拉埃米尔穆罕默德·阿里姆·汗（Mohammed Alim Khan），他身穿蓝色衣服头戴白色头巾坐在椅子上。这张照片非常有名，拍摄者是俄罗斯摄影家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普罗库丁·戈爾斯基（Sergey Prokudin-Gorsky），他开创了彩色摄影技术，记录了俄国的很多地方，留下了 20 世纪初珍贵的历史资料。

穆罕默德·阿里姆·汗曾在圣彼得堡学习，接触了很多俄国文化并带回到布哈拉宫廷中。他在 1910 年继位后，最初试图推广一些现代化改革，但不久之后保守派控制了国家，原本支持改革的阿里姆·汗也开始认为现代化并不适合他的国家。

1918 年 3 月，青年布哈拉党（Young Bukharians）联系塔什干的布尔什维克，告诉他们布哈拉人已经准备好革命。当布尔什维克军队到达布哈拉，要求埃米尔将城市交给青年布哈拉党时，埃米尔采取了武装对抗的态度，击溃了布尔什维克军队。

随着俄国内战结束，新政权开始有足够的力量和精力对付布哈拉埃米尔。1920 年，一支红军部队袭击了布哈拉，指挥军队的是著名的红军领导人米哈伊

尔·伏龙芝（Mikhail Frunze），经过 4 天的战斗，布哈拉被攻陷，城堡内大部分的建筑被摧毁，今天看到的建筑基本都是后来重建的。

阿里姆·汗逃往喀布尔，1944 年去世。他的女儿舒克里亚·拉德·阿利米（Shukria Raad Alimi）曾担任阿富汗广播电台的广播员，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她与家人逃到了巴基斯坦，然后又到了美国。城堡里面的导游说，几年前末代埃米尔的后人还曾经回到布哈拉，来城堡里参观过。



我走到城堡的街对面，曾经埃米尔的官方清真寺波洛·哈兹清真寺（Bolo-Hauz Mosque）正在维修中，隔一条马路是 1927 年修建的水塔，现在改造为一个观景台，我在观景台下面找到一家露天餐馆吃午饭。

宁山哀：青年布哈拉党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联合布尔什维克？

我：这和我之前去伊斯坦布尔提到的青年土耳其党有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奥

斯曼帝国战败投降，苏丹罢免了担任战争大臣的青年土耳其党领袖之一的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在军事法庭审判中，恩维尔本人缺席受审，逃离了土耳其。青年布哈拉党正是受到青年土耳其党的启发在 1916 年建立的，融合了本土的意识形态和革命重点，后期开始投靠布尔什维克，和恩维尔的青年土耳其党走了不同的方向。

宁山哀：噢噢，我看你在伊斯坦布尔的文章里提过恩维尔帕夏，他后来怎么样了？

我：恩维尔辗转去了德国，在那里他接触到德国共产党，1919 年恩维尔前往莫斯科会见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1921 年 11 月，恩维尔被列宁派往布哈拉，帮助镇压亲埃米尔的突厥斯坦民族主义者起义。

宁山哀：青年布哈拉党是受青年土耳其党影响成立，而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人恩维尔后来又去了布哈拉，他们联合了吗？

我：恰恰相反，恩维尔到了布哈拉之后，与起义领导人进行了秘密接触，叛逃到了起义者一方，试图实现他的泛突厥斯坦梦想。青年布哈拉党与恩维尔政见不同，坚定站在了布尔什维克一边。由于恩维尔军事经验丰富，以及身边跟随了很多奥斯曼旧军官，一开始获得了很多次军事胜利，最后 1922 年在杜尚别附近的一个村子遭到红军骑兵突袭阵亡。

吃过午饭后，沿着青年布哈拉党的建立线索，我要去拜访一座老宅子。这座老宅子的主人就是青年布哈拉党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乌兹别克第一批共产党领导人法伊祖拉·霍贾耶夫（Fayzullo Khodzhayev）。

青年布哈拉党在 1920 年占领了布哈拉，组建了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法伊祖拉·霍贾耶夫被任命为政府领导人。随着 1924 年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霍贾耶夫成为革命委员会主席，担任政府首脑，之后又成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一。

在部分乌兹别克人看来，霍贾耶夫出卖自己的同胞投靠布尔什维克。因为在二月革命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确认了布哈拉酋长国的独立，1918 年后的新政权一开始也只接收了俄国属突厥斯坦地区，建立了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维持了布哈拉酋长国的独立。由于青年布哈拉党的挑唆，导致红军最终决定吞并布哈拉酋长国。

但是霍贾耶夫同样反对斯大林的强权，这也导致了他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中被处决。虽然 1966 年霍贾耶夫被平反，但在乌兹别克斯坦他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今天在乌兹别克斯坦对他的纪念很少，他家的这座老宅子也只被称为当地富商的房子，很少强调霍贾耶夫本人，反而在里面陈列了一些反映苏联时代对乌兹别克人镇压和迫害的内容。

霍贾耶夫让我想起一个人，新疆三区革命中的阿合买提江，如果他不是在建国前飞机失事，而是活到建国后担任重要官职，那么在维吾尔人心中的地位 and 意义会不会和现在区别很大呢？

我在前面到过的雅克城堡仅仅是布哈拉的内城，要走到非常荒芜的外城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我经过了一个圣地，阿尤布陵墓（Chashma Ayub Mausoleum），也就是旧约中的犹太先知约伯，传说他来到这里用手杖击打地面，出现了一眼泉水，他的陵墓就在泉水的旁边，现在人们还会来这里接水喝。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遗迹，苏联人来到布哈拉之前，这里的人酷爱水池但水污染严重，所以瘟疫横行人们寿命很短，苏联人抽干了城里的水池，当地人才健康了很多。在古典时代，伊斯兰世界的公共卫生条件是拥有相对优势的，这可能来源于伊斯兰教要求中对清洁的重视，比如宗教活动前的清洗，所以近代问题的出现不是因为不重视卫生，可能只是城市管理水平和技术落后。

城市的公共生活质量就是一个统治德性的问题，虽然苏联的统治德性在西方人看来是低到地板的，但是到了东方就变成天花板了，苏联的城市公共管理水平是建立在从彼得大帝开始向西欧学习了两百年的基础上，而把其中发挥正常的一小部分拿到东方就高级的不得了。这也是俄国-苏联入侵中亚给这片土地带来的客观好处，强行中断了前现代国家不可避免的糟糕下沉。



经过阿尤布的陵墓，我走进一个公园，看到一座高大的红褐色石砖镂空建筑，这是萨曼尼陵墓（Ismail Samani Mausoleum），中亚伊斯兰建筑最古老的历史遗迹之一。蒙古人入侵时，陵墓被洪水淹没在泥土中，因此免遭破坏，直到 1934 年才由苏联考古队发现并挖掘出来。

这大概是这座城市当中和波斯-塔吉克有关的最重要的遗迹，伊斯梅尔·萨曼尼出生在撒马尔罕，他统一了萨曼尼王朝，在他统治时期帝国达到了顶峰，波斯文化渗入到中亚的核心地带，古兰经第一次被完全翻译成波斯文，以古典诗歌为代表的波斯文学非常发达，著名的诗人菲尔多西就是在这一时期写下了

他的伟大作品《列王纪》。

穿过公园，道路变得荒芜泥泞，不远处是残存的布哈拉外城城墙，这些昔班尼王朝时期修建的城墙很多地方都已经坍塌破损，只有大门由于旅游景观的缘故得到了重建。我沿着外墙往回走，找到被包裹在老城居民区中的查米纳（Char Minar），也就是《孤独星球》中亚版封面上的那座建筑。



这座建筑由于四座塔而著名，一般认为是一个举行苏菲仪式的学校。虽然建筑名字的意思是四座宣礼塔，但那四座塔并不是宣礼塔，而是装饰作用，被认为代表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佛教，建造者希望融合其中的相通处。

在这座建筑对面是一个出售纪念品的摊子，尽管店主信誓旦旦声称他的东西都是当地手作的，但我却在一个铜器底部发现了一个没有撕掉的标签，上面写着 Made In India。

在布哈拉的最后一天，我回到利亚比·豪兹旁边去拜访犹太会堂。今天的犹太会堂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但里面依然进行着犹太教的宗教活动。布哈拉犹太人这个称呼是 16 世纪访问中亚的欧洲旅行者发明的，当时中亚大多数犹太人都生活在布哈拉酋长国，因此被称为布哈拉犹太人。

到了 18 世纪，布哈拉犹太人遭到歧视和迫害，犹太会堂也被关闭。1793 年犹太拉比约瑟夫·迈蒙（Yosef Maimon）来到布哈拉，发现当地犹太人生活和信仰状况非常糟糕。迈蒙成为布哈拉犹太社区的领袖，他将本地犹太人的米兹拉希犹太传统（东方犹太教）改为塞法迪犹太传统（Sephardi），教育和复兴犹太教信仰。

1843 年，约瑟夫·沃尔夫（Joseph Wolff）在寻找以色列遗失部落的旅行中拜访了布哈拉犹太人，他的探险日记提供了关于布哈拉犹太人生活和习俗的宝贵信息。沃尔夫另一项更出名的任务是寻找两个失踪的英国军官，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被布哈拉埃米尔处决的斯托达特和科诺利。

1865 年俄国军队接管了塔什干，大批犹太人离开布哈拉搬到俄国突厥斯坦地区。从 1972 年开始，乌兹别克斯坦的犹太人开始移民到以色列和美国，主要在纽约的皇后区。

在离开布哈拉之前，我还要去拜访一座东正教堂。布哈拉的东正教堂非常少，因为东正教会在布哈拉酋长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离开老城区走过一段路之后，我来到棕色砖石建筑的圣天使长米哈伊尔教堂，教堂里只有一位老先生负责扫地和维护蜡烛与圣像，还有一位女士负责为教徒提供宗教物品和日常的捐赠登记。教堂内的布告我用谷歌翻译了一下，活动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应该是一座比较繁荣的教堂。

1860 年，俄国东正教徒开始来到布哈拉，在当时的布哈拉城外郊区建造了一座木制教堂，称为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1872 年教堂被大火烧毁，之

后在 1875 年建造了一座新的砖石教堂。这座教堂最初也是俄国突厥斯坦驻军使用的教堂，1929 年教堂关闭改为仓库，1992 年重新投入使用，命名为圣天使长米哈伊尔教堂。

布哈拉的俄国遗迹很少，俄国人建设铁路的时候绕过了布哈拉老城，在 16 公里之外修建了新布哈拉，也就是铁路移民定居点，叫卡甘（Kogon）。俄国把相关的行政管理机构，包括与布哈拉酋长国之间处理外交事务的部门都设立在卡甘。

今天布哈拉的火车站依然在卡甘，火车站附近最突出的建筑是埃米尔行宫，布哈拉埃米尔修建这座宫殿本来打算接待沙皇尼古拉二世，然而宫殿建成之后，埃米尔本人从没在这儿住过，沙皇最终也没来，后来就改为了铁路工人文化宫。

我在火车站旁边一家咖啡馆里喝茶等夜车，一个浅棕色的麻花辫的小女孩一直在偷偷瞄我，啃面包的时候小脸蛋一鼓一鼓，我朝她做了个鬼脸，她马上吓得转过头去，过一下又回头朝我吐舌头。那个可爱呀，我要是有这样的女儿，让我天天露脸吹捧歌颂领袖说他比我亲爹还亲，我都会认真考虑一下的。



希瓦：沙漠中的强悍古城

从布哈拉前往希瓦的路上，我仿佛到了另一个国家。在此之前，乌兹别克斯坦是一个双重内陆国的地理常识仅仅是书本上的一句话，直到临近希瓦，我才意识到这里离大海多么遥远。

前往希瓦要先到乌尔根奇然后转车前往老城，道路两旁都是沙漠，一阵狂风吹过漫天飞沙，沙漠深处温度骤降，和布哈拉简直是两种天气。接我的司机穿着厚厚的皮衣，带着大毛皮帽子，像极了电影中的沙漠马贼，但他的样子却让我觉得很亲切，我的东北老家过去出胡子，也是这样的打扮。

宁山哀：什么是胡子？

我：就是土匪的意思。

宁山哀：为什么叫胡子呢？

我：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说是源于对古代游牧部落南下掠夺的称呼延续，就是胡人的意思；一种说是因为土匪常年在山里，面容邋遢留着大胡子；还有说法是土匪下山抢掠会带着有胡须装饰的面具。

我好像随着风沙穿越进了历史中，如果说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曾经是商业与学术繁荣的大都市，那么希瓦就是沙漠中杀人越货抢劫商旅的盗贼窝点，希瓦汗国也正是凭借着沙漠中的地利，一度在波斯和俄国两个强悍的邻国之间肆无忌惮地从事奴隶贸易。

希瓦汗国真正的名字叫花刺子模，被称为希瓦汗国是俄国学者以首都希瓦来命名的。我在撒马尔罕路过昔班尼陵墓，昔班尼·汗在 1505 年占领了花刺子模，雄心勃勃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同时，波斯的伊斯梅尔一世也正好在建立帝国的上升期，两国在谋夫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战斗，昔班尼在战场上被杀，花刺子模很快被波斯人占领。

从 1695 年起，希瓦成为布哈拉的臣属，布哈拉任命了两名可汗，希尔·加齐·汗（Shir Ghazi Khan）和伊勒巴斯·汗（Ilbars Khan）。伊勒巴斯·汗四处掠夺波斯奴隶，并杀死了一些波斯大使，波斯君主纳迪尔·沙阿非常愤怒，在 1740 年征服了希瓦，处决了伊勒巴斯·汗，释放了波斯奴隶。

希瓦不仅挑衅南面的波斯，还挑衅北面的俄国。俄国对希瓦发动了五次战争，只有最后一次成功。1717 年，亚历山大·贝科维奇·切尔卡斯基（Alexander Bekovich-Cherkassky）进攻希瓦，俄军取得胜利后，希瓦统治者希尔·加齐·汗与俄国人订立了条约，建议俄军分散驻扎，以便更好地进行接待。然而俄军分散之后，希瓦军队突然发动袭击，俄军全军覆没。之后 1801 年和 1839 年，俄国对希瓦又进行了两次远征，分别由于沙皇保罗一世去世和天气寒冷牲畜大量损失而被迫撤回。

1839 年俄国远征的原因之一是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奴隶被关押在希瓦汗国。为了消除俄国吞并希瓦汗国的借口，英国开始与希瓦汗国取得联系，试图让可汗释放奴隶。英国人派遣了詹姆斯·阿伯特上尉（James Abbott）在 1840 年到达希瓦，他说服了可汗，并携带有关俄罗斯奴隶问题的一封信给沙皇。但是，阿伯特上尉离开之后被匪徒抢劫，虽然安全到达圣彼得堡，却没有完成任务。

阿伯特的上级派了另一名军官里士满·莎士比亚中尉（Richmond Shakespear）继续完成任务。莎士比亚中尉成功说服希瓦可汗释放了所有俄罗斯奴隶，他带着获释的 400 多名奴隶前往俄国，受到了尼古拉一世的接待，俄国暂时失去征服希瓦汗国的理由。在这一次外交博弈中，英国暂时获胜。

经过半个多小时风沙中的行车，我终于到达了希瓦古城的正门口，进入古城需要购买门票，也可以不买票从其他门进入，但不能参观古城内的建筑，我之后会告诉大家买票的重要性。

今天的希瓦古城实际上是曾经的希瓦内城，被称为伊坎卡拉（Ichan-Kala），是几乎完整的中世纪老城区，也是中亚地区第一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伊坎卡拉被坚固的土坯砖墙包围，沿着城墙每隔 30 米就有防御塔。贯穿古城东西方向的主干道两旁是历史古迹建筑，两边往南北方向延伸就是居民区，有很多民宿旅馆和餐馆。



我在预订的旅馆安顿好就来到了主干道上，昆雅城堡（Kyunya Ark）是内城的中心，这座城堡建于 12 世纪，拥有发达的基础设施，是希瓦可汗和家眷居住的地方，也是军队的营地要塞，城堡里有监狱、清真寺、造币厂和宫殿。昆雅城堡前面有一个广场，可汗的部队在这里训练阅兵，也是处决犯人的地方。

我走出城堡，主干道上全都是游客，以及在寒风中拍摄婚纱照的新人们，感觉有点像中国的平遥古城。我不知道是不是季节的缘故，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旅行中，到各个城市都能看到很多街头拍摄婚纱照的新人，可能是我去的地方里有很多旅游景点，要么就是当地人特别热衷于结婚。

主干道两旁是商贩，如果说这里售卖的旅游纪念品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有什么区别，那大概就是多了寒冷的主题。也许是沙漠地区的温差，希瓦的重要特产就是巨大的毛皮帽子、厚实的驼毛袜子和手套，老照片里那些希瓦贵族们戴的大到夸张的帽子不是没有道理的，确实非常暖和。

走过半条街的商贩，我来到古城中心的聚礼清真寺。这座清真寺主要特色是建筑结构，没有人们所熟悉的那种拱形的入口和圆顶，只是一座外表看起来很普通的平房建筑。这种特殊结构是因为清真寺在 18 世纪后期修建的时候，参考的是 10 世纪一座非常古老的清真寺的样式，而不是后来才流行的穹顶建筑。



聚礼清真寺的入口面对着古城的主干道，我推开装饰精美的巨大木门走进，这座清真寺的采光很有特色，天花板上开了三个天窗，为大厅提供光线和通风，内饰就简单地涂抹灰泥。室内大厅天花板平坦，由 215 根木柱支撑起屋顶，整座建筑走在里面更像一个修行场所。我穿梭在这些木柱之间，欣赏每一

根不同的样式，这个大厅就像一座木雕博物馆，展示了不同时期的希瓦木雕风格，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 10 世纪。

有一些柱子雕工非常细腻精致，还带着镂空，有一些则基本没有雕刻，只用了粗糙的原木。我在这些柱子当中观察到一个细节，木头柱子下方与石墩连接的部分使用的是金属连接件，并且中间垫了一层毛毡。

宁山哀：为什么柱子中间要垫毛毡呢？

我：当地人说这是为了防止潮气蔓延到木头柱子上，讲究的建筑要用骆驼毛的毛毡垫子做隔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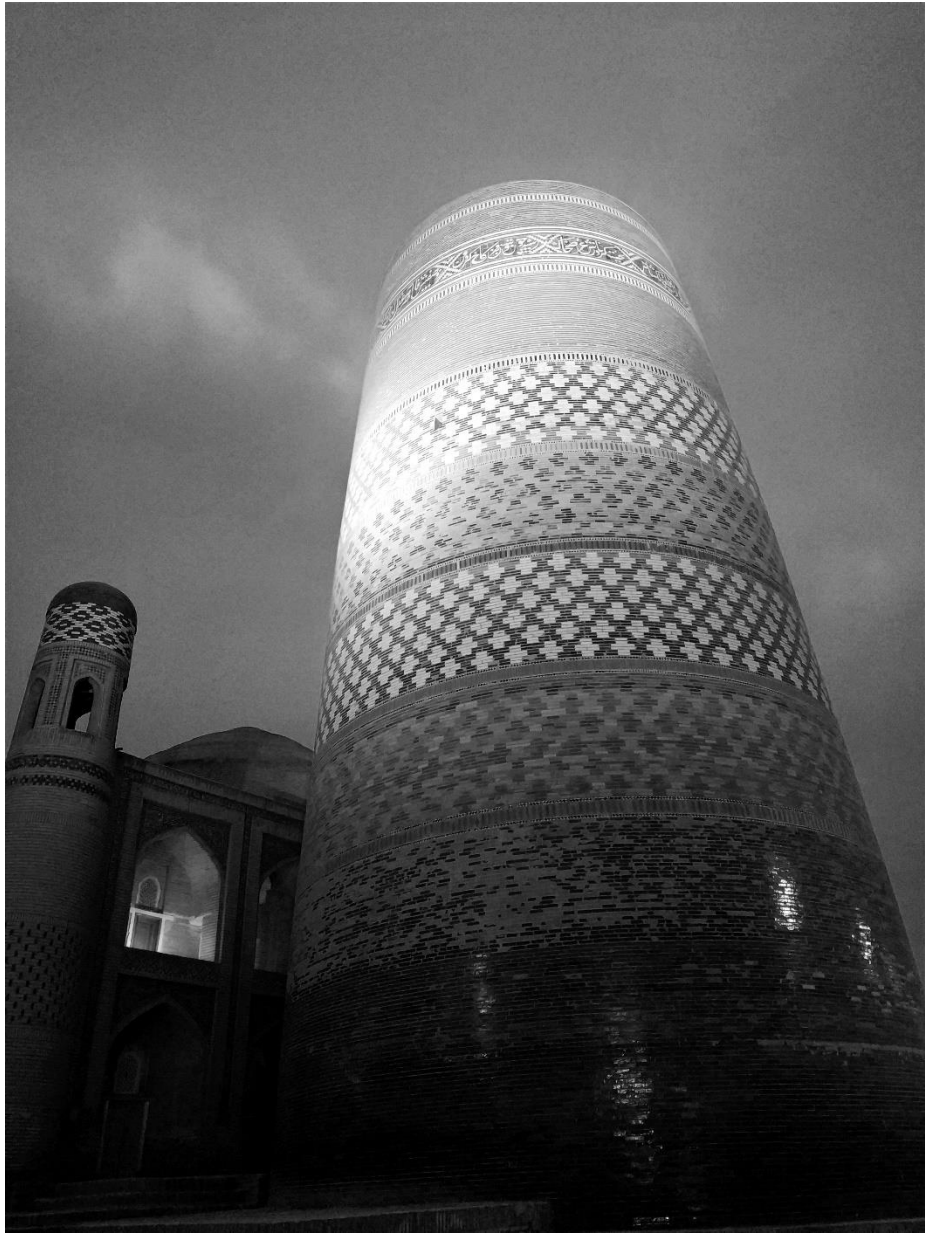
宁山哀：这样做真的有效果吗？

我：很值得怀疑，因为我看到的那些柱子大部分都已经严重开裂了，沙漠地区的温差对木头是很大的破坏作用，恐怕不是毛毡垫子就能保护好的。

走出聚礼清真寺，我的眼前是一座宣礼塔，虽然在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天对于宣礼塔已经审美疲劳，但这座宣礼塔却让人没法不注意到，因为它只有半截，根本没有修完。

穆罕默德·阿明·汗（Muhammad Amin Khan）在 1845 下令建造这座经学院和宣礼塔，以显示希瓦汗国的力量和威力。虽然这座以可汗的名字命名的经学院是中亚最大的伊斯兰建筑之一，但它却不如旁边未完成的宣礼塔出名。

Kalta Minor Minaret，意思是短尖塔，这座宣礼塔在中亚没有同类建筑，外观奇怪看起来倒像是现代建筑，如果改一下外表颜色，就像一艘垂直升降的外星飞船，好像《降临》里面的那种。宣礼塔虽然没有完工，但依然进行了美妙的装饰，给建筑带来完整的观感，整个外表面覆盖着深蓝色、天蓝色和白色的几何图案瓷砖。



这座宣礼塔的尺寸和独特的设计非常令人惊叹，塔根部直径为 14.5 米，高度为 29 米，推测建成之后大概是 70 米高，甚至在一些记录中认为可以达到 110 米。不过随着阿明·汗被杀，宣礼塔的建造也就停止了。据说阿明·汗想要让自己的宣礼塔超过布哈拉的喀龙宣礼塔，他希望站在塔尖上就能看到布哈拉。也有说法认为这座宣礼塔的建设就是布哈拉埃米尔派人教唆的，因为这座塔不可能建设完成，即使真的能建成，一旦倒塌也会毁掉整个希瓦城。

我离开短尖塔朝东边走去，路上查阅了希瓦汗国在俄国征服之后的历史。

1873 年，俄国征服了塔什干和撒马尔罕之后，对希瓦发动了进攻。希瓦君主穆罕默德·拉希姆·巴哈杜尔汗二世（Muhammad Rahim Khan II）与俄国签署条约，希瓦汗国成为俄国的保护国，废除了奴隶制，允许俄国商人自由贸易。此外，由于布哈拉埃米尔在俄国的军事行动中保持中立，希瓦汗国的一部分领土被割让给布哈拉酋长国。

布哈拉、希瓦和我之后要去的浩罕，这三个国家之间混乱的勾心斗角不只体现在好大喜功上，也让他们面对俄国的入侵始终无法团结一致，甚至是互相玩弄权术，最终逐一被俄国攻破，而他们真正开始联合还是之后的泛突厥主义影响。

宁山哀：后来希瓦汗国是怎么加入乌兹别克斯坦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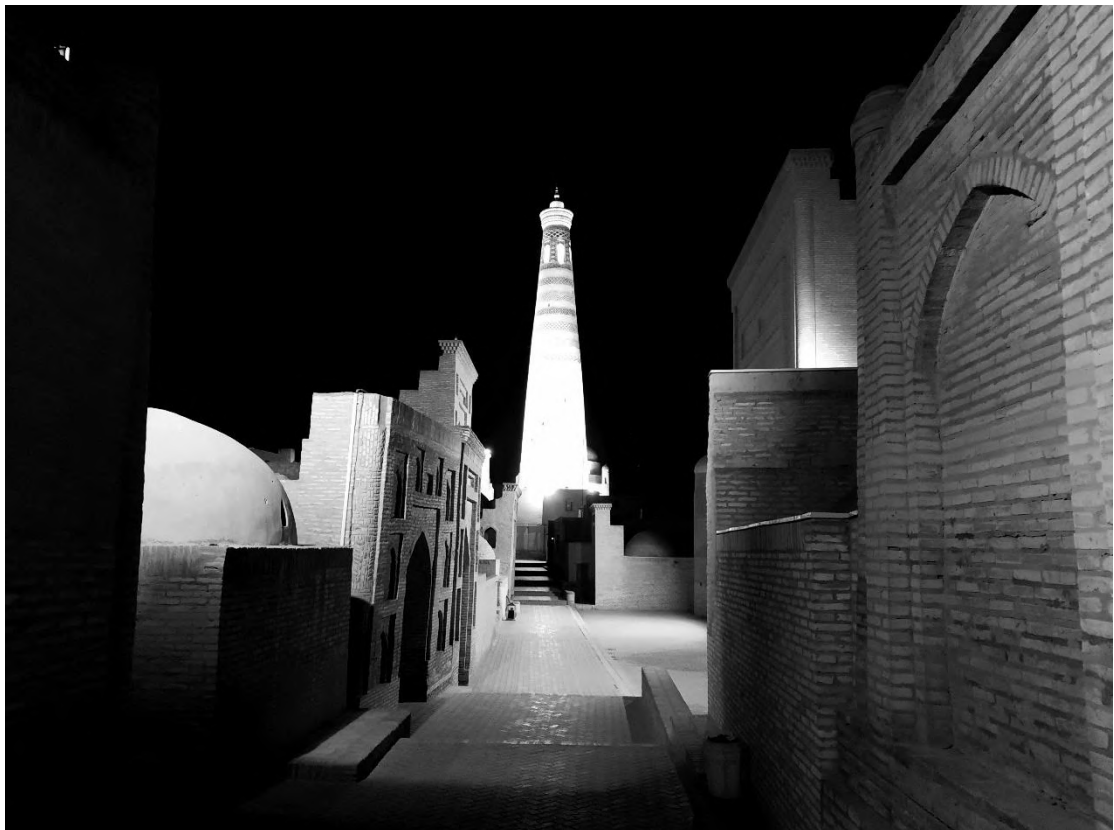
我：十月革命之后，希瓦君主伊斯凡迪亚尔·汗（Isfandiyar Khan）被土库曼部落首领朱纳德·汗（Junaid Khan）推翻，最后一位君主赛义德·阿卜杜拉上台，这位末代君主的统治只有两年。受青年布哈拉党影响成立的青年希瓦党改组为花刺子模共产党，1920 年伏龙芝率领的红军推翻了希瓦末代可汗。之后，花刺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成立，1924 年并入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宁山哀：青年土耳其党影响了青年布哈拉党，青年布哈拉党又影响了青年希瓦党，这其中是有连锁关系的吗？

我：是的，不只是青年希瓦党，受青年布哈拉党影响的还有 1933 年成立的青年喀什党（Young Kashgar Party），建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Islamic Republic of East Turkistan），也就是困扰中国政府的东突厥斯坦分离运动的源头之一。从伊斯坦布尔到喀什，时代背景就是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前现代国家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必经的民族主义探索。

宁山哀：这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不是你上一本书里去伊宁探访的那个？

我：不是，这个是东突厥斯坦第一共和国，1933 年年底建立，1934 年 4 月就解散了。我上一本书里去伊宁探访的是东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国，就叫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944 年年底成立，到 1949 年年底为止。“东突厥斯坦”只是地区的名字，这两次建国差异挺大的。



对于希瓦汗国来说，被俄国入侵未必全然是一件坏事，很多处于前现代的东方地区都是通过西方的入侵才开始进入现代化。尽管过程是被动的，却也比一直抗拒要好，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地区产生和凝聚起自己的民族国家意识，开始走向真正的崛起。

虽然希瓦汗国最终走入现代是在苏联时期，但这个国家知识分子们的危机感和行动却从俄国入侵之后就开始了。我沿着主干道走到古城的东边，这里有一片建筑群是关于希瓦汗国在俄国入侵之后的改革。

伊斯兰·霍加（Islam Khodja）建筑群虽然看起来是一片很古老的建筑，但实际上非常现代，是 20 世纪初伊斯凡迪亚尔·汗统治期间修建的。伊斯兰·霍加宣礼塔高 56.6 米，看上去很轻巧，天蓝色、深蓝色、白色和青绿色的珐琅镶嵌物砖石颜色结合优雅，与希瓦的天空自然搭配。

这座建筑以伊斯兰·霍加命名，他是穆罕默德·拉希姆·汗统治时期希瓦汗国的首相，虽然他的名字意味着他来自一个传统的穆斯林家庭，但这位首相却是以积极改革引进现代化著称。

伊斯兰·霍加在 26 岁就被任命为拉希姆·汗的首相，拉希姆·汗去世后，继位的伊斯凡迪亚尔·汗比伊斯兰·霍加只大了一岁，并无特别的才能，非常依仗伊斯兰·霍加。

在伊斯兰·霍加担任首相期间，修建了现代学校、发电厂、医院、电报和邮政设施，然而他在 1913 年被谋杀。虽然没有切实的证据，但一些学者认为伊斯兰·霍加之死与伊斯凡迪亚尔·汗有很大关系，显然这位君主并不是一个积极的改革者，同时他嫉妒这位和自己同龄却极有才华的下属。

在伊斯兰·霍加清真寺对面有一座和古城风格不太一样的建筑，是一所现代学校，也是伊斯兰·霍加积极改革的一个体现。这所学校开设于 1912 年，目的是为了引入现代教育，发展希瓦汗国的现代化科技和经济。



当时希瓦汗国同时存在两种教育体系，一种是以这所学校为核心的现代西式教育，主要教授俄语、数学、世界历史地理等现代课程；另一种则是当地传统的伊斯兰学校，主要教授阿拉伯语、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伊斯兰·霍加死后这所现代学校继续运作，直到 1920 年代被并入苏联的教育系统中。

现在这所学校被改为博物馆，一些游客为了省钱不购买古城通票，因为不花钱也可以看古城的建筑，只是不能入内，他们觉得里面的展览没什么意思。这是非常可惜的，有一些建筑内的展览非常重要，比如这座现代学校改造后的博物馆，里面展示的就是一段可能冷门但是非常有意思的历史。

这座博物馆展出了摄影师库达伯格·德万诺夫（Khudaybergen Divanov）的作品，他是希瓦汗国第一位本地摄影师。由于他的拍摄记录，我们今天可以在博物馆中看到大量希瓦汗国的珍贵历史照片，而这位摄影师的从业经历却和遥远的德国有关系。

希瓦最早的欧洲移民是门诺派教徒（Mennonites），这些门诺派教徒是荷兰再洗礼派在西普鲁士的定居者，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给予他们宗教自由和免除兵役的特权，这些人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被称为伏尔加德意志人，我在塔什干的路德会教堂提过这件事情。

这些伏尔加德意志人中一部分后来到了中亚，其中有一位摄影师叫威廉·彭纳（Wilhelm Penner），他向当地学生库达伯格·德万诺夫教授了摄影技术，德万诺夫也就因此成为乌兹别克斯坦摄影的创始人。

1908 年，德万诺夫跟随希瓦汗国代表团访问圣彼得堡，接触到先进专业的摄影技术。访问结束后，他带回了各种电影和摄影配件，独立拍摄了第一部乌兹别克斯坦纪录片。德万诺夫拍摄了伊斯凡迪亚·汗和众多清真寺、历史古迹，目的是为了宣传希瓦的文化和景点。除此之外他还拍摄了大量希瓦汗国普通人的生活与劳动场景，详细地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穿着打扮和风俗仪式，他的照片不仅仅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希瓦古城修复的依据素材。

宁山哀：这些德国人为什么会从伏尔加河去希瓦呢？

我：因为伏尔加定居点的人口超过了预期，俄国政府在 1870 年宣布不再给予移民特权。在这种未来不可知的时候，移民社区中有一位小克拉斯·埃普（Claas Epp Jr.）牧师预言基督将于 1889 年降临在中亚。这些门诺派教徒在 1880 年获得了俄国突厥斯坦总督的许可，一百多个家庭迁徙到塔什干附近。其中一部分人由于拒绝服役，准备迁徙到布哈拉，但是布哈拉埃米尔拒绝了他们，希瓦可汗邀请他们来到希瓦定居，他们的社区一直到了 1935 年才被并入苏联集体农庄。

在希瓦古城的晚餐，我品尝了两道熟悉的食物。一道是肉丸面条，我以为会是意大利面或者拉条子那种，但意外地口感非常绵软，像家里的挂面一样，面汤很浓郁，在冷峻的沙漠古城吃到这么温柔的食物也是很难得。第二道菜，菜单上写的是饺子，但却是一个巨大的烙盒子，不过是炸的，里面是牛肉

馅，东北回民腊月三十晚上不吃饺子吃烙盒子，不知道会不会有点关联。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吃到了最接近故乡口味的食物，这是特别温暖的。

宁山哀：很有趣，那家餐厅为什么会有中国食物呢？

我：不能说是中国食物，无论是面条还是油炸的面食，对于中亚北亚的游牧民族也是很平常的。这些食物是从西域传入中国的，对汉人来说胡人的食物。这些食物的传播背后，是从东欧平原一直到蒙古高原和满洲，辽阔的欧亚大陆草原之海的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

夜晚的希瓦古城，温度降到了要羡慕当地人穿着毛皮大衣的地步，一日游的游客已经返回了乌尔根奇，住在古城里的游客也回去吃饭了，大部分的摊贩都已离去，古城仿佛成了我一人的官邸。当年的城市如今只剩一隅，曾经四处抓奴隶，眼下也只能陪着笑脸宰宰游客，唯有夜晚的骤然降温和城外呼啸的风沙，还能让人联想起当年沙漠中这个小而凶悍的国家是如何左右撕咬的。



浩罕：费尔干纳的富饶与牺牲

傍晚，我坐着绿皮火车从塔什干前往费尔干纳盆地，这段地图上看起来并不十分遥远的路程，却由于绕弯和险峻地形要耗时很久。前往塔什干东部的火车显然不如前往西部的车厢高级，火车上虽然有茶供应但是晚餐食品只有馕和零食，我很庆幸提前打包了一桶炸鸡。

在苏联时代这条铁路有一段要穿过塔吉克斯坦境内，原本这些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边境线并没有实际意义，但随着苏联的解体，民族识别政策带来的矛盾一下子爆发，中亚的 5 个主要民族惊讶地发现他们竟然如此不喜欢对方，费尔干纳盆地混乱的边境划分矛盾也随之激化，所以今天这条铁路线要绕过一段塔吉克斯坦领土突出的部分，比较费时。

费尔干纳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魔力，由于连接了塔里木盆地和河间地区的贸易，这里非常富饶。公元 8 世纪，阿拉伯帝国在怛罗斯之战中勉强获胜，唐帝国的战略势力收缩，费尔干纳地区开始伊斯兰化（在西域地区对阿拉伯帝国产生牵制的主要力量不是唐帝国，而是吐蕃王国），今天费尔干纳也是乌兹别克斯坦乃至中亚宗教氛围相对浓郁的地区。

到达浩罕火车站，我已经熟练掌握当地人的价格，直接报出出租车司机开价的 6 分之 1，这是外国游客的荣誉，我能看到那一瞬间司机眼睛里的惊讶和失落。当然，他也挽回了属于他的荣誉，那就是拒绝了我的报价，最后我在夜里走了半个小时到达旅馆。

或许是由于富饶，费尔干纳并不平静，这里发生的历史充满了残酷和血腥。但当我深夜下火车前往酒店的时候，还有些被浩罕这座城市的精致感动了一下。从火车站到市政府广场之间的路旁都是婚纱店，即使晚上十点也有很多小商店还在营业，这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城市中并不多见。

浩罕城的中心就是浩罕王宫，从火车站向北前往市政府的道路是主要的商业街，再从市政府向东前往王宫也是一条商业街，但街道两旁都是现代商铺，几乎没有什么本地特产，靠近可汗王宫首先看到的是一座中心大超市，王宫就在超市的对面。皇宫东面是一条行车主干道和贯穿城市南北的河流，河对岸就是传统居民区和清真寺。从建筑上来看，以皇宫为原点，东边是偏乌兹别克人原本的城区，西边是俄国人来了之后修建的新城区，这座城市大体就是这样的划分。

第二天早上，我离开酒店前往浩罕王宫，现在王宫已经被作为博物馆开放，是了解当地历史最好的地方。虽然浩罕很小，但是商店繁荣街道干净建筑也亮堂，这座城市没什么游客，感觉当地人的性格也相对内敛，一下子耳边不再充斥着“TAXI?”“HELLO!”“WHERE ARE YOU FROM?”，清静了很多。不像旅游城市被外国人带坏了那么躁动，浩罕街上的人走路说话都慢慢悠悠的，很安宁。

浩罕汗国的历史并不长，费尔干纳地区原本属于布哈拉酋长国管辖，1709年沙鲁克·贝克（Shahruku Bek）在费尔干纳盆地东部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他在浩罕修建了一座城堡作为首都，开始了浩罕汗国的历史。

沙鲁克·汗的孙子阿里姆·汗（Alim Khan）雇用高地塔吉克人作为雇佣军，征服了费尔干纳盆地西部，并且占领了塔什干。1841年，英国军官亚瑟·科诺利上尉来到浩罕汗国，试图说服中亚各个国家共同抵抗俄国的渗透。之后，科诺利上尉为了另一项任务离开浩罕前往布哈拉，后面的事情我在布哈拉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他的任务就是营救之前被逮捕的另一位英国军官斯托达特，结果他俩都被处决了。

之后，浩罕汗国君主穆罕默德·阿里·汗（Muhammad Ali Khan）试图与俄国结盟，因此失去了布哈拉埃米尔纳斯鲁拉·汗的信任，布哈拉酋长国在1842年入侵浩罕汗国，处决了穆罕默德·阿里·汗。一同遇难的还有阿里·汗的母

亲，也就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奥马尔·汗（Omar Khan）的遗孀，诗人诺迪拉（Nodira）。

接下来，浩罕汗国不断遭到布哈拉和俄国的入侵。1868 年，浩罕汗国彻底变成了俄国的附庸国。最后一位君主纳斯鲁丁·汗（Nasruddin Khan）的反俄立场激起了俄国的吞并，1876 年浩罕汗国并入俄国突厥斯坦。



我来到浩罕王宫面前的广场上，两名警察骑着马从我身边走过，这里搭建起巨大的台子，看起来平时会有一些演出节目。虽然这座城市很小，但旅游设施相对完善，甚至广场上还有免费移动公厕。不要小看这个设施，就连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旅游景点都没有，游客们只能寻找寥寥无几的收费洗手间，这一度是乌兹别克斯坦旅游业最受批评的一点。

这座可汗王宫建于末代君主纳斯鲁丁·汗的父亲库达雅尔·汗（Khudayar Khan）统治时期，库达雅尔·汗治理国家毫无作为，转而开始为自己修建豪华

的宫殿。1870 年代，由于极高的税收和失衡的法律，浩罕汗国爆发起义，镇压失败的库达雅尔·汗不得不在 1875 年流亡到俄国。

这位治国无能的君主在 1871 年建造了这座宫殿，高高的门廊，装饰精美的大型入口拱门和四个宣礼塔。宫殿被一面石墙环绕，由 7 个庭院和 119 个房间组成。在库达雅尔·汗流亡的第二年，俄军占领了这座宫殿，改成军事指挥部，并建立了一座东正教堂和教会学校，浩罕汗国君主的宝座也被运到圣彼得堡冬宫。

1921 年这座宫殿被交给了一个农民组织，1924 年在宫殿内举行了一次农业展览，并在此基础上将宫殿改成博物馆，之后又作为军事医院。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之后，博物馆已完全恢复，墙面装饰和宫殿幸存的房间得以修复，重建了一些大门和柱子。但是，目前只有 2 个院子和 19 个房间可以参观，我在宫殿里参观的时候，看到一些工匠们还在绘制长廊顶棚的图案。



离开宫殿之后，我前往曾经浩罕君主的陵墓。我穿过居民区里曲折蜿蜒的小巷子，在路上回忆起一个和浩罕汗国有关的人，这个人在中国的历史书里曾经出现过，就是穆罕默德·雅库布·贝格（Muhammad Yaqub Beg），在中国翻译成阿古柏，中国历史中把他当作一个完全的反派人物，但是在浩罕汗国的历史中，他算是一个有些悲情色彩的枭雄。

俄国入侵浩罕汗国占领塔什干的时候，阿古柏是保卫塔什干的指挥官。在这一时期，大清国陕甘地区爆发武装冲突，牵连整个塔里木盆地都在躁动不安，喀什噶尔附近的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希望由霍加家族的人来统治喀什噶尔。此前在争夺喀什噶尔战斗中被清军俘虏处决的贾汉吉尔·霍加（中国历史书中叫张格尔）的儿子布尔祖格·汗（Burzug Khan）决定前往喀什噶尔，阿古柏加入了他们。之后阿古柏的军队陆续控制了叶尔羌和英吉沙，排挤了布尔祖格·汗，最终占领喀什噶尔。到了 1867 年，阿古柏已经控制整个塔里木盆地。

也是在这个时候，俄国大举入侵中亚，这或许刺激阿古柏急需向塔里木盆地之外扩张领地。他试图向印度方向吞并塔什库尔干，并向北占领库尔勒，却在乌鲁木齐受挫。到了 1877 年，随着陕甘冲突的平息，迟钝的大清国终于反应过来，庞大的战争机器开始发动，左宗棠率领军队远征新疆，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巨大胜利，阿古柏在库尔勒附近去世，他和儿子的尸体被焚烧成灰送到北京。

也是由于阿古柏的缘故，英国与俄国针对中亚的大博弈延伸到了喀什噶尔和塔里木盆地。1868 年英国探险家罗伯特·巴克利·肖（Robert Barkley Shaw）前往喀什会见了阿古柏，他成为第一个到达喀什的英国人。1872 年俄国探险家亚历山大·考巴尔（Alexander Kaulbars）前往喀什与阿古柏商谈贸易，但是没有进展。阿古柏小心翼翼地处理与俄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尽管他得到了来自布哈拉埃米尔和奥斯曼苏丹的支持，但他在塔里木盆地的统治并不得人心。



穿过一条接一条小巷子，我来到浩罕汗国的莫达利汗王陵。莫达利汗（Modari-Khan）的意思是“可汗的母亲”，表明这是一片女性墓地。墓地建于1825年，最初是奥马尔·汗为母亲建造的，后来成为浩罕汗国妇女公墓。

进入墓地，我从旁边一条小路走上十几米，看到一座白色大理石和青铜建成的纪念碑，这为了纪念女诗人诺迪拉。诺迪拉是奥马尔·汗的妻子，丈夫去世后，由于儿子穆罕默德·阿里·汗加冕时年少，诺迪拉成为了浩罕汗国事实上的统治者。尽管她试图教导儿子更多的和平自由的价值观，但她仍然执行了扩张政策，导致与布哈拉酋长国之间爆发了战争。1842年4月，浩罕汗国战败，诺迪拉与儿子一起被布哈拉埃米尔处决。在苏联时代，诺迪拉被提升为乌兹别克的国家女性形象之一，被公众视为烈士和民族英雄，

莫达利汗建筑群的入口是一座绿色瓷砖装饰的拱形大门，一个蓝色圆顶在入口部分的后面，入口内部装饰有螺旋图案的门廊。进入陵墓内，我看到一个有趣的活动，很多女人在陵墓前铺上白布，然后在布上滚来滚去，或者用一块

布裹着自己在地上滚。我询问了一下周围的路人，在难以翻译的只言片语中提取大概意思，是因为浩罕汗国君主的女眷们德行美好，所以在她们的墓前翻滚可以求得保佑，如果是孕妇还可以保佑胎儿平安出生。

走出陵墓，周围是一片公共墓地。在墓地入口我发现有一群人坐在长椅上，他们手持着棍子，陆续有人找上他们，一般是女人或者孩子，他们就一边嘴里念叨着，一边用棍子轻轻拍打对方的身体。从头部到肩膀和背部，也有用布包着碗敲打，或者直接用手。其中一些人还会提供瓶装水，他们将打开盖子放在自己面前念经，然后让对方带走，对方会给一些钱。

这让我想起在中国穆斯林当中有一种吹杜瓦的宗教仪式，这种仪式可能和苏菲信仰有关系，费尔干纳盆地宗教信仰浓郁，也是苏菲教团主要活动的地方，中国穆斯林一部分受到了中亚苏菲尤其是纳格什班迪教团的影响，所以这种相似的活动可能源于信仰的相通。

宁山哀：什么是吹杜瓦？

我：是一种类似驱邪或者画符的仪式，阿訇对着水或者糖念经，或者在纸条上手写经文，人们把这些物品带给需要的家人。

宁山哀：这种仪式真的会灵验吗？

我：很难说，我没有亲身经历过，朋友或者朋友亲属们有经历过的，时灵时不灵吧。中国汉人的民间信仰中也相信手写符文或者念咒可以起到驱邪佑护的作用。对中国回民来说，大部分人不懂阿拉伯语也不会写阿拉伯文，所以在他们眼里，阿拉伯文天然与古兰经相关联，被称为“经字”，所以阿訇手写的经文或者念诵的古兰经就带有神圣的意味，而且在伊斯兰典籍也有依据支持。

宁山哀：是因为这些念过经的水或者手写的经文能够鼓舞患者，起到安慰剂的效果吗？

我：不能完全这么说，语言文字有着特别的作用，仓颉造字之后“天雨粟，夜鬼哭”，上天降下粮食奖励人们，而恶鬼哀嚎因为从此害人变难了。念诵或抄写某些特殊的文字会对人的精神空间产生实在的作用，这一点在很多宗教与民间信仰中是有理论基础的。

宁山袁：所以你真的相信这些念咒或者符文是有作用的吗？

我：我当然相信，如果你确信了一个世界观，你就会根据这个世界观往下推演。这个世界观在于，人通过特定的方式与环境建立起联系，人的发音、动作甚至意念，人发明的文字和仪式，都是在试图和外部世界产生关联作用，求雨、驱邪都是如此，关键是找到人的行为与所要达到的结果之间的关联。就像打台球，如果你计算的足够精密，你可以用一杆打掉所有的球，咒语符文就是你的球杆击中第一球，而驱邪成功就是最后一球入洞，只是中间的过程看不到。这件事情在我所确信的世界观中是完全符合逻辑原理的，我没有理由不信。

我走进墓园深处，看到一位坐在坟墓边上的老人，我观察了他很久，他在这边专门给人传经走坟。有需要的人来了就坐在他旁边，他念的时候时不时嘴里发出啾啾的声音，好像也是一种驱赶仪式，有的人还带着大瓶的水放在他面前请他念经，最后会给他一些钱作为感谢。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阿訇，可能是散班阿訇，但这个仪式我很熟悉。费尔干纳穆斯林和中国穆斯林有很多习俗上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在我的故乡，穆斯林墓地离城区比较远，人们更习惯在清真寺里走坟，并不常去墓地。

离开墓地之后，我来到聚礼清真寺。蒙古人入侵时，聚礼清真寺以及整个城市被摧毁，现在的建筑建于 19 世纪初，这座清真寺同样也是一座博物馆，展示当地的手工艺和传统建筑构件，清真寺院子四周是木头柱子支撑的长廊，院子中央耸立着宣礼塔。

晚上我在浩罕的街头餐馆吃饭，注意到这边一个有趣的习惯。客人喝茶的时候，店主会拿来两个碗。我一开始以为类似中国的盖碗茶喝法，但发现当地人都是只用一个碗而已。我把这个问题发给国内的朋友，他们告诉我在维吾尔人当中也有这个习惯，因为过去卫生条件不好，风沙也大，人们在露天的茶摊喝茶要涮碗，两个碗其中一个就是装涮碗水的。

虽然今天卫生条件好了，但依然保留了喝茶给两个碗的习俗。我没看到有几个人真的去涮碗，虽然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习俗本身已经失去了实用性，但人们依然还是把这个形式保留了下来。

在浩罕汗国并没有找寻到太多的历史遗迹，这让我多少有些遗憾，在来到费尔干纳盆地之前，我期待着能找到这里和新疆的关联。我在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天遇到的懂英语的人并不多，而在费尔干纳盆地很多人连俄语也不懂。在与浩罕当地人交流的只言片语中，他们好像了解一点新疆和维吾尔人，他们建议我去更东面的安集延看看，那里距离中国更近。

在浩罕的最后一餐在旅馆隔壁一家俄罗斯餐馆，费尔干纳盆地俄族不多，很多当地人都不讲俄语，俄罗斯餐馆也很少，这家店有种独守孤城的感觉。老板很有意思，虽然有英文菜单，但她自己并不懂英文，我用谷歌把英文菜单翻译成中文点餐，老板再比着俄文菜单上对应的位置才知道我点的是什么。

安集延：巴布尔凝视的悲伤

从浩罕出发坐火车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就会到达这座离中国最近的乌兹别克斯坦城市，也是当年俄国人修建的跨里海铁路的终点。

安集延在费尔干纳盆地的东部，连接了东面的喀什、叶尔羌、英吉沙和西面的布哈拉、撒马尔罕，这里的商人们以中转贸易出名。一些安集延的商人到喀什周边做生意，有人就此定居在喀什，1934年盛世才召开新疆第二次民众大会，将这些定居在喀什的安集延人识别为乌兹别克人，也就是今天中国境内乌孜别克族的由来。

在繁荣商业之外，安集延是莫卧儿帝国开国君主巴布尔的故乡，受到这位文学气质浓郁而又经历复杂的君主影响，安集延这座城市又带着一些更敏感细腻的情绪。如果了解安集延的历史，会知道这种敏感细腻的情绪背后，是这座城市遭遇的血腥与残酷。

费尔干纳毫不平静，很大一部分源于苏联时代的粗暴民族划分。苏联按照高地游牧和低地定居来区分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将安集延和临近关系紧密的奥什分别划在了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两个不同的加盟共和国内，在苏联后期，乌兹别克人由于传统上的农商产业，得益于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市场改革，经济水平超越吉尔吉斯人。

1989年，费尔干纳地区发生了乌兹别克人针对梅斯赫季突厥人的迫害和驱逐，民族争端开始沸腾。1990年奥什附近的吉尔吉斯人公开袭击乌兹别克人，由于担心乌兹别克人报复，苏军封锁了安集延到奥什之间的边境，这也是苏联时期唯一被法院审判的民族冲突案件，到了2010年，更大规模的乌兹别克与吉尔吉斯民族冲突爆发。

安集延这座城市的布局围绕着火车站，北面是过去的老城区，南面是俄国人修建的新城区。当然随着城市建设，两边的差异并没有撒马尔罕那么大，只是几条主要的商业街都在城市南边，而以聚礼清真寺和历史博物馆为中心的传统街区则在北面。



我走出安集延火车站，车站对面的广场上竖立着巴布尔的骑马雕像，他是这座城市的象征。我走到广场上，广场后面延伸出去几条街道，两旁是俄国留下的建筑，人们在广场上晒太阳和拍婚纱照，一片祥和。

在 2005 年，这片广场上发生了一次示威游行引发的可怕屠杀。一开始抗议者聚集在广场上，要求政府释放 23 名被指控参与极端主义活动的商人，政府采取了强硬的态度清场，冲示威人群开火，根据不同的记录，有五六百到上千名平民伤亡。这次事件之后，俄罗斯和中国为首的上合组织站在了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一边，而美国和欧盟则要求进行国际调查，乌兹别克斯坦关闭了境内的美国空军基地，开始投靠中俄一边。

这就叫人以群分。

我离开火车站前广场朝南边的商业街走去，今天的安集延是费尔干纳盆地重要的工业基地，这里工商业非常发达，虽然只是一座小城，繁荣程度却如同大城市，街道两旁都是热闹的商铺，还有成群结对的小巴车司机和黑市汇兑贩子。

我从主干道拐入一条巷子，周围的景象变成了荒废的建筑工地，这里有安集延唯一一座东正教堂。安集延曾经有过 3 座东正教堂，圣塞尔吉乌斯教堂在 1930 年被关闭，圣乔治胜利教堂在 1931 被关闭，圣尼古拉斯教堂在 1932 年被关闭。到了 1950 年代，本地的东正教社区需要一座新教堂，于是在 1957 年建成了现在这座诸圣堂。

我顺着屋顶的十字架找到了这座教堂，在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院子里，非常简单的一层建筑和一个小小的钟楼。我走进院子，看到角落里有一座铜钟，已经开裂了，我没有在上面发现铸造日期，但看起来很可能是曾经被拆除的老教堂遗留下来的。一对老夫妻是教堂的管理人，他们说周日弥撒的时候，大概有七十人左右参加，塔什干的圣母升天大教堂会派神职人员来这里主持弥撒。

1876 年俄国人占领了安集延，带来了俄罗斯移民和东正教社区，但之后并不太平。1898 年，苏菲教团领导人穆罕默德·阿里·马达里（Muhammad Ali Madali）发动起义，袭击了驻扎在这里的俄军。起义很快被镇压，马达里和 18 名参与者被处决，546 名起义分子被逮捕，356 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安集延在俄国人到来之前是一个游牧和定居共存的传统经济环境，但是在俄国统治时期，这里由于自然条件优越成为帝国的棉花种植地区。但显然财富分配不均匀，很多农民和牧民生活处境非常糟糕，成为了费尔干纳地区不安定因素的起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无产阶级失地农民队伍很快就庞大起来，

当地人赌博和酗酒变得常见，犯罪率大幅度上升。

1916 年，由于战场失利，沙皇决定取消对中亚穆斯林的兵役豁免，准备在中亚地区征兵投入欧洲战场。这引起了俄国突厥斯坦大规模的抗议，进而爆发了 1916 年中亚起义。冲突首先发生在塔吉克斯坦的苦盏，然后蔓延到安集延和塔什干，一直到哈萨克草原，费尔干纳盆地的本地原住民与俄罗斯移民冲突十分激烈，起义在第二年被镇压。

宁山哀：十月革命之后这里是什么情况？

我：十月革命之后经过了短暂的浩罕自治状态之后，安集延被并入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由于国有化运动导致经济崩溃，费尔干纳地区饥荒严重，东突厥斯坦解放运动与布尔什维克的冲突持续到 1920 年，人们已经疲惫不堪。此时相对宽松的新经济政策开始缓解饥荒压力，到了 1924 年费尔干纳地区的冲突逐渐平息，新的政权也正式建立起来。

离开东正教堂，我来到城市北面，经过纪念二战阵亡官兵的广场和安集延地区博物馆，到了聚礼清真寺。

这座聚礼清真寺和附属的伊斯兰学院历史并不久，1890 年才建成。今天这片区域不仅仅是宗教使用，也是本地人休闲散步的场所，我沿着远处眺望到的宣礼塔找到清真寺，清真寺周围三面环绕着长廊，长廊的木柱雕刻精美，天花板绘制了各种图案，融合了传统的几何和花卉装饰。我走进清真寺里，惊讶地发现在礼拜殿旁边竟然是一个画廊，里面除了画风古典的风景画之外，竟然还有颇具抽象艺术风格的人物画，这在伊斯兰地区艺术中是很少见的，尤其在费尔干纳盆地这个相对宗教保守的地区。

这座清真寺保留下来很不容易，1902 年的大地震摧毁了安集延大部分古建筑，但聚礼清真寺建筑群几乎没有损伤。清真寺广场周围一圈都是画廊和工艺品店，画家们在这儿各自有个小房间，可以展示出售自己的作品。广场上都是

骑车玩耍的孩子，这才是清真寺最重要的功能，一座城市的公共生活中心。



我从聚礼清真寺前往巴布尔纪念馆，纪念馆在城市东南略远的地方，需要乘车前往。巴布尔公园是一座小山，向上望去半山处是巴布尔的雕像，阳光从雕像身后照过来，这位自传中颇为多愁善感的君主以一种很扭捏的姿势坐着。雕像右边有巴布尔博物馆，讲述了巴布尔和他家族的故事，陈列了以他为主题的艺术品。从雕像继续往山上走，还有一座象征性的巴布尔陵墓，上面覆盖的土是从他真正的陵墓所在地喀布尔运来的。

巴布尔的一生极为跌宕起伏，这也成为他书写回忆录的源泉。巴布尔 11 岁时，他的父亲照料鸽子的时候不慎跌入山沟，他登基成为了费尔干纳的统治者。他 15 岁的时候占领了撒马尔罕，然后不断在撒马尔罕和费尔干纳之间奔波，不断地征服、短暂地胜利之后又失去。在 21 岁的时候，巴布尔带领军队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夺取了喀布尔，然后一路征服到了印度北部，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在 47 岁去世后被安葬在喀布尔。

从巴布尔纪念馆返回火车站附近已经是傍晚，安集延的市场和我童年记忆里故乡的市场非常像，都没什么路灯，每个摊子自己打着灯，地面也是坑坑洼洼好像总也不会平整。市场里有固定的摊位，有板车拉着菜和水果，也有大盆盛装的肉类熟食，朝鲜人的咸菜摊子，乌兹别克人用大桶装着自制的奶制品，还有俄罗斯的巧克力和糖果之类的零食，在集市外面散装销售。

我在集市上买了点熟食，炖熟的香肠和羊肚就着馕吃，透过酒店的窗子，这座城市的繁荣商业持续到很晚，如果说今天的热闹可以让人们遗忘这座城市往日里遭受的苦难，那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费尔干纳盆地已经经受了足够多的流血与迷失，人们恐怕需要暂时强迫自己忘却政治、民族和宗教的冲突，但我不知道新总统的改革会让这里宽松多久，费尔干纳在过去几百年交织复杂的劫难是否能以此为终点。



尾声

从安集延返回塔什干的火车上，我认识了一个家在安集延的乌兹别克女孩，她英语特别好，父母离异后 16 岁就开始兼职做英语家教赚钱，还在自学德语。她说在乌兹别克斯坦只有富有家庭的孩子才能读好的大学，将来有好的工作，但她相信靠自己的努力，一定会在塔什干有美好的未来。我问她学习外语是否打算移民去别的国家，她说可以去工作，但不会移民，因为“我的爱国主义是如此深刻，在这块的土地上我要得到属于我的，不会离开”。

这是我在乌兹别克斯坦接触到的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想法。前总统卡里莫夫的去世对这个国家是一个振奋，新总统上台后颁布的一系列开放自由的政策，或许预示着这个国家正在向充满希望的方向发展。

回头总结，乌兹别克斯坦的旅行并不像我期待的那么美好，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很像中国，这种相似性并不能给人带来惊喜，而是一种无奈、沮丧和恼怒。因为这种相似性往往是这两个国家共同让人不愉快的方面，严重的贫富差异、浮夸的国家民族主义宣传、僵化固执的官僚主义、政府对宗教和少数民族的管制、糟糕的旅游发展。

无论是政府强管制下的公权力秩序还是政府弱管制下的社会自发秩序都各有优势，乌兹别克斯坦显然还在这两者之间徘徊。苏联解体后，原有的强管制秩序被打破，传统伊斯兰社会自发秩序由于长时间的中断还没能找回，就是这样一个尴尬的处境。

我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了这里，想必会带来一批投资，即将执行的免签政策也会带来更多的中国游客与商人。我毫不怀疑这里的民众将来并不会太喜欢中国人，只有少数商人在旅游和贸易中获利，多数人面对的是外国资本的市场冲击，街头也会出现更多挥金如土的外国人，这恐怕

会冲击他们在历史中形成的自豪感。

这是我临走前最后一次去帖木儿广场时，帖木儿大帝的雕像告诉我的，一个崇拜英雄与征服者的国家，一个缓慢但努力塑造自己民族自尊心的国家，在漫长的混乱、破碎、压抑的历史之后，或许要开始透一口气了。

注：乌兹别克斯坦之旅写于 2019 年 11 月。





宁山哀与我的最后一篇对话

宁山哀：看完了你的整本书，书中这四个国家中马来西亚和土耳其我去过好几次，但感受和旅行重点和你完全不同，如果我能早点带着你的书去旅行，可能会有更多的收获和更深入的旅行体验。这也是你一直以来写作的特点和长处，信息量巨大善于建立联系，我看完这本书就感觉好像有一张网，把时间和空间的一个个点联系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平面。

但你的书短板也很明显，你缺少现实体验，特别是涉及与人交往发生连接的体验，就我看书的时候脑海里有一个奇怪的画面，你闭着嘴蒙着面一言不发像个幽灵一样独自飘过每个地方，没有人注意到你，你也不关注任何人，就这么沉默着走过各地然后回来写了本书。

我：虽然不懂英语，但我还是努力和当地人交流了一些，在书里面也有提及，但大多是当地人看到我搭讪闲聊，询问我做什么工作，有没有结婚，来他们国家做什么，我询问对方日子过得怎么样，民众对政府看法如何，很多闲聊的话没有必要写在书里面。

宁山哀：是，我的确看到书里面有一些当地人说的话，但更像是你在采访对方，而不是你们在交流。这也是你表达上的短板，你能把历史文化观点写得非常丰富，但也能把与人的交流写得非常无聊。我觉得你的文字不够性感，不能让人迷醉，我在你的书里偶尔看到一些很感性触动的表达，但接下来马上生硬地打断，又开始讲历史讲建筑。就像一个男人在床上几个小动作让女人春潮涌动，结果他马上停下来开始聊正经话题给对方上课，这个人是不是脑子有病，你的文字经常出现这种让我觉得莫名其妙的问题。

我：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我写的不是小说而是旅行笔记，有一个很明确的功能就是记录我在这些旅行中的现场见闻、背景知识学习和自己的思考感受，这些本身就是很零散的，我一开始也没打算写一个故事，只是把素材整理出

来，这样更方便读者包括我自己以后去查询阅读。我不太理解你说的文字的性感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不是一部纯文学作品。

宁山哀：不不，文字的性感不一定和纯文学相关，如果说性感是半遮半露若隐若现，那你的文字就是在观点表达上过于赤裸直接，但在情绪感受上又裹得严严实实。我读起来会觉得，你在写某些部分的时候很兴奋，迫不及待地抛出自己的态度，比如对历史或者社会文化进行批判或者宣扬，而在另一些部分则刻意回避，始终在保持距离。

我：观点更容易被直白表达和讨论，但情绪的传递是更复杂的，而且更容易出现误解。我更愿意去表达观点而不是情绪，一方面是我觉得自己的观点比情绪更有价值，我并不是一个情绪很敏感的人，但我对自己的思考还是有信心的。另一方面是情绪通过文字表述会有折损，当读者看到文字接受情绪传递的时候又会再折损一次，这就让文字传递变成混沌的状态，写作者不确定自己的文字会被如何理解。在情绪的传递上，文字表达是不占优势的，因为文字是生物特征匿名的，读者不能确定接收到的文字和创作者的关联，但声音和影像与创作者的生物特征联系紧密。你觉得一封厚厚的信件和对方抱着你但什么都不说，哪种方式情绪传递更加直接强烈？

宁山哀：但既然你没有在读者面前抱着她，对方只能通过阅读你的文字来感受，那你的文字中缺少情绪的传递就会被对方注意到。你不能因为文字传递情绪可能会有折损，就干脆把情绪隐藏或者删除，这样你的表达是不完整的，而且让文字变得性感对你以后拓宽创作方向也是有好处的。我还有一个问题，在你的这本书里用了很多篇幅介绍历史背景，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因为我可以从维基百科上获取这些内容。

我：如果不是因为阅读我的书，你会去特意去维基百科搜索这些词吗？如果不是因为要去这些地方，我也不会特意了解这些历史，因为我觉得历史只有在和人的现有意识发生关联的时候才有更高的价值。比如我去一座建筑遗迹中，如

果我不知道这座建筑的历史，那就是一堆废弃的石头，是历史让我和这堆石头之间发生了联系，也许围绕这堆石头有一些事情可以连接到我的故乡。相反，如果是单纯文本上的历史记录，也只是一堆和我无关的故事而已，但是当我实地前往其中涉及的具体建筑遗迹的时候，那些文本对我来说才是真实的，是和我当下发生关联的，去的地方和阅读的文字是一个整体。

宁山哀：所以你接下来还会继续走吗？

我：盲目流动吧，深一脚浅一脚，走一步算一步。



在瘟疫中完成书稿

在我整理这本书稿的时候，瘟疫开始蔓延。在古代，瘟疫往往与道德联系在一起，被认为是人间尤其是统治者的道德堕落惹怒了上天。这是一种事后归咎，如果统治者无德，那瘟疫就是天谴，如果统治者德行良好，那瘟疫就只是普通的灾祸，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时候统治者都是无德的。

更现实地说，如果统治者无德，上行下效将带来一系列问题，君主残暴固执，臣属就会报喜不报忧进献谗言，民众的苦难被无视和掩盖，国有硕鼠国库虚空，官员的精力全部用于监视镇压和谄媚讨好，本来能妥善解决损失不大的天灾就会蔓延成无法控制的人祸。从这一点上讲，瘟疫与统治者的道德又的确是有关的。

把问题归咎于统治者本人并没有到达问题的本质，只谈论人性的善恶就会陷入空泛虚无当中，更务实的思考方式不是深究善与恶本身，而是善与恶的行使，是什么样的制度纵容人们作恶或者阻碍人们行善。一种制度能够让统治者的个人德性对民众产生如此严重的影响，以至于民众不得不期待统治者个人德性良好，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第一层是人们可以选出德性良好的人担任统治者，但这还不够，第二层是需要一套制度让统治者的执政行为受他个人德性影响很小，通过制度让统治者更容易行善更难作恶，到了第三层就是这片土地的德性已经整体抬得很高，无论什么样的人统治采用什么样的制度都不会很糟糕。一片土地上真正的福祉，就是哪怕一个暴戾的弱智当上独裁君主，这片土地上的人依然能过得不错。

我们现在如同在一条船上，船长已经疯了，按理说该把他关起来换个船长，但这个船长已经当了太久，大家也不知道换个人有没有能力管好这条船。人们要面对的是两个可能都很坏的结果，要么是继续留着这个发疯的船长，但

不知道他会不会一犯病把船弄沉了；要么是换一个人，但前景不明朗，可能这个人还不如不犯病时候的船长。

绝大部分人无法做出上帝视角的判断，也无法承担这个责任，只能让事情继续拖下去，要么等着船长彻底失去意识，要么等着出现一个明显胜过船长的人取而代之。或者更具建设性的意见是，大家一边做好船沉的最坏打算，练习游泳备好救生衣计划好互救方案，一边慢慢学习开船的方法，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中国人相信一句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充斥着痛苦的历史中能躲过大难本身就是难得的福气。一次大难可以让我们做一次内心体验，假设旧的自己已经在瘟疫中死去，而一个新的自己延续着未尽的念头，你会去做些什么？

我们可以自己假装已经死了，但先忍着不死，更努力更急迫地做事情，也可以更坦然更放松地享受生活。如果暂时活着如同已经死去一样，死亡便也没什么可恐惧的，如果相信人不会死两次，那么最痛苦绝望的一刻其实已经过去了，剩下的时间是在如跑马灯般回味一生，去除了生死这最大的执念之后，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是一个悲观的末世论者，但我不确定这种末日何时降临，悲观意味着我对社会崩溃坍塌的预测，并不表现在具体的个人情绪上。虽然我确定社会一天天更糟糕，末日在不远的未来会降临，那这个注定的事实却不影响我们今天让自己和他人过得更愉悦一些。

如果不是被瘟疫堵在故乡，我也想不起很多童年的事情。每天夜晚父母睡了，我独自在客厅里散步，把窗子开一道小缝透透气，嘎斯味的新鲜冷空气渗透进屋里，我望着远处迷雾中散射的灯光，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流放的囚徒。

老家的天空从我回来就一直被阴霾浓雾笼罩，倒是很像童年记忆里的样

子。小时候冬天的天空都是灰色的，但不是雾霾而是煤灰，户外无论哪里都是一层煤灰。要是下了雪，只有刚下完的时候是纯白的，第二天积雪上就漂浮了一层黑色粉末，等雪融化一点，地上混合着融雪、冰碴、泥水、黑土渣、煤灰，走一路鞋和裤脚都是泥点，要是摔了一跤就彻底完犊子了。

那时候读小学每天课间结束回到教室，老师总要提醒大家把脚跺干净再进楼，但学校领导一直也没想到在楼门口放一张毛毡垫，所以楼道地面永远是黑色的一道道脚印，如果换成红色，就很像杀人之后拖曳尸体的血迹场景。

如果环境非常洁净精致，个人的粗糙就会格外突兀碍眼，但如果环境本身就是埋了吧汰的，那人们反而更加宽容。小时候生活环境的冷和脏，多多少少降低了小孩子的虚荣需求，再牌子的鞋也得崩上泥点子，人人出门都是一件长羽绒服或者棉大衣。

这可能是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挺好的一点，共同富裕是指望不了了，环境的恶劣倒是可以在一定程度让人们看起来共同贫穷。瘟疫也是这样，大家都不能出门，出门都戴着口罩，娱乐和装饰消费大幅度降低，每天胡吃傻睡。

这次瘟疫赶上过年，很多人被迫待在家里很久，也有了更多和家人相处的机会，让人们深刻思考关于亲情和生命的话题。除了少数真的个人独立性极强的人，多数人大概还是需要亲密关系的支撑，处在家人爱人的包裹中，感受到自己被对方需要，自己的他人的需求也能得到满足，还能多挺一会儿。

今年过年是我从 18 岁离开家乡去外地读书以来，在家待得最久的一次，也是这 12 年里第一次在家过正月十五。算一算，过去我平均每年能见父母 10 天，理性地按照我们家族平均寿命来算，以现在的频率我大概还能和父母相处 250 天。

按理说我该多回家陪伴家人，每每想到这里我都觉得很难过。有人说到了

一定年龄就不要和父母多见面了，双方逐渐接受没有对方的生活，这样对大家都好。我的同龄人大多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生活被新家庭填满，和父母有了理所当然的疏远。但我由于一直单身的缘故，和父母的关系非常亲近，虽然一年只回家一次，内心却充满了眷恋，在我的生活中一直没有出现能替代这种亲近感的人。但反过来说，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早晚也会建立自己的家庭，生老病死离别都是无可避免的，陪伴爱人、陪伴孩子、陪伴父母甚至更上一辈的老人，这些是难以圆满甚至本身矛盾的。

我意识到这样想下去于人于己没有半点好处，反复踌躇只会让自己做不成很多事情，也并不会让父母开心。大概人就该走一步算一步，别往自己身上揽太多责任，能做就做，做不了也别觉得愧疚，毕竟这是多么短暂的一生。

就先活着，别想那么多。

和父母最近这么多天相处的感受，我其实很羡慕他们，或许是因为他们童年经历过比现在糟糕太多的时期，在他们成长中生活质量又确实不断提升，所以今天的生活在他们看来是难得充满希望的好日子，有一种从心而发的乐观。我意识到这种乐观是我学不来，也没必要学来的，人们只能理解自己生活的这几十年的事情，两代人之间的生活经验不一定能通用，前一代人的好极了和下一代人的糟透了并不矛盾，我们只是恰好处在波浪的不同高低区间，这也只是波浪的一段而已。

今年过年回家发现我家楼下通了地铁，之前我以为是一片荒野的运河畔也成了步行公园。我爸说天不冷的时候，他每天都去散步几圈，我专门沿着我爸每天的路线走了一次，有意想要知道我不在家的时候父母每天的生活，了解他们每天看到的图像是什么样子。

即便在瘟疫期间，河畔公园人还是挺多的，除了打球和跑步，很多人对着结冰的河道或者干枯的树林发呆，什么都不做，就那样干待着，我也站在那待

了一会儿。在北京的时候，仿佛有一个鼓吹罪恶感的精灵在肩膀上提醒自己不能浪费时间，必须做点事情创造价值或者娱乐消费，总之不能让时间白白过去。

人们充满焦虑是因为很多人能创造的价值就是很少的，能选择的娱乐消费也是很少的，他们紧张不安，觉得自己不断被别人碾压过去，像个废物点心，同时也没有享受到多少靠消费实现的娱乐，就这么委屈自己浪费生命。于是，在做事也做不成，玩耍也玩不开心的拧巴中惶惶终日。

这么想来，能有一段时间对着河道和树林干待着，任由时间流逝，这是多么美好，至少在这段时间里，你就比那些依然被创造价值和娱乐消费唬得五迷三道的人高级了一点点。

有一天我回到小时候生活的街区转转，那片从我出生甚至从我妈小时候到现在基本没怎么变化过的街区，现在也因为瘟疫产生了一点动作，各个小区开始设置路障封闭检查，每个路口都是戴口罩和红袖标的街道边检人员，恍然有些我之前去乌鲁木齐的景象。

观察群众运动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作为革命党起家的政府，最擅长的就是群众运动，必须经常保持随时动员的状态。群众运动不是让群众真的做什么，而是把群众拉到运动中来，让群众产生参与感进而依赖运动。重要的不是做什么事情，而是通过事情把人控制住，让人的精力意识在可控的范围内。优秀的群众运动就是，早上大伙儿把石头从山下搬到山上，晚上再搬下来，大家还干的热火朝天积极主动特别来劲儿。

瘟疫打乱了很多人的安排，有的爱人分隔两地，有的父母与子女则难得相处很长，也有夫妻第一次在其中一方的老家待这么久。被迫分隔与被迫相处对于亲密关系都是一种考验，正常生活的停摆让一些平时靠忙碌或者假装忙碌来逃避的事情开始浮现发酵，也让一些人难得有时间开始注意到自己一直忽视的

事情。

我在老家没有自己单独的桌子，只能等父母睡了之后在饭桌上写东西，每天看着那些做社会、科技和财经类媒体的朋友们忙碌着采访和写作，更不用说那些与医疗和物流直接相关的工作，一部分人已经开始利用瘟疫时期继续赚更多的钱了，这让我失落地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但事情的另一面，是摆脱了对于“创造”与“消费”的焦虑之外，我突然意识到不做事情也不花钱挺舒服的，至少是可以接受的，每天陪伴家人，看着外面兵荒马乱，我听天由命地享受着宁静，直到不知何时好运用完的时候。

一个比较发达的社会强制放缓发展速度，人们收缩自己的物质需求，自发减少创造与消费，人类就这样停下来让时间慢慢流过去。那种状态下，一部分人可能会回归到乡村自然经济当中，如果城市生活没有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和福利条件，那不如回去种地，人们花在赚钱和消费的时间精力减少，但原本的精神生活进度并没有停摆，可能会更多投入于阅读学习、艺术创作和宗教活动。

社会高速发展，大家都在赶一趟车，但车上的位置是有限的，有人上得去，有人上不去，下一趟车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还有没有车，所以大家都慌张地赶车，前面的人把后面的人踹下去，后面的人把前面的人拉下来，谁也别好过。现在告诉大家车没了，咱们只能一起慢慢往前溜达，走到哪算哪，大家也就松了一口气。

黑夜有一种深渊般的吸引力，迷雾中让人联想关于未来的混沌不可知，明确理性的东西就像融资策划书，不适合我的脑子，我就喜欢神叨叨说不清道不明让人充满畏惧与恐慌的东西，所以我过得像个贫穷的神棍，也算是求仁得仁。

结尾

在我上一本书《铁锈与孤岛》经过 20 个月找了 31 家出版机构之后，依然没能拿到书号出版纸质书，所以我自己制作发布了电子版，让读者们免费下载获取。这也是我写作的初衷，我相信每个时代的普通人都该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把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痕迹变成作品。如果有幸这些作品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余晖，在下个时代被挖掘出来，就会成为新时代人们建构世界观的一点点参考，我们的精神世界就因此化为不朽。

在写第二本书《盲目流动》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没有找出版机构，而是直接自己制作电子版，免费发布给读者们。所有阅读到本书的人，如果书中有一句话一个词能打动你，印刻在你的精神世界中，你就传递了我灵魂的一块碎片。

感谢你。





盲目流動

一個無業遊民自我流放的旅途

馬特


王鶴設計

馬特，原名馬特，現居上海。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曾任職於多家知名企業。他的作品涵蓋了多個領域，包括建築設計、室內設計、產品設計等。他的作品風格獨特，充滿了藝術感和創意。他的作品曾多次在國內外展覽中展出，並獲得了廣泛的認可和好評。